

目 录

辛亥革命当中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

..... 小岛淑男 邹念之译 (1)

19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

..... 弗朗兹·迈克尔 高翠莲译 邹桂芬校 (32)

清末留欧学生——福州船政局对近代技术的输入(节译)

..... 玛丽亚萨·巴斯蒂 田正平译 (54)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

..... 曾田三郎 孙国群译 袁琳校 (68)

世界生丝市场上的上海机械丝

..... 曾田三郎 孙国群译 赵宗颇校 (97)

1891年热河金丹道起义... 佐藤公彦 白子明 周泮池译 (123)

汪精卫政府成立前后的日汪勾结内幕

..... 冈田首次 柏如译 刘其奎校 (155)

1941—1945年外国对中国的援助

..... 阿瑟·N·杨格 任东来译 李安山校 (179)

美国“1948年援华法”产生背景新探：冷战战略之一面——

有限援助..... 约翰·H·费维 王一泉译 何志功校 (193)

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 沃伦·J·科恩 任东来编译 (209)

柯乐布、戴维斯与1949—1950年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新近公开的文件及评论

..... 迈克尔·沙勒 熊京民 任东来译 王冠华校 (216)

张作霖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远东年代与俄国反 革命的联系… 格·斯·卡列季娜 姚宝珠译 陈春华校 (230)	
戊戌变法与日本——论康有为对“明治维新”的理解 …………… 山根幸夫 郑海麟译 (241)	
一代鸿儒康有为和为他服务的日本女性 …………… 鸿山俊雄 陈家麟 马洪林译 (269)	
美国史学界关于孙中山对外政策的研究 …………… 齐赫文斯基 杜华译 李玉贞校 (286)	
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相逢——兼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 的地位…………… 久保田博子 齐福霖译 (303)	
孙文社会思想的再评价——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特点 …………… 全乐熙 洪韬译 (322)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5—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 …………… A·B·列兹尼科夫 宋洪训译 (332)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杜宾斯基 汤宜标译 (35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满洲形成的历史过程 …………… IO·M·奥夫钦尼科夫 杨江华译 (396)	
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 …………… B·乌斯基洛夫 罗峪华译 林荫成校 (405)	
长江流域战场的一段往事…… K·П·卡扎科夫 丁如筠译 (415)	
关于陈炯明致列宁的信和李烈钧告苏俄人民书 …………… 刘德喜译 (427)	
简评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一次知识分子革命》 …………… 冯崇义 (431)	

辛亥革命当中的上海独立 与绅商阶层

小岛淑男

(一) 前言

以上海为中心开展的各项活动，在清代末期的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若从全国范围来看，上海的活动在辛亥革命当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各项活动在政治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同它的重要性比较起来，我们对它的研究看来还很不充分。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在论述辛亥革命当中上海的独立活动时，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同盟会尤其是陈其美本人身上，把问题做了狭隘的解释，而对于光复会和立宪派的存在，则未予以充分的考虑，仿佛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而未曾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加以深入的探讨。但是，我们若能分析一下辛亥革命当中上海绅商阶层与革命派的相互关系，即可有助于我们理解“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与浙江财阀的勾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南京政府的成立等这一段历史过程。从这一点上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关于辛亥革命当中上海的独立活动，大体上只做了如下的简单的叙述：如郭孝成在其所著《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民国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一书中对于事实的经过只

做了这样简单的叙述：“上海租界内原有民军总机关，谋划各省事宜。惟民军所领之地皆在中部，无海口以资交通，不免有内外隔阂之患。故先期与巡警商团及学界等商约周妥。……”^①吉野作造和加藤繁所著的《支那革命史》（大正11年[1922年]内外书店版），看来是参考了郭孝成的著作，也只是提了一提“以陈其美为队长的革命军”和“市内各处巡警局”等等，而未及其他；萱野长知的《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皇国青年教育协会，昭和16年[1941年]版）和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等书，则完全把功绩归于陈其美一人了。

战后出版了很多有关资料。其中，如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1958年龙门联合书局版）一书，在简述上海独立经过的一节中夹叙了一段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②市谷宙三在《辛亥革命》（《世界历史大系》第14册，东亚Ⅲ，诚文堂新光社1955年版）一书中说：“上海独立，是具有其特殊性的，当地的工商业界为了维持地方秩序而组成的商团，实际上就是革命军。像这样由民军发动革命的事例，在其他地方颇为罕见。”这样叙述，实际上是把商团和革命军等同起来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上海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故事》（1959年版），也简述了上海独立的经过，略谓：同盟会中部总会开会商讨起义行动时，会员信成银行主任沈缦云建议与商团联合起义，于是就和商团总办李平书进行联系。与此同时，又由革命党人、工人和青年学生们组成了敢死队，并进而在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协力下，策动军队（清军）和警察参加起义。于是，上海的独立才被发动起来，并且取得了成功。^③

如上所述，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独立活动的内幕已经逐渐明朗化了。这说明中国绅商阶层和革命派（包括光复会和同盟会）在上海独立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

① 见郭孝成著《辛亥革命纪事本末》，第80页。

② 参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26—227页。

③ 参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故事》，第118—120页。

在怎样估价商团以及产生商团的绅商阶层(工商业界和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许多看法还有分歧。为了搞清辛亥革命的性质,对这些问题再进一步加以深入的探讨,看来还是十分必要的。

(二)商务总会

众所周知,自五口通商以来,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上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绅商阶层的势力颇为强大。庚子以后,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曾发动一次新政运动。为了对付这种“新政”的推行,以绅商阶层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各项活动,促进了绅商阶层的阶级联合。而且这些运动又多半是以上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在此期间,中国的绅商阶层一面通过筹设商会、回收利权、抵制外货等等活动,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同时还通过立宪运动、自治运动等等,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权力。

在上海,设立商会的经过情形大致是这样的:甲午战争以后成立的商务局,其官僚体制的机能并未得到普遍的发挥。庚子以后,经商务大臣盛宣怀奏准,由上海绅商严信厚、周晋镛等人出面,组成了商业会议公所,“以期各帮之联络”。接着,在“新政”运动的推进过程中,清政府内部增设了商部,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商业会议公所也把从前的各帮会(如各同乡会馆、同业公所等)联合起来,更名为上海商务总会,形成了中国绅商阶层的近代化统一组织。其后,在商务总会之下又陆续成立了沪南商务公会(后来改称为上海南市商会)、闵行镇分会、三林乡分会、马桥乡分会、塘湾乡分会等分支机构,而上海县商会和闸北商会也可以看成是上海商务总会的分会。此外,还结成了宁商总会、各马路商业联合会及其联合组织——上海各马路商业总

联合会等等。①经过这一阶段的组织建设，到民国初年，全国各地已成立了商务总会共约50余处，分会共约200余处，并且发展到海外的许多港埠。②其中，上海商务总会所占的地位更为重要，它已成为“各地商会的联络中心，代表各商会办理共同之商务”。③它的职能是：“内以处理华商之争端，外以应付洋商之交涉，为国家挽回利权”。④从而逐渐在内政、外交两方面获得了重大的发言权。

1905年，以上海为中心发生了抵制美货的运动，⑤1908年又因沪杭甬铁路借款问题发动了回收利权的运动，⑥在这些运动中，上海商务总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运动又都是促进中国民族工业勃兴的重要因素。⑦1910年11月3、4两日的《民立报》上曾刊登了一份《调查上海农工商业一览表》，说明了上海“近来新事业”的发展概况：

公司名称	资本	创办人	注册立案年月
三星纸烟有限公司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三日
中国纸烟有限公司	30000两	苏本炎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1000000元	苏本炎等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信成银行有限公司	1000000元	周廷弼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制造绢丝有限公司	400000两	朱佩珍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

① 见大谷孝太郎：《上海的同乡团体及同业团体》，载《支那研究》第19号。

② 参见《支那》5卷8期：《支那全国商业会之成立》。

③ 详见《上海之商务会组织——商业团体之大会》，载日文《时事新报》明治45年3月27日。

④ 《上海县续志》卷二，建置上，《农会商会》。

⑤ 参见菊池贵晴：《排斥美货运动的意义》，载《历史学研究》1956年3月号；又《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⑥ 参见藤井正夫：《清末江浙铁路问题与资产阶级势力的侧面观》，《历史学研究》1955年5月号；永井算巳：《江浙路事与清末民众》，载《信州大学文学部纪要》1957年11月号；赵金钰：《沪杭甬铁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抗款运动》，载《历史研究》1959年9月号。

⑦ 参看李时岳：《论1905—1908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载《人文杂志》1959年1月号。

四民纸烟有限公司	100000元	朱 畴	目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苏省铁路有限公司	10000000元	王清穆等	目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精厉实业公司	100000两	李微庄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富丰恒提炼公司	30000两	陈怡德等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立案
源泰祥合资公司	6000两	荣宝林等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目
恒裕机器锡箔有限公司	120000两	张直斋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一日
华兴水火保险有限公司	1000000两	严信厚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泰丰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70000两	王家佑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三日
中国集志社会合资公司	10000元	胡国楨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八日
源昌机器锡箔有限公司	100000元	祝大椿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公益机器纺织有限公司	1340000元	祝大椿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源昌机器缫丝工厂	500000元	祝大椿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华兴机器面粉有限公司	400000元	祝大椿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怡和源毛皮公司	180000元	祝大椿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源昌机器碾米公司	400000元	祝大椿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交换所有限公司	1000000元	袁 淦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立案
许若记丝号	15000元	许应萃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日
协和机器缫丝有限公司	160000元	楼景晖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华通水火保险有限公司	1000000两	林尔嘉等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增成地产有限公司	100000两	李厚祺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目
阜丰面粉有限公司	1000000元	孙多森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祥生烛皂有限公司	40000元	洪德生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目
四明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1500000两	袁淦等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
华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500000两	沈敦和等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
祥森火柴有限公司	100000两	洪德生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

日

日晖织呢有限公司	500000两	樊 葵	宣统元年一月二十三日
信昌碾米有限公司	50000两	沈缦云	宣统元年二月十日
北京厚德商业分银行	1000000元	顾 皓	宣统元年二月十六日
巩华制革有限公司	500000两	严良沛	宣统元年三月十日
彪家书室有限公司	50000元	施崇恩	宣统元年四月九日
裕商银行	1200000元	盛昌颐等	宣统元年四月十五日
宇丰造烛合资公司	60000元	李云台	宣统元年五月十六日
阳美宜今斋窑业公司	100000元	任提侯	宣统元年六月三日
延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00000元	林尔嘉	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宁给商轮有限公司	1000000元	虞和德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祥顺洋烛有限公司	7000两	宋季生	宣统元年八月五日
均益沙布有限公司	50000两	沈樊钧	宣统元年六月十七日
科学仪器馆	200000元	卢洪旭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华商贩运公司	40000元	姚文隄	宣统元年十一月立案
浙江分银行有限公司	2000000两	颜鍾骥	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这种趋势，有人从全国范围做了这样的分析：“最近以来，清国的实业勃兴颇为显著：自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元年，6年之间，向农工商部注册的公司，数达316家；所投资本，共达1.623亿两。这种企业勃兴，是由日俄战争以后的金融储积和中国官民间的回收利权、振作图强等热潮所引起的。……人们摒除了利害观念，力图排除外人利权，由国人自己经营。振兴企业的计划既系为此种狂潮所驱使，则其结果，终难获致良好之成效。”^①这种评论，显然是从某种敌对情绪出发的。尽管说在“狂潮驱使”下兴办起来的企业，其内部必然蕴藏着衰退的因素，认为“终难获致良好之成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排除外人利权”这种政治运动和“由国人自己经营”这种振兴实业的热情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确也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进

① 《去年的清国经济界》(下)，见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经济调查报告书》，明治44年(宣统三年，1911年)1月30日。

的国家，所以商务总会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也能够起到组织和推进的作用。

据《顺天时报》记载，1911年10月上海商务总会的阵容如下：

（见宣统三年九月六日《顺天时报》）

总 理	陈润夫(作霖)				
协 理	贝润生(仁元)	席立功(裕成)			
会 计	祝兰舫(大椿)				
书 记	钱琴西	关纲之			
接 待	周舜卿	庞来臣			
庶 务	陈辉庭	唐露园			
纠 察	倪锡涛	林运荪(世杰)			
调 查	王震(一亭)	沈绶云(懋昭)			
理 案	朱五楼	朱衡斋	苏葆笙		
	夏粹芳	苏筠尚(本炎)			
中 证	陈一斋	杨信之			
会 员	周舜卿	朱衡斋	林运荪	陈辉庭	陈一斋
	杨信之	朱舜田	王一亭	丁价侯	郑伯昭
	陈润夫	王修五	周汇三	苏葆笙	李柏保
	张效良	苏筠尚	石志相	田资民	贝润生
	王西星	早镜澄	谢客斋	洪瑞侯	潘祥生
	唐露园	葛原愚	陈彦清		
特别会员	周金箴(晋龢)	朱幼鸿(畴)	朱砚涛(琨)		
	席立功	钱琴西	宋汉章	倪锡畴	沈绶云
	孙荫亭	祝兰舫	袁葆笙	夏粹芳	黄砥玫
	庞来臣	关纲之	孙泉标	吴余森	
领袖会友	王雨亭	于兰屏(城)	江荣济(异)	费楚珍	
	吴友立	桂增元	陈利华	任炳荣	叶鸿荣
	朱吟江(得传)	姚紫若(曾寿)	杨伯平		
	张乐君(嘉年)	贾典三	芮芷香	寿秀夫	
	葛吉卿	庞琢斋	董宴秋	黄廉叔	王一亭
	朱哲甫	顾松泉(徵锡)	奚廌虞	黄星垣	

郝宗传 朱鉴堂 庞竹卿 陈养泉 朱组新
 个人会友 沈馥山 李徵五 徐菊如 汪子垣 陈煦东
 顾棣三 沈联芳 朱吟江 胡方镒 陈格清
 朱心臣 赵镜清 应筱梅 张少霞 徐养斋
 顾馨一(履桂) 陈联卿 张逸云 虞含章
 孙复瑞 马耀甫 叶明斋 李节图 纪鲁香
 孙瑞康

特别个人会友 胡筠秋 石运乾 杨振骧 徐通浩 刘绶藻
 于芑侯 罗叙义 陆葆泉 胡筠籟 陆子渊
 袁垣之 宋良才 李岳崧 屠也香 朱既醒
 周仲卿 丁耿庭 ……

上列名单并不完整，但由此可以了解上海商务总会的构成情况。另外，沪南商会(商务总会之下的分会之一)在同年改选委员时所联络的各行业及其代表的名单如下：^①

自来水公司	李平书		
银 钱 业	林运荪	叶丹庭	
豆 米 业	张乐君	顾馨一	袁祝三
汉 邦 米 业	叶惠钧	徐杏书	严润甫
木 业	于兰屏	朱省三	
花 业	吴凝园	郁屏翰	
布 业	汪宽也	胡访鹤	
商 船 号	李詠裳	朱子谦	
酱 园 业	吴笠谓	胡志源	
米 铺 业	奚赓虞	黄慎康	
典 质 业	万厚愚	汪安山	
西 烟 业	潘伯良	阎茂斋	
笋 干 业	孙永年	蔡竹亭	
粮 米 栈	高庆堂	王寿洲	
机 布 厂	陆松侯		
衣 业	陈菊由	王雨亭	朱俊臣

① 参见《民立报》1911年2月16日《沪南商会选举记》。

绸	缎	业	陈子文	严石甫	
油	麻	业	杨春坪		
柴	炭	业	魏凭文	叶佐金	
竹		业	董凤池		
砖	灰	业	吴芹甫	谢省三	邵壬生
蜡	烛	业	范崧生	汤之笙	
洋	广	业	袁锡之	沈瑞文	
草	花	业	周亦台		
铜	锡	业	张纪友	戴镇西	
漆		业	蔡友卿	杜友祥	吕妙生
水	果	业	江荣侪	李鸿琛	
纸		业	寿秀甫		
板	木	业	王烈松		
蛋		业	楼其梁		
糖		业	姚紫若		
参		业	苏筠尚	孙璽章	
乐		业	葛吉卿	杨丹霞	
南	北	业	倪槐江		
北	货	业	陆卓人		
腌	腊	业	张春园		
鲜	猪	业	倪秋霞		
冰	鲜	业	徐双麟	胡贞连	
肉	庄	业	崇品山	方镇梁	
茶	行	业	叶声远		
茶	叶	业	程伯璵	程鉴远	
皮	箱	业	陈子鑫	吴光照	
靛		业	石心田		
业	成	司	王一亭		
信	成	行	沈缦云		
交	通	司	黄友林		
大达公司			陈子岩		
申大面粉厂			顾馨一	王宝仑	

纯泰钱庄	钟禄卿
安记糖栈	伍蒿如
久记洋木号	朱吟江
万豫酱园	沈莲锬
阜昌参号	徐炳辉
地产业(个人)	戴敦川

选举的结果，推出下列诸人为第五届委员，并分担如下职务。^①

总 理	王一亭					
文 牒	沈绶云					
会 计	鍾禄卿					
理 案	顾馨一	张乐君	林运荪	苏筠尚	叶惠钧	姚紫若
纠 议	李平书	黄友林				
调 查	汪宽也	朱子谦	万厚愚			
庶 务	丁兰屏	李詠裳				
中 证	郁屏翰					

由上列组成情况可以看出：沪南商会内部，既有行会性的组织，又有近代化的企业，是由各种各样的行业构成的；然而选出的委员，则多是大资本家或近代化企业以及金融机关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同时又都是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成员。至于他们的经历，根据现有材料可能核实到的情况看来，大多数都是买办、大商人、高利贷或官僚出身。他们或投资于近代化企业，或直接经营近代化企业。如祝大椿(怡和洋行)、席立功(汇丰银行)、王一亭(日清轮船公司)、叶明斋(横滨正金银行)、虞洽卿(荷兰银行)、朱佩珍(平和洋行)、朱开甲(东方汇理银行)等人，俱系买办出身；周金箴(南昌知县，经道台转任电报局总办)、朱畴(浙江补用道，后任铜元局总办)、李平书(曾任广东省陆丰、遂溪等县知县，后擢至武昌武备学堂提调及江南机器制造局提调)、孙多森(曾任上海交通电报局总办、直隶劝业道等职)，俱系官僚出

^① 《沪南商会选举定职任期》，见《民立报》1911年3月2日。

身；他如曾铸(海商)、顾馨一(杂粮业)、叶惠钧(粮谷业)、苏本炎、郁怀智等人，则均系商人出身。

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上海商务总会，同清政府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当清政府为赔偿战费和推行“新政”而大肆搜刮民财的时候，他们虽然同清政府站在对立的方面，但是为了维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直到清政府垮台之前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国家权力之上。这一点，从上列人员的身份来看，应该说是毫不足奇的。1911年4月，即武昌起义半年之前，张謇为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4处总商会所推选，前往北京处理访美商团和中美银行等案件时，他一面扬言“此行之最大目的，在于考察现时政治中心之实况，以确定前途有无希望”；^①一面又晋谒摄政王载灃等人，进了如下的所谓“忠言”。他说：“对农工商各实业之已办者，朝廷自应实心保护；对其未办者，亦应竭力提倡，以培元气。”^②其后，当武昌起义的影响波及上海因而发生挤兑风潮时，南北商会的总理和协理立即召集各议董在商务总会讨论对策，决定选派商务总会总理陈润夫、协理贝润生及南商会总理王一亭、议董虞洽卿等人为代表，前往南京与江督张人杰筹议救济之策，使张承认了拨款400元。(原文如此——译者)此外，上海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商董沈缙云等人还同刘观察商量了“维持市面”的办法。^③并说：上海革命军起义之所以迟迟不动的原因，是由于“市民不欲惊动市面”，^④等等。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绅商阶层是在最后的关头上不得已才改变了态度，从依赖清政府转变为参与革命活动的。

① 参见刘厚生著《张謇传记》第179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4月版。

② 《辛亥5月17日召见拟对》，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③④ 分见《民立报》1911年10月22日：《沪商维持市面》；同年10月23日：《鄂江潮中之市面》。

(三) 立宪、自治运动与商团

上海绅商的政治活动，是适应着“新政”运动的推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它是立宪运动的一个环节；从地方上来看，它的目标在于扩大自治范围。1906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预备立宪的上谕，立宪派立即发出开设国会的要求，把立宪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又网罗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官界和实业界的代表，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在预备立宪公会的成立过程中，曾任上海商务总会会长、领导过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曾尽力于上海自治的曾铸（字少卿），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一同起了促进的作用。^①第二年，根据上海道台的照会，由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研究会、江苏教育总会、上海劝学所、商务总会、商会公所、商学公会、地方公益研究会、东南城地方会、西城地方会、总工程师董事会、议事会等各团体分别选出代表5人，拟订了咨议局章程草案。^②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向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等全国各地的立宪组织发出呼吁，组织7月请愿运动。8月，清政府宣布9年后公布宪法。翌年3月，清政府根据“采纳各省舆论，指陈各省利害，筹计地方治安”的精神，决定在全国各省筹设咨议局。同年7月，各省进行复选（选举，按复式进行。县为初选区，府为复选区）。10月，咨议局在各省相继成立。凡籍隶本省且具有下列条件的年满25岁之男子享有选举权：（一）在本省从事学务、公益事业满3年以上，成绩显著者；（二）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三）举贡生员出身者；（四）曾任文官七品、武官五品以上之实缺官员并未受革职处分者；（五）在本省拥有5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等等。被选举权则属于籍隶本省或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且年满30岁

① 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40页，中华书局民国19年9月版。

② 《上海市自治志》卷二。

之男子。(此处原文如此。但选举权似较被选举权更为严格，或恐前后颠倒，应请读者留意。——译者)

选举结果，上海县之当选者名单如下：^①(括弧内为得票数)

李钟珏 (81)	姚文楠 (78)	刘增祥 (64)
秦锡田 (63)	唐锡瑞 (61)	顾言 (58)
郁怀智 (58)	朱寿朋 (47)	李祖佑 (47)
马铁群 (47)	蔡正蒙 (44)	林曾贇 (44)
姚文栋 (44)	王增琪 (39)	王震 (33)
莫锡纶 (31)	朱开甲 (31)	钱椒 (30)
刘志涛 (28)	顾镜清 (27)	陆文麓 (26)
志宗邨 (23)	谢源深 (21)	吴馨 (21)
顾履桂 (20)	梅予彬 (20)	杨鸿藻 (20)
张熙瑞 (16)	苏本炎 (16)	孙涛 (16)
朱日宣 (16)	穆湘瑤 (15)	叶景云 (15)
贝仁元 (13)	顾鸿逵 (12)	朱孔文 (12)
王纳善 (11)	盛麟书 (11)	沈宗懋 (11)
蒋家凤 (11)	叶佳棠 (10)	祁祖鎏 (10)
杨辰 (10)	郭廷钰 (9)	周晋龢 (9)
沈懋昭 (9)	李厚佑 (9)	钱允利 (9)
赵履福 (9)	姚增荣 (8)	朱佩珍 (7)
吴福熊 (7)	周文彬 (7)	张嘉年 (7)
顾藩 (7)	沈功章 (7)	刘汝曾 (7)
王铨运 (7)	姚元增 (7)	潘上珍 (7)
潘紫绶 (7)	周树藩 (6)	姜渭渔 (6)
沈宝寅 (6)	杨维邦 (6)	

从上列当选人员中，又推出穆湘瑤、谢源深、姚文栋、朱开甲、秦锡田及顾言（候补）六人为江苏咨议局议员。上海绅商的意向，在这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各省咨议局成立后大约一个月，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即向全

^① 见《顺天日报》，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十七日。

国发出“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呼吁，16省咨议局纷纷响应，各派代表3名前来上海协商，遂决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1910年1月举行第一次请愿，继于同年4月，各省咨议局代表又联络各省的政团、商会及华侨发起第二次请愿，同年9月，乘资政院成立之机又提出“成立责任内阁、速开国会”的要求。清政府根据资政院的决议及各省督抚给军械处的联衔通电，于同年10月宣布缩短准备期间，于宣统五年后召开国会。预备立宪公会满足于清政府的这一诺言，停止请愿；但四川、湖北、湖南及东三省的代表仍然继续活动，终于遭到弹压。清政府的这一弹压措施，使得激进派对满清朝廷感到绝望，因而企图转入潜伏的革命活动。^①但在1911年4月皇亲内阁成立后，各省咨议局又在“举国骚然”^②的气氛中召开了第二次联合会，决定成立政党以迎接宣统五年开设国会，同年6月4日又在北京组成了宪友会，^③其政纲的第一条即宣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直到武昌事起，张謇还出面呼吁支援湖北官军，同时与江苏巡抚程德全计议，于10月21日以江苏省咨议局的名义向内阁提出“公布宪法，速开国会”的要求。^④这些事实都充分表明：直到后来袁世凯出马收拾政局的迹象明确以前，立宪派的态度一直是支持满清朝廷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地方自治运动，是“新政”运动的重要一环。在上海，清扫马路、装设路灯、构筑路桥、修整祠庙、举办团防等事宜，起先是委托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担任的。继于1895年成立了南市马路工程局，两年后改称为善后局。上海绅商在新政运动中，随着市容的整顿，觉悟亦逐渐提高。他们在“外权日张，主权寝落，道路不治，沟渠积污”和“整顿地方，以立自治之基础”的原则下，

① 参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14页，世界书局，1956年版。

② 参见《啬翁自订年谱》（《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录），1911年4月条。

③ 同①，第336页。

④ 见《张謇年谱》，1911年8月条。

经苏松太道袁树勋同意,于1905年创立了总工程师局,^①由议董33人组成。议董是由当地士绅及城厢内各行业商董互选产生的。其主要成员如下:^②

领袖总董	李钟珏 (平书)	
办事总董	莫锡纶 (子经)	郁怀智 (屏翰)
	曾 铸 (少卿)	朱佩珍 (葆三)
议 董	姚文栋 (子让)	刘汝曾 (景兴)
	林曾贲 (学罔)	严应钧 (殿卿)
	郭怀珍 (诵茗)	叶佳棠 (棣华)
	陆文麓 (松候)	顾徵锡 (松泉)
	曹 骧 (润甫)	王 震 (一亭)
	苏本炎 (筠尚)	干 城 (兰屏)
	穆湘瑶 (杼齐)	王丰玉 (访渔)
	祁祖鑾 (冕庭)	吴 馨 (怀九)
	王纳善 (引才)	张焕斗 (逸槎)
	王宗骏 (沽生)	黄庆澜 (涵元)
	程 鼎 (凝园)	李厚垣 (詠棠)
	沈功章 (枚伯)	刘桂馨 (一山)
	施非祥 (善畦)	杨高存 (丹霞)
	赵增烜 (松坪)	张嘉年 (乐山)
	朱开甲 (志尧)	沈 熙 (庆贤)
	张美翊 (让三)	袁希涛 (观润)
	沈恩孚 (信卿)	

上列议董当中,多数人身兼会馆、公所的董事,他们各自代表各种不同的行会参与了地方行政。在这时期,还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会、地方公益研究会等组织,后来各团体的代表就以地方自治研究会的办事处为集会场所,经常开会研究咨议局章程草案。到1909年,在各省设置咨议局的同时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使地方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开始施行。规定地方自治

①② 参见《上海市自治志》卷一,及《上海县续志》卷二,“总工程师局”项。

“专办地方公益事业，以辅佐官治为主”，在地方官的监督之下办理学务、卫生、道路、农工商务、公共事业以及筹款募捐等事宜。^①此后，上海城厢内外的总工程师便改组为“上海城自治公所”，于1910年1月成立议事会，经互选后又成立了董事会，其组成情况如下：^②

总董	李平书		
名誉董事	朱开甲	苏本炎	
董事	莫子经	王一亭	顾馨一
议长	沈恩孚		
副议长	吴馨		
议 员	瞿庆善（仲余）	徐志淦（问秋）	
	杨嘉谷（寿屏）	沈洪文（又铭）	
	郭廷铨（聘之）	吴炳熊（芹甫）	
	潘如梁（友梅）	蔡正蒙（山泉）	
	李厚佑（云书）	孔昭立（鲤庭）	
	沈 照（志贤）	金祖祈（兰宇）	
	李 浩（穰君）	吴宝地（叔田）	
	钱允利（贵三）	姚文栋（子梁）	
	沈懋昭（缦云）	王沛麟（星泉）	
	林世杰（莲荪）	钱福田（广甫）	
	臧清杨（廉逊）	叶增铭（惠钧）	
	爰庆良	江 异（荣济）	
	王树功（稚眉）	吴稚卿（云祥）	
	居 古（谷生）	周文炽（采臣）	
	饶景泰（霭亭）	赵秉圭（轮秋）	
	张国衡（士希）	凌纪椿（伯华）	
	朱树恒（久余）	金润章（松大）	
	张良试（誉先）	赵先第（钟英）	

① 见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议选举章程摺》，载《大清光绪新法令》第2册。

② 《上海市自治志》卷一。

金祖潜（庆候）	陆熙顺（伯鸿）
张在新（惕铭）	姚曾绶（紫若）
赵鸿藻（芹波）	宋国栋（少关）
许 谟（松春）	艾恒镇（北屏）
郁颐培（诵芬）	蒋调元（续春）
饶浩志（禄卿）	

（此外还包括前面列举的工程局时代的各董事。）

在选举的时候，按个人纳税额的多寡将选举资格分为甲乙两级。划分以后，享有甲级选举资格者334名，享有乙级选举资格者3310名，各选出议事会议员30名。^①由此可知：上海自治公所所代表的，乃是少数的多额纳税者的意见。

从义和团以后到日俄战争这一段时间内，为了“资自卫、谋富强”，人们认为有“强种”和“振兴尚武精神”的必要，从而开始提倡“锻炼身体”和“研习兵课”。^②于是，穆湘瑶在沪南组成沪学会体育部，郁怀智在闸北组成商余学会，苏本炎在城内组成商学补习会，吴馨等在沪西组成沪西体操会，李平书、王一亭等人在南市组成商业体操会，等等。^③鉴于禁烟（鸦片）运动期间有发生暴动的可能，当局要求各种体育会出动会员维持秩序，李平书、曾铸等人遂组成临时商团，设司令部，划分地区分别承担警备工作。其后不久，上述五团体合并起来，改组为“南市商团公会”，其他团体亦纷纷参加，遂又更名为“上海商团公会”，并得到官府的信任，发给步枪弹药等，进行武装。^④关于商团的性质，当时《民立报》上有一段记载，做了明确的说明：“以商人之资格，遵守约章，勤加操练，一旦有事，即挺身出队，以显武士之声威，并助兵力之不足。”上海商团公会的历代会长为：李平书、曾铸、

① 《上海市自治志》卷二。

② 《上海商团小史》，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卷，第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③ 《上海县续志》卷十七，兵防、商团。

④ 《上海市自治志》卷二。

苏本炎、王一亭、张嘉年、叶增铭；其所领导的基层商团共有：商余学会(郁怀智)、商学补习会(苏本炎)、基本商团(王一亭)、水果业(江昇)、豆米业(张嘉年)、参茸业(苏本炎)、清真回教(沙度)、洋布业(郁怀智)、书业(陈业霖)、珠宝业(杨栋生)、沪西商团(吕耀庭)、闸北商团(钱允利)、苏帮(王义经)、救火联合会体育部(李平书)、商务印书馆体育部(张国杰)等三十余个。^①

其后，帝国主义不断向中国周边发动侵略，英国侵略云南、帝俄侵略蒙古、日本并吞朝鲜，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上海各商团于1911年3月12日为迎接云南代表和革命派的宋教仁，曾召开南北商团大会。会议决定组织义勇队，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商团联合会于同年4月上旬宣告成立，公推李平书为会长，沈绶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副会长。这个联合会的宗旨是：“尽当兵之义务”；入会条件是“不论贫富，一律欢迎”；权限是“各省商团不得互相干涉。若为维持治安，公家亦只有提倡之责，而无‘调派编征’之权”。联合会在实行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发起了“爱用国货、不买洋货”的运动。^②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中国绅商阶层已经逐渐显示出对内“维持治安”、对外“伸张国权”的姿态。

武昌起义以后，商团除调动人员维持地面治安外，还在商余学会及其它七团体的倡议之下设立了上海商团筹备联合公所，推出李平书、毛子坚分任正副会长，以求组织体制的进一步巩固与加强。^③

① 参见《上海县续志》卷十三，兵防、商团。

② 参见《民立报》1911年4月13日《商团公会之扩张》、1911年2月12日《商团公会开会记》、同年5月17日《抵制洋布之大纱厂》、6月29日《商团不用外货》等记事。

③ 《民立报》1911年10月14日《商团联合之先声》。

(四) 革命运动与国民会

上海独立是在革命派的领导下实现的，包括上海在内的江浙一带的革命运动，是在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复杂的相互联系中开展起来的。1903年，留日学生的拒俄义勇军改称为军国民教育会，归国继续活动。在此期间组织起暗杀团，并由浙江留学生龚宝铨等人在上海联络同志建立了机关部。在这以前，浙江人蔡元培（山阴）、章炳麟（余姚）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致力于培养人材，但因1903年的苏报事件而遭到挫折；继而日俄战争爆发，遂又组成对俄同志会，后改称为竞存会，以图革命运动之再起。在这里，两者汇合起来，建立了光复会，结成了以浙江人、安徽人为核心的革命联合战线，陶成章（山阴）、敖嘉熊（嘉兴）、徐锡麟（山阴）、陈伯平（会稽）等人相继加入。当时的革命活动，先以敖嘉熊在嘉兴建立的温台处会馆为据点向上海方面开展；随后又以徐锡麟在绍兴开办的大通学堂为中心向浙江方面集结起来。1905年，光复会与兴中会、华兴会合并，组成了中国同盟会，蔡元培被推选为上海分会会长，旅日的章炳麟、陶成章等人担任了《民报》编辑。这样一来，光复会成员的半数以上都归到同盟会的领导之下了。其后，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同盟会本部派高剑公为江苏分会会长，同时负责上海方面的革命工作。在此期间，柳弃疾（亚子）、朱少屏等人又创办健行学会，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进展。^①

徐锡麟没有参加同盟会，仍在浙江继续活动。1906年萍浏之役以后，他想联络绍兴、处州、金华各府的学校、团体及各会党中的革命势力以光复军的名义举行暴动，后因刺杀浙江巡抚恩铭

^① 参见《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又见永井算巳：《清末的立宪改革与革命派》，载《历史学研究》，1956年12月号。

而被捕遇害。这一事件，使浙江方面的革命运动遭到挫折；1908年陈其美（吴兴）自海外归国，在上海建立秘密机关，创办《中国公报》及《民声丛报》，力图革命运动之东山再起。当时在上海的浙江同志和他共同计议：为了从徐锡麟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决定向清朝军队内部渗透，作为今后浙江方面革命活动之重点。^①与此同时，于右任在上海继《神州日报》之后，于1908年秋季创办《民呼日报》，逾年春改称为《民吁日报》，再过一年的秋季又更名为《民立报》，每遭查禁，即改头换面，继续出报，努力支撑革命的宣传工作。《民立报》在创刊的时候，曾得到沈缙云的资助，并在沈的引介下受到王一亭、李平书、张静江、叶惠钧等上海绅商的支援。当时的记者，有宋教仁、张季鸾、范鸿仙、马君武、景耀月、吕志伊、陈英士诸人。当时的《民立报》，不仅作为革命的宣传机关、而且作为革命的活动机关都曾起到重要的作用。^②

1907年5月在黄冈，6月在惠州，9月在钦州、廉州，11月在镇南关，翌年4月在河口等华南各地革命军的历次起义，虽曾使北京朝廷为之胆战心惊，然而连续的失败也逐渐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动摇。1908年8月，焦达峰等湖南同志另行组织共进会，开始单独活动；与此同时，远在南洋的陶成章、李燮和等人，在对历次因起义失败而逃往南洋的革命同志们的救济以及就地筹募捐款等问题上，与同盟会本部发生了矛盾，他们攻击孙文，要求改选总理，接着又恢复了光复会的名义。^③同盟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倾向，在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失败以后更加深刻。有人认为光复会的重建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④其后的光复会由章炳麟、陶成章分任正、副会长，李燮和担任南部执行委员，一时出现了“其时，在东（按指日本——译者）同志概皆灰心，已不过问党

① 参见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载《辛亥革命》第7卷，第152页。

② 张家云：《于右任传》。

③ 见《光复军司令李燮和》，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35页。

④ 见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载《辛亥革命》第1卷。

事”的局面。^①同年6月15日孙文由夏威夷回到日本，旋又被迫于同月25日奔赴新加坡，他也为光复会的问题深为苦恼，曾透露出要解散同盟会的意向。^②于是，谭人凤、宋教仁、赵声等人为了改组同盟会，便想另行组织中部同盟会，把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宋教仁随即奔赴上海，与陈其美等共同谋划，决定以《民立报》馆为临时活动据点。然而，当决定在广东再度发动起义的时候，谭人凤也在武汉地区把准备响应的工作做好以后，即与宋教仁、陈其美等人相偕奔赴香港去了。于是，濒于瓦解状态的革命派，遂在黄兴、赵声的领导下总算又再度联结起来，李燮和等也接受了黄兴的要求从南洋前来支援，准备向清朝发动最后的决战，一时“颇有风云际会之盛”。^③尽管如此，黄花岗一役的失败，使革命受到致命的打击，赵声郁愤而死；黄兴在失望之余，意气消沉，说“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之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④意绪转入虚无之境；谭人凤则“心志俱灰……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⑤意欲退隐山林。但此时在武汉方面，共进会和文学社都在进行组织整顿，准备通力合作，利用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乘机举事。谭人凤便把这两个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湖北中部同盟分会，^⑥又去上海与宋教仁等人计议，于7月1日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由宋教仁主管文务，潘祖彝主掌财务，陈其美、范鸿仙等人分任评议，并公推主持党务的谭人凤为议长(主席)，议定按合议制推动会务，凡事“须经评议而后执行”。当时在起义的时机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颇有分歧，谭人凤以“不限时期为原则”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⑦但又拟定“宣统五年为大举时期”，其原因是“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

①② 均见谭人凤：《石叻碑词叙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8辑。

③ 同上，第45页。

④⑤ 同上，第48页。

⑥ 同上，第48页。

⑦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09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此宣告也”。^①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在湖北分会成立的时候，谭人凤曾提出“取消暴动观念”，^②看来他已经从历次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痛感必须先搞地下工作，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群众基础之上在预定实施宪政的宣统五年与满清朝廷一决雌雄。中部总会在其宣言中还提出“共同计划”和“切实组织”的问题，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认为过去由于缺乏“共同计划”，才出现了以章炳麟为主的分裂行径和以陶成章为首的攻击活动；又由于缺乏“切实的组织”，才出现了徐锡麟、温生才等人未经入党而先以身殉的惨事。^③由此可见，中部总会虽然是从批判同盟会的立场出发的，然而它的方针却是和光复会不相同的。

在此时期，英、俄两国对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的觊觎进窥，使中国留日学生深受刺激，他们纷纷发起“回省运动”，相继归国；而以“提倡民兵”为宗旨组建起来的留日中国国民会，更向东三省、云南及上海分别派出两名代表，向当地咨议局及其他公共团体进行宣传，筹划建立国民会的分会。1911年4月23日，傅梦豪（山东）和蒋洗凡两人被派到上海，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倡尚武精神、涵养国民实力，为此，要兴办团练、体育传习所、国技保存会、军事研究会及商团等等。^④他们抵沪以后立即与上海绅、商、报、学各界代表沈仲礼、王一亭、沈缙云、杨千里、陈英士、朱少屏等二十余人进行协商，于4月26日召开大会。^⑤沈仲礼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国民会所持宗旨，在于提倡尚武精神，颇合鄙见。鄙人年来办理商团，略有成效。入会者均有军国民之资格，小则足以保乡里，大则足以卫国家。如各省皆能如此办理，中国何患不强？诸君既已志在救国，则须处处出以和平，以期有济于

① 见谭人凤：《石叟碑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辑，第49页。

② 同上，第48页。

③ 参见佐藤俊三：《支那近世政党史》，第59页，大阪屋号书店，1940年版。

④ 《民立报》1911年4月24日，《国民会代表归国》。

⑤ 同上，4月27日，《国民会代表纪事、联合绅商报学之大会》。

事实，一不招政府之干涉，二勿惹外人之嫉妒。……”他指出国民会与商团在提倡尚武精神、实行民众训练这一点上，两者的态度是一致的。

同年5月7日，上海报业公会、嘉定旅沪同乡会、全国商团联合会、福建学生会、全国学界联合会、湖北旅沪同乡会、中国精武体操会、云南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学会、四川旅沪同乡会等团体联合举办欢迎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①会上就准备军国民教育、组织民团、辅助国民会、设立总机关以联络旅沪各团体等事宜做出了决定。继于6月11日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4000余人，^②经过选举，决定由下列诸人担任会务：

会 长	沈缦云					
副会长	马湘伯					
坐 办	叶惠钧					
庶 务	朱少屏	卢韩昌	史家麟	傅梦豪		
会 计	王石麟	章木良				
书 记	杨千里	李怀霜	程文卿			
	蒋洗凡					
评 议	童弼臣	席仰高	张虎臣	章佩乙	孙劲农	王詠琴
	柳成烈等					
调 查	陈英士	徐跃远	王渠玉	王汉良	高锦舟	明少贞
	徐培圃等					
编 辑	朱绍伊	方燮尹	辜铁珊	朱伯为	桑丹生	戴伯行
	吴书箴等					

上列人员中，陈英士、章木良、史家麟等人原系中部总会成员，杨千里为《民立报》记者。当时的情况是“本会分子，原系同盟会会员者居多。”^③可以想见：这个组织，是在“不得煽动革命”的前提下、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性团体。其后，即向各地发

① 《民立报》1911年5月8日《欢迎国民会代表记》。

② 《民立报》1911年6月12日《张园之风云大会，国民会成立会记》。

③ 《民立报》1911年12月3日，《国民总会通告》。

用了组织分会、成立模范体育团的号召。浙江等省，积极响应，杭州于7月5日在迎接上海国民总会代表辛梓、农竹君、陈其美等人的会上成立了国民尚武会，推师范学堂监督徐班候为正会长、褚辅成为副会长；由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负责制订了会务章程。^①武昌起义以后，该会成员多方活跃，“从戎执先之士，以本会会员居多数。其后，会员分散各省，或在政界，或长军旅，为国民效力。”^②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中国国民会也一同归并进去了。

（五）、上海独立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不久，便发生了四川暴动。中部总会正在计划前往支援的时候，武汉方面的革命活动也顿时活跃起来。9月25日，（武汉方面）特派居正、杨玉如前来上海，一为购买手枪，二为要求谭人凤、黄兴、宋教仁等前往支援。10月3日，在陈其美寓所召开会议，决定南京、上海两地也和武汉同时发动起义。一星期后，武汉方面燃起了革命的烽火，谭、黄、宋等人急往支援；与此同时，陈其美、李燮和等人也在江南地区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上海的起义和独立，是在陈其美、李燮和等民党的领导下，经商团、敢死队等民军的奋斗以及驻防在当地的清军反正而实现的。向商团进行策动工作，据说是中部总会在准备起义的时候，由沈缙云建议进行的。^③如前所述，沈缙云当时是信成银行主持人，在上海商务总会内身任要职，同时又是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副会长和国民总会的会长。他在上海城自治公所的总会上曾向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进行策动，李平书记述当时的情况说：“8月，武

① 《民立报》1911年6月21日，《浙省国民会又盛》。

② 《民立报》1911年12月3日，《国民总会通告》。

③ 《上海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故事》第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吕起义，风声所播，咸动于中。南京信成银行主任沈缙云君与陈君（其美）志同，与余为莫逆交，介绍陈君定期相见。……”^①嗣后，李平书便与上海自治议事会议长沈恩孚（信卿）、副议长吴馨（怀疚）、自治公所董事莫锡纶（子经）等人密商，一致认为“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之义；当审查情势，以为进止”。^②由此可见，上海绅商已在“审查情势”，准备踏上革命之途了。

在此期间，南京、杭州两地的革命行动俱难发动，而武汉方面的形势又步步吃紧。因此，陈其美于11月1日改变主意，提议“上海先动，苏杭即应”，得到叶惠钧等人的支持，遂决定按此计划举事。^③2日傍晚，在自治公所内决定翌日一齐行动。李平书即与警务长穆湘瑤联系，就维持市面秩序问题共同协商，同时部署全体商团与救火联合会会员分头在城厢内外各重要地点驻守，共同防卫，“以助警察之不及”。^④在这以前，各商团已经做好一切响应民党活动的准备，11月1日举行检阅式观操，任李英为临时总司令；2日夜间，李平书又召集各商团会长开临时会议，决定以救火会钟楼的钟声九响和十三响为暗号，一齐举事，各团体听到钟声立即各就岗位。这是阴历9月13日（阳历11月3日）的信号。^⑤当天，参加这次革命行动的各团体都在南市九亩地集合，到会者以陈其美、李书平、沈缙云、吴馨等为首，共达数千之众。其中，以叶惠钧率领的商团数百名及张承樞率领的敢死队为数最多。接着便向最大目标——江南制造局发动攻击，这是上海独立过程中一场最大的战斗。早在发动攻击之前，李平书即曾向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发出劝告，略谓“人心瓦解，恐局中区区守卫不足以抵御，不如别筹保全之策。”^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平书等上海绅商阶层响应革命的一种方式。

①②③ 俱见《且顽老人七十自叙》卷三，第187—188页。

④ 同上，第188页。

⑤ 《上海商团小史》，见《辛亥革命》第七卷，第87页。

⑥ 同①。

11月3日,革命军的一支队伍未遇到任何抵抗便控制了南市,占领了道台衙门等机关;但另一支攻击制造局的队伍却遇到凶猛的抵抗,陷入苦战之中。第一次进攻制造局的主力是张承樞、田鑫山及刘福彪等率领的敢死队,这支队伍是由青年学生、工人和青帮、洪帮等组成的。张承樞是湖北人,曾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他和裁缝工人田鑫山等的“在帮兄弟”联合起来共同组成敢死队,经乃师于右任的介绍,参加了陈其美等民党领导的起义活动。^①刘福彪原系江湖艺人出身,在清末加入了青洪帮,当上头目。他闻知民党举事,前来参加,据说“商团亦从而附和,遂使竖子成名。”陈其美很想利用刘福彪的势力,但又怕他难以制御,故对敢死队500余人只发给枪160余支,以“隐防其跋扈”。^②张承樞曾说他的部属中“有少数地痞流氓”,^③当系指刘福彪等人而言。当天在进攻制造局的一役中,陈其美被俘,民军被迫败退。

在当天深夜又发动第二次攻击,终于翌日晨打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在第二次攻击中担任主力的军警,是经光复会李燮和进行策反工作以后反正加入民党的。^④在此之前,李燮和为黄花岗起事回国,后因事败而遭到华侨(曾对黄花岗起义提供援助)的抱怨,遂与陶成章偕赴上海,建立锐进学社以为光复会的支部。后来陶成章转赴南洋,李燮和遂将会务委托给同乡尹锐志等人主持而只身返归乡里。继在武昌得知革命事起,又急赴上海,在锐进学社召集光复会员,共谋响应。他一面敦促陶成章急返浙江,一面加紧向当地军警进行策反工作。自太平天国以后,江南一带的军警多系湖南出身,李燮和也是光复会里少有的湖南人,李遂通过同乡关系向当地军警进行煽动。他委托吴淞巡官黄汉湘向吴淞军警进行策动,又通过闸北巡逻队队官陈汉钦鼓动上海军

①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见《革命逸史》第5集。

② 《青洪帮刘福彪》，见陈伯熙著：《上海轶事大观》上，第27页。

③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

④ 参见钱基博《辛亥革命光复实录》，载《辛亥革命》第7卷。

麟反正，以此建立起光复军。后来陈汉钦因事机泄露而提辞前义，警察和各军营立刻响应，纷纷打出光复军的白旗，陈汉钦遂率领这支反正的军警武装攻占了制造局，救出陈其美，实现了上海的独立。同日，黄汉湘也在吴淞举事，成立了军政分府。

11月4日夜，上海各界领袖在海防厅聚会，协商组织沪军都督府。^①军警方面咸推李燮和为都督，绅商方面则多拥护陈其美，双方发生分歧。后经陈汉钦出面调停，由陈其美任都督，李燮和转往吴淞军政分府，称吴淞都督，继又号称光复军司令。这时，章炳麟自日本、陶成章自南洋相继归来。其后，章炳麟与汤寿潜、张謇等人共同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继又改称为统一党。沪军都督府则由陈其美任都督，李燮和、华振基、虞洽卿、李显谟、曹雪庚、张人杰、沈恩孚、陈汉钦、叶惠钧、周舜卿、朱少屏等人任顾问。其下，由李平书任民政部总长，朱葆三任财政部总长（继沈缙云之后），郁怀智、张静江任副部长，王一亭任商务部总长兼交通部总长，虞洽卿任外事商务部副部长，吴馨任上海县民政长，穆湘瑶任上海县警务长，莫子经、顾馨一两人分任上海市政厅正副厅长。由上列名单可以看出，推陈其美为都督的上海绅商阶层在都督府内部占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所组织的商团，继续编成义勇队等参加对南京的进攻，一时颇为活跃。另外，在4日夜召开的会议上，张承樞领导的敢死队曾有多数人参加，他们极力推举张承樞为沪军总司令，不肯相让，但因张本人表明辞意而被改任为北伐军总司令。^②由此可以看出，敢死队一派人对于都督具有相当的牵制力。如果大胆地加以推想，也许这是都督府为排挤李燮和而利用了这股势力。当时李燮和曾受到暗杀的恫吓。后来光复军首领陶成章为了汤寿潜的继任问题即浙江省的控制权问题（继汤寿潜之后）也和陈其美发生了争执。章炳麟曾经

① 《上海商团小史》，第89页。

② 见前引《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

透露：陶成章是被陈其美的打手蒋介石暗害的。^①当时光复会方面的评论称：陈其美原系“贪财好色”之徒，“一时有‘杨梅都督’的诨号。”^②张謇也曾遣责过沪军都督府的腐败情况。

苏州方面，得到民军占领上海的消息以后，地方上的有力分子也开始活动起来。李平书曾亲赴苏州劝说巡抚程德全宣告独立，紧接着上海民军也派来代表多方活动，及至当地新军坚决要求独立时，程遂于11月21日以张謇为议长召开了临时省议会，不久以后就在程德全的领衔下成立了江苏都督府。程德全任都督兼参谋总长，顾忠全、钮永健任参谋；宋教仁任政务厅长；马良任外务司长，杨廷栋任次长；张一麐任内务司长，沈恩孚任次长；蒋懋昭任财政司长，姚文楠任次长；沈缦云任通阜司长，陶逊任次长；陈懋修任军务司长，张一爵任次长；参事会长则由范光启等担任。从这个阵容来看，在江苏都督府内立宪派所占的比重很大。

（六）、二次革命

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议结束以后，成立了为袁世凯所控制的北京政府，而宋教仁等人却为实现多数政党制和责任内阁制而继续多方活动。在此期间，以立宪派为中心而结成的共和党逐渐显露出甘心给政府做附庸的面目，宋教仁等为了同他们抗争，遂将统一共和党、国民公会等一些小党派联合起来组成了国民党。自从革命爆发以来，同盟会这个组织在逐渐走向公开化的过程当中已有许多投机分子混进来，及至改组成国民党的时候，它的面目就更加模糊不清了。我们且来看看当时国民党上海支部的构成情况^③：

① 马叙伦：《光复会，附陶成章之死》，载《辛亥革命》第1卷，第520页。

②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第49页。

③ 《民立报》1912年12月20日，《国民党消息，上海分部职员表》。

部 长	王一亭	
副 部 长	沈缦云	朱葆三
总务部主任	金 浩	(铁军)
政治部主任	高德光	(次舟)
文事部主任	高德录	(锦舟)
理财部主任	顾馨一	
交际部主任	项燮藩	(学坤)
评议部长	江确生	副部长 叶惠钧
常驻议员兼书记		

殷震宇 (兰荪)	翁锡荣 (圭臣)
杨天骥 (千里)	沈亮棠 (戟俄)
董震欧 (襄君)	许少亭 (静波)
朱曾畴 (少沂)	陈问安 (颂山)
殷正详 (筠孙)	陈竹贤
沈仲礼	周金箴 李登辉

从上列阵容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成员都是在上海独立过程中曾经活动过的绅商阶层。由于这个原因，国民党才在国会选举中获致大胜，提出了建立政党内阁的主张；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领袖宋教仁于1913年3月遇刺后，立即发生了内部动摇，有些人陆续退党或者企图另建第三党；与此同时，国民党国会议员团中的蔡元培、汪兆铭等人（对于宋案）又不想进行武力抗争，而企图通过法律手段求得解决。当时主张武力抗争的人，除孙中山外只有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三个都督而已。接着，袁世凯就强行签订了大借款合同，悍然罢免了三个都督，遂致惹起了第二次革命。上海方面也于7月17日以陈其美为总司令组成了上海讨袁军。

在此期间，县商会、商团公会、教育总会、救火联合会等四个团体，为了维持秩序，组织了保卫团，以李平书为团长，莫子经为副团长，陆松侯、顾馨一、王引才、贾季英、朱鉴堂、苏筠尚、马良骥、凌季潭、毛子坚等人为参议。李平书以“不干涉军事”为条件承担了这一职务。不久，南京举事，上海响应。

7月15日警务长穆湘瑤辞职，翌日，南市巡警暴动，李平书予以解散，在市政厅内另设保卫局，命商团及救火会会员分驻各要地担任警备。但各绅商对第二次革命不感兴趣，商会曾致电参、众两院，反对“叛乱”；保卫团也召开会议，主张法律解决，避免战争，并决定向南北两军进行呼吁。于是，县知事吴怀疚亦效法警务长穆湘瑤之故智，称病辞职。^①

上海讨袁军司令部在南市成立后，南市居民深恐遭兵火之殃；但以制造局为中心的一场攻防战，势在不可避免，李平书只能表示“但望炮火不及南市，且勉尽保卫之责。”^②22日，陈其美率领南军（包括刘福彪的敢死队）在钮永建等松江军的援助下开始了连续5昼夜的战斗，但因北军的炮火波及租界，引起了外国领事团的干涉，吴怀疚、莫子经等又要求由北军保卫上海；同时，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亦发出停战呼吁，基此种种，最后遂由伍廷芳出面斡旋，实现停战。于是，讨袁军退出上海，吴怀疚、穆湘瑤复职，李平书和沈缦云则分别逃往日本和新加坡。^③由此可以看出，在上海绅商内部，接近革命派的人们已在接近立宪派的分子的压力之下逐渐被排除出去。在这以前，当陈其美辞任沪军都督的时候，上海绅商已有和北方特别是梁士诒一派加紧勾结的迹象，^④张謇则以商务总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熊希龄内阁，致力于实业振兴。第二次革命的结果，商团受到“袒南之嫌”，市政厅亦被解散而另成立了工巡捐局。经过这样一些周折，上海市政又复归于袁世凯的势力控制之下。直至第三次革命爆发，李平书等人才从海外归来，响应护国军。其后，在军阀割据的形势

① 参见1912年7月20日《民立报》：《南商界之声嘶力竭》，《吴怀疚翩然远引》。

② 见《且顽老人七十自叙》卷三。

③ 分见《民立报》1912年7月24～29日：《高昌庙决战记》、《红十字会之纪事》、《呜乎，外交团干涉之渐！》、《三翻四覆又有此计》、《调和家煞费苦心》、《穆杼斋得意之秋》、《李平书何所适从》等文。

④ 参见《浙江财阀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载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0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上海绅商阶层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姿态以求适应环境，到五四运动以后，革新势力逐渐抬头，而上海绅商阶层也逐步加紧了同中国国民党的联合。

(七)、结 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辛亥革命来看看上海绅商阶层对于革命的态度。前文已经说过：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己），在紧要关头由支持清朝政府一转而变成参加革命，同时想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再从革命这一方面来看，革命党人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便转而采取了发动地方势力策划起义的方针，如在武汉策动新军、在上海联合商团和敢死队等等，在这些方面虽然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其本身的核心力量薄弱，故其结果反而使革命的主导权沦入地方实力分子之手（如旧官僚、军阀、绅商等）。但无论怎样，革命派总算以江浙地区为基础，成功地发动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南京临时政权。从这一点上来看，对上海起义进行必要的分析，这对于探索辛亥革命的性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上海起义，与其说是靠着革命派的组织力量发动起来的，毋宁说是在革命派同商团（绅商）、敢死队（会党）等这样一些时而接近时而背离的两种势力相互联合和利用中取得成功的。这一事例，典型地说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译自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编《东洋史学论集》第6辑：
《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第113～
133页 邹念之译

19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

〔美〕弗朗兹·迈克尔

地方主义一直是中华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所谓“地方主义”，是指在中国的一些关键地区，出现了军事和政治权力的中心，它们承担着政府的某些重要职责，但它们仍然处在国家的体制中。当朝廷中央政府的权威遭到削弱，朝廷政治上的跌落要求建立这样的地方政府机构的危机时期，地方权力的中心就应运而生了。

19世纪是这样一种内部危机的时期：清朝，由于行政和军事组织的衰落而削弱，又因许多次威胁王朝生存的反叛而动摇。在这个混乱和反叛期间，一些杰出的绅士领导人组成了一支支地方武装。象曾国藩这样的人，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并成为李鸿章的师长和年长的同僚，李鸿章是当时中国的领袖人物之一。这些地方领导人在自己的家乡地区组织起自己的武装，把以地方为基础的军事力量和忠诚于他们的政治组织联合起来，从他们所占有的地区取得财政上的支持。这些地方组织给它们的领导人提供了自治权力的基础。

然而，他们并没有向清政府本身的最后权威进行挑战。他们行使的权力确实侵入了一个强大的王朝政府决不会允许侵入的权力的中心领域。但是，遭到削弱的清政府无力履行它的行政和军

事职责，从而留下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这个真空被地方领导者填补了。尽管这些地方主义者承担了军事、行政和财政权力，但他们仍然承认国家的王朝中心基于天命的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因此他们承担的权力和他们地方官僚机构的组织处在王朝国家的体制中，尽管同时又削弱了王朝的权威，促成了清王朝的最后垮台。

是什么原因使这样的地方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的？决定这些地方组织性质的又是什么？答案在于中国社会的官僚性质；中国社会和政府间的关系；受过教育的名流绅士的特点及其在社会和政府中的作用；也在于中央政府对它的地方行政保持控制并在政府权力与儒家社会秩序范围内的自治权力之间保持适当平衡的问题。的确，考察整个帝国体制失去平衡时出现的地方主义现象，能使我们对儒家社会和政府有效地发生作用时期所存在的平衡与紧张的复杂体制有更清晰的认识。

绅士的双重作用

由于中华帝国受过教育的名流即绅士所起的双重作用，使侵入王朝政府权力内的地方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绅士，产生了管理中国社会事务的领导阶层，也形成了政府要从中选拔官员的阶层，所以政府必须依靠他们。

当中央权力衰落时，地方政治组织就得以建立起来，并承担政府的某些职责，因为受过教育的名流这一阶层仍然保持完整，政府是从这个阶层中给它的组织配备人员的。这些受过教育的名流继续担任社会公职，而且他们总是准备领导或转到新建的政治组织中去尽职。形成社会延续与政治改组之间联系的是绅士在政府和社会中的作用。

绅士在帝国的社会和政府中的作用是以他们被公认的优势为基础的，即掌握人类行为规律的知识 and 被社会承认的人类事务的管理能力。他们的权威则是基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通过这种

教育，他们不仅得到了管理人们和处理事务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书写官方语言的技能，历史知识和政府工作实践的知识，而且精通处理现存社会秩序内的事务的方法。但最为重要的则是受到儒家伦理箴言的谆谆教诲，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绅士是儒家秩序的守护者和代表者，儒家秩序赋予他们以仲裁者和组织者的职责，他们通过实际运用儒家伦理信条，来履行这个职责，这些信条是处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准则。通过那些被接受了的人类行为规律的知识，这些受过教育的名流就成为一个职业团体，为使儒家秩序起作用提供必不可少的管理事务的人才。通过接受儒家经典教育，他们得到了这种资格，并通过考试制度而得到王朝政府的承认和保护。

王朝政府和受教育的阶层——绅士的关系，开始于早期的帝国时代，当时的汉朝统治者通过儒家学者使国家安定，并接受了他们对国家的服务。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朝廷同意儒家对社会制度的解释，同时也得到了儒家对政府的承认。到了宋代，受过教育的名流和政府的这种关系由于科举制的全面发展而正式化了，科举制是国家对绅士的功名资格的承认，这种资格是担任官职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到清代，这种科举制进一步复杂化。绅士的领导地位和特权完全取决于功名等级，这种等级确定他们的资格。这样确定的资格不仅使绅士垄断了国家政府官职，而且使政府承认他们作为社会公职人员的独立地位。

政府接受绅士作为社会公职人员的作用是保持中国制度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华帝国的历史以其信守传统长达两千多年而著称。然而正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传统及其文化基础，而不是政治制度，使中华帝国的历史得以延续。带着周期性危机和新发端的王朝历史的不稳定，与帝国时代社会制度的秩序的相对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中国传统的延续有赖于社会秩序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社会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因为王朝政府的活动范围远小于通常承认的范围。政府本身主要关心的是被

认为对政权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对它的势力和控制来说非常重要的领域。军权在原则上是属于政府的特权；法律禁止百姓携带武器。^①而且只有皇帝的文武官员有带兵权。王朝政府保持征税权。政府垄断了任命文武官员的权力，这些官员要对政府的首脑——皇帝完全负责。政府也有立法权，尽管它的法律只是一部刑法，也只限制在它所适用的范围内。^②这意味着它支持儒家的道德准则，这种道德准则是所有人类关系的基础。在这些领域，政府努力维持其垄断权，但在其它领域，尽管官员们可能也很活跃，而政府并没有试图垄断它们；官员们的许多行动是隐蔽的，并与地方绅士领导者的独立权力有联系。

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之有限，从政府官员的人数之少中可以容易地推断出来。在清代，只有约4万名文武官员——其中大多数在京都——在他们的幕僚和下属人员的协助下，处理政府本身应该解决或试图解决的所有问题。官员的人数之少和获得功名的整个绅士团体的规模之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官员就是从绅士中选拔出来的。在清代，大约有100万到150万名绅士成为社会领导者。他们能够处理政府所不能处理的事务。^③

尽管大多数绅士从未担任政府官职，但在他们家乡和所属省

① 一方面政府除它的军队外，具有禁止个人拥有武器的倾向，另一方面，为了防匪自卫和处于不稳定时期，有必要允许公民拥有某种武器，这二者总是存在矛盾。在许多涉及这个问题的政府的规定中，这个特点显而易见。例如见《大清会典事例》，崑岡等编（上海1908年），第772卷，第3a—4b页。在严刑的威胁下，坚决禁止支配人马，拥有盔甲盾牌、枪炮、大信号旗。然而使用弓箭、矛、剑、弩和叉戟还是允许的。有一个时期即使这些武器也禁止使用。见《清朝文献通考》，万有文库编，上海1936年，第195卷，第6569页：顺治五年（1648年）“严私藏兵器之禁，刑部议准，嗣后除任事文武官员及战士外，不许收藏铳、炮、甲、胄、枪、弓、刀、矢等武器，违者本人处斩，家产妻室入官，邻佑十家长杖、流。”而一年之后，这个严格的规定又修改了：“六年，复以民无兵器不能御侮，所为贼利，奉谕：除火炮与甲胄仍照例严禁外，其三眼炮、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所存留。”

② 见弗朗兹·迈克尔的《法律在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和共产党中国的作用》，《中国季刊》1962年，第1—3期。

③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111页。

份却发挥了各种作用，这正是社会福利和政府安全所依赖的。绅士们所做的活动包括仲裁、福利活动，管理和联合管理极为重要的公共工程，以及教育绅士后代和维护儒家制度本身。在他们的活动中，绅士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非按政府的命令和行政机构的规定行事。他们的职责不象那些官员——对皇帝负责。对他们来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赋予他们服务于社会的义务，“肩负人类的重任”。虽然他们的责任是不仅包括对社会忠诚，而且包括对儒家政府忠诚，但如果统治王朝失去“天命”，这种忠诚就不一定集中在它的身上。

尽管绅士的这些活动不是在政府权力的控制之下，但它却和国家的政治机构相联系着。绅士在他们的家乡和所属省的管辖范围内发挥他们的作用。绅士活动的区域并不是他们自己地产所在的地区。^①绅士的社会职责是个专门团体的职责，他们的职务和权力取决于通过国家的科举等级获得的受教育资格的证明。这些等级被配置给各地区和省——绅士发挥作用的政治区域。所以绅士在社会中的独立权被置于国家政治部门的机构中，这种体制提高了绅士的社会领导作用的重要性，而且促进了这种作用向国家结构中的政权作用的转变。

在这些地区，绅士担负着大量广泛而不同的任务。他们充当个人、家庭、村庄甚至地区之间的地方冲突中的仲裁者。他们必须关心贫困者和残弱者，他们组织救灾粥场和义仓，募集、提供资金用来减轻最贫困的人的困难。他们组织和管理地方公共工

① 土地所有权既不是权力的基础，事实上也不是绅士收入的主要来源。总的说来，绅士既没有大量来自土地的收入，也没有人地产的永久拥有权。一些绅士根本无土地。尽管大多数绅士把一部分钱投资于土地，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公职。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规定，财产的分散是通过继承实现的。因此大地产，除中国特殊规定的例外，都不能被集中掌握很长时间。土地不是政权的基础。见弗朗兹·迈克尔为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所作的导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程：修路，筑桥，建防洪堤坝，修建对农业经济有至关重要作用的灌溉和排水渠。仲裁、慈善事业和公共工程可大可小，大事显然是很重要的，小事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孤立活动，而是系统地处理关系到本地区人民利益的许多问题。总之，绅士的活动决定着他们所在地区的福利、稳定和秩序。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绅士是一批社会公职人员，他们是处理司法、经济、福利和其它问题的职业管理人员。他们所受的教育给他们以道德准则的知识，而这个准则是处理儒家社会中人类事物的行为规则，从而使他们胜任这样的工作。^①这种准则为他们在已成为官僚政治的社会中处理决定广泛领域内的事务提供了一致的标准。

国家和社会

然而政府官员的工作和社会绅士的活动没有明显的界线，也不截然分开。例如在公共工程的重要区域，官员与绅士的管理和责任有密切的联系。尽管小型工程经常由绅士承担，有的有政府的正式许可和参与，有的则没有，而大型工程都由政府组织、不断指导和提供资金，但必须有绅士予以帮助。即使官员在组织公共工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也依靠绅士的合作，召集地方居民和经常提供从有关地区筹集的资金。例如在清代，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几乎所有公共工程，即使不是绅士自己做的，也都有绅士参加。政府和绅士的这种合作在许多其它领域也都可以看到。没有地方绅士的实际合作，地方官就无法管理所属地区。

既然绅士在一些地区和省内已承担着重要的政府职责，那么只要情况需要或机会出现，他们的职责就会扩大。如果政府内部

^① 弗朗兹·迈克尔：《法律在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和共产党中国的作用》，《中国季刊》，1962年，第1—3期。

的衰弱和腐化使官员的活动涣散或者毫无效用，即使政府处于强大时期，那些有行政垄断权的机构也可能被这些地方领导所接管。那些从政府官员手中脱离的权力可能被地方领导所占有。这些领导者靠地方军队支持，能在当地或地区的基础上重建政府不能维持的政治组织和势力。在这样的危机期间，绅士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威望和教育的垄断权。这使得绅士领导成员中的一些人从他们的社会基础上被提升，在新建的地方政府的组织中承担起官员的职责。所以有这些绅士中大量受教育的名流的存在和他们处理大量政府事务的独立作用，不仅是传统秩序在危机期间能够存在下去的基础，而且对中央政府控制的行政机构也是一个潜在威胁，因而对朝廷来说也经常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因素。

也许有人想确知绅士的这种作用。即使在帝国末期，清朝在行政制度和方法方面也还是十分老练的，为什么还要把它的官员和行政活动限制在政府最基本的范围内？为什么它如此强烈地依赖绅士在它自己的发动下去处理地方事务呢？政府当然有权制止平民任何真正的自治，设立控制他们的附属机构，诸如保甲和里甲，这表明政府要防止任何这样的地方自治。那么为什么政府不通过任命其直接控制下的官员和下属官员去管理所有的政府事务呢？为什么政府给绅士如此之多的灵活性、特权和责任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实际上在于绅士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没有哪个皇帝能离开这种权威。

绅士们的儒家学问不仅给了他们进行专门活动所必需的公认的人类关系准则的知识，而且给他们以解释这些社会准则的权力，这个社会有赖于儒家信条。儒教准则基于一种对社会秩序的解释，这种解释就其本质来说限制着政府的司法活动，同时也把人类间关系的庞大领域留给社会道德准则去处理，而运用这种道德准则的人则是那些被认为精通它的人。所有这些传统都保留在绅士的手中。绅士对国家的贡献取决于朝廷对儒家体系的全盘接受。绅士本身作为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教导者在发展和传播儒家传统。

任何要限制和损害他们作为教导者和社会领导者作用的企图，必将触及儒家制度的核心。

这种情况使与国家首脑即皇帝有关的统治阶层处于一种特殊地位，皇帝，天命的承受者，在理论上说是具有绝对权威的，但他也要依靠绅士实现他的意志。他的问题是保持中央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只有一部分官僚机构存在于他的政府机构之中，在政府机构之外的官僚机构，从事教育和传播伦理价值、信仰、思想的体系，这个体系保留在政府控制之外，并被认为是绝对事实的一部分，皇帝接受了它，象它的卫护者——受过教育的名流和所有信仰它的人接受它一样。

王朝政府只能努力把这种文化领域和政府自己的权力体系联系起来。为此，政府建立了科举制度，通过它，使儒家教育的成果得到正式承认。这种科举制不仅使受教育者得到政府的承认，而且实际上，可使政府对社会领导的选择有所依据。在清代，只有那些得到科举功名的人能被正式承认为有特权的受过教育的团体的成员，通过确定考试人数，政府成功地限制了绅士并取得了承认这个团体的某些控制。

政府和绅士的利益大都是一致的，但也有分歧。防止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一种反对力量并成为一种危险是政府所关心的。同样，保持特权和保护地区和团体利益，反对过多的中央权力，则是绅士所关心的。中央政府与绅士间的冲突，如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将有利于彼此检查对方的弊病，但也能导致令人窒息的一致或政府的垮台。

清朝以一种弄巧成拙的体系作为控制政策

政府官员和绅士的职责没有明显的权力上的界线，代表国家政府利益的官员同时也是他们家乡地区的一名绅士。中央政府努力避免的危险是绅士侵犯国家权力和僭越政府官员的权力，最重

要的是在建立中央政府再也不能控制的地方官僚权力的中心时，地方官员和绅士力量联合起来。为了防止这种威胁，每一个朝代的帝国政府都制定一系列措施，分化和控制政府行政官员的权力，管理和控制绅士。这种措施最后变得更复杂了，在清朝统治之下，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但那时，象早期一样，它们并没有阻止中央控制的最后崩溃，事实上却加速了王朝的衰弱。

为了控制绅士和官僚的权力，清王朝，象以前的帝国政府一样，广泛地运用了一个集团牵制另一个集团，一个官员牵制另一个官员的办法。一个异族王朝能依靠本民族作为其权力的主要来源。满族是使用这个方法最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便是一个异族的团体能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中国的行政制度内。^①

在官员内部建立起来的互相牵制仍是较为重要的。在清代，人们可以分清宦途的两种形式：在中央政府中尽职与在当地和地区行政机构中尽职。在朝廷和中央政府机关的内部，官员集团与在地区、县、省里发迹的官员是有区别的。^②在省内和地方的行政官员本身的职责，都被分在一个系统里，在这个系统里没有一个人拥有全权，而且每个官员都被用来牵制另一个。在地方一级的官员中权力的分散和重叠很显然是个安全措施。在清代，总督、布政使、按察使、盐政、学政、巡抚都向自己的上级权力机构负责，但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各自的职权范围。他们需要合作，彼此又是竞争对手。他们由中央政府任命，这决定着他们的一生。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上告彼此的情况。他们中的任何人，即使是

① 弗朗兹·迈克尔：《满族统治的起源》（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42年，第6、7章。）

② 有具体例子。参阅郭良和：《清朝的军机处》，见《远东季刊》第11期（1952年）第167—182页。

总督，也不能完全控制所管辖的地区。^①所以没人能组织他的官僚机构与政府对抗，但也没人能迅速行动，积极带领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或为了全面改革采取新措施和变革。

在中央政府中，任命的任何一个职位都同样缺乏权力。实际上万事都依靠皇帝。这种制度是奖励给人以安全感，而不是奖励积极性。为阻止官员和绅士之间的联系，任何官员不得在其家乡和本省任职，每个官员的任期很短，以至于不能和地方领导相识和接触。^②这种措施的用意在于使官员和绅士隔开，但对政府工作效力是不利的。

然而保持帝国政府权力的主要手段是保持对三个最重要的权力范围的垄断(或近于垄断)：官员的任命权，税收控制权和军队控制权。一个强大的帝国政府应该在这些领域拥有全权。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控制要是受到侵害，就标志着王朝的衰落。

清政府在这儿方面失去控制，是由于整个官僚机构的效率日

① 《清国行政法泛论》(东京1918年)第2卷列举了关于官员互相汇报对方的简要实例。该书是由七卷日文著作压缩而成的同一书名的中文译本，1915年在东京发表。“根据实际情况，总督在职权上担任监察上的次要官衔，且有负责监察京城和各省的上百官员的作用，这个作用决定着他们的成败、善恶。所以他们的监察权扩大到他们的下属官员以外。他们可以弹劾同级甚至高于他们的文武官员。这种弹劾权力实际上适用于总督，学政，皇帝钦差大臣，满族驻防营的鞑靼军官，绿营兵的提督和其他高级官员”(第54页)。

“巡抚巡查府、县和附属县及各部门，考察〔官员〕的勤惰，分析他们是否有能力。然后向地方法官汇报，地方法官再与总督和巡抚联系”(第79页)。

“各部门或地方〔官员〕品质的好坏、勤惰，将被告知于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再提升或责难他们。”(第90页)

② 《大清会典故例》第47卷，第1a-7a页。也见《清国行政法泛论》第2卷第52、64、382页及其后诸页。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伦敦和纽约：朗曼·格林，1910—18年)第1卷第8—10页中把全部问题概括为：“所有的地方官……都由北京任命……一个职位通常以3年为期，低职官员一律按此条例；他们也许会被再次任命，但他们最迟也必须在第二个三年任期内的后期，在新的环境内重新扎根，还必须再次为维护他们的长官尽力。……对某些特别有利可图的职务，一般任期只一年。另一个限制在中国是独特的，而且从未放宽：没有任命任何一个文官担任他所出生的省内的官职。”

益降低，这种情况同以前历朝出现过的情况一样。这种衰弱归因于腐化，这在中国史料中多次被提到过；而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这个因素是中国历代王朝垮台的主要原因。腐化本身是某些内在因素引起的一种现象。腐化不能用它自身来解释。某种腐朽也许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中和中国所有时代中。只有当腐朽达到使整个行政组织变得毫无效用的程度时，它才会导致政府的垮台。为什么它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它何时达到危机点？答案是也许控制体系本身引起自身的衰落。牵制体系，权力分割，恐怖的使用，时常打击个人和家庭，有时为阻止独立和自治而打击整个集团，这种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弄巧成拙了。它挫伤了所有的积极性，阻止了所有的机智行动，它把行政机构窒息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只能实施日常措施，官员不能自如地应付急务，这就妨碍了整个行政组织中精力旺盛、雄心勃勃、有进取精神的官员。它没有给新的投机留有任何余地。超过别人的唯一办法是从现存政府收入中得到更大的份额。为了保持甚至提高他们自己的俸禄，官员们不得不组织起自己的派系以确保他们的职位和作用，防范竞争者和对手的害人之意和诬言。所以这种体制本身在阴谋和玩弄权势的气氛下，使定期的送礼和贡物成为必要，谁也逃脱不了这种气氛。正是这种体系的安全措施导致了它的崩溃。

政府权力最后求诸的是军队。军队的胜利是建立新王朝的基础。中央控制军队是他们权力继续存在的保证。但军队是行政组织的一部分。它也有腐化的倾向。当官员私吞士兵的饷银，军队由于士兵逃跑而变得空虚时，中央军队变得毫无战斗力，甚至成为不稳定的另一个原因。

清军及其衰弱

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满族以军事力量的混合体开始了他们的统治——他们自己的八旗军和汉族职业兵即绿营。在这些军事组

织内，对中央控制及其安全的强调达到了顶点。

当满族人建立起八旗军时，他们已经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①。即没有一个军事将领有全权。^②八旗军军政合一，每旗都有分给自己的农业土地，但这些土地由零散的小块组成，这些小块土地与属于其他旗的土地混在一起。所以没有设立区域性的单位，每旗有一个被任命的官员把持着官僚的行政机构，出征时军事指挥临时任命，每支军队由来自不同旗的小单位组成。

征服中国后，八旗军变成一支特殊的帝国武装，是一种护军营，驻防在京都和国家有至关重要战略意义的一些据点；一部分八旗军留在满族地区。每支防军由来自各旗的单位混合组成，由各旗的行政组织供应。甚至满族自己的护军也由行政上的保护者牵制，这只能妨碍它的军事的效用。

绿营兵以小股驻军分散在全国。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离自己最近的满族驻军集中的军事力量。绿营兵是职业兵，他们依靠薪饷生活，通常是所在驻防区的本地人。绿营的军官是官僚机构中的成员，他们的职位经任命而成，不许在他们的家乡地区或省内任职；他们经常轮换；他们的前途取决于中央政府。^③在绿营兵中不存在中央指挥，皇帝仅保持至高无上的军权。总兵和提督指挥几个营，但他们的权力被复杂的牵制和平衡体系所限制，有的军队处于巡抚和总督的控制下，但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之间没有明显的权力划分和指挥上的联系。为了他们行政区的防务，即使比较低的行政官也可控制军事力量，绿营的管理掌握在六部之一的兵部尚书手中。

只要承担了战斗任务，统帅就必须特别任命，他统帅的部队是从几个驻地调拨来的八旗和绿营组成的混合军队。显而易见，这些军事力量的管理和部署是多么笨拙不堪，他们要受整个行政

① 见弗朗兹·迈克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6章。

② 见《大清会典》，第35卷；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77—182页。

组织弊病的影响是多么不可避免。

八旗和绿营的衰落在18世纪已经出现，到19世纪中叶最为严重。八旗军首先败坏，他们的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服役，禁止离开部队从事农业或任何其它职业。他们是有特权和薪俸的团体，与一般的汉族人生活隔绝。驻防兵的薪饷从王朝开始就确定了，且一直保持不变。当旗人家族人口增加时，就没有额外的资金把相应数量的职位加在士兵身上，薪饷就不足了。薪饷是根据17世纪中期的物价确定下来的，而在18和19世纪物价上涨了4到10倍。^①开创时充足的薪饷对这个军队来说成了不足的赈济品，而军队由于缺乏训练和常年的无所事事，风纪败坏了。皇帝曾几次给八旗驻防军一笔专款进行分配，以减轻他们经济上的困难。但当这笔钱花尽时——花得很快——情况并没有任何变化。满族人面临一种选择：或者允许旗人从事某种职业与汉人合并，或者继续保持他们作为一种特权衰败的、与汉人隔绝的团体。他们选择了后者，而且希望用这种方法保持这个团体的忠诚而不越轨。而实际上从太平天国起义到1911年的中国革命，尽管满族驻防军不再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它一直保持着忠诚。整个驻军都被消灭了，正如一些奏折中所说的“忠诚战死”。

绿营兵的衰落开始的稍晚一些，是由某些略微不同的原因引起的。尽管早在17世纪就有人描写个别的罪恶事例，但绿营兵的战斗能力一直保持到19世纪末期，在乾隆所指挥的战役中曾起过主要作用。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绿营受到行政部门普遍衰弱的影响。许多资料的评论中开始指出普遍的腐化和玩忽职守现象。^②军官把士兵的饷银装进自己腰包的事相当普遍。不能占有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章，王清禹：《西朝执政》第4卷，第48b—56a页。

② 《清实录》志59，嘉庆4年。第44卷第4a页，第47卷第16a、29b页及以后诸页，第74卷第20b页及其后诸页列举了一些事例。全面描述见肖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第210—212页，250—251页。

这笔钱财的人也通过大量礼物进行贿赂而串通作弊。实际上军官贪污军饷非常类似于地方行政官贪污税款的情况，除非采取把军饷从征收地直接送到政府手中，或者从政府手中直接送到接受者手中这两种办法，否则就无法消除这种现象。由于士兵不能得到赖以生存的足够的饷银，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逃兵。据估计在19世纪初军队实力是花名册上名义军队的1/2到1/6。^①军官无法阻止逃兵，这些军官继续把已不在部队的士兵的饷银据为己有。那些留在军中的战士不得不另寻收入，他们作船夫，小贩，或干偷摸抢劫的勾当。士兵只有在战争期间，通过掠夺和蹂躏他们的指定作战地区而得到困难补助。因为这样的战争意味着军官能得到政府作为给养的资金，战争成了官兵有利可图的经济冒险工作。只要政府能提供战费，战争就被尽可能地拖延下去。军官和统帅变富了，军队的职位更受到重视并有更高的报酬。^②

在臭名昭著的和珅贪污案里，一个主要的控告罪名是：和珅作为乾隆手下的一名主要官员助长了军事组织的贪污并从中取利，从而发了惊人的大财。朝廷对这方面腐败的严重性已有充分认识，但采取的措施毫无效果。有几次试图缩减绿营兵的规模，利用这笔节省的钱充作军饷，因为绿营兵的实数比名义上少许多，这样的裁军减少了军官和行政官的贪污数量。在军事组织中，帝国的秩序遭到破坏，19世纪前半期，大多数绿营兵不仅毫无用处，甚至比这更糟。

随着军队的衰弱，中国政府失去了维护秩序和防止由于不满弊政而出现的不稳定的能力。帝国政府行政和军事力量的衰弱引起了不属于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导势力的膨胀。地方官和绅士接管

① 罗尔纲的前引书：《中国文库》，第6卷（1838年），第593—605页；驻美公使给中国的电稿，国家档案缩微本92，6卷，1849年6月14日广州电函。太平军占领南京提供了具体例子。见薛福成《书沔阳陆帅失陷江宁事》，引自《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第1卷第116—122页。

② 见肖一山的前引书。

了帝国政府失去的权力。因此本文第二部分便开始谈地方权力的逐步建立。

地方权力的逐步建立

在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斗争中，对权力来说，关键因素有三个：行政任命权，征税权和对军队的控制权——后者在危机和变化期间是决定性因素。控制军队，使建立官僚行政机构和税收制度成为可能。甚至在清朝统治早期，当叛乱发生时，清政府就接受了地方领导力量进入政府机构中作辅助。只要正规的中央军队即八旗和绿营军是强大可靠的，地方组织对中央的控制就不会产生威胁，他们的领导人或被淘汰，或用行政机构中的职衔将其打发掉。当完成紧急任务和平息地方动乱后，这些地方部队只要可能就被合并到绿营军中。其余的被正式“解散”，这只是把他们从官方登记中去掉的过程，而不是从被他们组织的地区取消其作为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过程。然而政府的行政和军队太虚弱，再也不可能取消或收编地方军队了。政府活动力的降低，增加了绅士在地方防务中的责任，绅士的地方军事活动有时得到官方的承认和同意，但有时没有官方的同意甚至公开与官方对抗。例如，反对高税率，或抵制政府的措施，或反对政府在不同地区的冲突中偏袒一方。在一些官方报告中，所谓“劣绅”的例子有所增加。这些绅士领导者因为某种原因，带领自己的军队反抗政府。

然而军队的组织和指挥能力无需绅士的行政资格。地方的暴富者，所谓恶霸及“土匪头子”能利用政治动乱和普遍的绝望与不满时机，组织军事力量，建立自己的地方权威。地方领导人经常由秘密团体的领导人充任，这种秘密团体一直存在于上一个世纪帝国整个历史阶段中，在政治动乱和人们不满期间变得更重要了，因为那时它便成为军事起义的组织机构。

官员们在奏报这一时期地方军事组织的发展时，根据军事组

织与政府的关系评价这些力量。如果它们赞同政府，就被视为政府军；否则，就根据这些军队的规模和政治目的，把它们视为“劣绅”，“匪”，“贼”。不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好”与“坏”的绅士之间的界限或“匪”与被官方承认的地方军队之间的界限，都不是很固定的。一个军队的领导可能多次改变立场。如苗沛霖，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期间安徽著名的军事组织者之一。^①许多次战斗都属地方性争斗，官员们只要可能就保持中立。当他们参加争斗者的一方时，另一方自然变成了“匪”。用官方术语说，得到承认的地方组织称为团练（地方部队）；那些对立面的地方组织则称为“匪”，正象“好”与“坏”的绅士之间存在区别一样。

到19世纪中期，政府的衰弱和地方的不稳定所引起的不利情况达到了危机程度。这时存在一些能被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利用的条件，他们为了举行反政府的总起义组织不满分子，并武装当地百姓。这个时期的叛乱有太平军、捻军和回民叛乱，所有这些叛乱都起源于武装团体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和地方争斗，只有当地方动乱日益严重，对中央政府权力构成威胁时，政府才会袒护一方。

这些起义部队的士兵大都是农民。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起义同中国历史上早期的起义一样，通常具有“农民起义”的特征。实际上，农民构成了反叛的军事力量——他们是因为生活条件无法忍受而离开自己土地的农民——但这些农民参加起义并不是为农民的权力而战，成为战士是摆脱不幸的一种方式，是寻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机会。农民中也有人参加衰落的王朝为保卫自身而招募的军队，但起义部队的领导者不是为了农民的翻身而战，在这

① 徐珂的《清稗类钞》（上海，1928年）第7卷，第158—165页，简单记载了关于苗沛霖的生平和职衔。关于他的活动，见蒋湘泽《捻军起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93—96页。在范文澜、翦伯赞等所编的《捻军》第6卷〔北京，1953年〕中到处可见。关于他的被捕和处决，见薛福成《陈玉成、苗沛霖两贼处斩的报告》，引自《捻军》第1卷，第359—362页。他给鲍超的信，见《文献通编》〔北京，1930—43年〕，第22卷第6b—8a页。

些领导者中，有些人过去是农民，他们和普通士兵一样，离开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农民生活，想从帝国的征服中取得利益。他们想挤进官僚的名流中，成为皇帝或官员，摆脱他们从前的苦难生活。这是起义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不是社会革命者，而是在战斗中英勇，在政治上精干的军事将领和高官。这种型类的传统反叛不是力图改变制度，当有军事成功的希望时，绅士就可能参加起义队伍，或给胜利者提供帮助，在同样的社会基础上重建政治体系，或者他们亲自组织反叛。

保卫社会制度

然而19世纪的情况在一个关键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当时的三次主要起义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唯一一次公开表明其目的的起义，即推翻帝国，重建一个帝国政府。太平军起义不同于其它起义，也不同于早期的起义，宗教意识在它的组织中和领导成员的授权上，在它试图建立的新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起了作用。它的领导者不仅要推翻并取代帝国政府，而且要建立新的带有宗教意识的制度，作为新国家和新人才培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起义是一次革命，它不仅打击了清王朝，而且打击了清朝的思想意识和利用它进行统治的统治阶层本身。^①

太平军在摧毁清王朝上本来很可以成功。但他们推翻统治集团的企图，成功的首要条件，是需要有为他们政府和行政机构建立一个与统治集团对抗的自己的领导集团的能力。太平军努力创立这样的领导集团是他们最大的利益。太平天国两名最重要的领导者是：杨秀清，最重要的军事组织者和太平天国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者；洪仁玕，天王族弟，在后期参加起义。他俩曾为此做

^① 这些观点在迈克尔和张等合著的即将出版的《太平天国文献史》中得到了全面发展。

过努力，但都失败了。太平军的失败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建立以新官员骨干为基础的自己的政府，而且他们在造就这支官员骨干上从未取得成功。

对儒家制度的打击迫使绅士为保护这一制度本身而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成了清政府抵抗太平军打击的保护者，他呼吁他的绅士同伴来维护儒家制度而不是号召他们挽救清王朝。在谈到太平军在意识形态上的进攻时，他写道：“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①

击败太平军的不是政府军，而是在太平军席卷过的省内组织起来的新地方军队——主要在湖南和安徽——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其他人的部队。首次成功地抵抗太平军的是绅士所领导的地方部队。当时帝国认识到了这一点，就鼓励绅士大规模地组织它所希望的类似地方部队。默许和鼓励地方势力的发展不是新现象，早在鸦片战争前10年就已经这样做过了。现在，由于太平军的威胁日益增长，政府不仅允许绅士就地继续建立这样的组织，而且鼓励某些政府信任的官员从政府的行政部门辞职，象绅士一样在家乡组织必要的抵抗力量。

新地方主义

曾国藩是所谓湘军的缔造者，这支军队成了其他地方部队的榜样，然而他的头脑中正酝酿着更庞大的计划。他不再组织一些地方部队了，虽然它们对地方的防御有价值，但太弱太小，难以调动，以至在对付大量的太平军的斗争中未起多大作用。曾国藩组织了一支地区性的军队，在家乡范围之外作为正规军事战役中的

^① 引自曾1854年写的《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16页。在他的全集中为第92册。

一支武装使用。^①在建立这样的军队时，他利用现存的地方部队，把它们联合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个地区的军队组织形式也遵循地方部队的形式，将领挑选自己的军官，每个军官负责自己挑选的人组成的部队，并负责他们的军饷和福利。士兵对军官、军官对将领要有个人忠诚，各军队要在他们军官的个人权力控制下，以军官名字给部队命名。所有地方部队要对控制它的曾国藩效忠。军官的任免权归曾国藩，他可以随意组织和解散这些军队。尽管军官的升迁形式上要根据曾的建议由中央批准，但实际上取决于曾国藩。军官和士兵来源于军队组织起来的省——湖南省，曾国藩的家乡所在省，财政支持来源于湖南绅士，他们也提供军队的军官。

然而曾国藩不久就认识到，他所需要的为其军队和军队的战斗提供的物资，远远超过绅士所筹集的贡物。他们需要的是正式任命他作统治这个区域的官员，以便他能控制这里的税收。正规的行政机构和新军事组织之间的二元化状况必然导致冲突和敌对。这就妨碍了新军队为防务所作的努力。政府很长一段时间拒绝接受这一避免不了的现象。只是在政府军被太平军打败时才任命曾国藩和后来的其它地方军队的将领诸如李鸿章、左宗棠做其军队所保护的省的总督。清政府只得不顾行政和军事系统权力分离以及保持中央控制军队的规定，只好许可效忠的地方部队合并为在建立自己军事和行政组织的将须领导下的地区性军队。它不得不承认违反和取消所有分权原则，以及政府制度和安全赖以存在的中央控制原则。对曾、李和其他人的任命给这些地方将领的军事权力上又增加了民事行政权。过去他们用军队解决的问题现在通过行政组织解决了；他们挑选和任命自己所需要的人，这样就创立了自己的官僚组织。他们的行政机构人员与军事组织完全不同，这些人员主要不是从他们自己的省内挑选的；这表明行政机构内存在

^① 见罗尔纲的前引书。

在着个人和团体的忠诚，而不是附属于建立官僚集团的地理区域。所以地方主义，我们喜欢承认它的新发展趋势，即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敌视外界人的地方观念。那些在帝国官僚机构内建立起来的新官僚组织的领导人可以从一省调到另一省，但他们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权却毫无损失，他们随身带着这些组织。甚至没有失去军权，因为他们的军队依然忠诚于他们。

即使当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和某些核心人物或军队被调到京都时，这种调动也不意味着他们和中央政府合流。如李鸿章和后来的袁世凯，他们的势力仍基于他们的组织对他们个人的忠诚，基于他们对财权和军权的控制，即使当他们被调到北京担任京都所在省的总督(直隶总督)或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时也是如此。这样的调动没有使他们的地方组织变为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权力的基础。

只有在革命后，袁世凯才企图在他自己的组织基础上重建中央政府，把他所要求的中央权力加到他自己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之上，自从王朝失去天命后，中央权力变得徒有其名了。袁世凯为了自身的目的，在政府传统上和当时许可的范围内，试图维持中央权力。但是他失败了。尽管儒家思想无疑曾使国家和社会谐调一致，维护了国家的观念，甚至在反叛和局部衰落时期也如此，但此时的儒家思想已失去了所有的支持。由于没有儒教，没有以儒教为基础起双重作用的绅士，地方主义就退化为军阀主义。在儒家思想的危亡时期，为复兴国家和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指导原则。

然而，19世纪的地方主义，在它的初期，正如在以前历代一样，由于政府和社会间传统的关系使它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地方绅士中出现了新的地方领导成员，绅士扩大了他们发挥作用的地区，包括政府拥有特权的地区——保护他们的家乡和省，实际上是保护整个社会。新建立的行政组织与地方绅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行政组织继续得到绅士们的支持。地方领导者拥有他们自己

武装的军队、行政机构和财政的控制权。但政府不得不通过任命这些领导者和他们机构中成员的形式，给官僚集团内的地方机构和其它机构以官方的支持和承认。所以地方机构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逐渐削弱了中央控制的基础。这个发展趋势瓦解了中央权力，建立了新的地方权力的核心，对王朝来说，它与公开的反叛具有同样的危险性。

当非常时期结束，主要危险似乎已消失时，帝国政府就企图削弱或取缔新领导者的独立权力。但地方政权，一旦建立起来，最终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地位。19世纪曾国藩、李鸿章和其他地方领导者建立的组织，标志着朝廷权力瓦解的开始，权力的瓦解导致了清王朝的垮台和代之而起的军阀制度。

19世纪，清朝权力由于行政机构的腐化和继起义之后中央军队的瓦解而衰落时，正是绅士领导通过自己控制的军队和行政组织重建了地方政府。而且当政府结构濒临崩溃时，绅士领导者采取行动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延续。当时在这一点上，绅士们取得了成功。

新的绅士领导成员保持着对清王朝的忠诚，因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矛头不仅针对清王朝，而且针对社会制度本身。一旦确保了对太平军的胜利，帝国政府就企图削弱和取缔地方领导者的独立权力，虽然如此，新的领导者并没有解散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组织。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同治中兴，因为地方权力一经确立，就一直存在下来；而且中央政府并没有重新获得它曾失去的军事、行政和财政权力的关键部分。政治衰弱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通过赋予新的天命的朝廷重新集权来解决政治衰弱问题之前，由于西方的冲击导致了儒教信仰的文化危机，它削弱了社会制度本身的基础，由于政治制度的崩溃使这个社会制度变得更加脆弱。是否在其它政治条件下这个制度本身能够通过改革而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例如象康有为这样的改良是否具有成功的可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里与我们所议无关。

绅士在早期危机中维持社会秩序，只有当这种危机过去之后才会出现绅士自身衰落的危机。在这种早期的危机中，传统国家和社会的衰落和延续的各种因素都仍然起作用：受教育的阶层即绅士在国家和社会中的特殊作用；清政府对于官僚机构中绅士所提供的帮助的依赖；为保持中央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和压制绅士所形成的策略的多样性；在无能 and 腐败中，这种控制体系的崩溃；地方和地区军事力量的建立；受过教育的人在维护社会和文化延续中所起的作用——这些都在19世纪中叶清王朝的危机中作为主要因素而出现。我们认为，这些各种不同的因素，在前一时期也是重要的。

李鸿章的活动反映了这种危机时期历史的特征。李效仿这时第一支地方军队缔造者和组织者曾国藩，并在曾的保护下，组织了自己的地方军队(淮军)，创立自己的行政组织，这是在清王朝的系统内保持其权力的基础。但他也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即超出传统地区领导的新发展。李鸿章活动的历史是一条特殊发展进程，因为它发生在帝国时代的末期，当时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制度问题已与西方冲击带来的新因素结合起来。李建立上海基地并利用新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政资源，把传统的组织和控制方法运用到通过条约开放的商港而引进中国的新的贸易和工业界。李把管理中国农业经济的传统官绅制度运用到新经济部门，但仍保留着政治控制制度的特点。这种制度抑制了私人企业，同时也阻止了中国革命的彻底完成。

译自斯佩克特所著《李鸿章与淮军》一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的序言。

高翠莲译 邹桂芬校

清末留欧学生

——福州船政局对近代技术的输入（节译）

（法）玛丽亚萨·巴斯蒂

1875年3月17日，前福州船政局监督普罗斯佩·日意格在5名中国青年的伴随下，从福州搭乘香港邮船前往法国，此行的目的是带领这几位青年到法国和英国的有关设施去考察学习。与1872年容闳率领的那批留美幼童相比，这次赴欧的都是20几岁的青年，他们懂英语、法语，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欧洲近代科学知识，当然，也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教养的根底。他们5人都毕业于船政局附设的学堂——求是堂艺局。其中，魏瀚、陈兆翱、陈季同3人曾就读于制造学堂（因学堂位置在前，亦被称作前学堂），他们于1867年2月学堂创办之时即入学，1873年12月毕业。另外两人叫刘步蟾、林泰曾，与前面3人入学和毕业时间相同，但他们是在海军学堂的航海驾驶班就读（海军学堂亦被称作水师学堂或后学堂）。

福州船政局在最初筹建时，似乎并未考虑到要附设技术教育机关。就连船政局的筹建者左宗棠在1864年与法国海军大尉保罗·德克碑讨论的最初计划里，也没有一句话涉及到关于学校和教育体制的事。1865年初，德克碑受委托返回法国，就船政局建设步骤和所需费用进行研究。创设学堂、培养中国技师和航海驾驶员

的问题，是在德克碑提供的技术和财政情报的基础上，最后修改船政局建设方案时才提出来的。德克碑还在法国逗留期间，为了得到清朝皇帝的批准，日意格与中国人一道，制定了详细计划，并订立了他们2人作为船政局监督的军官雇佣契约期限。但是，上述的新计划究竟是在他的启发下制定的，还是由左宗棠的幕僚们首先提出的，目前限于资料还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左宗棠好象已经萌发了一个顽强的念头，即尽量使中国人具有可以不依赖外人而自己造船的能力。另一方面，采用求是堂艺局这种学校教育的独特形态一事，大概是完全委托日意格去筹划设计。

从整体上看，求是堂艺局采用的是法国的办法，即把船舶工程学校和海军学校结合起来。此外，1868年初，又增设了绘事院、领港员及轮机技师班和艺徒学堂(所谓艺徒即工匠)。船舶制造学堂的教学用法语进行，该校最高年级的教学内容是利用法国军港下士官学校的科目编制而成；航海驾驶班的教学用英语进行，采用当时英国海军的培养办法。

无论是中国有关当局，还是船政局的法国监督们，在制定教育计划之初，似乎都未曾考虑到，日后要从学生中选派一部分人到外国继续深造。契约书中，中国方面提出的培养目标是，通过5年的教育，使学习船舶工程的学生，具有设计和造船的能力；航海驾驶班的学生，具有在沿海航行的能力。上面讲的5年，不是从工厂建成之后算起(实际上，工厂全部竣工用了近7年)，这是因为，建厂任务是如此繁重，人们谁也无法事先预料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法国方面，1866年接待了受中国政府之命到欧洲访问游历的斌椿一行。1967年，法国外长在致驻北京法国公使的信中作出如下指示：“中国人是富有远东民族观察力的人民，对于他们中的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们来说，在其头脑中树立我们法国观念和文明的优越地位的最好机会，不是徒劳地一再炫耀武力和商业方面的成

就，而是让他们来这里进行实地的观察和研究。当他们走出国门，试图了解世界的时候，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国度。我们要鼓励中国政府，尽可能多地派遣人员来我国学习，学习专业，学习我们的语言，并把有关我国学校、学术机关以及产业设施等方面的情报亲自提供给他们政府。我们方面则要为这些人员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方便，以便使他们能把学到的成果很快带回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最好政策。”很遗憾，外交部长所表明法国政府的这种意图，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成果。

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败北。第二帝国瓦解后，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在这面对来自中国的要求竟漠然置之。当容闳率领的30名幼童正准备起程赴美的时候，日意格尚在法国逗留。那时，担任福州船政局监督的路易·迪努瓦耶·德·赛贡札克于1872年初接到中国有关当局的建议，希望法国能象美国一样，接受中国派遣的留学生。把上述要求报告给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和驻上海领事之后，很快就发现，在法国没有人关心此事；终于，他不得不承认：“美国新教徒的影响处于优越地位。”

1875年3月，日意格带领船政局的第一批5名学生赴欧洲前夕，曾致书法国驻福州领事。信中说：“自从在中国服务以来，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国家的人们引向欧洲。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呢？因为我感到，我们绝对无法与贸易商们在海上进行商业竞争，所以，我们必须在吸引人才方面胜过他们。”这些话与其说他在表白自己首先提出并实现了上述意图，毋宁说他是想借此得到一个获得荣誉勋章的机会。可以证实上述推断的例子很多。比如，他曾对驻中国日本海域舰队司令官库兰兹准将一字不差地重复过上面那封信中的话；在向他的继任者谈到第二年将派遣更多的船政局学生赴法留学一事时，他又重复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但是，事实是，在此之前的书信中，他从未表露过上述想法，相反，他总是强调，这一行动的首倡者是总理船政大臣。例如，1873年11月29日，在致舰队准将司令官的信

中，他并没有把中国向法国派遣留学生一事说成是自己提议的结果。日意格写道：“沈葆楨现在正在给中国皇帝起草一份奏折。从沈对我的询问中暗示出他们将从船政学堂的学生中选派一批人赴欧学习。带领这批学生的监督人员，将不象幼童留美时那样，由中国人担任，官方明确表示，想让我承担这一职务。”1873年12月30日，日意格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沈葆楨已向皇帝奏明，船政局应派一批青年赴欧继续深造四五年。他建议将此事委托给我。”1874年2月4日，在给他义妹的信中又说：“我现在正被委托制订一份派遣学生赴欧学习的计划，沈葆楨将向北京呈递这一计划。”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的危险，沈葆楨受命赴台湾筹划防务，派遣学生的计划被推迟，他的财政支配受到限制。在沈葆楨的原计划中，1875年3月17日随日意格赴欧的学生是40—50名，这时不得不缩减为5名。这5人是船政学堂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的知识，特别是数学方面表现出的才能，使与他们一起学习的外国士官生非常吃惊。这5人都出身于福建省破落的读书人家庭，船政学堂付给他们的膳宿费和月规，不仅能维持他们的学习费用，也成为赡养他们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

此次欧洲之行，沈葆楨交给日意格的任务有两条：一是为在福州制造装有比较省燃料轮机的铁甲舰购买必要的材料，访聘急需的欧洲技师；二是研究欧洲各国最新装甲舰的发展情况，提出对中国最适合的方案。要求同去的学生要熟悉欧洲这方面的最新技术，回国后确实能实地运用。1875年5月初，日意格一行在马赛港登陆，之后，学生们就分赴英、法两国考察学习。魏瀚和陈兆翱2人于1876年初进入拉塞思地中海制铁-造船公司，实地研究装甲舰制造技术。刘步蟾和林泰曾进入英国戈斯波特海军学校。日意格为了使刘、林2人在下次能乘坐英国军舰到大洋进行航海实习，敦请中国政府向英国当局提出要求；中国方面则来电催促他返回中国。于是，1876年4月23日，日意格带领刘步蟾、林泰

曾和陈季同一道从法国启程，留在欧洲的只剩下魏瀚和陈兆翱 2 人。

1876年6月初，日意格和3名学生回到福州。未及休息，他就匆匆赶到南京，然后又北上天津。这是因为沈葆楨已于上年5月升任两江总督，驻扎南京，北洋大臣李鸿章驻扎天津，日意格要前去向他们汇报欧洲之行的成果，并商量原定计划的进一步实施。

实际上，当日意格还在欧洲的时候，沈葆楨已于1875年9月与他的继任者船政大臣丁日昌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一起，为共同推动这一计划进行了准备。沈葆楨打算从欧洲订购装甲舰，不仅要派遣参与该舰制造的学生和工匠赴欧，也要把现场监督和工人送去。1875年11月他把这批将要出国的人员集中起来进行了法语和数学方面的培训。丁日昌主张选派一位中国监督作日意格的助手，暗示这样做可以限制外国人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扩大计划预算的野心，船政总考工李凤苞被他推荐为合适的人选。1876年3月28日，李鸿章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报告了计划的现况，在得到同意迅速制定详细计划的批复后，立即打电报召日意格回国。

日意格和李凤苞一到天津，马上与李鸿章一道确定了计划的基调，1876年10月12日呈报总理衙门。在计划中，由于资金不足，订购装甲舰一事被取消，从而派遣现场监督和工人赴欧实习的设想也落了空。但是，在学堂接受用法语讲授造船技术的31名学生和工匠将被送到法国，培养成技师和工长；海军学堂驾驶班的19名学生将被派赴英国深造。5年间累计所需经费折关平银42万两。立即得到上述消息的英、法两国驻北京公使表示：他们的政府将分别对进入本国工业设施和教育设施学习、实习的中国青年予以帮助。10月19日，总理衙门原则上同意了李鸿章等制定的计划，在听取了有关的高级官员，特别是两江总督、福建巡抚、福州船政局督办船政大臣的意见后，要求逐项迅速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驻伦敦公使郭嵩焘曾与李鸿章接触，他想探

听一下，在这批留学生中可否增加10名湖南青年。李鸿章拒绝了郭的请求，理由是，湖南的10名青年不懂任何外语，他们要出去，就得象留美幼童一样，必须在国外滞留多年方能奏效，而此次赴欧学生的经费已经确定，无法再行变更。

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拒绝从自己的预算中补助派遣经费。为了使这一事业与福建省所能提供的有限的地方财政经费相适应，1875年12月11日，福建巡抚丁日昌想出一个巧妙的借口。他说，比照派遣计划预定的学习要求，船政局各学堂只能提供原定派遣名额的一半，因为大多数学生的学力达不到规定的标准。这样，经费预算额就应该按照实际可以派出的人数减少。1877年1月13日，在李鸿章和闽浙总督的联名会奏中，采纳了丁日昌的意见，把它作为解决经费的办法提出，很快就得到上面的批准。

留学生使团由下列人员组成：法国监督1名日意格，他的助手副监督1名，这个职务最初由日意格的秘书担任，后来，在1878年由塞贡札克担任。中文秘书1名，由学生陈季同兼任，他的另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学习国际法。中国监督1名李凤苞，罗丰禄担任他的助手兼翻译。学生14名，工匠4名，另外还有1名是李鸿章推荐的随员马建忠，这都是赴法人员。赴英国学习的是12名学生。船政局派遣的30名学生中，包括了1875年就先期到达巴黎的两名。按照章程的规定，学生们被允许穿着外国制服，但辫发必须保留，每天均须详记日记。学习期限定为3年，遇有必要情况，可延长6个月至1年。总经费不再是1876年计划中的42万两，而是20万两，其中的一半由福建省厘金收入项下拨解，1/4由该省税关收入项下拨解，另外的1/4由福州船政局预算中预先扣除。

使团于1877年3月30日乘船离开福州，4月8日从香港换乘法国邮船。在马赛港登陆后，一行人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然后直驶伦敦，12名留学英国的学生到达目的地。12名学生中，有7名被分配到军舰上，去大洋实习，其中的6名，实习后即去学习

最先进的装备技术。有4名直接进入格林威治海军专门学校，开始是学习轮船驾驶和有关科学，之后又上军舰到大洋去实习。还有1名学生即后来很有名的严复，他最初进入朴茨茅斯专门学校学习，之后又转入格林威治海军专门学校，专攻数学和自然科学。李凤苞的翻译罗丰禄则留在伦敦的专门学校攻读物理和化学。

赴法的留学生们是1877年7月初抵达巴黎的。有4名学生被允许作为正规生进入瑟堡船舶工程学校学习，其中包括前此到达的魏瀚和陈兆翱2人。5名学生进入上伦下士官学校，其中4名学生为了进一步熟练掌握船体制造和金属延压技术，又到勒克勒佐·舒奈达工厂去实习。另1名被送到圣艾蒂安矿山学校，由于不适应当地水土，后又转入巴黎矿山学校。陈季同和马建忠2人注册巴黎私立政法学校，在新闻记者富科·德·蒙戴翁的指导下，马建忠于1878年获得文科和理科学士学位，第二年又获得法律学士学位。陈季同在李凤苞被任命为驻德公使后，作为李的翻译，随同到柏林赴任。4名工匠中，1人进入拉塞思造船厂，另外1人进入马赛铸铁厂，其余2人一块被分配到马赛木模厂。1878年12月，又有5名工匠抵法，分别被送入夏龙工艺学校、布雷斯特下士官学校和圣夏蒙矿冶公司实习。以后的数年内，先进入学校学习的那批学生陆续到船坞实习或到比利时、德国、英国等各地去考察旅行；而先到工厂实习的那批青年，则又进入有关学校接受专业教育。在派遣章程中，对每个学生在留学期间应该掌握的知识和达到的技术水平都有专门的规定，但是，由于法国学校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和全面训练，学生们所获得的知识和技术远远超出了造船所必需的范围。学生和工匠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所在学校正规考试要求的学力，因此陆续获得通过。这批人在1879年夏至1880年11月先后分批回国。

留学生们在欧洲是如何生活的？很遗憾，章程中明确规定的每天必须详细记录的日记，好象一本也没有留下来。从日意格私

人文件中保存下来的照片上看，学生们身着短领长袍，个个表情严肃，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但是，现有的一些零星资料表明，这批学生的境遇是各式各样的。1名学生于1878年病逝于土伦。其他的人由于得到日意格的多方面照应，比较顺利地适应了环境。与容闳率领的留美幼童相比，这批年轻人身上不存在丧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危险。这是因为从年龄上看，赴欧的学生们要年长得多，而离开祖国的时间又短得多。1881年12月，某御史曾告发学生中有人信奉天主教，然而这次弹劾似乎并无真凭实据，作为保守派官僚搞垮船政局的周期性政治攻势中的一环，结果是不了了之。一般学生们尽管在一个时期内能够适应欧洲生活，但让他们长期同化于这种异国的文化社会环境，显然是很难的。青年中不乏象严复那样的人物，对周围的新世界细心观察，认真思考辨别；然而象魏瀚、马建忠以至于陈季同等大多数人，则是与迎接他们到来的社会结成一种具体的实在的联系。1882年以后在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供职的陈季同，因为在法国人中有许多熟人，得以巧妙地辅佐中国公使曾纪泽在法国掀起一场反对舒埃·卢·富尔利的通卡政策的舆论。他也是巴黎文艺沙龙受欢迎的人，他用法语把许多富有魅力的中国民间风俗和文学作品介绍给法国人。这些作品后来由新闻记者富科·德·戴蒙翁编辑出版。富科·德·戴蒙翁在1877年中国留学生抵达法国后，曾担任他们的家庭教师，编辑过程中，陈季同予以大力协助。

可是，由于陈季同曾以大清帝国公使馆的名义向巴黎的宝石商和装饰品商筹款而负债过多的缘故，中国政府不得不于1891年把他召回国内。两年后，受到法国政府警告的比利时政府，在迎接陈季同的庇护者李鸿章时，拒绝陈以中国留学生使团主席的身份入境。1895年4月，陈季同曾去台湾，他向那些坚决抵抗日本占领的台湾爱国者们宣传“五·二五民主国宣言”的思想，并马上被任命为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陈季同竭力劝说人们，确立共和制度一定会得到法国的同情，使法国积极加入抵抗日本的防御阵

线。他的期望落空了。台湾被占领后，陈季同逃回上海，1905年，病逝于上海。1904年，他曾以中国问题为题材用法文写成一部轻喜剧《英雄的爱》，毫无疑问，这是对法国文学的一个贡献。陈季同既是东亚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又是沙龙文学作家，在他的身上，显示出那些最早直接深入欧洲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成果中最奇妙的混合物。此后福州船政局派遣的留学生中再也没有人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成果了，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术方面。

第一批留学生派出后，福州船政局陆续把那些具有相应学力的学生送到欧洲各高级学校，从而大大推动了它的教育工作。早在1879年11月3日，沈葆楨和李鸿章在一份关于首批赴欧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召回问题的联名会奏中，就恳请清廷按照相同条件再次选派学生赴欧。这一奏折马上得到皇帝的批准。但是，受命具体实施的闽浙总督于12月20日提出异议。他主张，在着手选拔之前，为了使学生的外语水准能完全达到规定的要求，必须再等待三四个月。实际上，问题的症结之处与其说是学生的准备不足，毋宁说是地方当局对赞同新的财政措施游移不决。1879年12月26日，对派遣留学生一事最热心的辩护者沈葆楨去世，这无疑是对这一计划的沉重打击。此后，这一计划的实施完全以李鸿章的捉摸不定的态度为转移。

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订购装甲舰2艘，司令塔1座，他派遣4名技术人员和10名工人赴欧实地参加制造工作，这4名技术人员都曾首批赴欧的留学生。他们从1881年1月起，到1882年12月，在欧洲滞留近两年。1881年，船政局制定了筹集10万两临时费，派遣8名制造学堂学生和6名驾驶学堂学生分赴法国和英国留学的计划。凑巧，1881年12月2日，李鸿章抽调其中的4名到他在天津刚刚创办的海军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任教，赴欧学生只剩下10名，按照计划的规定，与首批派遣一样，此次经费亦由福建省财政项下支出。

福州船政局派出的第二批留欧学生直到1882年9月才抵达法国。李凤苞和日意格依然担任监督，并授权相机处理一切事宜。学习驾驶的两名学生由军舰直接送到英国。学生中有3人去了德国，进入柏林施瓦岑考帕工厂研究鱼雷制造，中国政府曾向该厂订购鱼雷。3人中的1人因不适应当地水土和德语水平低，于1883年夏被调到法国，不久，进入船舶工程学校学习。还有1人自杀了。据说，他曾因购买试制鱼雷所需的炸药而负债，李凤苞拒绝替他报销这笔债务，促成了他的自杀。另外1名叫陈才瑞，他由于要把自己新获得的科学知识用来为中国舰队服务而受到库贝提督的攻击，不得不于1884年8月初返回福州，但实际上，他好象最早也是在1884年11月才回去的。被直接送到法国的5名学生，有1人进入巴黎土木学校学习。由于感染时疫，于1883年12月病逝。有3人进入枫丹白露炮兵工程兵学校。另外1名，先在穆兰·勃朗，1884年11月起又在苏拉·里苏里炸药制造厂实习。法国当局对接受这批从福州去的学生进入土木学校以外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没有表现出为难的意思，但在中法两国正处于战时关系的气氛下，学生们被严格限制接触专业以外的东西，第二批留学生在1886年初全部回国。

中法战争时期，左宗棠曾再次试图振兴福州船政局。由于战争，船政局本身和由法国援助制造的军舰船舶都毁于法国舰队的炮火，继任者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刚刚与法国缔结了和约，左宗棠就与李鸿章联名会奏，请求向法国、英国派遣第三批留学生。皇帝同意派遣的谕旨是1885年11月18日下达的。决定从制造学堂选派13名学生和工匠赴法国、英国、德国学习；从驾驶学堂选派9名学生到海军学校和英国军舰上学习深造。中国监督由周懋琦担任，日意格承诺留任洋监督一职，负责与欧洲各有关设施的交涉工作。学生留欧期限规定为学驾驶者3年，学船舶制造者6年，经费总预算30万两，筹款办法仍与前两次相同。

1886年4月6日，周懋琦率领福州船政局的24名学生（学习

驾驶者8名，学习轮机者2名，学习制造者14名）从香港乘法国邮船起程。李鸿章从天津水师学堂选派的9名学生与他们同行。这批人于1886年5月5日抵达马赛港，受到接替日意格而任洋监督的塞贡札克的迎接（日意格于同年2月底病逝）。14名学生留在法国，19名学生则转赴英国。

在英国，6名学生被分配到装甲舰和战舰上实习驾驶。8名学生攻读大炮和舰艇装备；8名研究轮机；3名去学习有关航海法的诸问题（此处学生总数有误——译者）。他们的理论学习和实习交错进行，比如说，有时在诸如格林威治海军专门学校学习理论，有时则到船坞或舰上实习。其中的1位年轻士官于1888年6月来到巴黎，他是在测量船实习期满后被分配到海军部测量部学习海图技术的。

到法国的留学生先进入巴黎桑·巴利博私立中等学校补习法语和普通学科。之后，1887年秋，有两名作为私费旁听生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科学系学习，3名入土木学校，3名入巴黎船舶工程学校，6名进入巴黎大学法学系。他们不必参加“外国政府官吏身份鉴定”考试。翌年，法国高等教育监督官通知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两名学生，他们通过了数学和物理学第一次学士学位考试。很遗憾，在当时这一成果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889年秋，在船舶工程学校学习的1名学生因数学成绩不合格而没有获得结业证书，之后，不得不转入布雷斯特下士官高级学校攻读轮机专业。在船舶工程学校学习的另1名学生，为了弥补知识的不足，不得不花费整整3年的光阴。学习法律的几名学生，全部获得了学士学位，其中不乏取得相当成就者。例如，王寿昌曾于1898年建议并协助林纾将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成中文，该书是清末风行一时的林译名著之一，最初译名为《椿姬》。

学习驾驶的学生们于1889年秋返回中国，由于财源枯竭，其它学生也于1890年夏天离开欧洲。其中1人因肺出血在欧洲病逝。另1人患了肺结核被紧急遣送回国，结果死在途中。第三批

留学生从整体上看，有较强的适应性，他们不象第一批赴欧学生那样，对周围新环境充满好奇心，而是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其中不少人深入社会生活，注意了解所在国的情况。

这批留学生归国后，大部分未在船政局任职。实际上，到后来在高级官员中没有人再对福州船政局抱有信心，在失去高级官员的庇护后，船政局被交给一批能力平庸之辈管理，信用丧失，濒临危机。中日战争之后，它更面临着一个停办或租借给德国人的抉择。1879年曾跟随日意格到法国留学，后来成为技师的魏瀚，在1895年10月警告法国驻福州领事，以船政局将面临被德国人操纵的危险为由，敦促法国方面干预此事。领事立刻向闽浙总督表示，法国愿为船政局的复兴尽力，同时迅速电告巴黎和法国驻北京公使。法国海军太平洋分舰队的巡洋舰接到紧急命令驶至福州，司令官布泰舰长应闽浙总督的要求，在魏瀚的暗中帮助下，制定了重建船政局的方案。在方案中他特别暗示，应再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896年5月11日，闽浙总督向皇帝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他一方面指责布泰所提方案耗资过多，另一方面竟若无其事地全部照抄。总督的奏折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96年7月23日清廷批准了他的计划。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则采取紧急措施，加紧对访问巴黎的李鸿章和北京的总理衙门做工作，以确保再度对船政局施加影响。

1897年1月，船政局决定选派10名学生分赴法、英两国学习，但是，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接到通知说，格林威治海军专门学校名额已满，于是，只好选派造船学堂的6名学生赴法学习。这批留学生的监督由吴德章担任，他曾是船政局派出的第一批留欧学生之一。经费和前几次一样，由厘金、关税等地方收入和船政局基金中提供，总数预算为10万7千两，学习期限原则上定为6年。

6名学生于1897年10月出发。其中1人中途调任驻布鲁塞尔公使馆翻译，补充者第二年才赶到。这批学生的学力远不如前几

批。新到船政局担任法国技术使团监督的杜瓦勒依要求亲自参与选拔学生的工作，但他对巴黎方面则强调，学生们进入高等专门学校不必进行入学考试。他在信中写道：“这批学生所具有的应付考试的能力很低，就凭他们那不熟练的法语，恐怕就有不少人过不了关，果真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那将是很遗憾的。我曾认真地考虑过，只要他们在学习上肯花力气，专业方面还是可以取得成果的。”学生们被允许免试入学，但只有1名进入船舶工程学校，其它几名则进入土木学校。1年后，进入土木学校的学生因学力不足，转入圣路易公立中等学校预科补习。此时，福州船政局因财政困难，其主持者福建省当局不得不于1900年4月8日取消中国监督和翻译的编制，不久，在同年11月17日又请求批准撤回全部学生。

学生们没有受到充分的教育，这不是当时的欧洲人的责任。这批留学生与前几次相比成果甚少。他们是大清帝国灭亡前船政局派赴欧洲的最后一批留学生。1906年船政局曾有1名学生被派赴国外，但那是去日本，进入中华民国时代，新的留学潮流涌向了美国。

从1895年起，至1900年止，除去在国外病逝的5名青年外，福州船政局的68名学生在欧洲完成了他们的教育。这些留学生为中国的新式海军提供了第一批军官。学生们选修的专业多种多样，又都属于最基本的学科，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19世纪最后若干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矿山采掘、工业企业、土木工程等新式企业的技术骨干。这4批留学生中，很明显第一批的成就最大。这恐怕与留学生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欧洲技术人员和国外的学习环境对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协作精神。1880年以降，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那种认为欧洲人比一切亚洲民族都优越的感情相当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社会阶层，因此导致了对中国留学生友好态度的改变。然而，尽管如此，这批早期留欧学生，包括他们的后人，在他们相互联

姻组成的家庭中，有一个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这就是，让孩子们追随其父辈的足迹，到他们曾经受教育的法国或英国去学习。

【备考】 原文在正文之后，附有详细的注释，其资料包括普罗斯佩·日意格的孙女戴塞洛夫人所收藏的文件，巴黎海军史料部和外交部的文件，以及巴斯蒂女士自己从福州船政局发掘的珍贵资料和中国方面的各种史料。巴斯蒂女士特别对戴塞洛夫人致以谢意，感谢承蒙她的允许，得以阅读日意格的有关文件。限于篇幅，在征得作者的同意之后，译成日文时，我们把注释部分略去。

本文是第一篇围绕中国赴欧留学生的派遣具体叙述清末中法交流的论文(当然，由于篇幅所限，写得较简略)。众所周知，日本和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都于19世纪中叶被迫开放海禁，一起向西方摄取近代文明，两国最初都曾把派遣留学生作为最重要的手段。日本在开放海禁后8年，由德川幕府向欧美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明治维新时期，包括各藩在内，派遣总数达140余名(据石附富：《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统计，留欧学生占近3/4)。清朝政府1872年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是它向国外派出的第一批学生，这是在被迫开放海禁之后30年，距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十余年才采取的措施。在以后的岁月里，在19世纪的最后1/4时间里，60余名学生由福州船政局派赴欧洲一事，在中国值得大书特书。作者依据第一手资料所进行的论证，不仅为研究中法关系史的一个侧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的两个国家对待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和接受这种文明时所显示出来的差异。

译自〔日〕《东亚》1985年3月号

(日译者：岛田虔次、长部悦弘)

田正平译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

曾田三郎

前言

在战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关近代民族工业的研究并不多，^①而且这些研究的重点局限于纺织工业。纺织业是关系人们衣着的生产行业，和外国资本、外国商品的竞争最激烈，同时在民族资本中占较高比重，因此作为研究重点是很自然的。

然而，就近代缫丝工业即机器缫丝业^②在中国民族资本中所

① 近年来研究近代缫丝工业的论著，就著者所接触到的来说有：专门研究民族工业业种的岛一郎著《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京都，女神书房出版，1978年）。该书第三章《缫丝工业和世界危机》，其主要内容就是分析世界危机对中国缫丝工业的影响。此外还有奥村哲撰《危机影响下江浙蚕丝业的重组》（《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2号），《危机前夜的江浙机器缫丝业》（《史林》第62卷第2号）。前文主要分析南京政府对于危机影响下的江浙地方蚕丝业的改良政策，后文把上海的缫丝业和江浙两省各地的缫丝业作比较研究。更早些年的研究文章，则有铃木智夫《清末民初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社会结构》，1960年）。这篇论文企图说明广东地方近代缫丝业的发生到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本的成长过程。铃木论文作为研究民族资本发展过程的个别证据是可贵的，但它没有触及到民族缫丝资本内部。

② 机器缫丝业是生产工业还是加工业？日本的富岡丝厂是原封不动地把当时意大利、法国的缫丝技术移植过来的一种尝试。而中国的机器缫丝业最先是由上海的外国商行经营的。日本蚕丝史研究者认为，当时意大利和法国的缫丝业所处的阶段“属于生产工业技术范围”。（石井宽治：《日本蚕丝业史分析》，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49页）。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机器缫丝=机器’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浅泽秀树：《日本资本主义和蚕丝业》，未来社，1978年，第105页）。以著名的《支那蚕丝业大观》为代表，在战前中国的中国蚕丝业调查报告、学术专著里，都是使用“机器缫丝业”这一专用语，其中堀江英一著的《支那缫丝业的生产形态》（《东亚经济论丛》第2卷第4号，第3卷第1号）指出，机器缫丝业不能称为生产工业。

占的比重来说,也决不可忽视。中国的近代工业是以纺织工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但在1928年的上海纺织业中,缫丝工业资本占5.4%,居第二位,几乎与纺织业相匹敌。从工人数量看,缫丝工人约占纺织系统工人总人数的31%,也居第二位。^①

一般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究其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战争使欧洲各国对华贸易和资本输出或停滞,或减少。也就是说这一外因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了作用,这一点是一直被强调的。^②但在这个观点中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与事实不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外国商品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暂时性的倒退。但是,民族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停滞状态。例如,在著名的经济学家严中平的《中国纺织史稿》里,关于机器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也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到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作为一个阶段来叙述的。实际上,这个时期民族资本纺织厂的生产设备继续在增加。因此不能仅仅从外资和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暂时减退这一外因,来考虑

① 据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工业》(影印本)统计表:《上海各种工业资本分配比较》,《上海各种工业工人人数比较表》。

② 周秀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中指出,虽然辛亥革命的影响,民族运动的开展,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无论怎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外因。并由此联系到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只是昙花一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会编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雄浑社,1972年,下卷,第24页。)

可是,近年来在笠原十九司的《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 and 资本》(《历史学研究》别册特集,1977年)和《抵制外货运动和民族产业》(《中国近现代史讲座》,东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4卷收)二文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运动的开展是有联系的。见《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使中国近代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历史别册特集)。这一记载证实了上述观点,即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国内条件。著者也认为,有关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原因的研究,采取这种观点是重要的。提倡以国货代替日货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要具备生产国货的主要经济条件。经济条件是否具备,或者其程度如何,这是又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在市场方面，缫丝业和纺织业正好相反，主要依赖于国外市场。民族纺织厂生产的棉织品，是以国内市场为中心，就必然要抵制外国资本、外国商品的侵入。生丝，则是依存于国外市场。在国外市场上，要和外国商品竞争，主要对手是日本丝。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国资本，外国商品从中国市场上暂时减退这一外因的作用，这种看法对于分析纺织业固然可以，而对依存于国外市场的缫丝业那样的工业，就不够有说服力。

因此，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不仅要看到外因，还要着眼于国内原因。并且要对各个行业加以具体分析。本文就是以此为宗旨，以上海为中心，对1910年代到1920年代引起江浙地方近代缫丝工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国内的经济原因，加以综合归纳。然后进一步分析由于这些原因而发展起来的民族缫丝资本的结构。

一、近代缫丝业的产生

江浙地方近代缫丝业发展的数据，如表1所示。^①表中的“其他”栏包括杭州、苏州、镇江、湖州、萧山。

从这张表里我们能够了解到江浙地方近代缫丝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其中一点是缫丝厂在日清战争后迅速增加，在此之前则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并不能维持稳定经营。此后不久，工厂数的增减剧烈波动。上海的缫丝业在1895年“逐渐走上发展轨

① 此表曾登载在奥村哲撰写的《史林》杂志上的论文里。从此表可以看出因资料来源不同，各年的工厂数字稍有出入。又《支那蚕丝业研究》中的表记载有关上海之外的地方丝厂、缫丝设备数只是从1911年开始的。实际上，1900年前后苏州、杭州、镇江、绍兴等地已有缫丝厂。但是这个表可反映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江浙地方的丝厂及其设备大体上变化不大的状况。

江浙地方的丝厂数、锅数

表 1

年 所	上 海		无 锡		其 他	
	工场数	锅 数	工场数	锅 数	工场数	锅 数
1890	5					
1891	5					
1892	8					
1893	9					
1894	10					
1895	12					
1896	17					
1897	25	7500				
1898	24	7700				
1899	17	5800				
1900	18	5920				
1901	23	7830				
1902	21	7306				
1903	24	8526				
1904	22	7826				
1905	22	7610				
1906	23	8026				
1907	28	9686				
1908	29	10006				
1909	35	11058				
1910	36	11858				
1911	46	13062	5	1,372	8	1,964

年 场 所	上 海		无 锡		其 他	
	工场数	锅 数	工场数	锅 数	工场数	锅 数
1912	48	13392				
1913	49	13392				
1914	56	14424				
1915	56	14424	8	2118	8	1768
1916	61	16192	9	2530	3	1876
1917	71	18800	9	2660	8	1876
1918	71	19200				
1919	65	18306	14	3853	10	2244
1920	63	18146	14	3856	10	2244
1921	58	15770	15	4183	10	2244
1922	65	17260	14	4188	11	2304
1923	74	18540	18	5828	12	2408
1924	72	17554	18	5588	11	2476
1925	75	18293	17	5208	12	2676
1926	81	18664	20	6621	16	3112
1927	88	20610	22	6992	18	6058
1928	95	23534	38	10430	29	6390

注：据东亚研究所《支那蚕丝业研究》第129—133页。“其他”一栏里，1919年以后的数字，包括湖北省的一二个丝厂。另外，其他地方1927年的锅数超过4000以上，不大可能。

道”，^①这种说法欠妥，应该说还处于没有走上“轨道”的状态。发生变化是1904、1905年以后的事。除了20世纪头10年末到20年代初的几年，可以看到上海缫丝厂、缫丝设备都有增加的倾向。

无锡及其他地方，没有确切数字的年份较多。无锡从1904年最初开设丝厂以来，虽然发展缓慢，但一直在陆续开设。其他地方自1904年起已有5个厂，到20年代前半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中期开始和上海缫丝工业同时复兴，无锡及其他地方缫丝厂的开设也扩大起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904、1905年近代缫丝业发生的过程，然后再来阐明当时围绕着产生近代缫丝业的国内各种经济条件，从而揭示出年轻的民族缫丝资本的有关特色。

江浙地方最早的一家机器缫丝厂，是由怡和洋行于1861年在上海开设的。^②这个厂由于一开始就不主动积极经营，以及购买原料茧遇到困难等原因，经营了10年左右就关闭了。^③1878年，旗昌洋行招聘日本富冈丝厂的技师波尔·布组纳来沪开设丝厂。1882年，公平洋行、怡和洋行开设丝厂。于是，江浙地区的丝厂首先在外国洋行的主持下出现。江浙第一家民族资本的丝厂也于1882年在上海开设。

上海，是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五口之一，开埠后开始大量出口中国手缫丝，这种丝在欧洲市场上只能作纬丝用。上海民资丝厂开设的时候，作为经丝的中国生丝开始在美国市场上遭到排斥。^④美国的丝织工业，由于引进了动力织机，中国手缫丝就不能作经丝使用。以此为国际背景，上海的外国商行，以及黄佐卿那样的生丝贩卖商便开始创设近代缫丝厂，以适应欧美市场趋向于

① 堀江英一：《支那缫丝业的生产形态》。

② 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1年，第307页。

③ 石井摩耶子：《19世纪后半期英国资本在中国的活动》，载《社会经济史学》，第45卷第4号。

④ 石井宽治：《日本蚕丝业史分析》，第33页。

需要高质量生丝的行情。^①

上海近代缫丝业产生的特征，便是在外国商行的统治下，将当时意大利和法国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机器缫丝业照搬过来，以生产作为经丝使用的优等丝为目标。90年代视察中国制丝业的日本蚕业界有关人士认为，中国手工丝的质量低劣，市场价也低廉。而中国丝在欧美市场上“常常要比本国的优等丝贵数十元”，如果中国机器丝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当前已经面临几分失败的我国蚕丝业，其前途将更堪忧虑”。这是日本蚕业界有关人士视察中国蚕丝业后，向日本蚕业同人提出的警告，要他们对中国机器缫丝业提高必要的警惕。^②

但是，完全照搬外国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机器缫丝业和中国现实社会的各种经济条件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并不顺利，困难重重。直到甲午战争期间，江浙地区的机器缫丝业还完全局限在上海一地，即使在上海也没有增加几家丝厂。

甲午战争后，上海丝厂数量迅速增加，但不久又停止了发展。而镇江、苏州、杭州等上海以外的地方也开设了机器缫丝厂。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地方官奖励开设近代工业，以及民间民族意识的高涨起了强大的促进作用，^③使得民资丝厂在数量上超过外资丝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丝厂经营者对各种现实的经济条件的

① 早期经营民族资本丝业时，中国官僚中已有人认识到生产优质丝的重要性，提出了奖励发展机器丝的倡议。1880年，浙江巡抚曾经购进缫丝机器，企图在民间推广机器缫丝。后来由于他的调任，没有收到实效，购进的机器被转卖给公平洋行。1883、84年间，李鸿章视察了外国人经营的丝厂，了解到优质丝的销路很好，便主张奖励机器缫丝。（《申报》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条复四事”，光绪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三）。

② 农商务省农务局（松永伍作）《清国蚕业视察报告书》，1898年，第2、6页。

③ 有关在上海、苏州开设缫丝厂的问题，曾有记载说：“此时中国官吏及民间上绅，害怕外商在自己的国土上设厂垄断经济利益。谓抵制之策，以自己首先经营工厂为唯一良策。于是各地竞相设厂，或设官局，或绅商集资开设，或官商合办。”（《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1908年，第12辑，第30页）。

轻视和忽视。1896年上海的丝厂迅速增加到17家，1897年又增加到25家。但1898年就减少到24家，1899年又减少到17家，这种时增时减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1904年对上海丝厂调查的结果，除外资经营的和中外合资经营的以外，几乎没有能够继续经营下来的民族资本丝厂。^①

1898年丝业的不振造成了1899年上海丝厂的减少。除此之外，经营者的经验不足、投机性、资本不足等都是1899年丝厂减少的原因。还有，“蚕茧出售缺乏规律，收茧商都集中到同一区域争购，结果使供求失去平衡，蚕茧价格昂贵，简直是盲目收购”；“周转资金机关的不具备”；“难于雇到技术熟练的男女工”等，都是丝厂不能维持的原因。^②上海丝厂的减少不能认为是某一年的特殊情况，造成丝厂难以经营的主要原因是原料茧紧张，熟练女工不足，资本不足，不具备金融机关等等这些国内经济条件的恶劣。

日本从手工丝到机器丝的过渡被称为“大飞跃”，^③照搬欧洲先进机器缫丝业的上海缫丝行业，则由于和国内现实的各种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其速度是可想而知的。矛盾之一是资本不足。购买工厂设备需要巨额固定资本，但国内资本积累不足。当时日本派到中国来调查蚕丝业的一个成员曾经指出：甲午战争以后迅速增加的一些丝厂不能很好经营下去的原因，是由于丝厂必须具备巨额固定资本的缘故。^④

经营丝厂必须具备在短时期里买进原料茧的巨额资金。日本

① 《支那经济全书》第12辑，第32—33页。

② 轰木长：《关于清国蚕丝业的报告》（农商务省工商局临时报告，第20册，1901年）第59页。

③ 石井宽治：《日本蚕丝业史分析》，第443页。

④ 前桥商业会议所（深沢利重）：《清国蚕业视察报告》，1899年，第8页。农商务省农务局（松下宪三郎）《支那缫丝业调查报告书》1920年版中指出：上海缫丝工业由于是照搬欧洲的，所以在工厂设备方面，需要巨额固定资本。（第171页）

的生丝商人得到政府的金融支援，从金融贷款得到购买蚕茧所必须的资金。由于这项措施才使日本的缫丝业出现“飞跃”。而中国缺乏日本那种来自官方的、有组织的、强大的保证蚕丝业发展的金融政策。经营者本身的资本不足，国内又不具备金融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机器缫丝业在上海生存下去，就必须依靠将谈到的外国商行的缫丝金融。

另外，那时江浙地区原料茧的上市量也很有限。甲午战争后缫丝厂的迅速增加促使茧价猛涨。战前在无锡生茧市场上，每担茧的价格总是稳定在20元以下，但到甲午战争后的二三年里暴涨了两倍。^①在江浙地方，收购原料茧的店家称为茧行。1884年一个宁波人在无锡开设了一家具具有杀蛹和烘干设备的茧行，能把买进的生茧及时作杀蛹、烘干处理。^②然而直到19世纪末期，茧行增加无几，已经开设的茧行也难以深入农村，直接向蚕农收购蚕茧，也就无法控制蚕茧收购。

这一时期原料茧的收购情况大致如下：^③1882年、1883年开始出现乡民卖茧风气，由小商人上门收购。1890年前后蚕茧收购出现两种情况，一种由地痞居间把持，从中牟利，称为“白拉。”^④另一种由当地的劣绅包下蚕茧，然后抬高价格，强行卖给茧行，称为“露天经纪”。茧行还是无法控制蚕茧收购。

上海的机器缫丝业要把生产的重点放在生产优等丝，就不仅要充分确保大量的原料茧，还必须保证茧的质量。但是，这时虽然许多地方开设了茧行，如无锡，然而农民并不把全部生茧卖给

① 农商务局高津仲次郎：《清国蚕丝业视察报告书》，1897年，第31页。

② 东亚研究所：《支那蚕丝业研究》，1943年第110页。顾毓方著《无锡之工业》，1933年第15页。蚕茧干燥设备的设置，是由布留纳开设的宝昌丝厂开始的。从茧行这个名称到正式收茧是在1882年的南京农村（《申报》光绪八年五月二日），至于开设茧行的最早年代和地点，还是个留待解决的问题。

③ 《时报》，1915年4月20日。

④ 称为“白拉”的人，是活跃于土丝买卖里的掮客。这些人“一看到带着生丝到城里来的农民，就把他们引到丝行或帐房间，在买卖双方之间拉生意，从中获得佣金”。（《清国蚕业视察报告书》，第21页。）

茧行，他们总是把质量好的茧留下来，供自己手工缫，这种现象很普遍。^①

在劳动力方面，“受雇进厂的女工，不外乎来自城市和农村两方面”，^②大致局限于招收上海附近的女子。机器缫丝“虽说是使用机器，但基本操作工序还要依靠女工的技巧”。^③因此培养熟练女工是一个关键问题，这是上海缫丝业实现生产经丝使用的优等丝目标的首要条件。

民资缫丝厂是依靠外国商行的金融开办的，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指导生产，训练女工都必须依靠意大利、法国技师。生产优等丝的厂更是如此。^④甲午战争后，民资丝厂替代外资厂开始增加。但是引进的机器缫丝业和国内实际的各种经济条件之间的差距，使丝厂经营陷入困境。在这种境况下，丝厂的增减反反复复。而得以维持下来的丝厂从缫丝金融到指导生产、训练女工，都必须依靠外国商行、外国技师。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这一阶段能够进入丝业界的人物的社会成分。

在上海开设第一家民族资本丝厂的黄佐卿，原是一个经售手缫丝的商人。甲午战争后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研究引进近代缫丝业时，便注意到上海丝栈的这些经售商们。在签订马关条约的交涉中，张之洞为了奖励发展近代工业而听取上海大商人的意见，丝业界就列举了徐棣山、黄宗宪、杨兆鏊3人。^⑤杨肯定是丝栈经营者，其他两人恐怕也是与经售生丝有关系的。徐、杨两人于1896年正式在上海开丝厂。其他文献资料也讲到清末经营

① 《清国蚕业视察报告书》第17页，《支那经济全书》第12辑，第90页。

② 《支那经济全书》，第12辑，第40页。

③ 泷泽秀树：《日本资本主义和蚕丝业》，第28页。

④ 农商务省生丝检查所紫藤章：《清国蚕丝业一斑》，1911年，第80页。农商务省生丝检查所：《朝鲜支那蚕丝业概观》，1913年，第252页。

⑤ 《致上海叶令大庄》，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张文襄公全集》电牍二十五。

丝厂的人多数是“内地的茧商”和“上海市场的生丝商”。^①据个别厂的调查看，后者居多。1896年对上海丝厂的老板作了一个调查，其中出身湖州和无锡，尤其出身湖州的人居多。^②原因是“湖州这个自古以来有名的七里丝产地，长年和生丝商馆的接触频繁”。^③早期开设丝厂的这些人，都是通过推销生丝和外国商行发生密切关系的商人。

当时技术先进的意大利、法国缫丝业一个厂至少有100锅，多的达400锅。要引进这样大的设备，首先必须是资本雄厚的富商；其次，从春天购买蚕茧的资金到培训熟练工人、管理工人等，都必须依靠外国商人、外国技师。这些只有在推销生丝的过程中和外国商行有密切关系的商人才比较容易办到。

二、缫丝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20世纪初起，上海机器丝的输出量逐年增加，在生丝的总输出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升高。这种情况可以从表2中看到。从

上海出口丝五年平均量(单位包)

表 2

种 别 \ 年 别	1909—1913	1914—1918	1919—1922	1923—1927
机 器 丝	23117	32280	33328	51212
手 缫 丝	48331	33097	27310	25610
合 计	70448	65377	60638	76822

注：本表据《支那蚕丝业大观》，第412—413页。表中1919—1922年栏只是4年的年平均量。1909—1913年的合计可能计算错了，这里仍按原文。

① 《支那经济全书》，第12辑，第50页。

② 《清国蚕业视察报告书》第42—44页。

③ 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支那蚕丝业大观》，1929年，第324页，以下简称《大观》。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机器丝占生丝总输出量的20%；到20世纪头10年的后半期接近50%；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机器丝超过手缫丝；到20年代则达到67%左右。

上海机器丝出口量的增加，无疑是由于近代缫丝业的发展。在这些出口的机器丝中，一部分是无锡出产的。正如表1所示，除了1919—1921年之外，1904年、1905年后，尤其是1910年后，上海机器缫丝厂和缫丝设备不断增加。这种发展趋势是由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第一是市场问题。上海、广东的近代缫丝工业生产不久，便把欧洲，尤其是法国作为主要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上海机器丝的出口来看，输往欧洲的生丝占75%，输往美国的占25%。^①还有一条资料说：“近年清国向美国输出的生丝量正在逐年增加，特别在近几年，其输出量有显著增加。”^②中国丝一向输往美国市场，在一次大战期间，其输出量迅速增加。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市场的萧条使欧洲丝进口数量减少，给上海丝进入美国市场带来了有利条件。如前所述，由于上海引进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先进技术设备，能够生产和欧洲同样质量的优等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日本缫丝业主要生产作纬丝用的普通丝，而上海生产的机器丝则大部分是超级优等丝。就1914年美国市场上优等丝的情况看，意大利丝的60%，上海丝的85%是优等丝，而日本只有18%的丝是优等丝。^③和日本丝竞争的是广东机器丝。

在美国市场上，从1916年起欧洲丝的输入量就明显减少，这时日本丝还没有卷入剧烈竞争的旋涡。这给上海丝进入美国市场留出了很大的余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

① 《支那缫丝业调查报告书》，第10页。

② 《清国蚕丝业一斑》，第1页。

③ 浅泽秀树：《日本资本主义和蚕丝业》，第216页。

了中国近代缫丝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当然正如文章开头所指出的，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只强调外因是不正确的。

· 引进的上海近代缫丝业和现实的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成为近代缫丝业难以发展的内在原因。只要各种经济条件得不到改善，缫丝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同时，正如前面所述，要摆脱外国商行而自立，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方近代缫丝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其各种经济条件是如何得到改善的呢？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主要课题。

首先是劳动力问题。单是这个问题便颇有必要写一篇专门论文，此处只是简单触及一下，简略叙述缫丝女工供给地的扩大和培养女工制度的形成。

缫丝女工供应地的扩大问题，和众所周知的纺织女工的情况基本相同。^① 机器缫丝业产生之初，上海的女工都来自苏北各地和上海近郊农村。到1910年前后，无锡来的女工也多起来。所以说上海的缫丝女工，是由上海、无锡、苏北三地组成的。^② 20世纪20年代后，在关于上海丝厂的调查里，反映出除苏北各县外，无锡、苏州也是女工的供给区。此外在女工的培养、管理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头10年几乎没有外国技师担任工头的丝厂，而由中国人担任“总管车”替代外国技师监督生产。而且，技术优秀的女工，以“女管车”身分，培养一定数量的女工，指导缫丝生产。^③ “总管车”、“管车”监督指导下培养女工的方法，是一种类似师傅带徒弟的做法。把意大利缫丝法和煮、缫分工结合起

① 关于纺织女工的情况，参看松林阳子：《中国纺织工人状况》（《史学研究》第123号）。

② 《清国蚕丝业一斑》，第94页。

③ 1910年代外国技师任现业长的工厂，似乎还有少数几家，但到20年代就完全没有了（《大观》，第332页）。

来，形成了自己培养女工的制度。

其次是改善原料茧的供给问题。如前所述，从蚕农手里收购蚕茧，是通过茧行进行的。因此就必然涉及到扩大茧行制度的问题。茧行的开设，以无锡为中心，扩大到武进、江阴、宜兴、金坛、溧阳等太湖北面乃至西面较为新兴的养蚕区。^①从茧行数量增加的趋势看，19世纪末无锡有杀蛹、烘干所80所。到1910年前夕，无锡一地开设的茧行达140所，1918年增加到224所。^②此外，在传统的养蚕业、丝织业繁荣的地方，茧行也开始多起来。例如，三大织机地之一的杭州附近，到1910年代中期便发生变化。“曾经是有名的土丝产地，此时尚能见到少量的土丝，但占的比例相当小。随着茧行的增加，交通工具的发达，蚕茧将有全部转变为机器丝原料的趋势”。^③

象征1910年代茧行扩大的事件，是上海江浙皖丝厂的茧业总公所与丝织品商、丝商团体之间，在开设茧行规定上的矛盾。上海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是由丝厂资本家和茧业公所（茧行同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到1912年开始公开化，到后期省政府、省议会，直至中央政府也牵涉进去，围绕着开设茧行条例的制定，矛盾激化。^④

在扩大开设茧行的背景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19世纪末期，缫丝厂经营者多数直接开设茧行，8/10的原料茧是亲自收

① 特别是无锡、武进两县，与其他地方相比，茧行的数量占压倒优势，约占1917年江浙两省茧行总数的33%，成为上海丝厂原料茧的重要供应地。而且这些地方的蚕农从很早以前起就开始改良茧的质量，“对于蚕茧的商品化有相当高的热情，老早就采取改良蚕种及养蚕技术，生产优质茧，卖高价的方针。”（本位田男、早川卓郎：《东亚的蚕丝业—东亚经济研究》（3），有斐阁，1943年，第408页。）

② 《清国蚕丝业视察报告》，第26页。《清国蚕丝业一斑》，第111页。《支那缫丝业调查报告书》，第91页。

③ 《展望支那蚕丝业》（临时调查局调查资料，第17号）1918年，第98页。

④ 《大观》，第174—175页。

购的。^①后来逐渐出现蚕业区的“实力者”、“资本家”和“乡绅”开设茧行的情况。^②丝厂经营者只能借茧行的名义和烘茧设备收购原料茧，或者委托茧行负责收购。^③

随着欧美市场优质丝需要量的增加，土丝的输出量减少，蚕农出售生茧的可能性增强。于是茧行大规模开设起来，上海丝厂经营者代替养蚕地方的乡绅，成为开设茧行的主体。和19世纪末那种状况相比较，丝厂就能保证从蚕农手里直接收到原料茧。

由于茧行扩大开设，不仅茧的上市量相对增大，交易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无锡、上海形成了干茧市场。1908年从南京经无锡到上海的沪宁线通车，对干茧市场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在无锡，贮藏干茧的栈房林立。从周围蚕业区收购来的茧经杀蛹、烘干加工后进仓，等待成交。这些茧不仅供给上海和无锡本地，还供给苏州、镇江的丝厂。由于铁路通车，也可以把生茧运到上海杀蛹、烘干，然后出售。

干茧市场的形成有利于近代缫丝业的发展。在干茧市场形成之前，丝厂必须在春茧上市时买进全年生产所需要的茧。现在，春茧上市时由茧行向蚕农收购，丝厂只须按照和外国商行的订货合同，随时向茧行购买所需要的干茧。丝厂经营者就不必一下子拿出一笔收购春茧的巨额资金。多数茧行老板都是茧商出身。20年代浙江生产的蚕茧，近6/10是由茧商经销的。

此外，上海的许多丝厂是依靠租借工厂设备的租厂制度开工的。这种制度可以说是解决引进的欧洲先进机器缫丝业和国内未

① 《支那经济全书》，第12辑，第58页。《清国蚕丝业视察报告》，第27页。

② 《大观》，第162页。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支那工业综览》，第159页。堀江英一：《中支处理蚕茧的形态》（东亚研究所第六调查委员会第三次调查报告会报告书，1942年）。

③ 详细说，丝厂和茧行的关系有四种结合形式。第一种形式称为“租灶”，以茧行的名义租借一切设备。第二种称“包烘”，从收茧到烘干，都由茧行负责。第三种称“包交”，包括收茧、烘干、运送到上海，支付税金等一切费用，都由丝厂负责交付。第四种称“行佣”，茧行负责收茧、烘干，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成熟的资本积累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形式。租厂制度的普及使经营者摆脱了巨额资本的固定化，至少在着手经营丝厂时困难小一些。

租借工厂设备通常是在新茧开市的6月份前后到第二年的5月份，大约1年时间。但是其中也有长达几年的长期合同，或三四个月的短期合同。其租金在1910年代，一般是每月每锅银1两半左右。到20年代便涨到2—2.5两。1910年代丝厂的平均规模是260—270口锅，每月租金390—405两。20年代工厂规模缩小到240口锅。而每月租金却上升到480—600两。^①原来只要5000两左右资本，20年代则要6000—7000两资本才能确保一个一般规模的丝厂经营1年。

由于租厂制度，使许多丝厂经营者从巨额资本固定化中解放出来，只要筹集到流动资本就可以经营工厂。接下来就必然提出补充流动资本的缫丝金融问题。丝厂经营者组织同业公会来筹集自己所需的资金，大部分厂必须在正式开工前筹集到收购春茧的资金。这种金融方式也是19世纪末以后近代缫丝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变化。

19世纪末经营丝厂困难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机关的不完备，由于这个原因，就不得不去依靠外国商行的资金。有关缫丝金融的发展变化问题，有人指出，第一次大战前，外国商行的金融占主要比重，大战之后以中国钱庄、银行金融为主。^②在此不能详细说明缫丝金融发展的具体情况，但可以找到1917年缫丝金融的确

① 鸿巢久：《支那蚕业之研究》，1919年，第264页。《大观》，第254页。根据生丝的行情，借贷资金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同的文献资料，资金额也有差异。

②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编：《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4页。

切数据。^①当时上海丝的收茧总金额为1400—1500万两,其中外国商行的融资约占850万两,钱庄融资约600万两,其他内外银行融资约20万两。

据1918年的调查,按金融机关对丝厂融资比重来排列的话,其顺序为:钱庄,外国商行,外国银行,中国银行,生丝销售商,融资总数与1917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但从比例来看,钱庄约占4/10,外国商行约占4/10,外国银行等其他来源约占2/10,^②外国商行融资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

进入20年代后缫丝金融的状况是:“上海丝厂资本家通过产地茧行购茧时,普遍依靠钱庄”。^③这是否可以说,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缫丝金融从外国商行为主转变为以钱庄为主。这就是缫丝金融发展的一般趋势。

引起缫丝金融变化的国内原因之一,是1910年代到20年代钱庄融资能力的增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银行衰落,相反钱庄势力增大,“尤其是欧战期间获得巨额利润的浙江人,他们把钱投入钱庄,使钱庄势力日益增大”。^④一次大战期间,钱庄利润迅速增加。上海钱庄升数,大战结束时和20世纪初相比增加

① 《支那的蚕丝业》(临时产业调查资料第16号),1918年,第109页。又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其他国家的商行和中国钱庄的融资额见附表。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三井洋行的缫丝金融,非常活跃。

附表 1917年的缫丝金融

国 籍	日 本	英 国	美 国	法 国	意大利	瑞 士	中国钱庄	合 计
融资额 (两)	2000000	2800000	500000	1300000	1400000	500000	6300000	14800000

注:据《展望支那蚕丝业》,第84页。

② 见《支那丝业调查报告》,第20—21页。

③ 森村顺一郎:《以上海为中心的支那生丝业》(《大正13年夏季海外旅行调查报告》,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校刊收)。

④ 长野郎:《支那资本主义发达史》,1931年,第394页。

两倍以上。1912年到1926年间平均资本额增加4倍左右。而且从1913年到1923年间没有一个钱庄倒闭。

缫丝金融的主要承担者转移到钱庄，标志着丝厂经营摆脱了外资的控制而趋向独立；标志着开设丝厂比较容易着手。外国商行控制缫丝金融的目的是通过金融来确保生丝出口。外国商行一般是以提供金融为条件，换取包揽该厂生产的生丝出口业务。专做出口生意的商行，往往掌握着3—5个这种关系的丝厂。与此相反，钱庄以金融为本身业务，钱庄金融的活跃，融资额的增大，在20年代前半期，春茧开市时，其融资可上升到2000万两到2500万两，替代受到外国商行特定经营限制的融资。因此钱庄对于缫丝金融的承担，具有很大意义。

综上所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的近代缫丝业在收购原料茧及资金等方面的困难有所改善，经营丝厂较容易了。加之市场的原因，中国在1910年代到1920年代国内各种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使丝厂数增加。至于在上海近代缫丝业的发展中民族资本内部构成的情况如何？19世末和20世纪初的情况相比有什么不同？这是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三、民族缫丝资本的情况

1. 市民小资本

如上所述，上海的近代缫丝业由于欧美生丝市场状况的变化，国内各种经济条件的改善，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便有所发展。

下面就考察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的民族资本情况。

在江浙地方，如上海、苏州、无锡和杭州等地的缫丝资本形态，似乎也不完全一致。因资料有限，在此只能以上海为重点进行剖析。就江浙地方的民族缫丝资本而言，存在着“买办资本”，“平民小资本”，“农村合作社”三种形态。考虑民族缫丝资本状态的时候，可以此为线索，但处于第三位的“农村合作社”因时间、

地域的关系，不属于目前考虑的对象。这里所说的“农村合作社”是指1929年江苏吴兴县最早由蚕农联合开设的开弦弓丝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创办丝厂的主要是一些销售生丝的商人。随着各种经济条件的改善，中小资本家联合起来便可能开厂。所谓“市民小资本”就是指这种由私人合股或共同出资等小资本家的集资而言。这是由中小资本家投资组织起来的缫丝资本。

这种资本和19世纪末的丝厂经营者相比较，经营者的资力颇有日趋弱小的倾向。前面所载的表1也反映出，在上海，一方面丝厂的数量在增加，另一方面各种丝厂的规模在日益缩小。从每个厂平均锅数的变化来看，19世纪末到1904、1905年，上海各厂的平均锅数在350口上下。1910年代减少到230—240锅。^①这种情况说明，1904、1905年以后，虽然丝厂的家数增加了，设备并没有按比例增加。因此说，从1910年代到20年代缫丝厂的增加，虽然形成了少数“缫丝大资本”，但小资本丝厂在缫丝行业中占绝对优势。

在着手开厂时，由个人组织资本的情况是少数，合作和所谓合伙制居多数。往往由一个人发起，集合几个知己朋友合股经营。各人的股本多则4000元至5000元，少则1000元到2000元。共同签订称为“议单”的契约书，挑选一人作经理负责经营。经理多数是从股东中推选，也有从股东外招聘的，这种合股经营的厂是否能维持和继续经营，要到第二年收茧时期再决定。在上年亏损很大，或预测当年市场的状况希望不大时，往往就此解散。合股之所以能解散，就是由于前面所提到的租厂制度。许多丝厂都是依靠这种制度开工的，合股者并不把自己的资本固定于工厂设备。

上海丝厂的经理，多数是具有管理工厂经验，当过“总管

① 1918—1920年间，每个丝厂的平均锅数增加，但上海的近代缫丝业却陷入困境，许多小厂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里倒闭的。

车”的人。各个厂大多分设称为帐房的事务部和实际操作的生产部。生产部下设“剥茧间”、“抄茧间”、“车间”、“丝间”。剥茧衣、选茧、缂丝到成品出去各道工序都在这些工场里完成。每道工序都有监工，缂丝车间的监工称“管车”。“总管车”有的总管几个“管车”，有的负责管理全厂各个车间、各道工序。据史料记载，各道工序虽有若干性质上的差别，但车间里配备的女工较多，所以就缂丝工作具有的基本性质而论，各工场的差别似乎并不大。

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由于前面所叙述的各种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使一些负责监督丝厂生产的人，也逐步积累起资金，再通过至亲好友筹集资金，自己出马经营丝厂。而由当过“总管车”的人担任经理的目的，是要解决丝厂金融问题。

由担任过“总管车”的人任经理的丝厂，较为肯定的只有个别几个例子。如徐锦荣开设的永泰丝厂，在永泰丝厂做过“总管车”的曹金可开设的瑞丰、元大丝厂。此外，尽管据说由“总管车”当经理的厂很多，但实际上都不能肯定。可能是由于这些厂资本小，缺乏连续经营的力量，缺乏详细记载的资料。而下面要

每锅的流动资本额及厂数

表 3

流 动 资 本 额	工 厂 数
不满90两	34
90~99两	23
100~109两	12
110~119两	8
120~129两	9
130~139两	5
140~149两	4
150两以上	7
不明	2
合 计	104

注：据《上海之工业》第18—26页。

谈到的那些富商任经理的丝厂，则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因为这些厂资本周转能力强，经营年数多。

租厂制度的普及，使丝厂经营者摆脱了工厂设备这一巨额资本的固定化。只要组织到一定数量的流动资本，就能经营丝厂。至于流动资本的数量，从1928年前后的流动资本额看，若能筹集到每锅100—150两资金，就能向钱庄贷款办厂。也就是说只要筹集到每锅至少100两资本，就可考虑开厂。表3反映了当时上海104个丝厂每锅的流动资金额。当时上海的大部分丝厂每锅仅备有流动资金100两左右。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厂，不能开动全部缫丝设备。^①这些丝厂经营者自己不仅没有工厂设备，也没有维持稳定经营的足够的流动资本。

补充资金不足部分的钱庄贷款，主要是用作收茧所必需的资金。这笔资金的多少则要根据工厂设备的规模和蚕茧的市价而定。有人对1910年代前半期一个具有200口锅的工厂作计算，若每天生产大约一担生丝，全年开工280天，那么一年的总产量就是280担。一担生丝需要5担干茧，一年就需要1400担干茧。每担茧价为110两，购买全年生产原料的费用应为154000两。这个计算并没有把这个阶段女工的技术能力和干茧的质量考虑进去。首先，5担干茧就能生产一担生丝的茧，必须是优质茧。事实上，就是优质茧，生产一担生丝也需要520—530斤干茧。何况在茧的质量普遍恶化的20年代后期，就需要600斤茧。其次，这个资料记载的所谓110两1担干茧的价格是按极低的市价估计的。从1910年代后半期到1920年代前半期，上海干茧的市价除个别年份外，每担茧都在150两上下浮动。把这两点考虑进去后，再来重新计算，所需资金就大大增加。一个规模为200锅的丝厂，连续生产9个月，就需要1500担干茧；每担茧价为150两，收购资金

① 在关于1910年前后的情况中指出：上海丝厂里并非所有的机器都在转动，有一部分经常停止转动，在很多时候达2/10以上（《清国蚕丝工业一斑》，第81页）。

就需要225000两。这就是说这时经营1个一般规模的丝厂，1年所需的购茧资金约30万两。不过，由于干茧市场的形成，便不需要具备全部资金，在春茧上市时，只须买进全年需要量的60%，其余部分随时可向经营干茧的茧商购买。

经营者要向钱庄贷款，就得把合股筹集的资金存入钱庄，然后由钱庄根据经营者的信用程度给予信用贷款，一般存入的股本额相当于贷款的2—3成。例如，自己筹集到4万两股金，按信用贷款的二成计，可以得到钱庄20万两信用贷款。经营者的社会地位、经营手腕，以及股东的身份是钱庄信用的主要根据。^①由富裕商人当经理的丝厂，是以其本人及人事关系得到钱庄较高的资力信用。

小资本丝厂多数由当过“总管车”的人担任经理。因为标志产品质量的商标并不在于一个厂的老板，而在于经理。生丝质量的好坏，要看生产负责人——“总管车”的手腕如何。因此经理是具有“总管车”经验的人，在某种意思上，就对外表明了这个厂生丝的质量。钱庄对这些厂的信用根据，就是看经营手腕和反映在商标上的缫丝技术。

钱庄向丝厂开展金融业务，一方面使那些和外国商行没有密切关系的中小资本家，能依靠合股小资本经营丝厂，从而使丝厂数量增加。另一方面，丝厂的经营要接受钱庄的强力干涉。钱庄贷款大部分用来收购原料茧，钱庄一经放款，从收茧、进栈到提货，厂方都得接受它的强力干涉。当丝厂开始收茧时，钱庄派出人到当地去办理支付茧款业务。购进的茧被放进和钱庄有特殊关系的栈房。栈房把入仓的茧作为贷款的担保，因此丝厂经营者和钱庄有直接清算债务的情况。钱庄的放款期限，普遍为3—4个

^① 《大观》，第340页。据《大观》记载，钱庄向丝厂放款，似乎完全是信用贷款。当然，钱庄根据经营者的社会信用程度来确定贷款的数字，但并非没有担保。据前面提到的《支那缫丝业调查报告书》记载：放贷是以购进的蚕茧作抵押的，以此规定作为提供贷款的前提。实际上《上海钱庄史料》（第802—803页，842页）记载的钱庄的具体例子里，钱庄对丝厂的放款几乎都是以丝、茧作为抵押。

月。在此期间，必须以销售生丝的货款还清借款。丝厂提取原料茧必须得到钱庄的许可。在没有还清借款期间不允许提取全部干茧。

钱庄放款一般是短期的，得到放款的丝厂不仅不能把资金投资于设备，而且因迫于归还贷款的期限，不得不迅速把产品转变为货币形式。3—4个月的贷款期限，相当于收茧之前和外国商行成交的生丝合同大体完成生产的时间。因此丝厂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逐步把产品转变为货币，以还清钱庄的贷款。丝厂经营者迫于贷款的期限，就要尽快把生丝卖出去，这对外国商行及丝商有利，对丝厂不利。

合股经营的丝厂其离合集散，非常频繁。下面把1917年的68家丝厂(除怡和丝厂外，其余均为民族资本)和1922年调查的68家丝厂作一比较，就可看到1917年开办的厂到1922年时，只存下13家。每年的倒闭率达十分之一二。这种情况是值得充分注意的。

这种状况即使到1920年代，几乎还是如此。表4是1928年上海丝厂经营年数分类表(见下页)。

1928年这一年新开设30家，占总数的3/10强，从总数中减去30家，就是前几年开设的厂数，其中包括开厂年代不明的，共是65家。但是，上海前一年度的丝厂总数是88家。因此，38家减去65家，剩下的23家合股经营的厂在1928年春茧开市期间终于倒闭了。倒闭的厂差不多占前年度经营总数的26%。

在国内各种经济条件得以改善的情况下，原来属于工段长地位“总管车”开始资产化，以这些人为核心，聚集起他们周围的小资本家，形成了缫丝小资本。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但是，由于资本小，必须依靠租厂制度，依靠钱庄金融，因而也就不能充分克服丝厂经营的不稳定性。这些小资本的发展是非常艰难的，往往经营一年或数年就倒闭的例子很多。另一方面，个别新的小资本丝厂能够改善经营的情况也是有的。

上海丝厂经营年数分类(1928年)

表 4

经营年数	工厂数	厂名
15年以上	8	瑞纶、云成、统益、大纶、怡和、信昌、久成、英安①
13年	1	元元
12年	2	元丰永②、瑞丰
10年	1	百司福
9年	5	裕经、天昌、豫丰、绪兴、大来
8年	6	通纬、锦云、瑞和、天来、丰泰元、慎兴
7年	4	绪昌福、绪昌永、永丰润、同丰永
6年	6	九经、顺丰、恒隆、广源、宝泰、泰来
5年	5	百司二、纶祥、竞丰、祥和、协丰
4年	2	纬丰、安豫
3年	13	以下略
2年	11	
新规	30	
不明	1	
计	95	

注：据《支那蚕丝业大观》第1074—1079页。①英安的厂名，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在经营年限长的厂中没出现过，恐怕是协安之误。②元丰永，也同样是元丰之误。

2. 缫丝大资本

在多数小资本不能稳定经营的情况下，也有少数能够长期经营的。其代表就是表4中汇总的、经营15年以上的8个厂。其中除怡和是英国资本不作考察对象外，其余都是民族资本。另外应该加进没有列入表4，但属于经营15年以上之列的永泰丝厂。这个厂在上海经营了将近30年，到1920年代后半期才搬到无锡去的。

除去怡和加上永泰的8个丝厂中，最早的开设于甲午战争前后。但就是这几个厂，到1904年时也只剩下信昌、瑞纶、永泰3个厂。而且瑞纶厂是和德商、信昌厂是和法商共同经营的，完全转到中国人手里经营，还是后来的事。经营15年以上的这些厂，多数是在1910年代前后开设，或是转变为民族资本的。此后的一些厂，如表4上所列的那些厂，都是后来逐年开办起来的。虽然有些厂开设没多久就解散掉了。这些工厂在1910、1920年代尚能维持比较安定的经营。

下面准备以这8个厂为中心，对其资本的特征加以探讨。但是，要搞清各个厂筹集资本的时间，每个股东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只能从能够列举出经理姓名的经营者的情况，来研究其资本的特征和筹集的手段。

在叙述这一问题前，先触及一下资金量方面的情况。这8个厂每锅的流动资金和前述的小资本丝厂没有多大区别。小资本丝厂每锅的流动资金在100两上下的厂居多数，而久成、信昌、协安、瑞纶等厂每锅的流动资金达150两至200两。而且瑞纶、永泰、信昌、协安、久成等厂不依靠租厂制度，都自己拥有工厂设备。所以这8个经营稳定的厂，在资本数量方面可说是居于优越地位的。

在研究“大资本”的特征时，先以8个厂为中心，然后着重研究经营历史较长的厂，并对个别经营者的特点作剖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瑞纶丝厂转到以吴烂溪为核心的民

族资本手里，后来由其儿子吴登瀛个人经营。吴登瀛是第一流的生丝出口商行——安利洋行的买办，除了经营瑞纶丝厂外，还同时经营恒生泰丝号（机器丝推销商）、永泰号茧行。经营统益丝厂的是倪钦章，此人既是以出口生丝为主要业务的泰和洋行的买办，同时又是统益号茧行老板。经营大纶丝号的吴松岩是安旗洋行的买办。经营信昌丝号的史馨生是百司洋行的买办，同时又经营绪昌福丝厂，但掌握绪昌福丝厂实权的是信孚洋行的买办薛浩峰，信孚是第一流生丝出口商行，薛又同时经营绪丰丝号。

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永泰丝厂的经理是徐锦荣，但掌握实权的是薛氏。据说在1896年创办永泰丝厂时，列名为企业主的是永泰洋行的买办。徐锦荣是“总管车”出身，但他并不致力于经营永泰厂，同时又经营三元号茧行。其他3个厂的经营者的情况不甚了解，但协安丝厂的奚雨臣经营百司福等几个厂。久成丝厂的莫觴清掌握被称为“久成系”的10余个丝厂，他死后久成系便解体了。云成及元元等原来就是久成系的。

前面讲到小资本丝厂的经营者的多数是当过“总管车”的人，而这8个厂的经营者和核心人物则多数是买办及丝号经营者。除上面列举到的人之外，在上海著名丝厂的经营者的里，作为“买办型缫丝业”的代表人物，还能举出朱静庵、丁汝霖、邱毓庭、黄吉文等。

朱静庵经营元丰、同丰永两厂。元丰丝厂据前面经营年数分类表，到1928年已有12年厂龄。朱静庵既是第一流生丝出口商行怡和洋行的买办，又亲自经营丝厂。丁汝霖是允余丝厂的经营者的。1928年的调查里没有允余厂，但在1924年的调查里说到这个厂经营了9年，丁汝霖死后，产业由他儿子继承，但是在1924年期间允余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则无法考证。丁汝霖是慎余、有余两洋行的买办，还经营鼎余丝号，又经营同一牌号的茧行。

邱毓庭经营天来丝厂，他是公安洋行买办，又是毓记丝号的老板，还有以天来丝厂为核心的几个厂也是属于邱毓庭系统的。

黄吉文是豫丰丝厂的经营 者，同时也是美鹰洋行的买办，某丝号的经营 者。

以上列举的是经营年限较长，在上海有名气的丝厂经营 者。这些人多数是向外国商行推销生丝的丝号经营 者和买办，并且双重身分者居多数，同时又是茧商。有人根据这种情况指出上海民族缫丝资本的“前期性”和“买办性”。上海民族缫丝业中的“大资本”具有这种特点是事实，那么这种大资本究竟向什么方向转化呢？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丝号、买办、近代缫丝业三者之间的历史联系。^①

“洋丝庄(即丝号——著者注)作为生丝交易所，不仅仅是替外商收购生丝的经纪人，而且多数是由富商个人经营的。他们从自己10余万元的资本中拿出一部分，或和朋友合资，或贷款给资本不足的丝厂”。^②因此，丝号经营者在维持生丝推销商职能的同时，亲自出马经营丝厂。

生丝经销商的作用，有相当大的历史性变化。生丝经销商原来统称丝栈，以出卖浙江产的土丝为主要业务。其职能不局限于推销生丝收取佣金，还为贩运生丝的内地商人准备客栈，当这些商人的货不能马上脱手时，丝栈便替他们办理生丝保险，放进自己的堆栈，代为保管，必要时对回乡的人预先借给一定数量的资金。等到货销脱之后，再通过钱庄把货款汇交回乡的内地商人，同时扣去手续费和其他费用。

此外，丝号的经销商又称为厂丝号，专门推销机械丝。若和丝栈比较，其作用要小得多。由于丝厂和外国商行设在同一地区，机器丝几乎没有现货交易，丝号没多大必要，“只是经营生丝的

① 关于江浙地方的近代缫丝业性质，是由上海向其他地方发展的，这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奥村哲发表在《史林》上的论文说：历史的必然性也可以说是对上海近代缫丝工业而言。

② 《最近上海丝厂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29年。

销售以及以生丝作担保的临时信贷业务”。^①

最初，无论是机器丝还是土丝，都由丝栈卖给外国商行。后来手工土丝的出口量减少，而机器丝的出口量随着丝厂的增加在不断扩大，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经销机器丝的丝号。关于生丝经销商分化的具体过程，无法寻根究底地剖析清楚。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丝厂开始经营之后，继续经营下去的那些丝栈转变为丝号；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买办随着机器丝出口量的增大，重新加入丝号行列，并着手经营丝厂。上面列举的许多“缫丝大资本”就是在1910年代前后开始形成的。机器丝经过丝栈的并不多，这对生丝经销商的分化是个相当大的促进。在1910年代后半期，这种分化便相当明显，在文献资料中，把丝号、丝栈分开记载。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依赖于外国商行的缫丝金融比例较高。这种融资并不是由商行直接进行的。“生丝出口商的放款多数通过买办进行，买办对商行负责，收取一定数字的佣金。”^②这就是说商行的缫丝金融是通过买办之手，由他们负责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钱庄的缫丝金融活跃起来，到后来甚至压倒了外国商行的金融。

总而言之，不管是丝号还是外国商行的买办，在他们着手经营丝厂时起，作为丝商或作为买办的作用便逐渐缩小了。

结 束 语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近代缫丝业所必需的国内各种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成为近代缫丝业得以发展乃至脱离外国商行而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缫丝资本逐步形成，其资本的构成有“市民小资本”和“缫丝大资本”二种。只强调上海缫丝资本的买办性是错误的，还应看到小资本也在形成。这里所谓的“市

^① 《大观》，第429页。

^② 《支那蚕丝史》，第110页。

民”，是指由工段长——“总管车”为核心的社会中下层资本家所组成的资本而言，仅此而已。“缫丝大资本”确实具有买办性的一面，但就其历史看，这一面正在逐步削弱。从以上论述可以证实这些看法。

但是上海近代缫丝业的基础并不稳固，这与改善国内各种经济条件的方法有关。第一，是租厂制度问题。这一制度是解决巨额固定资本和国内资本积累不成熟之间矛盾的一种形式，有利于丝厂的开设经营。但另一方面，依靠租厂制度既难于改良工厂设备，又容易利用干茧交易的普及而使经营陷入投机性。第二，是为补充资本不足而展开的钱庄缫丝金融问题。小资本也可以向钱庄贷款经营丝厂，租厂制度使他们不仅不投资设备，钱庄金融又促使丝厂经营者迅速把生产的生丝转变为货币。因此，经营者在和丝商、外国商行的关系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第三，是收茧制度问题。茧行制度的扩大，对丝厂经营者来说，易于确保原料茧的来源。但是，茧行向茧农收茧是在以茧业公司为核心，对开市日期、最高收购价格等方面实行垄断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垄断，可说是削弱蚕农生产积极性，阻碍蚕农主动改良蚕茧质量的原因之一。20年代中期前后，上海丝厂的最大原料茧供给地无锡出现了蚕茧质量恶化，丝产量下降的情况。茧质的恶化，不仅使原料茧的需要量增加，还要增加选别蚕茧、剥茧毛等女工的人数。

上面这些情况，如果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丝和日本丝在欧美市场上的变化联系起来看，问题的严重性就更显得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机器丝行业开始转向以生产优质丝为重点，于是在欧美市场上日本丝成了上海丝激烈竞争的对手。

译自日本《历史学研究》第489号，1981年1月

孙国群译 袁琳校

世界生丝市场上的上海机械丝

曾田三郎

前 言

上海的缫丝厂最初是在外国洋行的主持下开办的。而民族资本的缫丝厂得到迅速增加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反复，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稳步发展。有关造成上海机械缫丝业发展的国内各种重要原因，前文（即《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译者）已作了探讨，并指出了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

造成中国近代缫丝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各种经济条件的改善，为了强调这一点，前文对生丝市场的问题没有多作论述。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机械缫丝业都和外国市场紧密联结在一起，所生产的大部分机械丝是输往国外的。因此，在研究中国机械缫丝业的发展时，也不能忽视国外市场对生丝的规格要求。

19世纪中叶世界生丝市场形成以后，中国生丝和以意大利生丝为中心的欧洲丝、日本丝相匹敌。那么它在世界生丝市场上占着怎样的地位呢？所占地位的情况，又对上海缫丝业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呢？就中国丝的输出而言，上海丝和广东丝就有很大的差异，本稿准备探索上海丝中有关上海机械丝在世界生丝市场上的地位。

最早发展机械缫丝的欧洲，由于19世纪中叶蚕病流行，缫丝

业受到很大打击。此后，仍以意大利生丝为中心维持着一定的生产量。日本开始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后，其中机械缫丝业从1870年代起得到迅速发展。在中国，与广东丝同时发展起来的上海机械缫丝业发展速度并不快，但必须注意上海机械缫丝业和日本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中国生丝中，广东丝和上海丝的区别在于，后者被称为支那丝，是从上海输出的生丝的总称，但这些丝并非都是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生产的，其中还包括湖北、四川、山东等省的少量机械丝。由于这些省的缫制方法中不仅渗入了日本式的缫丝法，而且是以生产黄丝为主，缫丝方法和质量都和上海丝不同，所以不属于本文所说的上海机械丝的范围。本文所讲的上海机械丝是指上海缫丝厂生产的生丝，以及和上海的厂丝没有多大区别，属于同一类型的上海附近的无锡等江浙地方生产的大部分机械丝。^①就是说，所谓上海机械丝是指从上海出口的机械丝的大部分而言。

一、世界生丝市场的形成与中国

以开港为转折点，输往欧美各国的亚洲生丝渐渐增多。至于世界生丝市场正式形成，是以1850年代的中国生丝和60年代的日本生丝输往欧美各国的数量增加为标志的。^②而亚洲生丝和欧美市场的联结，又是以亚洲各国的开港为基本转机。其次，1850年代从法国发生的蚕病于60年代波及到意大利，使欧洲的养蚕业受到了很大打击；同时，比以法国的花纹织品为代表的高级丝织品便宜的丝织品流行起来，于是环绕发展丝绸业的各种条件中最重

① 所谓上海式缫丝法就是引进的“保尔·卜鲁纳缫丝法”，有关这种方法的具体特征，本文将论述到。上海式缫丝法从上海扩展到江苏、浙江两省的各个地方，但在浙江省，日本式缫丝法也有所渗透。

② 石井宽治：《日本蚕丝业史分析》，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23页。

要的原料丝的需要量激增，欧洲各国对亚洲丝的需要也增加了。^①加上运输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以及国际金融的完善，欧美各国实现了增加输入亚洲丝的目的。

19世纪末，在欧美各国中法国是最大的生丝消费国。自19世纪中叶蚕病流行时开始，法国对亚洲蚕种、生丝的需要便逐步增大，最初一段时期是经过伦敦市场间接输入的。到1860年代法国邮船航线达到了远东，加之苏伊士运河开通，法国便逐步直接输入亚洲生丝。从上海出口生丝状况看，对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大陆的出口量超过对英国的出口量，从1870年代中期起已是如此。

亚洲丝输入的增加，打击了克服蚕病后的欧洲蚕丝业。法国由于输入亚洲丝的增加，造成国产丝的价格低落，致使刚刚克服了蚕病的养蚕业受到很大打击。1880年代后半期，法国的生丝产量降低到1850年的22%左右。因此，法国丝绸业使用的生丝总量中，国产丝所占的比率也下降了。从1880年的里昂丝绸业看，国产丝仅占13%，而日本丝和中国丝则占50%以上。意大利从1860年代到1870年代生丝的产量依然下降，但它不同于法国，后来又渐渐回升。这时，亚洲各国还不能马上着手生产优质丝，但作为输出国，依然维持着一定的生丝产量。

不仅具有丝绸业传统的法国需要亚洲丝，就连丝绸业新兴国美国对亚洲丝的需量也日趋增加，它在较法国稍晚的时期内，都是经伦敦市场间接输入的。直到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辟了中国航线，和横贯大陆的铁路开通之后，才直接输入亚洲丝。

在养蚕业没有根底的美国，最初大部分原料丝必须依赖于以日本、中国为主的国家进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生丝消费量明显增长，从1895年和1904年欧洲及美国的生丝消费量的变化

^① 据关于19世纪丝绸业的研究说：“从1860年前后开始，质量一般，价格便宜的丝织品代替了高级上等产品，这种丝绸风行国际。”（服部春彦：《19世纪法国丝绸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史林》第54卷，第3号）。这一现象的出现，便成为对比欧洲丝廉价的亚洲丝需要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较看，前者的增长率约为18%，后者的增长率则超过70%。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生丝消费量超过法国。“总之，欧洲的消费量如迟迟不能增长，那么美国市场必将控制丝价，并按本国消费力之多寡，给予一般丝的状况以莫大影响，此乃毋庸置疑之事实。”日本明确地预测到美国将在世界生丝消费中确立支配地位。

纵观世界生丝市场，以法国和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各国对亚洲生丝需要量的增大，促进了日本和中国缫丝工业的开始改良。这个改良并不局限于改进不利于蚕丝业发展的国内各种条件，还联系不同的主要出口市场，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日本丝的出口市场于1880年代中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在此之前主要市场是欧洲，大多数供给法国消费。但是，日本丝和中国丝质量相同，不能作经丝，而只能作纬丝。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市场上，日本面对本国生丝不能进入经丝领域这一现状，在实行“殖产兴业政策”中，便以振兴以往的缫丝业，打开这一局面为主要目标，具体实施政策就是招聘外国技师，引进欧洲缫丝技术，其典型例子就是富冈缫丝厂的建立。但是，日本缫丝工业改良的方向并不是建立和现实的经济状况不相符合的庞大的富冈缫丝厂型的工厂，而是采取较简易地引进欧洲缫丝技术的诹访型缫丝。这一改良的目的是把日本生丝的主要销售市场从欧洲转往美国。

以诹访型缫丝为技术基础的日本缫丝业，采取大量生产质量均匀的中档丝而不是高档丝的方针。在美国市场上，日本丝主要用作丝织品的纬丝，需要量极大。当然日本也有少数缫丝厂生产优质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缫丝业基本达到了大量生产美国市场上用作纬丝的生丝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近代缫丝业，姑不论其发展速度，就其发生改良看，是在上海和以顺德、南海两县为中心的广东省。关于上海和广东的近代缫丝业，各个方面都必须区别分析，包括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生丝质量问题。在此将直接触及上海的问题，但是关于1870

年代陈启沅在广东引进近代缫丝业技术的阶段，暂且介绍以下3种说法：机械缫丝说，改良脚踏缫丝说，脚踏缫丝说。如何抓住这个问题，在搞清广东缫丝业特点的基础上，与上海的近代缫丝业作比较，也许是很重要的。

1861年上海出现第一家由怡和洋行出资创办的近代缫丝厂，不久，外国商行主导下的缫丝厂逐步开设。而民族资本的缫丝厂迅速增加则是在中日战争以后。上海缫丝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欧洲的缫丝技术。在上海的丝厂里，一直到相当晚还有外国技师。

日本蚕丝业界对上海引进欧式机械缫丝业，以及中日战争后其丝厂数迅速增加的状况，均有所警惕。同时，中日战争后随着金本位的采用，国际银市的变动，也影响到日中两国生丝的出口，对此日本蚕丝业界议论纷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蚕丝业界对中国发展机械缫丝业的潜力之大，怀有戒心，但是没有重视在生丝出口的现实中中国丝对日本丝的威胁。这和日本蚕丝界对中国缫丝业改良的程度和中国丝的销售市场的认识有关。

例如，日本有位著名的生丝推销商，在给原商店货主的信中说：“现今支那的大部分生丝是所谓上海的七里丝和质量最差的广东丝，这些丝只不过比提丝稍好一点，能和我国的机械丝作同样用途的优等丝仅是少部分。”中国出口的生丝大部分是原来的座缫丝，^①这时的广东丝，相当于日本从开港后到明治初年大量出口的“提丝”稍经改良的质量，能和日本机械丝相匹敌的生丝并不多。开始时，由于中国和日本丝作同一用途的生丝不多，所以银市价的变动对日本丝的输出并未构成大的影响。原商店还在1908年“生丝贸易概况”中指出：日本和中国的生丝出口，“在发送地和质量方面，两国的利害关系全然不同”，即不仅质量不同，

① 在江浙农村，脚踏缫丝相当普遍，称这种方式缫的丝为座缫丝，严格讲并不正确。这里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把白丝、黄丝、再缫丝这类非蒸汽机械丝，称为座缫丝。

销售地也不同。日本丝的69%输往美国，31%输往欧洲；中国丝的25%输往美国，75%输往欧洲。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到，中国缫丝业的改良虽然起步较晚，但并非完全不能生产质量好的生丝，这一点至少从上面两条资料可以肯定，后一条资料明确指出“最优等”丝的存在。这些“最优等”的优质丝就是上海机械丝。后面将详细论述上海机械丝在世界生丝市场上所占的位置，其质量之优异很快就引起了日本的重视。

19世纪末日本的一条资料论述说：“近年欧美市场上，上海机械丝的声誉年年增高，其价格也优于我国机械丝，虽劣品也如此”。^①在欧美市场上对上海机械丝的评价提高，价格也上涨。许多资料一致公认上海丝质量好，色泽纯白，纤维齐一，类结不多、富于弹性。这样好的上海机器丝一般被用作“高级丝绸的原料”。关于上海机械丝的用途，后面将专门论述。

随着世界生丝市场的形成，欧美市场对亚洲丝的需要量增大，同时中国也发生了以上海和广东为中心的缫丝业的革新。上海机械缫丝业的发生就是这一革新的标志。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其速度是缓慢的。从怡和洋行开设第一家缫丝厂到中日战争前夕，机械作业的丝厂极少，中日战争后，发展速度也并不快。第二，生产在欧美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优质丝。上海机械缫丝业在产量和质量两者之间，以产品的质量作为重点，这和日本机械缫丝业以产量为主形成鲜明对照。以此为生产宗旨的上海机械丝得以在世界生丝市场上独占鳌头。

二、法国市场和上海机械丝

中国以上海和广东为中心的缫丝业发生了改革，但如已经论述到的那样，中国丝和日本丝的销售市场完全不同。简单说，以

^① 《上海缫丝业购买无锡地方蚕茧的情况》，《通商汇纂》，第68号。

上海机械丝输出数量表(单位为担)

表 一

年 \ 国 别	英 国	美 国	法 国	意 大 利	其 他	计
1906	9.13	2970.97	7958.40	1260.28	—	12198.73
1907	7.40	4078.58	8281.09	1182.99	—	13550.06
1908	2.91	3920.68	9518.93	1194.53	10.00	14647.05
1909	—	3165.53	12347.92	1543.79	26.88	17084.12
1910	5.01	3604.12	15291.79	2430.69	133.90	21515.51
1911	34.58	5402.38	13448.26	2303.30	49.65	21238.44
1912	180.95	7373.33	14929.88	2373.11	579.27	25436.54
1913	10.98	5677.35	17264.20	1039.96	120.30	24112.79
1914	207.26	10333.37	11257.82	723.10	1201.91	23723.46
1915	382.31	15301.45	19467.27	18.99	1566.35	36736.37
1916	338.45	14983.92	15915.04	54.62	1353.85	32645.88

注:1906--1916年的上海贸易利润和贸易报告

1880年代中期为界限，日本生丝的销售市场主要是美国，而中国丝主要是欧洲市场。

那么，上海机械丝是否和所有中国丝完全相同呢？首先看看它的出口市场。秦惟人撰写的《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丝的出口》一文对1905年底之前从上海出口的生丝作了统计；表一是190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出口的机械丝的统计。据秦氏统计，1894—1896年3年间，上海机械丝大量输往美国市场，1896年以后到1902年间输往美国市场和输往欧洲市场的数量几乎相等，从1903年起输往欧洲的数量开始超过输往美国的数量。此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市场已明显地成了上海机械丝的销售中心。从1905、1906年起上海的缫丝厂开始稳步增加，这些厂生产的生丝主要销往欧洲市场，特别是法国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8年间，输往法国市场的上海机械丝占出口总量的比率，最低年份约为58.7%，最高年份约为72.3%。

在上海机械丝的销售地中，法国市场占着重要地位。那么从法国市场方面看，中国丝乃至上海机械丝处于何种地位呢？由于相当一段时期情况不明而无法统计，但表二显示了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里昂生丝检查所检验各国生丝的比率。严格来说，这个表中的数据 and 法国实际消费各国生丝的比率并不一致。因为既有经检验后转销欧洲其他各国的，也有经米兰生丝检查所进入法国的，但是基本能够了解输入法国的各国生丝的比率。

我们先来概观一下表二所反映的总的特点。按理说，法国不同于美国，蚕丝业是它的传统工业，然而国产丝在总检查量中所占的比率却不断下降，1890年代为10%左右，到1900年中则下降到9%左右，以后降得更低。从1880年代后半期起，在法国丝绸业生产中，国产丝消费比率已在降低。实际上，在“生丝消费量”中，国产丝只处于补充地位，消费量的大部分必须依靠外国进

里昂各国生丝的检查比率(百分比)

表 二

产地 年	法 国	西班牙	皮埃蒙特	意大利	匈牙利	普鲁士	斯里	孟加拉	克什米尔	支 那	广 东	日 本	野蚕丝
1890	10.39	0.68	2.57	14.13	—	3.71	0.13	1.50	—	17.69	18.86	17.33	7.01
1891	12.72	0.84	2.61	14.73	—	4.02	5.47	0.92	—	16.09	15.81	21.19	5.60
1892	12.34	0.57	2.57	11.55	—	5.65	6.83	1.10	—	16.45	15.03	21.82	6.00
1893	9.61	0.44	1.97	11.10	—	4.20	5.53	1.46	—	18.57	20.86	21.24	4.99
1894	11.32	0.60	2.30	10.80	—	4.69	4.32	1.14	—	16.40	17.97	23.63	6.82
1895	12.62	0.36	1.55	9.16	—	5.19	6.91	1.63	—	15.64	16.50	24.08	6.36
1896	10.50	0.48	1.43	9.76	—	5.69	7.76	2.20	—	15.20	20.68	20.02	6.28
1897	11.77	0.53	1.89	9.30	—	5.06	7.05	1.83	—	17.81	21.02	17.86	5.88
1898	10.25	0.40	2.08	11.02	—	5.24	7.23	1.81	—	15.92	24.38	15.73	5.94
1899	9.94	0.34	1.74	8.72	—	6.96	5.71	1.70	—	17.40	26.00	13.17	8.32
1900	10.72	0.61	1.76	7.45	—	6.03	8.11	1.98	—	14.80	25.90	13.97	8.47
1906	9.23	0.64	1.20	10.67	0.57	7.24	7.18	2.62	—	12.00	21.56	16.60	10.40

续表二

产地 年	法 国	西班牙	皮埃蒙特	意大利	匈牙利	普鲁士	斯里	孟加拉	克什米尔	支 那	广 东	日 本	野蚕丝
1907	9.07	0.51	1.06	8.15	0.54	6.73	7.14	2.65	—	13.64	18.88	18.18	13.45
1908	8.37	0.65	1.08	8.17	0.80	6.25	5.58	1.69	—	16.70	20.74	15.48	14.49
1909	8.14	0.69	0.89	5.70	0.76	6.11	6.42	1.35	1.33	17.00	18.60	18.11	14.90
1910	7.64	0.63	0.93	6.73	0.95	5.08	4.83	1.73	0.63	18.15	21.35	22.50	8.82
1912	8.36	0.82	0.89	7.45	1.12	5.56	5.65	1.00	2.21	19.19	17.09	18.82	11.81
1913	6.90	0.83	0.80	8.23	0.85	4.60	5.51	0.92	1.51	19.52	18.71	22.77	8.85

注：1890—1900年，见《欧美蚕丝业视察复命书》，第27页，1906—1910年，见《各国生丝的生产及美法需要的状况以及价格的优劣》（《大日本蚕丝会报》）236号），1912—1913年，见《法国地方蚕业现状及丝绸业对生丝的需求情况》（《衣笠蚕友会报》145号）。再，1894年和1900年各国比率合计不满100，依原数。

下。”^①

其次，法国消费进口丝的总量中，中国丝占的比率最高，接下来才是日本丝和意大利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丝在美国生丝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率，已从40%左右上升到50%左右，而法国对中国丝的依赖程度更大，在里昂生丝检查量中，中国丝所占的比率从30%几上升到每年达40%多。

在中国生丝中，“支那”栏下的数字是指从上海出口的生丝。在大部分年头，广东丝的比率较高，1900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逐渐下降。与此相反，上海丝的比率一度较低，从1900年代后半期开始回升，到大战前夕反过来高于广东丝的比率。

从上海输往法国市场的座纰丝量，由19世纪末的2万多担上升到3万多担，20世纪初开始减少。1905年以后又回升到2万多担，甚至一年突破1万担。进入20世纪后，其他地方法国市场输出机械丝的数量增加，尤其是1900年代后半期，有明显增加。从表二看，从1900年代后半期开始，上海丝所占的比率逐步回升，可以说这是上海机械丝出口量增加的结果。

从各国生丝在法国市场上所占的比率可以看出，上海机械丝和法国市场有着密切关系，即使日本丝和美国市场没有关系，法国也是上海机械丝的当然销售地。要了解决定这一关系的主要原因，必须从法国丝绸业的特点和上海机械丝的特点这两个方面加以研究。

先来分析法国丝绸业的特点。法国丝绸业的中心地是里昂，在19世纪中叶它所生产的丝织品占法国总产量的80%，其最大的特点是生产高级丝绸。而这时的里昂，精致的丝织品都是用手织机生产的。尽管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丝绸业相继勃兴，但是法国丝绸继续向美国和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出口，而这种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就是法国掌握着生产高级丝绸的技术。

^① 《33年度中法国蚕丝需求状况》，《通商汇纂》，第203号。

前面已触及到，自1860年间起，欧美各国对丝织品的消费从高档品转向价格便宜的中档品，花纹真丝那样的法国高级丝绸的出口减少。除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随着流行式的变化，丝绸业也发达起来。美国在南北战争后，伴随动力织机的普及，丝绸业也因之而发展。

随着1860年间开始的欧美各国丝绸需要的变化，法国丝绸业也开始增加无花纹真丝、丝毛和丝棉混合物产品的生产，而且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引用动力织机。尽管是按照流行变化生产的丝绸，法国产品的质量也依然较高，并没有轻易丧失掉法国丝绸业的传统特色。20世纪初，“法国作为蚕丝集散地和丝绸生产国，依然居于各国之首，尤其是精致织品和新品种，真可谓天下无与伦比”。^①若从此时世界各国的生丝消费量看，这条资料的前半部分与事实有出入，但法国丝绸业保持着生产高级丝绸的特色则是无可怀疑的。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丝绸业的竞争能力不仅在于因生产力发达而生产出大量廉价丝绸，还在于产品质地优异。就法国丝绸业和欧洲其他各国同行的关系而言，“意大利、瑞士、德意志3国的丝绸业，近来大有勃兴之势，然而法国以其精巧优美的技能获胜，凌驾于3国之上”。再拿美国丝绸业比较，其“精致之点，无论如何也不及意、法”。^②

法国丝绸的竞争力在于质量这一点，由产品的出口情况就可看出来。19世纪末以后，法国丝绸的最大国外市场是英国，其次是美国。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丝绸输入额中，法国是最大的货主，法国货经常占总输入额的40%左右。业已成为世界最大生丝消费国的美国，到大战前夕仍旧进口法国丝绸，并且每年的进口额几乎不变，反映出对法国丝绸的固定需要。这

① 《法国36年丝绸业情况》，《通商汇纂》，明治38年，第31号。

② 原合名会社：《欧美蚕业一斑》，1900年，第4页，第69页。

样做与其说是为了补充国产货的不足，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证本国尚无力生产的优质丝绸。

法国丝绸除了质量好以外，另一个特点就是不象美国那样大批量生产同一种类型的产品，而是着眼于生产花色品种齐全的产品。这是法国丝织品面向各国的不同需要，招揽主顾的又一竞争力。

法国丝绸业不是大量生产同一类型的廉价产品，而是生产质量优良的花色产品，这一特点也反映了使用织机演变的情况。法国于1870年以后，正式开始使用动力织机，但没有马上抛弃生产高级丝绸的手织机。表三显示了里昂织机数的变化，1861年手织机的数量达到顶峰，此后开始逐渐减少，尽管这样，直到19世纪末，动力织机始终没有超过手织机。

里昂丝织机台数

表 三

年	手 织 机(台)	动力织机(台)
1800	2500	—
1812	12000	
1827	27000	
1852	65000	
1861	116000	
1872	115000	5000
1881	100000	18000
1890	72000	20000
1897	65000	25000
1900	37000	30000
1914	17270	41000
1924	5413	45454

注：永瀨顺弘：《19世纪末期法国蚕丝业动态》（樱美林经济学）第5号。

当世界卷入丝绸热销的漩涡时，法国丝绸业也仍然具有质量好，花色品种多的特点。美国丝绸业采取大量生产廉价产品的方针，法国却崇尚产品质量。对比两国的丝绸行业，“在工厂的组

织结构、经营方法方面，法、美两国各有异趣。美国是机械万能主义，以大批量生产为目的；法国则信赖职工的技术，工厂的规模亦不大。”^①尽管动力织机得到普及，法国丝绸业界依旧尊重职工的技艺。

概观法国丝绸业，它具有质量好，品种多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就影响到它对原料丝的特殊要求。首先，法国严格要求原料丝纤维齐一，没有类结，而且大量需要细丝，就这一点日本丝便难以进入法国市场。其次，美国需要大量同一类型的生丝，法国却需要规格繁多的生丝。世界生丝市场上的上海机械丝正好符合法国的要求。

上海机械缫丝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原封不动地引进欧洲缫丝技术，这种技术称为“卜鲁纳缫丝法”。保尔·卜鲁纳曾在日本指导创建富冈缫丝厂，并在上海创办缫丝厂。在欧洲缫丝法系谱里，有法国式和意大利式。前者的特点是煮缫兼业，带有共捻式捻线装置，称为再缫法。后者则以煮缫分业，带有群马式捻线装置，称大柞直缫法。是否由于卜鲁纳是法国人的缘故，也有资料认为上海机械缫丝业是法国式，实际上是标准意大利式。^②

意大利式缫丝法以蒸汽为动力，推动铁制缫丝车缫丝，用这种方法生产的上海机械丝质量较好。早在19世纪末，日本蚕丝业调查员便指出：“上海丝皆为优等品，比我国优等机械丝尚高数等”，^③承认上海机械丝比日本丝质量好。至于其他方面，虽然也承认上海机械丝的质量好，但预测到其产量不会迅速增加。^④

① 《关于意法蚕丝业的调查》，第47页。

② 认为是法国式的资料中，有小山久左卫门的《视察南清缫丝业报告》（1906年）。日本富冈厂的缫丝法是卜鲁纳传授的，好象是法国式缫丝法。不过，日本推广到各地机械缫丝工业中的方法，无论是意大利式，还是法国式，都是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改造过的缫丝法，两种方法并没有明显区别（《讲座·日本技术社会史》，第8卷，纺织，第222页）。

③ 农商务省农务局：《视察清国蚕丝业报告》，1897年，第47页。

④ 《30年中纽约生丝贸易情况》，《通商汇纂》，第96号。

机械丝的产量与原料茧的上市量等各种条件有密切关系，而上海机械缫丝业的特点是只注重质量，不注重产量。在上海缫丝厂里由于采取煮缫分工作业，使缫丝女工从煮茧、抽丝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实行严格选茧和减低摇丝速度，让多数女工从事选茧和摇丝工作。并不是去追求产量，而是着重提高产品质量。

日本生丝从欧洲市场上后退的原因，一是日本缫丝业本身将出口重点转向美国市场。二是“日本丝质量粗劣，被欧洲市场所排斥”。后者是主要原因。上海机械丝“稍带青黄色，手触感甚佳，即使其他成色，也与法、意丝不相上下。尤其是丝价低廉，受到市场欢迎。”^①上海机械丝的质量之佳不亚于以优质丝著称的意大利生丝和法国生丝，而且价格便宜。因此，在欧洲市场上大受青睐。

上海机械丝的质量之优，也可从市场价格上大致看出。从1901—1905年间里昂的各国生丝行情看，上海丝的价格经常高于日本丝。^②大部分上海丝是以无锡蚕茧为原料的细丝，质量很好，具备生产高档丝绸的特性，这就是它受到法国市场欢迎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生丝的输入中，日本丝所占的比率，20世纪初期为40%到50%，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则上升到70%。而法国不同于美国，它进口各个国家的生丝。就是对中国丝的进口来看，它在进口上海丝的同时，也输入相当数量质量不甚好的广东丝，并不象美国那样集中进口日本丝。

上海机械丝的品种、规格十分繁多。丝厂总是强调严格选茧，把这一点作为保障生丝质量的主要条件。据资料说，上海丝

① 《视察欧美蚕丝业报告》，第73页。

② 《里昂38年中各国蚕丝的平均市价》，《通商汇纂》明治39年，第33号。即使和意大利丝、法国丝的价格作比较，这5年间上海机械丝的价格也并不特别便宜，因为没有看到长时期的价格浮动，所以不能判断上海机械丝的贵贱，但欧洲市场期待上海机械丝质量要比价格强烈。

厂选茧时根据茧的大小、颜色、形状、茧层厚薄等，将茧分成10多种规格。因此，缫出的生丝具有纤维齐一，类结少等优点，其质量确实可与意大利生丝匹敌。同时也生产优质丝以外的各种生丝，均由外国生丝出口商标上各种复杂的等级规格。

这些品级齐全上海机械丝并不符合用机器生产大批量同种类型丝绸的美国市场的需要，但在法国市场上却没有受到多大障碍。由于法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残留着手织机，就是引用动力织机的工厂，规模也比较小，而且厂主充分发挥职工技艺，用各种规格的生丝织出各种各样的花色产品，因此法国丝绸业正是需要多种品格的生丝。

由于上海机械丝的特点正适合法国丝绸业的特点，它便能进入法国市场。然而从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市场上淘汰下来的日本丝进入美国市场这一情况，又预示着上海机械丝进入美国的困难程度。下面就上海机械丝在美国市场上的地位作些剖析。

三、美国市场与上海机械丝

美国丝绸业发生在1820—1830年间，最初只能生产极低级的丝绸。美国为了确保国产生丝，采取保护蚕丝业的政策，到19世纪末还在反复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蚕丝业并没有明显的发展。1891年便决定废除奖励蚕丝业制度，依靠从国外进口发展丝绸业所需要的原料丝。实际上这时美国已经急速增加进口外国生丝。

美国自1820年代开始，经伦敦进口中国生丝，那时美国丝绸业生产的都是些下等品，与高价的欧洲丝相比，当然喜欢中国丝，50年代以后中国丝便成了美国的主要原料。再从日本生丝的出口情况看，从开港后的江户末年至明治初年间，大部分是输向欧洲市场，到1870年代中期输向美国的也只是少部分。日本向美国出口生丝量到1884年开始超过欧洲，达到总输出量的过半数。

从1870年代后半期至1880年代前半期，日本生丝的出口急速

转往美国，并以它为主要销售市场。1894—1896年3年间，上海机械丝对美国的出口量也超过对欧洲的出口量。因此，在一个时期里日本蚕丝业界把上海机械丝看作“日本生丝的劲敌”。^①但是，没有多久上海机械丝的主要目标便转向欧洲市场。这种转变要想从美国市场方面寻找原因的话，就必须首先了解美国丝绸业发展的特点。

迅速普及动力织机，这是南北战争后美国丝绸业发展的特点。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完全屏弃手织机，使用动力织机的先例。^②表四反映了美国丝绸织机数的变化。1880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手织机，但到1890年时，动力织机明显增加，手织机明显减少，到20世纪初手织机几乎消灭殆尽。

美国的丝绸织机台数

表 四

年 \ 织 机	阔 幅		窄 幅	
	动力织机	手 织 机	动力织机	手 织 机
1880	3103	1629	2218	1524
1890	14866	413	5956	1334
1900	36825	164	7432	9
1905	47725	0	8400	0

注：《横滨市史》第4卷上，第109页。

普及动力织机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就在于产品成本降低，批量生产的丝绸价格便宜。但是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就要使用质量统一的原料丝，以防捻丝或中断织布作业。因此，美国对质量统一的生丝的需要量不断增加，农家小规模生产的中国座纰丝便不能适应美国的要求。于是，日本丝取代中国丝占领了美国市

① 《支那机械丝在美国的声誉》，《大日本蚕丝会报》，第32号。

② 《横滨市史》，第4卷上，第113页。

场。而这时的日本丝也是座缫丝，就是机械丝也还处于以小规模丝厂为中心的时期。但日本对这些丝采取集中复摇，集中装运的体制，以适应美国市场的要求。这种丝并不是质量高，而是质量均一。其中大量输出，具有代表性的机械丝有信州上一番。

美国丝绸业在普及动力织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日本机械丝业为了适应美国丝绸业的需要，不仅退出了欧洲市场，而且由于意大利丝和后起的上海机械丝进入美国经丝市场，又退出了美国经丝市场，专门生产清一色的中档丝供美国作纬丝用。日本丝在美国生丝的总输入量中所占的比率相当高。

在1907年经济危机时，美国丝绸业界需要廉价原料，便出现了增加进口广东丝的现象。这虽然是暂时性的，是美国在20世纪初应付生丝涨价的措施，但也说明美国丝绸业界开始从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增加生丝进口。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从1905、1906年开始，上海的缫丝厂、缫丝设备稳步增加，美国似有变动生丝需要的预兆。日本蚕丝业界有人对上海、广东缫丝业的发展发表看法说：“最早，日本丝在美国市场独占鳌头的状况，并未引起各方注意。但不知何时，中国丝对本邦生丝的贸易大局，将造成何等威胁”。^①说得相当深刻。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生丝向欧洲出口，以欧洲为输出中心的状况并没有多大变化。在美国市场上中国丝威胁日本丝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

在中国机械丝中，广东丝和上海丝与美国市场的关系也有不同。对于广东丝将另作别论。上海丝在美国市场上滞销的原因，在于它重视质量而忽视产量，品级过于多样化。但也有少量上海丝进入美国市场，对于这部分丝的用途，就是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美国丝绸业的特点是要求质量均一的中档丝，

^① 《美国丝绸业一斑》，第95—96页。

但对经丝的要求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进一步研究。经丝要经得起高速旋转着的织机的拉力，这一点对日本丝来说是个难点。因此，由于机械缫丝业的发展而取代中国丝进入美国市场的日本丝，从1890年代起，因意大利生丝的输入和上海机械缫丝业的勃兴，也不得不退出美国经丝市场。“本邦丝用于经丝者，虽非全无，但为数甚少”，“本邦总出口量的一成乃至二成供作经丝用”。^①可见日本输出的大部分生丝是作纬丝使用的。

再看上海机械丝：“其不分良莠，输入美国均供作经丝。尤其价格低廉者，需用甚多。如去年，产丝量极大，其纤维度自十七支至二十一支的上等丝输入美国，代替欧洲丝，作‘一本经’使用者甚多”。^②可见进入美国市场的上海机械丝是欧洲丝的代用品，专作经丝使用。具体记载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丝在美国使用情况的资料未必有，但据某个资料说，上海机械丝和意大利丝一样，均被用作高级丝袜、阔幅丝绸、缎带的经丝。

总的说，上海机械丝基本不适合美国市场的需要，输入的只不过是日本丝不能胜任的经丝部分，也仅仅作为欧洲丝的代用品。在经丝的输出中，上海丝在美国市场上遇到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意大利丝。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上海机械丝

就国外市场看，上海机械丝的销售是以欧洲为中心，其中大部分是满足以生产比较高级的丝绸为特点的法国丝绸业的需要。虽然也向美国出口，但是，意大利生丝在经丝方面占着强大优势，

① 《欧美蚕业一斑》，第8页，第14—15页。

② 《美国丝绸业一斑》，第61—62页。所谓“一本经”，即不需要捻合，单根用作经丝，织布作业的手续简略，适宜织质地薄的织物，从20世纪初开始更加广泛应用。与意大利生丝和上海机械丝相比较，日本丝的弹性较差，基本上不适宜作经丝。（《美国丝绸业一斑》，第68页、90页。〔《我国优等丝为何不向欧洲输出》，《大日本蚕丝会报》，第212号〕）。

上海丝仅占一席之地。

由于上海机械丝是以法国为主要输出市场，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丝贸易就得到了发展。但是，法国的生丝消费量到20世纪初已达到了极限。1897年里昂丝绸业的年产额为4亿法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仍在4亿至4.5亿法郎之间徘徊。从里昂生丝的平均年产额看，1903—1912年10年和1893—1902年10年相比较，增加额只不过1500万法郎。

这种现象说明，一定存在着影响消费量的原因。虽然1907—1909年间没有统计数字，但从表五中的统计便可以看到20世纪初的20年间，法国的生丝消费量一直停留在400万公斤左右，就是整个欧洲的生丝消费量也都没有多大增长。美国则相反，它的生丝消费量有明显增长，20世纪最初10年间增长了1倍。就1912年而言，它的生丝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0%以上。

从1890年代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生丝的总输出量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国内原因是因为机械丝只用来补充座缫丝不够出口的部分，这是上海机械丝输出量没有迅速增长的起因。此外，也与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各国的生丝消费量停滞有关，因为上海丝的主要外销市场是法国。

要提高上海机械丝的总输出量，从外销市场角度说，不仅欧洲的消费量要有显著增加，还必须扩大对美国的输出。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美国使用的经丝方面，与意大利生丝展开竞争，并战胜对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实现这一课题露出了很大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沉重打击了直到大战前始终处于旺盛的法国丝绸业。1914年8月德国向法国宣战以后，法国丝绸业界许多织机停止运转，丝绸生产额大幅度下降。因此，生丝的进口减少，价格也下降。例如上海机械丝的进口，从大战爆发前夕到1915年1月间下降了将近20%。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整个欧洲丝绸业，中国生丝不得不另谋市场。

世界各国生丝消费量(吨)

表 五

国	年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10	1911	1912
法 国	4579.9	4109.5	4060	4812	3142	4143	4262	4077	4661
美 国	5300.0	6000.0	5100	7285	6946	7572	10060	9215	11208
德意志	2840.0	2983.0	2795	2760	2970	3144	3667	3445	3734
瑞 士	1560.0	1665.0	1405	1716	1537	1893	1725	1628	1715
英 国	720.0	761.0	622	744	660	675	580	502	642
奥地利·匈牙利	770.0	750.0	740	838	835	822	845	894	794
西班牙	195.0	205.0	180	185	180	137	140	150	151
意大利	1000.0	1000.0	850	1050	1100	1150	1125	1100	1125
俄 国	1400.0	1514.0	1340	960	995	1234	1688	1720	1700
印 度	465.0	385.0	276	410	280	285	580	605	1175
其 他	600.0	630.0	585	660	720	926	664	718	856
计	19429.7	20002.57	17953	21400	19305	22281	25336	24054	27761

注:1901—1903年,见《横滨市史》第8卷,720—721页,1904—1906年,见第9卷,343页。1910—1912年,见《世界生丝的生产及其消费》(《通商公报》104号)。1902年和1905年的合计数有误。仍按原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一度打击了美国丝绸业，但从整个大战期间来看，它还是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一度受到打击，是由于过去作经丝用的欧洲丝的进口减少。1914、1915两年里没有多大变化，但从1916年起，意大利、法国丝的输入额锐减。

欧洲丝对美国市场减少输出，上海机械丝便进入了美国市场。日本有关这一情况的资料叙述说：“本邦丝确曾独占美国市场，现在支那丝迅速适应美国需求，独占已不复存在”。^①可见日本蚕丝业界对中国丝进入美国市场怀有相当强的戒心，唯恐中国丝的对美输出今后会持续增加，因此呼吁丝业界必须随时注意“这方面的蚕食者”。^②

曾经致力于中国生丝输出的日本三井洋行的有关人士说：“在我们的营业中，完全把上海丝和广东丝区分开卖”，^③因此，提到对美输出的中国丝增加时，必须区别上海丝和广东丝。就上海丝来说，与大战爆发的同时，对美输出量就急速增加（参看表一），就连日本也发现了“上海机械丝中的细丝用作锻带原料、粗丝用作衬衫、服装料的原料，所以美国方面的需要量有大幅度增加的倾向”。^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担心与上海机械丝质量类似的生丝输出量会减少，事实上1916年时对美输出量是急速减少了，上海机械丝作为欧洲丝的代用品，美国市场对其需要越来越大。

在美国市场上，包括上海机械丝在内的中国丝的输入量增加，弥补了欧洲丝输入量的减少。但不能认为这是暂时性的，其实，增加进口中国丝，改善由日本丝独占生丝供给的局面，是美国丝绸业界所一直期待的。以前美国丝绸业界曾对增加进口中国丝表

① 《支那蚕丝视察一斑》，《衣笠蚕友会报》，第132号。

② 《横滨市史》第15卷，第135—136页。

③ 《日本生丝在美国市场的用途及其和各国生丝的竞争情况》，《大日本蚕丝会报》，第282页。

④ 《横滨市史》，第11卷，第307页。

示过关心，而着手实行增加进口政策，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美国丝绸业家因格尔在上海开设美鹰洋行，向缫丝厂提供贷款，这不仅促进了上海机械丝向美国出口，而且推动了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改良蚕丝业。^①对因格尔的这一举动，日本蚕丝业同行中马上有人提出警告：“今日只不过一个美鹰，今后难免有几十个美鹰企图开发支那蚕业”。^②

从中国增加进口原料丝的动向，决不局限于个别丝绸业者，而是整个美国丝绸业界一致的要求，这一点从下面的叙述便可明瞭。1915年末，美国丝绸业协会和纽约生丝检查所扩大原料丝的供给国为目标，起草了一个汇总检查中国生丝结果和提出改良意见的文书，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驻美外交官带回国，要求由北京政府出面改良中国蚕丝业。关于此事，美国丝业协会表示：“美国丝绸业家对扩大原料丝供给地问题，时时不离脑际。若有吾人最希望之原料丝供给地，必将予以充分援助，为其发展竭尽全力”。^③可见美国丝绸业界对扩大生丝供给国甚为重视。增加进口包括上海机械丝在内的中国生丝，乃是整个美国丝绸业界翘首以待的。几乎同时，法国企图创设大宗丝商团体为核心的“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这也许是想以此与美国希图推动中国蚕丝业的改良相抗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丝绸业界推动增加进口中国丝的工作终于正式化。1919年美国丝绸业界和上海缫丝资本家之间，就由美国生丝检查所创办上海生丝检查所问题进行协商，达成同意建立这种检查所的大致意见。第二年美国丝绸业协会的丝业视察团来到中国，经过该团的交涉，决定于1921年创建上海生丝检查所，1922年开始业务活动。^④

① 《横滨市史》，第11卷，第117页。

② 《论未来的支那蚕丝业》，《衣笠蚕友会报》，第48号。

③ 《对支那及广东生丝警告的始末》，《大日本蚕丝会报》，第290号。

④ 《支那蚕丝业大观》，第534—536页。

美国丝业协会会长查尔斯·契尼参加的丝业视察团，于1920年3月至4月访问了中国。接着还到日本活动。在日本的欢迎会上，契尼说：“承各位宏量，我等迫切需要贵国以外的一部分原料，相信将会得到贵国的充分谅解”。^①从战时丝业协会的活动看，丝业视察团的目的就是增加进口中国丝。美国国内老早就在议论改良、发展中国丝，防止出现日本垄断生丝供给局面的问题，^②1922年的美国丝业协会杂志论述过欢迎上海机械丝增加生产的愿望。^③

中国方面也密切注视着美国迫切期待扩大原料丝供给国的动态。^④各种议论纷纷指出，生丝在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应该积极谋求增加生丝出口。有的进一步指出，今后生丝出口应以美国市场为中心，因此要弄清中国生丝过去不太受美国市场欢迎的原因，以便克服弱点。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战后，美国丝绸业界一直在谋求增加进口中国生丝，中国方面也有与此相呼应的举动。在美国对中国丝的改良意见中，对上海丝和广东丝有不同要求，对上海丝着重在数量方面，即要求上海丝实现满足美国市场需要的体制，对此视察团认为改革的第一点就是要解决原料茧不足的障碍。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战后，中国丝对美国的输出显露了扩大的势头。虽然实际结果究竟如何，值得重新研究，但和战前相比较，有如下变化。

以上海为中心的产丝区适合于欧洲市场需要的细丝减少，输向欧洲的有细丝和下等细丝，兼有黄丝。相反，输向美国市场的，“过去仅限于作为经丝用的优等丝，而战后随着需要的增加，已

① 美国丝绸业协会派遣员欢迎会：《美国丝绸业协会派遣员欢迎会报告》，1920年，第48—49号。

② 《支那蚕丝业改良论》，《大日本蚕丝会报》，第341号。

③ 《大正10年美国丝绸业一斑》，《衣笠蚕友会报》，第196号。

④ 《广东蚕业改良方法》，《中外经济周刊》，第31号。

扩大到中等丝”。^①

战后9年间，从上海生丝的出口状况看，19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机械丝出口的增长，使总输出量有了增加，出现了从停滞状态转向上升的趋势。从机械丝的销售市场看，对美国的输出量有了增加，对欧洲的输出量更进一步增加。而战前销售市场的状况没有多大变化。^②但是这个统计必须考虑到，其中也包括机械生产的黄丝，这种黄丝主要是战后增加的输出品。其产地是四川、湖北、山东等省。要了解上海机械丝在不同销售市场上所占的比率，必须将上海出口的机械丝的总量减去黄丝的出口量，才能推算出来。

试算1925、1926年上海输往各地的机械白丝的比率，输往美国的，1925年约为47.9%，1926年约为50%；输往欧洲的，1925年约为51.3%，1926年约为48.8%。^③和战前相比，输往美国的比率可以说相当高。

结 束 语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机械丝的外销市场看，与法国市场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在美国市场上，意大利生丝占优势，上海丝仅在经丝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说，大战之前上海机械丝业的发展，主要是与法国市场相结合的结果。

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市场，或者美国的经丝市场，对于日本生丝来说，并不是十分主要的输出市场。因此，在世界生丝市场上，上海丝和日本丝的竞争并不激烈。

上海机械丝在世界生丝市场上所处的这种地位，与上海机械缫丝业的发展状况有关系。日本在引进欧洲缫丝技术的时候，以

① 《支那蚕丝业大观》第413页。

② 《支那蚕丝业大观》第412—413页。

③ 1925、1926年贸易报告与利润年报。

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方针，引进适合日本现实经济状况，大量生产质量一般的均一生丝的简易设备。相比之下，上海缫丝业则是照搬欧洲的缫丝技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始终没有独自加以改造。因此，机械缫丝业的发展速度受到阻碍。在生产的时候，又以牺牲提高劳动生产效力，去生产日本不生产的法国市场所需要的高档生丝。

上海机械丝的主要外销市场法国，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丝消费国，到20世纪初，便让位于美国。美国的生丝消费量显著增长，以至主导了世界生丝消费。而法国则下跌到停滞状态，于是一向以法国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上海机械丝出口量的增长，也因此而受到制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上海机械丝从法国市场扩大到美国市场的良好转机。首先，由于美国市场上意大利生丝减少进口，扩大了上海机械丝进入美国经丝市场的幅度。其次，从战时到战后，美国丝绸业界为了改变日本垄断生丝供给的局面，要求增加进口包括上海机械丝在内的中国丝。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机械丝的销售市场出现了扩大的苗头，但究竟达到怎样的结果，还须进一步研究。因为要适应美国丝绸业界的要求，就必须对江浙地方的蚕丝业进行大改变。至少要改变缫丝厂原来的缫丝方法，这样就要改良设备，保证资本。不仅如此，还要确保生产大量生丝所需的原料茧，就这一点而言，便与蚕茧交易方法，座缫丝产地的广泛存在有矛盾。

译自广岛史学研究会：《史学研究》第163号

孙国群译 赵宗颐校

1891年热河金丹道起义

佐藤公彦

前 言

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之所以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是因为它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伴随洋务运动的开展，广泛爆发的反洋教斗争达到高潮的一年。5月到9月，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各府县，发生了哥老会领导的大规模的仇教斗争。^①继此高潮，10月份在北方的热河，金丹道徒和在理教徒开始起义，天主教会是其攻击对象。从后面的叙述来看，这次起义的内容虽并不限于反洋教斗争，而是包含着各种因素，但从近代反洋教斗争史的角度来看，也可给予如上的评价。^②

这次起义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不仅因为它是同时发生的反教会斗争的一个侧面，即中国历史上连续不断的以白莲教徒（以下泛指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及其结社）为主体的叛乱，准确地

① 研究论文有：矢泽利彦《长江流域教案考察之一》、《长江流域教案之研究》（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第1辑、第4辑，1958、1960年，东大出版会），里井彦七郎《近代中国的群众运动及其思想》，第2章《十九世纪中国的仇教运动》（东大出版社1972年），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等等。

② 论及此事件的著作有：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2章，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理查德·施：《1891年热河金丹道起义》，《近代中国》第6卷，1980年。本稿多受助于上述论著。

说它反映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是一次反抗作为欧美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基督教会与反抗清朝、蒙古王公贵族压迫相结合的以反帝反封建为课题的少数叛乱事件之一。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中国北方人民群众所处的闭塞的社会状况，同时也为认识5年后兴起的大刀会和义和团为什么会成为反帝运动的序曲，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论述方法上虽略有繁琐之处，但通过对起义过程的具体描述，可以作为对义和团研究的桥梁。

一、社会背景

热河主要是蒙古人居住的地方。满清入关前，后金天聪年间这个地区的蒙古各部族曾先后向皇太极投降，后来以协助清朝远征有功，各部族得到了一定面积的、独自占有的游牧土地（旗地），清廷还授其首领及统治阶层以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封号。各王公贵族按地区设有统辖行政机构及蒙古八旗兵。这就是旗。旗在行政上属于理藩院。每一旗在行政官位上设札萨克（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王公贵族协理旗之行政事务。^①在这种体制下，蒙古人经营着以畜牧业为中心的生活。

清初，这个地区的汉人为数甚少，后来他们不断越过长城而涌入。康熙五十年五月的上谕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种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②可以看出，人口过剩的山东一带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孤身口外寄依于蒙古王公贵族及其统治下的蒙古，开垦山林荒地而定居下来的情况。当时开垦的土地均很肥沃，向蒙古缴纳之税

① 见《承德府志》卷二六藩卫。

② 见《承德府志》卷首一——十五诏谕。

负担亦轻，较之内地易于生存。因此，冒犯禁令向口外移居者逐渐增加，据《承德府志》所述：“康熙年间，喀喇沁札萨克等地域辽阔，每招募民人，春出口外耕种，冬则返回（被称之为“雁行人”——笔者注）。由于蒙古人贪图租利，外来人被留下来，今已多至数万”。^①（乾隆十三年九月）蒙古人对客民“贱价出典地亩”“令其垦种”，客民则成了蒙古人的佃户而定居下来，开始成立家室养育子女。乾隆初年，直隶、山东移民浪潮兴起，此间客民们建造房屋构成村落。^②乾隆时期形成的这种蒙汉杂居的情况，可从乾隆刑科题本中租佃关系史料加以了解。

表 1

（1）热河八沟

居住在狮子沟的李斌，是正黄旗（应为正白旗 译者注）吉兰太管领下刘君赐家壮丁，其祖父揽了蒙古荒地，开垦了9顷70亩，每年交租粮48石5斗，租银32两。与母舅夥种30多亩，其余的地，都租给张得武等耕种（转租）。乾隆二十五年蒙古人与之算账，共欠租粮180石，租银110两，因此不得不将地退还。

（2）热河八沟

居住在热河八沟榆树林的于起山，租种喀喇沁札萨克七齐克旗毕什里图章吉箭上蒙古喇嘛苏吉图家土地1顷90亩，每年议定租银20两，乾隆三十四年，因租未送到，苏吉图去讨要，于要求待其兄进口卖烟返回后交银，为此发生争执，苏吉图受伤致死。

（3）承德府朝阳县

寄住于承德府朝阳县樱桃沟的山东荣城县人丁文学（42岁），乾隆五十七年春租种同村刘成祥一段地，给了他25千大钱押租。原说过退地还钱。第二年因不甚得利，把地退还。因讨要租钱双方争斗，造成伤害致死事件。

（4）热河八沟（乾隆三十四年）

居住在热河八沟湖池沟的山东宁海州人丁世荣，租种蒙古地亩度

① 见《承德府志》卷首二——七诏谕。

② 见《朝阳县志》卷二十五风土。

日，其叔张二举向丁转租了46亩地，历年拖欠的租子共有6石7斗，总未归还。

(5) 热河八沟

居住在热河八沟二口营子的山东历城县人许万良(25岁)，于乾隆三十九年揽了蒙古家1顷20亩地。其熟人徐大年因没有地种，相商将地分给他一半耕种。四十年五月，因发生争吵，徐大年受伤致死。

(6) 承德府建昌县

屯居宁远州镶黄旗胡文吉佐领下的胡存家，于康熙十八年，曾在蒙古嘎拉甲祖上租得荒地一处，转给朱谦家垦种，每年交租银32两，并未拖欠。至乾隆五十五年间，朱谦因地亩欠收，无力交租，地主嘎拉甲即将地亩撤交罗城喇嘛承种。五十六年二月经人说合，言定朱谦三月内交租仍许种地。胡存等因见地内已被罗城喇嘛种麦，赴税员衙门呈控。审议未决，胡存等亦未交租。至六月，罗城喇嘛带领其它喇嘛赴地拔麦。胡存等前来阻挡，致使引起伤亡事件。

〔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

① 291—293页；② 311—313页；

③ 481—482页；④ 651—655页；

⑤ 678—679页；⑥ 709—710页。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山东——朝阳区汉人中有七八成都是山东人，其余为山西人、直隶人^①——一带移居口外的人，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包括蒙古人的“巨室”，连同附属于它的“奴隶之家”（包衣等等）及先住汉人（承包开垦人）的佃户结构。不久蒙旗就设立收租局征收租税了。但是，随着汉人流入和定居农耕的增多，导致了蒙古人游牧地盘的逐渐缩小，及下层蒙古人生活的贫困化^②。康熙年间在承德府设皇帝的避暑山庄，由蒙古王公贵族敬献的，作为皇帝的狩猎场所，是一个东西300余华里，南

① 见《朝阳区志》卷三十三纪事。

② 乾隆五十七年出口禁令曾一度被解除，汉人大量移居喀拉沁、敖汉等地。据《承德府志》记，出口汉民从557000余人（乾隆四十九年）增至884000余人（道光七年），19世纪初叶内蒙古东南部出现了“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局面。（沈斌华《内蒙古经济发展史札记》第12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北200余华里，周围1300余华里的广阔围场。之后，上述趋势更加严重。

二、前史——太平天国时期的民众运动

在这个地区蒙汉杂居的局面形成后，随之而来的是乾隆四十三年将热河厅升为承德府，并把八沟厅等也改为1州5县（平泉州、建昌、朝阳、滦平、丰宁、赤峰）。给这种社会状况以极大的冲击并使其发生变化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为解决镇压太平天国的财政困难，考虑在内蒙地区采取开放蒙地政策，征收赋税，即所谓的纳银“押荒”。首先向汉人开放蒙古八旗官地及广阔的荒地“招集富商，开垦升科”。^①“招佃纳租”以“每亩5升升科”。^②又在1863年“招佃开垦”热河围场四周的8千顷荒地，作为括取押荒银两的对象。^③由于蒙古王公贵族的“捐输”，及对蒙古八旗、王公的军事动员——最典型的是僧格林沁——使得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这些“捐输”、“军事动员”必然依靠蒙古王公贵族对其统治下的人民的掠夺而加以补充，这样就激起了首先以抗租斗争为主的人民群众的抵抗运动。〈表Ⅱ〉是这些事例的代表。

受其影响，朝阳附近地区的群众斗争也日趋高涨。道光末年在平泉、朝阳、建昌交界处的金厂沟梁金矿工人屡屡起事，他们跨马出没各地，拦路抢劫，被称为“金匪”。^④这次斗争的首领是朝阳南大店经营店铺的李凤奎与原义州捕厅外委高瑞。咸丰九年

① 见《文宗实录》卷一二四——三十四、三十五。

② 见宓汝成《清政府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及后果》（《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370页）。参照《文宗实录》卷二二九——十二、十三。

③ 《穆宗实录》卷六十——十四、十五。

④ 见《朝阳县志》卷三十三。清廷为鼓铸大钱与制造军火，令该地区开采矿铜，以济急需，由于官僚、商人的榨取，矿工屡屡起事。（《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24、25页）。请参照民国《呼兰县志》卷三。

表 II

1851年	内蒙古 哲里木盟	以佃户吴保泰、王柏龄为首，联合蒙汉农民四五千人，要求减租。
1852年	科尔沁左翼后旗	有数百人参加的抗租斗争，后被武力镇压。
1853年	卓索图盟 土默特右旗八枝箭	蒙族牧民，对因镇压太平军而造成的兵差过重的抗议斗争。
1854~1855年	哲里木盟 科尔沁左翼后旗	以汉族霍义、孟玉龄为领导的抗租斗争，有蒙古族农民参加，蒙汉佃农五六百人。
1857年	卓索图盟	夺回王府霸占的土地的斗争。
1865年	土默特右旗八枝箭	抗拒抽丁充兵和调查壮丁。
1857年	卓索图盟 喀喇沁右翼中旗大 窑尔沟地方	以矿工刘福泰为领导，有一二千人参加的反抗官府和焚毁衙署的斗争。
1858年	伊克昭盟乌审旗	“独贵龙”起义。蒙古牧民反对王府的“官差”、“劳役”，要求减轻杂税。
1860~1865年	卓索图盟 东土默特旗	以绰金汰、那木萨賚为领导的“人(头)会”运动。反对差项过重，横征苛敛。

以上根据刘毅政(原稿为刘毅生,误——译者)《太平天国时期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历史教学》1981年6月;《清朝实录》咸丰五年五月己卯条;同治元年十二月辛卯、二年六月甲辰、十一月丁巳;三年四月己亥,七月丁卯;四年二月壬辰各条;《朝阳县志》卷35艺文。

二月，李白立等200余“金匪”盘踞朝阳城内起事，勒索1000余两。同时，丰宁县也有劫狱戕官事件发生。同年冬，奉天省巨贼王洛七（锦州南凌子人）、阎洛六集团也到处活动。在王洛七集团内，有卓索图盟喀喇沁右翼旗人，自供称系敖罕（汉）贝子旗营下蒙古人，以贩马为生的白凌阿也加入进来。^①奉天副都统恩荷穷追王、阎集团至金厂沟梁，捕获企图逃走的阎洛六等人。这时白凌阿逃至朝阳以东的达尔罕王旗，联络弥勒僧格（白凌阿之甥）、赵保承（二喇嘛）。翌年，即咸丰十年秋，“奉天贼”王达、“东荒（朝阳东部）蒙古人”白凌阿、“朝阳贼”刘珠等率约50人进逼朝阳县街，效仿李白玉之例，勒索白银数百两。复在锦州石山站截获科尔沁饷车，金条13块，宝银5个（10月），并在这一年攻陷义州城。由于盛京军的镇压，这支“抗粮”起义军从义州城南门突围。^②王达不幸被捕牺牲。刘珠、白凌阿均投奔李凤奎。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蹂躏天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在此期间，又有永平府昌黎县廪生才宝善越永平狱逃至李凤奎处隐匿起来，才宝善唆使李凤奎借机“举大道，自立为王”。^③咸丰十一年二月二日，李凤奎、刘珠（刘猪）率众多“金匪”进逼朝阳县城。二月初四，刘珠等纠集六七百人杀入县署，破县狱，释囚犯300多人，县署、捕厅、监狱署、理藩员司署均被焚毁，夺税员衙门库银，焚数家大商店。^④他们占据县街附近，收集粮草，招兵买马以整军备。李凤奎称帝，身披黄袍，头戴冕旒，封才宝善为军师，刘珠为领兵元帅，李母为皇太后，头戴五花冠。而这些穿戴均取自伶人演戏的行头。李凤奎、才宝善等人为扩大势力，充实兵力，又派一部人马北进赤峰，焚

① 见刘毅政《太平天国时期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历史教学》1981年6月）。

② 见民国《义县志》中卷。《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24页有“抗粮”起义之说。

③ 见《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④ 见《文宗实录》卷三四三——九、十。《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衙署，破监狱，释囚犯，进行掠夺。^①对此，逃往热河的咸丰帝调回在山东镇压捻军的陕西、奉天、黑龙江士兵，以对付李、才部。李凤奎、刘珠等率部数百人，转向义州，当清军从西、南两个方向逼近朝阳时，起义军开始溃败。由朝阳向南逃跑的主力部队遭附近社长等所率乡村自卫组织的突袭，逃入奉天省境。此时，李、刘之间内讧加剧，李欲杀刘，使义军分裂，力量减半，终至瓦解。^②李凤奎潜逃，在寻找家人的流浪途中被发现，为乡长、社长等捕获送往朝阳县，与头目郭落萃一起在街心枭首示众。曾为这一骚乱大伤脑筋的当局，聚集富户的巨金，设置了团练的人和局、义和练局。

咸丰十一年五月逃至吉林边界的才宝善等人又招集三四千人骚扰昌图厅科尔沁蒙古地方。年末，白凌阿、才宝善进入义州境内，盘踞在城北高台子。同治元年五月在图谋焚抢闾阳驿时，遭官兵追击。^③第二年（同治二年）十月，才宝善、白凌阿复出昌图厅，并与咸丰十年李凤奎部下的滚地雷王五（昌图盗首）及该地方头目齐秀等联合进行活动。^④民国《义县志》中卷记有：同治二年“流贼”柴宝善（才宝善）谋反扰乱地方。可见，他们是在较广泛地带反复地进行活动。同治四年十一月，由王钟元、赵大刀、马傻子等率领的四五千吉林贼，侵犯奉天市广宁并向义州进犯。王钟元为朝阳县北哈尔脑东沟人，“赌棍”，曾为李凤奎集团的头目之一，李死后逃至吉林省大沟，聚众贼以图卷土重来。他们高举红、黄、兰旗进攻义州后，又掠夺锦州一带。十一

① 见《文宗实录》卷三四四——七、八。

② 见《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③ 见《穆宗实录》卷一五——三十四、五十一；卷十七——十九、二十；卷二八——五十七。

④ 见《穆宗实录》卷八二——二十六、二十七；卷八三——二十五、二十六；卷八六——四十二、四十三。

月十九日进攻朝阳，经过激战控制了县城。^①十二月六日得悉清军前来镇压，起义军获取人质后逃走。后来众贼在朝阳坡集合时被清军歼灭，其残部远遁。次年二月，残余部队200多人又活动一时，不久北去。同治八年，幸存下来的马傻子又在义州叛乱。直至光绪十一年“巨贼刘姓”被捕处刑，这一连续不断的骚乱才得以平息。^②然而，咸丰、同治年间组织起来的义和练局、人和局等组织，也因经费不足，于光绪四年全部废止，朝阳县内的乡村自卫组织也逐渐衰落下去。

咸同年间，以热河朝阳一带为中心的这些骚乱，是咸丰十一年达到顶点的全国性抗粮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为背景爆发的李凤奎为首的蒙汉人民联合起义，突出地表现为提出建立地方政权的口号。而同治七年被捕处刑的白凌阿的活动所显示的特点，则在于利用广阔的地理环境，在各地进行长期持续的斗争。从清政府为镇压这些起义和骚乱，调来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东三省和蒙古军这一角度来看，这些斗争客观上起到了从侧面支援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作用。但其力量又不能说是过于微弱。尽管如此，从这一地区反复不断的起义及后述几种斗争方式，可以窥知李凤奎起义对金丹道起义的巨大影响。

光绪十年，发生过从热河建昌到赤峰、丰宁、围场、多伦、克什克腾旗、巴林旗一带的几个集团的起义及从热河、宣化、古北口出动练军前往镇压的事件。^③以杨步法为首领的集团，骚扰建昌县后盘踞在围场边境。宋教思等人在多伦附近发生叛乱。据说多伦附近的“匪徒即有在建昌之匪首杨步法等在内，似杨步法

① 见《穆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三十一、三十二，卷一百六十一——五、六，卷一百七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② 王钟元于同治十四年进击朝阳（《朝阳县志》卷二十四），以上记述仅以朝阳一带为中心，关于整个东北地区，请参照《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23—73页。

③ 见《德宗实录》卷一八五——十六，卷一九〇——二、三、四。

已与宋教思等合股”。^①另一起义集团以王端仁为首领，四月，在克什克腾旗黑沙滩、鱼泡子发动骚乱后，沿途聚集了2000人的部队，竖“四色号旗”，王端仁为“平王唐主”，杨长青为总头，杨九如为棚头，抢劫了宣化府、巴林旗、赤峰县和丰宁县所属地带。王端仁（王佃仁）40岁，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咸丰、同治年间充当乡勇头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曾被授予顶翎。乡勇解散后苦于生计遂出走口外^②20余载，在克什克腾旗的黑沙滩、鱼泡子捕鱼为生。然而“因蒙人不准捕鱼，并杀多人”，王与杨长青等人共谋，在黑沙滩聚集四五百人“终以报仇为名，顿举叛乱”。^③李鸿章说：“至口外各属客民多系直隶、山东无业之徒，陆续前往或开垦荒地，或以贸营为生”，^④杨长青和杨九如的境遇似与王端仁相同。杨步沅、宋教思、王端仁等后均逃入奉天境内，光绪十七年四月，他们的党羽100余人又在热河围场附近的朝阳湾子进行骚扰。前往镇压的官军，经7年之久捕获了由八面城（辽宁、吉林交界）潜回围场的王端仁。

这种社会状况在金丹道起义时同样可以看到。朝阳一带的土地、山林，多为郡王、贝勒、贝子等蒙古王公贵族的封地，亦即旗地。流入这一地区众多的汉人要想定居，不得不成为蒙古贵族以及内蒙东部上千所喇嘛寺院的佃户而取得一块耕地。而蒙古贵族常常“勒增汉民租课”。^⑤掠夺人们的财产，尤其喇嘛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地租极高，成了蒙汉佃户怨恨的对象。^⑥后

① 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五十“练军剿匪获胜折”。

② 《刘武慎公遗书》卷七奏稿六“游民出口请飭将军都统稽查片”中（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有“长城坍塌处所不少，单骑独行，易于偷越，巡察尤难。比年山东曹州等府水患为灾，多有游民出口谋生。直隶沧、青各处亦有同往者。……渐因饥寒流为盗贼。……马贼之来多由乎此”的记述。有关长城内外马贼的活动情况，请参照卷八奏稿七“兜剿马贼摺”等各摺。

③ 见《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2923页，光绪十七年六月。

④ 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五十“查覆口外剿贼情形摺”。

⑤ 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63页。收租局以各种名目征收附加税。

⑥ 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55页。

来金丹道扎根的朝阳县曲连沟等村庄，在黑大山附近，有“汉人若入山樵采，或砍伐一棵小树，一旦被巡山的山鞑子捉住，十无一生，百般拷打，所用之刑尤骇人听闻”^①的记载。事实上，起义领导人杨悦春谈其反叛动机时说：自己“原种敖汉贝子的旗地，该贝子（达木林达尔达克——著者注）任昭乌达十一旗盟长之后，累增租课。其子色二爷和喇嘛四爷藉势横行，讹索奸淫，拷打杀害，无恶不做。受其害者不敢诉诸官府，只得饮恨在心，时刻思图报复以泄积愤”。^②另一头日齐保山（齐洛道）亦供述，去年（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和今年五月“胞弟与胞侄在黑山砍柴割草，先后被蒙古旗人捉获，受惩身亡。因此怀恨在心”^③而参加起义。头目潘岳淋也说“因砍伐山林素与蒙人积下怨恨”。^④有的记载亦云：“汉人担柴草等物至贝子街出售者，常被贝子府奴仆苛罚责打，日积月累蒙汉之间恶感愈深”。^⑤这样，蒙古贵族的统治极端露骨地带有暴力性质。身居陋室的贫苦汉族客民在其威胁下，被迫处于屈从地位而积怨深重。他们被擢于社会秩序的保护之外，饱尝身居异境的孤苦。虽然那里设有名义上调解民族矛盾的权力机构，却因理藩院管辖下的蒙古理事官同直隶省属下6州县当局的对立而丧失了机能。加之“历任热河都统多以卖官为生（以钱买官）各县官之贪婪尤甚”。^⑥又如“承德府知府启

① 见《朝阳县志》卷三十三——十九。

② 见《朱批奏摺·农民运动》卷六〇〇——三十三号。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以下简称《朱批》），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以下简称《源流史料》）第124页。理藩院事务都统恩承等亦不得不承认“蒙古赖客民耕种收租资生，亦实有相依为命之势。风闻平时虐待客民，故此次匪徒得以藉口。”（《宫中档光绪朝奏摺》第六辑第772页，以下简称《宫中档》）。还有敖汉扎萨克：“盗买该处常平仓谷，……民间所存粮米，亦恃势强购，小民受累”。（《光绪朝东华录》第2967页）

③ 见《宫中档》679页，恩承等奏。

④ 见《宫中档》758页，定安，裕禄奏。

⑤ 见《朝阳县志》卷三十三。

⑥ 见《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65页。

绍诞妄浮夸，贪婪夙著，横索所属州县之赃款盈千累万”。^①由于官府腐败，以至汉族客民“不再诉官办理”，相反“以杀尽贪官为己任了”。至此，他们认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保护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的反抗，带有个人行动的性质。金丹道或武圣教、在理教之类民间宗教结社，从其宗教内容来说，虽有性质与程度之别，但是起到了把处于分散、孤立、软弱无力状态的汉族客民联结起来的统一作用。换言之，人们接受宗教结社的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处境。那么，所谓金丹道、武圣教、在理教究竟是怎样的宗教组织呢？

三、金丹道 武圣教 在理教

起义的中心组织是由金丹道、武圣教、在理教及其它组织形成的复合体，其中以金丹道为核心。起义的首谋者热河建昌县杨家弯子村人杨悦春（51岁）有如下供述：

“从前江南老道（士）郭姓者至彼（杨悦春）化求布施，（当时）传授《梦首经》等六种（经本）。彼（杨悦春）又转传齐灏、王福、杨连元、郭洛之等，取名圣道门，命名为金丹教。齐灏等又辗转（在朝阳、建昌、平泉州等地）传授多人。此教劝人学好，绝无邪术，因此信从者益众，彼兼施医药，人皆称杨四老师。”^②

（括号内均为笔者注）

《朝阳县志》卷三十三记述，早在光绪初年，县东南方炒米甸子，碾盘沟等村设有金丹道教堂，以一道士为师，夜聚昼散，男女均可入教，“练成者刀枪不入，能腾云驾雾”，后为该地有势者驱逐，遂潜至朝阳县北之建昌县敖汉地方，在杨家弯子村医生杨彦

① 见《德宗实录》卷三〇三——六。

② 见《朱批》，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悦)春家中设立了教坛,杨全家入教。从朝阳东南移至杨家弯子村传播金丹道的这一人物,可以认为就是杨悦春所供述的郭道士。另从教徒李洛道(李教明)的供述判断,“当初运用武圣道功夫,以学好为名以来,已30年”^①,可见在金丹道之前这一带就曾有过白莲教的布道活动。同时可以窥知郭道士的活动成了这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光绪初年通过杨悦春而固定下来的。

这类活动的具体表现是“劝人吃斋行善,故士人亦称之为学好者,如戒烟、酒,以教育为名以诱人,实乃为烧香聚众”^②“佯修善事……实行煽惑”^③,故“自称善类”^④。金丹道虽声称“学法术、抗大清、兴真主”,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⑤但也有着施行医术,吃斋行善,禁酒禁烟为内容的带浓厚劝善修养团体的性质。以杨家弯子村教坛为中心,附近各村亦设有教堂,称统辖的传教首为老师,杨悦春为总老师,附近教徒每月聚集一次,关东或山东教徒每一年聚集一次。从“藏污纳垢,心怀叵测”一类的记述来看,似乎穷于生计的游民也多有加入此道者。^⑥

金丹道这一教名渊于“抱朴子”及魏伯阳所谓制金丹以求长生的道教思想和法术,并受11世纪广为流传的内丹,即感知心中的一粒金丹(相当佛教的人间佛性,净菩提心之类),精心修练以完成真体与道之合一(达到彻悟的境地)的影响。^⑦道光以后

① 见《宫中档》第736页,安定,裕禄奏。

② 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2页。有守五戒(杀、盗、淫、妄、酒),拜佛陀、菩萨、玉皇、老子,以及做灵媒的记述。保罗·塞尔鲁斯:《民俗对中蒙的贡献》,见《民俗研究》第6卷,1947年,第24页。

③ 见《宫中档》第857页,叶志超奏。

④ 见《宫中档》第656页,德福奏。

⑤ 见《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60页。

⑥ 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2页。教内头目李洛道、齐洛道、张洛道、姚洛道、黄洛道、刁洛道等均以洛、道、师等字为其法号。以朝阳北部丘陵地带为根据地的匪首郭海,拥有部众千人,起义时攻占朝阳,号称“平清王”(李提摩太:《1891年中国的反洋骚动》,见《北华捷报》,1892年,第67、68页)。

⑦ 吉岡义丰《现代中国诸宗教——民众宗教的系谱》(佼成出版,昭和四十九年)第60、242页。

直接与南方各省兴起的青莲教(别称金丹道,金丹大道)有关^①,而热河的金丹道虽可说属青莲教北方支系,但无明确的组织关系,而且从同武圣教所主张的教义相互渗透的情况来看(后述),在性质上也不完全与青莲教一致。

在组织上,一些成员具有金丹道与武圣教的双重关系。关于这一教派有若干材料,较易检索。杨悦春供述的另一领导人“李国珍(金丹道=圣道门之外)曾习武圣门。各股人马中同时还有武圣门中之人,屡败于官兵而各自逃散,起事之初倡言“‘符咒能避刀枪’,实为哄人”。^②据此证词可知,金丹道与武圣门是有区别的。“扫北武圣人”李国珍攻击赤峰之际,“立20余营按八卦方向,以混立名目”,^③十八年谢添明、杨泳刚、侯得山等被捕时缴获了“纸图人3个,八卦图两个,‘奇门遁甲’咒语,邪术卦本等书”。^④还发现有“画有坎号褂子四十余件”^⑤,沈国泳说,同治年间“从外来道士曹义路学得武圣教金钟罩邪术,传习符咒,创立众生、天命、正恩、隐恩、顶航、十阁、十谛、五老的九等名目,敛钱惑众,捏称入教习术能避刀兵劫数,刀枪不能伤身”,^⑥称武圣教各地基层教徒小组织为“盘”,设“武圣教天、地、云3种盘图”,以“3盘为据”。^⑦

由以上各种特征来判断,可以了解到,武圣教即金钟罩,有着浓厚的八卦教武派性质,而且还有着青莲教即金丹道(后来的

① 见程啸《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二期),拙稿《清代白莲教发展史》(《续中国民众反乱的世界》,汲古书院,1983年)。

② 见《朱批》,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③ 见《宫中档》第857页,叶志超奏。

④ 见《宫中档》第841页,长顺、富麦丹奏。

⑤ 见《宫中档》第八辑第815页,恩泽等奏。

⑥ 见《朱批》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盛京将军裕祿奏(《源流史料》126页)。

⑦ 见《宫中档》第八辑第815页,恩泽等奏。根据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叛乱时的《三佛应劫书》,林清为天盘,李文成为人盘,冯克善为地盘,牛亮臣为仙盘(《平定教匪纪略》卷29)。徐珂《清稗类钞》宗教类“黄天教”中亦可见。

一著道即一贯道)的影响,①因而武圣教与金丹道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两者在内涵与宗旨上颇有雷同,“金丹道五圣门以劝人学好为名”,“五圣道功夫以教人学好为号召”。②五圣道即武圣道,金丹教(亦称圣道门),武圣教(亦称武圣门、五圣门)都讲学好,可见圣道门与五圣道有着一脉相通之处。

由上所述,金丹道与武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教义与主张无相互排斥之处,两者的关系类似八卦教的文派和武派。从金丹道、武圣教的劝善吃斋,禁酒禁烟,烧香聚众与符咒,习练武功等基本内容来看,前者又与在理教有相通之处。这就是后来金丹道同在理教相结合的主要原因。

在里教(在理教)是当时以天津为中心,在直隶一带广为传播的宗教性团体,它是随着清末普遍吸食鸦片而问世的。吸食鸦片造成人体中毒,损害健康,因经济穷困,家庭濒临崩溃的危机,正是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背景,才以宗教的力量相标榜,以“严禁(鸦片)烟酒”为主开展活动的。因而这一结社便很快在华北、东北地区广泛推展开来。

就其创始,诸说不一,确实情况尚不能判明。一种说法是在理教为玄门全真道的一支。③明末清初,有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杨莱如者(原名澄澄),万历壬寅年进士,明亡后拒绝出仕二朝,乃随崂山程相旺(另说为吴阳春)学道而创此教,有所谓该教系尹喜继承老聃之说(似指《道德经》?)演绎流传,与元代邱处机(长春子)的全真道龙门派相结合而成,清初传至程相旺。程歿于康

① 参照拙稿《清代白莲教发展史》第166页。金丹道似乎也叫做“学好的”“mi-mi Chao”(密密教)(李提摩太前引书,第79页。)密密教与青莲教(金丹道)均以江西省为活动舞台,也许二者有某种联系,但目前尚不确切。关于密密教,请参照野口铁郎《明末清初千年王国论的宗教运动》(《千年王国的民众运动的研究》,东大出版社,1982年);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据说金丹道后来改名为先天教。(保罗·塞尔鲁斯前引书,第26页。)

② 见《宫中档》第821页,叶志超奏,第735页,安定、裕祿奏。

③ 见兴亚宗教协会编《华北宗教年鉴》,1941年,第508页,《盖平县志》卷十一,宗教志。

熙三十六年，至嘉庆年间其弟子在天津始设在理教公所。还有将在理教引伸为明朝遗老以排满兴汉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秘密结社，但其可信程度颇值得怀疑。

另一说法是，^①在理教的创始者尹灵(尹某)，天津沧县永丰村人，出生年代或曰明末或曰嘉庆、道光年间，他向众人劝说戒酒戒烟(鸦片)，致力于救济病人。又说，尹遇一道人而皈依，以符水医病而得众多门徒。尹死后发展壮大。所谓在里者，盖画一圈为教，教徒皆在其内之意。考虑到在里教的中心是永丰县的志武堂，而嘉庆、道光年间正值鸦片流行，因此认为在里教为尹灵所创之说似有相当根据。

该教“奉佛教之法，习儒教之礼，修道教之行”，是“浑然融合三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②谭嗣同说它只不过是“取孔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皮毛而成的”。^③它向庶民传播轮回思想及因果报应，拔苦兴乐，以正身、修身、克己、复礼为本，习禁酒、禁烟之行。入教者被介绍人带入公所跪坐于祭坛前，“五体投地以拜老师”，然后接受训示，并发誓教徒之间要相互友爱，禁绝烟酒，誓约之后，方准入教。还传授对父母妻子也绝对保密的五字箴言，五字是“观世音菩萨”。另一说法是“一心保大明”(是由原来的“一心灭满清”、“努力灭满清”更改而来)。^④而谭嗣同认为它就是喇嘛教徒口咏的“唵嘛呢叭咪吽”即观音菩萨的真言——六字大明咒。^⑤在里教似也有喇嘛教的影响，但这是清末的革命派出自政治目的，把当时的秘密结社之类的组织，几乎都宣传为持反满态度的同盟者而对其进行工作。为此，这种宣传流布于街巷，反而歪曲了这些民众组织的真实面貌，这一事实必须引起注

① 见徐珂《清稗类钞》，宗教类，在理教。

② 见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满洲评论社，昭和14年，第262页。

③ 西顺藏译《仁学》(《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三册，岩波书店，第376页。)

④ 见《奉天通志》卷九十九；民国《辑安县志》卷三。

⑤ 见西顺藏译《仁学》(《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二册，岩波书店，第376页)。

意。

在里教治疗鸦片中毒主要是通过信仰戒律，修养克己；另一方面使患者边服用由各种草药制成的药丸(茶膏)，同时将患者收容起来，使其与鸦片断绝，脱离地狱。这种治疗方法取得了实效，救治了众多鸦片中毒患者，做为有益的社会事业很快广为人们所接受。它不仅面向吸毒者，也吸引那些以讲求修身养性克己为目的的人。在天津，“民间从其教者约十之六七，皆有身家恒业，大率手艺、力役之人较多，农商次之，读书之人亦间有与焉”^①(光绪九年)。这样便在中下层民众中发展起来。在理教的势力逐渐波及热河，与标榜“不食烟酒”“吃斋行善”的金丹道在布教上发生接触以后，彼此之间有了理解。

通常把清代的白莲教以及民间宗教结社，都概括为“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但我以为仅作如此概括似有不足之处。

清代的民间宗教结社之所以取秘密形式，是由于“社会生活的不自由”(G·金摩尔)，人们应享受的权利被当局视为“邪恶”，不仅道德上受贬，而且其它活动也遭禁止和镇压(禁止结社自由)。我们为给这些结社下定义，着重分析其宗教思想和组织形态，而很少表述这种结社的政治性。所能看到的仅是参加民间宗教结社的民众的直接动机，即由于社会生活、个人人生不幸这个事实。可是这种动机的实质，是人们热烈希望改变那种动荡不安，无任何保障的生活现实。具体地说，那些由于贫病交加，流浪纷争而倍尝生活困苦、烦恼、不安、孤独、等级差别，被遗弃的人们，希望恢复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安定。当他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苦难根源时，则要求从中摆脱出来，恢复应有的人格，恢复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安定，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即同所有受苦难的人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聚拢起来的 就是这种宗教结社。因此可以说在该宗教团体中，甚至孕育着“不幸的辨神论”。

^① 见《李文忠全集》，奏稿四十七《在理教请免查办摺》。

换言之，在其背后是培育人们对这个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否定的意识。披着福利社会外衣的专制国家，始终把这一社会底层的“苦难的共同体”视为危险的，不容许其存在并继续加以禁止和镇压。在此情况下，参与结社的成员对现世俗世所持的不满、哀叹、愤懑、怨恨、憎恶等否定的感情，做为其绝望的代价，对来世即“另一世界”产生了无限憧憬。另一方面他们同不公正的俗世的守护神——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为首要任务，以镇压为能事的社会权力开始对立和反抗，不久，他们对充满俗恶不公的俗世彻底失望，变得不再憧憬“另一世界”，而是憧憬并期待着从根本上来改变眼前这个现实。中国民众作为自然灾害和政治动乱的受害者，不得不违心地忍受着自己卑屈微弱的地位。因此创造了医治社会病症的治疗术——即“魔术”，以及世界末日论的“劫数”思想。这种宗教结社的集团感情，在清朝思想意识统治僵化，在政治上又缺乏改良主义灵活性的情况下，宗教有时很容易走向对社会、对政治批判的道路，最终形成一种暴力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集体统一地，从政治上表现宗教结社成员否定现世，反映他们情绪的口号，就是“反清”，而作为否定之否定所提出的口号才是“复明”和迎接“真主”的思想。对白莲教及其成员来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性的思想意识。“反清复明”的口号，可以认为是集聚结社成员及民众各自程度不一的对现世的否定，并能使其升华为带有一般性集团意识的，最普遍的，因此也是笼统的最大公约数的政治意识的表现形态。所以，在危机之际，才能作为人们集体表露的共同意志从底层深处爆发出来。我认为这就是清代宗教民众运动中出现“反清复明”的缘由。这一论点不仅对白莲教结社，对于天地会结社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适合。清代秘密结社的反清政治性质，是对掌权当局的镇压进行不断抵抗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历史性抗衡，在秘密结社萌芽过程中，即早已打上了烙印。

四、起 义

加入或接触过金丹道及武圣教的人们，通过相互交流，感觉到他们所蒙受的迫害、苦难，并非偶然现象或个人的命运，而是带有共性的社会产物。因此这种感觉必将进一步引起他们心中的憎恨情绪。共同的这种苦闷、悲伤、憎恨的情绪，不久便发展为金丹道、武圣教组织同蒙古王公府之间的敌对意识。有记载说，金丹道、武圣教方面“商议起事谋反，陆续购备洋炮器械，置造旗帜”^①。“杨悦春等人起义之前，即与沈国泳（奉天省新民厅三台子人——笔者注）共谋举事”，^②可见以武力进行抵抗报复之态势已明朗化。不久，日益紧张的敌对关系，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杨悦春讲到决心起义的直接动机时说：“十月初，闻（敖汉）贝子调遣千余蒙古兵，欲借打猎为名行剿杀金丹道之实的消息，随即聚集伙党数千人，趁蒙兵未齐之际，先攻破贝子府”。^③而徐润说，金丹道在起义之前已把贝子府前店铺的布匹，纸张抢购一空。布为头巾，纸为护心，因纸柔软以为子弹难以穿透。当时市井也散播着“学好者将要攻打贝子府的谣传”。为此，敖汉贝子调

① 《朱批》，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延茂奏（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缘郭广海籍隶奉天义州，系正黄旗关永佐领下人，一向唱书度日，在监病故之郭柏令系其胞叔。光绪十七年二月间，郭广海闻邻屯石体坤素习武圣门教，遂与郭柏令拜认石体坤为师傅，传与咒语。后被本旗访拿，逃赴热河草白营子，投入教首王增股内，即封郭广海为平青王，商议起事谋反，陆续购备洋炮器械，置造旗帜。至十月十二日，王增因接伪主李国珍来信，即带领郭广海等赴朝阳县木头城子苏万深家会齐，各持枪械奔往朝阳县，沿途裹胁居民，抢掠枪炮，共有千余人。至十三日，闖进朝阳县街，与护卫营勇接仗，并焚烧衙署，搜抢财物。后因同夥李林等声称与蒙古喀拉沁王有仇，邀允郭广海等前往报复。二十日，行喀拉沁王府，放火杀人，不计其数。二十七日又在五官营子与古北口官兵接仗，因拒敌不过，越山逃逸。十一月初一日随同李国珍攻克乌丹城，十六日在该处林沟叉与官兵接仗，因王增等被击身死，郭广海等……逃至吉林双城堡……。”

② 见《朱批》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盛京将军裕禄奏。（《源流史料》第126页）。

③ 见《宫中档》第857页，叶志超奏。

集蒙兵以防不测。眼前的一切动向引起了前述金丹道的疑虑，^①在这种尖锐对立状态下，有一种异常紧张的危机感，终于导致了义举。杨悦春同草白营子各教堂首领王增、李彬、丁义和、李广、聂朱、聂珩、王福等人密议，认为“必须先发制人”，并以“扫胡灭清，取得帝位”为旗号，^②决定先杀蒙古人以雪积愤。^③于是各路首领立即动员，入教者自不待言，“附近居民皆愿相随”^④以泄多年积忿。十月九日，潜聚杨家湾子的一二千群众，分别以兰、黄、红、白、黑五种旗帜为标记，高举“替天行道，扫胡灭清”大旗，向十数公里处的贝子府进击。府人以武器猛烈抵抗。入夜，金丹道的火药车中弹爆炸发出轰鸣，被炸者凌空而起。蒙古兵见状，以为金丹道在施法术驾云，越空入府杀人，各个惊惶失措，弃械而逃。金丹道徒终于攻入府内。可是最大的仇人贝子与色二爷、喇嘛四爷已经逃走，未能捕获。起义者将府中男女及附近的数百户蒙古人全部杀死。又掘毁贝子祖坟，以泄仇恨。十一日，临近的曲里营百余名蒙古兵也被击溃。起义军将占据的敖汉贝子府改为“开国府”，杨悦春为“开国府总大教师”，并张贴告示，安抚民心，提出“向敖汉贝子府及蒙人复仇”，“勿伤百姓”。与此同时，大力筹集武器、弹药、旗帜、马匹，以扩充军备，休

① 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2页。

② 见《朝阳县志》卷24，有举“平清灭胡”旗号的记载。

③ 见《朱批》，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④ 见《朝阳县志》卷三十三。作为起义的社会经济史的背景是：（一）去年直隶洪水泛滥，饥民起事。（《官中档》第623页，德福奏。请参照《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第534—554页）。“本年年景欠收，良泛（疑“沃”之误——译者注）之田仅收十之二三，薄田仅收十之一二”（《朝阳县志》卷三十三），（二）该地区生活贫困，“见无衣苦民，其小孩则上身单衣，情尤可怜”，“目睹男女老少，有无上衣者无下衣者，共在土炕向火，且无食进腹数天”，“看贝子以北之村更加穷苦，不禁暗暗生怜”。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0、62页）。

整部队，^①以对付蒙古人和清军的反击，也是准备从“开国府”出兵攻占朝阳、平泉、建昌、赤峰四州县这一战略方针所采取的行动。与此同时，起义军一部进至四家子地方包围了县丞衙门，夺取了那里的武器和马匹。

十月十二日，李国珍在敖吉地区与张双、周宽、薛殿宽等五百余人举行起义。当日，李国珍致书王增，指示关于起事的具体行动。王增处有一“说书人”郭广海，原是义州正黄旗佐领关永的仆人，光绪十七年三月与其胞叔郭柏令，拜邻屯的石体坤为师，习武圣门，因被该旗追查而逃至王增处。^②民国《义县志》中卷记有“光绪十六年，教匪郭百令、陈明、杨明等反叛，盛京丰统剿匪驻义州，溃兵入境”，郭百令似即郭柏令。郭广海在密谋起义时，曾自称“平青(清)王”。王增率这些教徒，在朝阳县木城子苏万深家，与其它集团会合后，取武器胁迫沿途居民从行，一路边夺取武器边向朝阳县城进发。

十月十三日五更——准确地说是十三日上午四时许，在理教徒同“马贼”四五百人攻入朝阳县城。攻城时似乎由两个以上的部队组成。从西北向县街正面进攻的是在理教和“马贼”的部队；金丹道集团似由李广、齐灏、李斌、张富、聂珩(原书吏)、郭海(原弓兵)、郭洛九等头目率领，同王增、郭广海等的集团合并而成，他们潜入城内放火，破狱释放犯人，焚毁县署、税员衙门、七道泉子喇嘛庙。^③金丹道与在理教怎样联系，又如何采取共同行动，详情不解。之后，十月二十四日左右，又有高举十字黄

① 编成五大旗，并施行大王、王、侯、九门提督、兵马大元帅、元帅、先行、军师、领兵、先锋、总领等职务编制。东路土默特旗一带(王增、王福)、西路平泉州喀拉沁旗(李青山)、北路赤峰县(李国珍)，以及杨悦春部，大体分为四队，再加林玉山等，则分为五队。(参看《朱批》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之杨悦春供述。)

② 见《朱批》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延茂奏(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喇嘛依其地位勾通官府，干予诉讼，因此民众惧怕他们。《奉天通志》卷九十九)

旗，由道士率领的部队，以及由杨明、郭沅萌、杜把什等人率领的在理教集团，还出没于义州境附近。^①这一集团中，有妇女参加是它的特点。^②如果这里所说的杨明，是前述《义县志》所提杨明的话，那么等于前年的“教匪”是武圣教徒之一，而现在又以在理教徒的面目出现，两者间的相互渗透由此可知。后者，高举“奉天除暴，护国佑民，在理教门”大旗，^③袭击喇嘛庙。口号中所说的“暴”，是指蒙古王公贵族以及喇嘛寺院。在理教本来与天主教会严重对立，但从它主张“保国佑民”，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来看，似乎在模仿教会与教民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在这个口号中，流露着老百姓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

袭击朝阳后，郭广海等又赶到与其伙伴李林结怨的喀拉沁，二十日放火焚府而报了仇。^④

占领敖汉贝子府后，金丹道徒们又在十五日袭击了建昌县三十家的天主教堂，伤害教民数十人。由于迁安县道徒曾与教民对立，群众激愤，他们夜间即从敖汉贝子府冲向建昌、平泉、迁安一带，“焚烧了各地天主堂”。^⑤十七日夜，该集团闯入平泉州街内，烧毁了西北平台子的天主教堂。据说熊熊烈火映照下见有“数千”之众。^⑥传教士们早已逃之夭夭，火迹中发现不少未及逃脱的幼儿（孤儿）尸体。二十日夜，道匪200多人捣毁了平泉州西聂门子沟的天主教会，多数教民被杀。^⑦在这次仇教斗争中，金丹道

① 这期间，该地区有“黄羊教”徒千余人活动，据说“其术能避刀枪”。（《宫中档》第686页，崇善奏）。这里是指内蒙古胡萌的“黄羊教”（陆景琪“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斗争中的几个问题”、《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山东大学，1982年第73页）。参照《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175页。

② 见《宫中档》第688页，安定，裕禄奏“道匪中尚有女兵打仗，竟有女贼亦是奇闻”。（《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5页）

③ 见《宫中档》第651、686页，崇善奏。

④ 见《朱批》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延茂奏（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第647页，德福奏片。

⑤ 见《宫中档》第628页，德福奏。

⑥ 见《宫中档》第628页，德福奏。

⑦ 见《宫中档》第655、656页，德福奏。

徒们声称“我为善类，不伤百姓，只与天主堂有隙，扶恨报仇”。当时流行的歌谣说：“金丹道举大义，五圣门儿好神气，杀尽天主教，大兵一到，人头砍掉”，“先有理，后有道，五圣门儿威风凛，天主教末日临”。^①当时在直隶省天津县和承德府基督教会最多。承德府下的滦平县有两所，平泉县3所，建昌县5所，赤峰县3所，朝阳县6所。围场厅还设3所天主教堂（包括分教会），在法国保护下，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传教士在那里进行传教活动。^②天主教活动的这一地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教民拒绝承担当地村民演戏、赛会、烧香所摊派的费用，因而引起纠纷（光绪十四年）。另外，大多数教民是为了求得教会庇护自己的不良行为而入教的。村民一旦同教民发生争讼，总是吃亏，不得不忍气吞声。三十家子教会的华人教士林道源，旁若无人，令人极为反感，村民们认为教民是产生祸端的元凶，它的存在对农村社会是一种危险，因而对他们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这种对立情绪以在理教为最，二者可谓势不两立。^③这些对立，虽以同教民的不和为背景，但酿成仇教斗争，还有待于直接冲突的契机。据说那是由于斗争领导人，三十家子牌长林玉山，试图对行抢的教民韩某加以庇护的教会进行报复而引起的。四月，教民韩某，借商店粮食不偿还而发生纷争。韩与从中调停的徐荣、林玉山发生口角，竟将徐荣打死，并抢了林玉山的杂货店。林图谋报复。七月，教民在教会内制造武器，以防袭击。但双方均不敢轻易动手。恰好，平泉州当局捕获一马贼，因系天主教徒，在传教士的压力下予以释放，对此，人们大为不满，进一步激起了对教会的仇恨。林玉山复仇心切，主动接近金丹道，劝说金丹道共同发难。当林得知

① 见保罗·塞尔鲁斯前引书，第25页。

② 1838年，格列高里十六世将满洲教区委托给巴黎宣教会，彼洛尔司教在雍正禁教后的1841年仍留在天主教村，自从入朝阳松树嘴村后，即以该地为中心继续其传教活动。（《满洲宗教志》，满铁社员会，昭和15年，第222页）。《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382—385页。

③ 见《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31页；李提摩太前引书，第69、76页。

杨悦春等起事袭击敖汉贝子府后，便纠集同伙佟杰等放火烧了三十家子、平泉州、聂门子沟等地教堂。^①由此可知，对林玉山等人最有吸引力的是，他们认为金丹道是代表民众利益的组织，是对付以帝国主义武力为后盾、具有政治特权，专横霸道的教会势力的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这种看法，和蒙古势力统治下的汉族客民加入金丹道的动机是一致的。金丹道正是作为一个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及迫害民众的教会势力的组织而不断地扩大的。在这个意义上，林玉山集团对金丹道起义来说，虽是新的参加者，但已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这一地区已形成针对社会矛盾而开展的一场抵抗运动，“向教堂、蒙古人报仇，不伤百姓”，^②金丹道是肩负起仇教斗争的唯一集团。林玉山集团经多次斗争，到处袭击蒙古人，且吸收了马贼、土匪，四处活动，他们盘踞在三十家子村，一时有千余之众。

十月十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到盛京将军裕禄关于事变的电报，便火速命令由山海关向边外巡视的直隶提督叶志超调查、镇压。叶志超命令驻古北口的练军参将韩照琦率兵三百余先行，同时请求李鸿章出动直隶各军。李鸿章鉴于长江流域教案已同列强发展为外交问题，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决定全力以赴加以镇压。李鸿章电令把属淮军系统的驻芦台练军（夏青云、聂士成）、驻开平通永练军（杨元升）及山海关、榆关防卫各营（卞得祥、刘运昌）从石门寨、喜峰口调往建昌一带。之后，又电令驻西北的宣化练军（王可升）向多伦、赤峰方面调动，还把大沽的直字营洋枪队投入热河，而最终完成了镇压起义的总体布署。奉天省

① 见《光绪朝东华录》，第3065页；《朱批》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林道源被杀后尸体被肢解，首级悬于树上。（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三——四十七）。据《北方的叛乱》（《教务杂志》，1892年）第23卷第135页记述，起义从平泉和朝阳，建昌两处发起，仇教斗争的导火线是围绕粮食分配，在理教徒被教民杀害，而且官府有意抹杀该事件而引起的。参照李提摩太前引书，第79页。

② 见《宫中档》，第682页，德福奏。

方面也投入了盛字营(丰升阿、耿凤鸣),奉天练军(左宝贵),锦州驻留军(聂桂林),形成包围态势后开始了进攻。^①

二十四日,三十家子的仇教斗争集团首遭古北口练军韩照琦部的攻击。之后,该集团转移到建昌县东南瓦房店,重集人员以图攻克建昌县。路经五官营子时“五色大旗”遮盖遍野。二十七日与古北口练军展开激战。参将韩照琦报告宗教叛乱特点时说:

“贼首身著道巾彩衣,执剑作法,状如疯癫”。^②于是出兵讨伐建昌县高尔磴(凌源县明尔登)的“平西王”佟杰、军师斐某所率数百人的起义集团,官军还虏获了“金丹道盟簿”及符咒。^③林玉山似乎是在理教徒,可见他连同其党羽,已与金丹道合为一体了。该地区的起义军遭到官军追剿。三十家子的林玉山、军师宋先生、佟老耗(佟杰之子)集团虽逃往高尔磴一带,同三官庙道士吴广生党徒会合,但被官军和社、团勇镇压,十一月初,其活动始告终结。

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后,奉天边境外的起义集团,凡遇蒙古人及喇嘛庙宇,便烧杀抢劫,并进行“相随入教则不受蒙古人之欺压”的宣传。^④十月二十八日起义集团在边界附近的朝北营子遭奉天官军打击而败北。之后,照树沟举“十字红旗”的李洛道以及黑城子的潘岳林集团也相继被击溃。二十九日,曾大破平泉州判于甫筠所率乡勇,并杀死州判的榆树林的黄旗集团^⑤和在建昌县叶柏寿的红旗集团,分别被直隶官军击败。就这样,划分为几十部,彼此保持联系,并纠集马贼或饥民共有数万人的起义军,先后被

① 官军出动之际,传教士为保护教民出示了该地地图。(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编,第79页)

② 见《宫中档》第691页,叶志超奏。称“此股贼匪,自起事以来,妄称妖术”。

③ 见《宫中档》第734页,德福奏。

④ 见《宫中档》第737页,安定,裕禄奏。

⑤ 见《宫中档》第698页,叶志超。此时捕获了“伪教神铜象”,也可以认为是林玉山集团。

各个击破。^①至十一月四日，在毛家窝铺以大炮、抬枪进行拼死抵抗的“红黄大旗”集团也被击溃了。

关于十一月十四日在下长泉同以杨悦春为核心的集团所进行的战斗，叶志超传述如下：

“贼已麇至，大半以墨涂鼻，……口念咒语，直冲向前，施放枪炮，弹如雨下，十分凶悍”。^②

另，据说驻在黑山地方的起义军“头目身穿黄袍，招诀念咒，指挥拒敌”。^③关于吉林府下烟筒山战斗^④（十一月十九日），曾有报告说：

“贼以小黄旗施展邪术，我军炮多炸坏，贼由内闯出，枪子如雨……兵团受伤数十人，均无退意，复以秽物装入抬炮连击，贼始惊乱纷纷逃窜”。^⑤

还有报告说：“日前与官兵接仗时，闻用纸人纸马以助声势，嗣因邪术不灵，致被擒获”。关于这些宗教叛乱的特征，表现为由超自然力所维护的圣性和以秽物为象征的俗性（破坏超自然的威力）的对立，曾有论述，^⑥在此不赘。这种情况是在民意被无情践踏，政治或经济要求得不到合理解决，而又缺乏“制度性手段”时，而不得不采取的带有一种伦理性形态的反抗。这种伦理形态，作

① 见《宫中档》第762页，李鸿章奏；第830页，定安，裕祿奏。起义集团虽仍占据各地教堂，但已开始被击破，

② 见《宫中档》第791页，叶志超奏。

③ 见《宫中档》第824页，叶志超奏。

④ 十一月初有人自朝阳来联络，教徒孙刚呼应朝阳起义。（《朱批》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长顺、富尔丹奏）“贼以小黄旗施展邪术，我军枪多炸裂，贼由内闯出，枪子如雨，乡团头目……练目……阵亡，兵团受伤数十人，均无退意，复以秽物装入抬枪连击，贼始惊乱纷纷逃窜，……贼中手执黄旗者即伪军师孙刚，已于败逃时，自刎身死。……该匪等与孙刚素习邪教，早蓄异谋，自十一月初有朝阳教匪马连起潜至该处勾串，孙刚并该匪等起事以为朝阳接应，孙刚称为军师，赵泳汛名为谋主，其所备枪炮刀矛马匹均系平日预储及掠取各铺家防夜之物，日前与官兵接仗时，闻用纸人纸马以助声势，嗣因邪术不灵致被擒获。”

⑤ 同上。

⑥ 拙稿《乾隆三十九年王伦清水教叛乱小论》（《一桥论丛》第81—83页）。

为一种世界观基础的便是民间宗教。宗教把世界一分为二，通过宗教的圣性，才能表达他们的伦理要求，这些现象无论何等离奇古怪，似当如此理解。

十月十二日在放吉地方起事的李国珍集团，袭击了蒙古人，夺取了武器、马匹，十几天就发展到数千人。群众推李国珍担任“开国府”北方战事的“扫北武圣人”，遍掠奈曼、海林、东翁牛特各旗一带。十一月二日陷乌丹城，占据贝子府，为报平泉、榆树林、毛家窝铺失败之仇，且令一部分人南下，^①到达赤峰县城一带，已拥有四五千人的队伍，建立了20余营，“按八卦方向混立名目”。十一月十六日，以直隶练军为首的各军开始了对该集团的攻击。在此战斗中，除虏获了大量火器之外，还有与其它部队联络的书信、逆示、黄蟒袍、《纪效新书》、《冬明历》、《万全通》、神牌等物。^②战斗中李国珍负伤被捕，乌丹、赤峰一带的起义至此被镇压下去。

十八日，在吉林长春府城外鬼王庙准备起事的教徒谢添明、杨泳刚等10人被捕。他们曾参加朝阳起义，后因失败逃至鬼王庙僧人苏某处。原计划二十八日入长春城破狱，胁迫众人重返朝阳。奉天怀德县亦有道徒，纠集江东道徒，曾计划共同起事救援热河。^③这些均显示出金丹道组织活动之广泛。

从下长泉战斗败阵下来的杨悦春希图重集部队未果，之后，隐避于金厂沟梁山洞时被发现，十一月二十七日与其子、侄一起被捕。^④

朔风吹，雪花舞，几经激战，万具横尸遍野，叛乱终被镇压。

从以金厂沟梁为活动据点，占朝阳、攻赤峰，着黄袍，称“皇

① 见《宫中档》第825页，叶志超奏。

② 见《宫中档》第860页，叶志超奏。

③ 见《宫中档》第841页，长顺、富尔丹奏。

④ 见《宫中档》第857页，叶志超奏。

帝”或“开国府总教师”，及其残余势力在吉林、奉天各地的广泛活动，有金匪和“土匪”分子参加等等方面来看，金丹道起义同李凤奎起义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而且还含有以宗教结社的思想和组织为核心，针对民族矛盾激化和教会势力进行斗争，这一新的历史意义。然而决定金丹道起义具有新历史意义的诸因素中，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组织形式，则体现了历史连续性。

参与镇压起义的叶志超总结说：直隶总督李鸿章一闻朝阳警讯即刻电令各军备战，“电报通信灵便，铁路转运迅速”，“口外相距千余里，且山路崎岖……，先后数日即已赶到”，由于奋勇作战，方得迅速镇压。^①就是说，这是洋务运动（电报、铁路）的成果。但从民众运动的角度来看，电报、铁路等设施，对他们开展斗争是一种威力巨大的障碍。因此，义和团运动中破坏铁路、电线等，可以认为是出自这种民众斗争的经验。

叛乱后，热河的统治方式有所改变，蒙地佃户的田租，仿效内地王公庄田租税由州县代征之例，即改由州县征收。（《光绪朝东华录》第3101页）

五、叛乱之后

叛乱虽被镇压，但他们的活动并未终止。后来也还出现过与金丹道起义有关的事件。光绪十八年，奉天省盖平县当局以武力弹压了以石力坤为领导、准备起事的宗教结社。^②

奉天省新民厅三台子人沈国泳，在同治年间拜外来道士曹义路为师，习武圣教金钟罩，并宣传“入教学术能避刀枪劫数，枪炮不入”，沈把金钟罩传给石力坤。石力坤和金丹道的杨悦春、齐保山、潘岳林等早有交往，杨悦春等决定起义之前，即与沈国泳联

^① 见《宫中档》第863页，叶志超奏。

^② 见《朱批》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盛京将军裕祿奏。（《源流史料》126页）

系共谋大事。金丹道起义之际，沈国泳派其弟沈国顺、石力坤等赶赴朝阳东北黑城子参加起义，同官军作战。战败后，全家移居奉天省开原县八棵树屯北王家堡，改名换姓潜伏下来。石力坤也与该教道士魏中洋一起潜入盖平县灰庄屯，与当地的李庭福等人再次开始了活动。石捏称李庭福之孙李中央青龙附体，推戴为主，并认李中央为义子，自称“盖世法王”。石力坤还在广宁（今北镇）县民家屯传授金钟罩，私造木印、符咒、幡布、刀枪，并招集党羽，在盖平、广宁一带开始活动，^①后为官府发现遭镇压。这个石力坤是否就是前述义州郭柏令、郭广海之师的石体坤？虽证据不足，但二者为同一人物的可能性很大。

在东北三省发展起来的武圣教，后来也停止活动。日清战争期间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在吉林省内发生过武圣教组织计划攻击省城而被镇压的事件。^②

宗师刘明，为了向东三省传教，从张家口派遣教首孟毓奇担当此任，他在沿途收了164名“教首”（大弟子），让他们各领300—500信徒（称此为“盘”）。率有众多信徒的头目，分别封号为“总兵”或“元帅”，并以“天、地、云三种盘图”为证。据传，其信徒自“山海关内外及至张家口无处不有”，“多达数万”。后来孟毓奇在吉林府下用谰言为朱承修占卜命运，并推朱为“主”，与头目张九令、岳详等“约期谋反”。在吉林府下过着贫困生活的李添成，于

① 《盖平县志》卷三相传，光绪八年有“混元门”教徒数千人，光绪十六年灰庄屯有白莲教传来。

② 见《朱批》卷六〇三——一三〇号，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长顺、富尔丹片（《源流史料》第128页）；《宫中档》八辑第815页，恩泽、富尔丹奏；《朱批》第六〇三——一三〇号，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增祺奏（《源流史料》129页）；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延茂奏（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九辑，第788页，恩泽奏。

光绪十八年习如意门教。^① 光绪二十年八月闻孟毓奇在朱承修家劝教便拜孟为师，学法术。法术中即有“天盘、地盘、云盘，及能避枪炮的咒语”。李添成在十二月初收到先期集结于官街，准备十二月十五日起义夺取吉林省城的孟毓奇命令，即率70余名部下出发。初八，途中烧毁了素与自己不和的于会海家，李因筹备食物在白旗屯街焚杀劫掠而遭法特哈门官军追击。初九，在官街与元帅张九令的300多人队伍会合，但遭尾随的官军追击溃散逃走。在这12天的战斗中，官军除虏获了大批武器外，还有私造の木印、黄令旗、“坎”字号褂衣40余件。张九令供述在他上面的起义军首领有“关内外总教首”的“军师”孟毓奇、“伪主”朱承修等人，这些人最后都与其它“伪帅”、“伪将”等一起被捕处死。这次事件适值日清战争爆发，吉林官军大半被调往奉天省，这是趁此间隙谋划发动的一次流产的事变。

义和团运动期间，朝阳县的义和团众和金丹道、在理教徒们一起袭击了热河一带总营的松树嘴子教会。^② 当时他们从铎子沟联庄会借到了武器。十二月，俄军进驻后，传教士充当先导，并以协助义和团的罪名，袭击各村联庄会，与联军一起开始了报复行动。为了替教民索回受义和团之害的损失，俄军及教会势力到处掠夺。对此，联庄会各村推邓莱峰为总会首，组成“拒洋会”，同教民和洋人尖锐对立，后来竟发展到与俄军、清军、教会武装交战的地步。辛丑条约签订后，赴朝阳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曾为双方调停，但遭到教会方面的拒绝。教会通过北京法国公使逼迫清政府

① 同年十一日，单兆安等在黑龙江呼兰县组织儒门教（如意教），利用《太阳经》倡导消灾免祸而被检举（《朱批》卷六〇三一一二二号，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增祺奏，《源流史料》第129页）。该教为嘉庆年间来自安徽的王氏一族及刘松之弟子们所传。（在拙稿《清代白莲教发展史》中，将这一儒门教与金丹教、武圣教混同，乃误。）

② 见廖一中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2页，《义和团档案史料》第413页。教会设立于光绪初年。（《朝阳县志》卷八，参照《满洲宗教志》满铁社员会，昭和15年，第222页。《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82—385页。）

镇压拒洋会。清政府命马玉崑以武卫军25营骑、步兵进行武力镇压。1901年11月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邓莱峰等的拒洋会、联庄会均被歼灭。^①

1901年冬，活跃在奉天省海龙、通化一带的王和达、董老道等义和团众与鸭绿江畔帽儿山杨老太太为首的六合拳会合。杨老太太曾参加过1891年的金丹道起义，失败后辗转各地，在帽儿山组织秘密会社六合拳，^②传习法术，教练拳棒，武装起来的3000余众，割发辮束红巾，装束如义和拳。六合拳组织袭击了海龙城，并在通化附近与清巡捕队及团练交战，成为一股抗俄力量。后来遭到关东司令官阿列克塞耶夫所率俄军和由忠义军招为官军的依凌阿、刘宝善部队，以及奉天的马、步兵部队的攻击而失败，王和达被捕处死。^③但此后“各种仇视欧人之私教”“不独依然有之，且日甚一日”，“仍有传习在礼会、混元门、八卦门并六合拳等名目，情迹诡秘，朝夕易地，甚至有聚众多人私行做会情事”。^④说明宗教结社活动仍在秘密进行。光绪二十七年有记载说“风闻热河黑城子有匪演习六合拳之事”。^⑤另驻东清铁路俄人报告说，在铁岭县城南关帝庙内，有儿童演练“六合拳”。^⑥1902至1903年期间，在沈阳、本溪的小市、营口、铁岭、柳树河子、夹皮沟等地，有义和团或六合拳的法师及其成员被捕之事。^⑦

光绪三十年，在奉天省开原县、铁岭县交界处发现“混元门

① 见《朝阳县志》卷二十三，忠义，卷三十三。

② 见《义和团运动史》第490页。

③ 见《义和团运动史》第478—493页；黎光等《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9—174页；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一个俄国军官在满洲的札记》，齐鲁书社，1982年，第31，45—51，72页。

④ 见《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175页。“混元门”出现于光绪三、四年间。（《奉天通志》卷九十九）

⑤ 见《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83页。

⑥ 同上第94页。

⑦ 见《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175页。另称“吉林有洪莲门即红羊教，暗图举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卷二九四——二九四五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八日萨保奏）。参见《宫中档》第686页，崇善奏。

教”(混元门学好)而被检举。开原县曾是沈国泳等人潜居之地。八月,入混元门行六合拳的8人被捕,当时还没收了《呈奏天廷表》,抄写的符咒、道书、《修真宝传》、“八卦图”、道帽、“计道经”、“师宝经”、“师宝”印章,及“祈福达天”字样的印板、观音像、道袍、《金刚般若经》等等。

他们以李大法师(守一)为中心,以高七标子、王智刚、高万知、崔子心为承办人,聚敛教徒钱财,购置山地修建房屋,为“练拳之坛场,作传道之用”。他们把练拳与传道相结合,视二者为一体。从查获的邪书中记载的“神拳备天人胜会之用,异种孽冤,弥天罪过”等词句来看,他们把自己所演练的六合拳认为是备天人胜会所用之“神拳”。事实上正如他们所述:“混元门盖妥房屋,即操练神拳,听法师之传示”,“练拳时须烧香、上供、念咒,之后方得打拳,能避刀枪,练拳功夫百日可成”。^①

这种群众性的活动不久就和东北地区的红枪会、大刀会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尽管它具有很大程度的“迷信”和“落后”性,但事实上它不仅成为农村的一种自卫力量,而且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抵抗力量,这是众所周知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红枪会或大刀会同样代表着民众的真实愿望的缘故。^②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可以说金丹道起义在东北地区起到了来自民众的民族抵抗力量的先驱作用。

译自(日)《东洋史研究》第43卷第2号

白子明、周泮池译

① 见《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248—258页。

② 见前引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满洲评论社,昭和14年第262页;渡边龙策《马贼》,中央公论社,1964年,等等。

〔附记〕本稿是利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金丹道起义的《朱批奏摺》而著。谨向有关人士致以谢意。与《宫中档》所收奏文相同者,注以《宫中档》。所引《义和团源流史料》者,注明其页数,唯原档引用了原文。

汪精卫政府成立前后的日汪勾结内幕

冈田酋次

译者按：此文择译自冈田酋次所著《日中战争内幕记》一书。冈田酋次在日本侵华期间，先后任军需官和汪伪政府的经济、军事顾问，是参与汪伪政府上层决策的重要角色之一。本文记述了汪伪政府成立前后日汪勾结的大量内幕材料，对研究汪伪政权史颇具参考价值。由于作者系日本侵华重要成员，文中对某些问题所持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敬希读者注意。文中标题系译者所加。

策划成立汪精卫政府

汪精卫把希望寄托在近卫第二次声明上，不顾生命危险前往上海，接着赴日，和平沼首相以及日方中枢要人会谈。归国后，又席不暇暖，视察华北，和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会见。1939年6月末又和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会谈。7月下旬乘飞机前往广东，访问了隐居在香港的陈公博。那时陈反对汪组织政府，情绪消极，汪要他重新参加和平运动，逐步推进建立新政府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汪决定于9月1日在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前年4月在武昌举行，蒋任总裁，汪任副总裁）。这一会议是完全由中国方面独自举行的，在与会者当中，单是有影响的人物就达200数十人。

这次大会，改革了国民党的组织，采取主席制，推选汪为主席；同时确定“和平反共建国”为中心政策。当天汪主席作了长时间演讲，声泪俱下，使与会者为之恻然。

接着于9月21日，汪前往南京，和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及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三方举行会议，对建立中央政府问题作了坦率的讨论。这时候，日本方面亦似乎在配合中国方面两个政权的联合统一，把在华统率全部陆军的派遣军总司令部设立在南京，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司令官，坂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这使人想起日俄战争时，大山和儿玉两将军出马就任满洲军总司令官和总参谋长的情形。

汪从日本回国后，内心里怀有一个巨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对第二次和第三次近卫声明从速搞出一个具体计划，有了计划，就可以在新政府建立后为中日之间应签订的条约制定内容；有了计划，又可向全国呼吁，为实现和平推进第一阶段的工作。当然日本方面对这样的意见，是不会有异议的，事先以兴亚院为中心和有关机关联系，开始制定具体计划，这就是所谓调整日中邦交的內部谈判所决定的计划。这一计划，是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重点，不用说，也是我们梅机关最关心的事。

同年12月8日，兴亚院会议已决定了有关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协议，和这一内容有关的文件有：先前日中同志间在了解事件的情况下讨论过的重光堂会谈的协议；汪赴日时平沼首相发表的以道义立场处理日华关系的表示；以及已经存在的体现平沼表示和近卫声明精神的调整日中新关系方针（1938年8月决定，11月末御前会议通过）。在占领地区，日中双方都认为，即使在作战方面发生某些特殊的情况，但就其总体上来说，上述声明及经过情形还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变动。可是哪里知道，兴亚院的决定计划，都是有关各省（部）提出的赤裸裸地表达对华权益思想的单纯要求的罗列，也可以说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内容是可悲的。

当时的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在其《中国事变回忆》一书中记述说：“当时由各省提出的要求是极其粗暴的，例如：在华北企图趁机扩大华北政权的权限；在华中要求把联结中国首都南京和经济中枢上海的铁路经营权让给日本；在南方要求在海南岛确定新的权益。更苛刻的是，进一步扩大防共的驻军区，根本不把已燃起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人民群众放在眼里，又把晋北13县划入蒙疆，在中国本土公开扩张象满洲国那样的区域，诸如此类，全是赤裸裸的权益思想，其结果已完全离开了近卫声明。”

为此，包括我在内的梅机关的许多人员认为，拿兴亚院这一计划和汪方谈判，不但会使中国方面怀疑日本的诚意，而且即使汪方接受了这一计划，也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群众的反对，无法掌握民心，和平工作将愈益困难。因此，这时想把原计划送还中央，等待中央重新考虑。

影佐少将当然对这一计划也不赞成。参谋本部堀场中佐曾参加“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的起草，他对汪的工作十分理解并抱有希望。他虽作了极大努力，但认为要改变上述原计划已不可能，马上退还中央，只会招致反感。为此，对原拟放弃建立新政府的中国同志进行说服，并直接和汪面谈，把和缓各方面的条件留待将来解决。这样才以原计划为中心双方再次进行协议和处理。现在回想起来，对汪派的和平工作显然事先已宣告了死刑，至少对以后的工作给了致命一击。以后的经过情形也证实了这一点。

果然，在双方交涉中，汪方同志中有陆续叛离的倾向，特别是和平工作的发起人、也是内部谈判的重要成员高宗武和陶希圣秘密脱离汪派，逃往香港，并且把内部交涉的原始文件全部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结果给中国群众提出了汪精卫是否会同华北的王克敏和华中的梁鸿志一样成为日本的傀儡的问题。虽然新政府成立时，日本政府即予承认（其后德、意两国亦予承认），但是有一种气氛，认为汪的新政府的生杀与夺之权也是掌握在日本

手里的，这无论如何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影佐少将是当时担任内部协议交涉的人，对于所达成的协议是煞费苦心的。在他的遗稿《奔波历程记》中，对于这一时期的回忆有如下记录：“兴亚院指示下来的原计划，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作为草案交给汪方交涉负责人周佛海，向他传达了以这一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的要求，结果直接由汪精卫来了复信。大意说：来信及日华关系调整草案已收到，遗憾的是与近卫声明意旨颇不相同，但对于以本草案为基础进行交涉并无异议。而在交涉濒于停顿、决裂之时，汪以悲痛的表情又说：由于阁下以及梅机关各位的努力，使交涉结果接近近卫声明，阁下所取积极态度，使我十分感激。但日方提出的原案，实在背离近卫声明甚远，因此同志中间已有因感到失望而离异的人，今后还将出现更严重的离异情况。即使以后的交涉能得到若干修正，但今日日华双方关系间交涉停顿事项，对我们的和平运动都是致命伤。而阁下如果为了使和平运动进一步成长，在这些主要问题上让步，则阁下必须自行负责，这也是我难以忍受的。以此看来，还不如把交涉停下。当然我对于和平的信心是不变的，但对于建立政府的形式和方法可否中止？”这就是当时汪的心情。

由于这样的关系，艰难的交涉到1939年才完成。第二年，即1940年3月30日，在江南春光明媚的吉日，汪的中央政府才实现在南京还都。当时汪精卫是58岁。

新政府成立之前，还出现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日本中枢部门通过宋子良正在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交涉，并说颇有希望。因此在汪的谅解下，曾有过推迟汪政府的成立等情况。可是不久被拆穿了，说这个中间人是一个假的宋子良。于是急剧决定汪的还都。这一件事也表明日本是多么的焦心急躁。

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典礼的情况，新闻记者金雄白在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有这样的记载：“举行典礼的大会堂挤满了参加者。但没有一个热情洋溢的人，看上去气氛十分冷静。武官大

多穿军装，文官都穿中国礼服，汪穿的是晨礼服，虽风采一如往年，十分庄严，但不禁使我感到他显然憔悴衰老了。”对于汪在这一天的演说，有这样的记述：“他的声音没有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音调很低，缺乏音色，软弱无力，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糟的演说吧。演说大意现在还记得是：（1）大亚细亚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北上时最后提出的主张；（2）历史上没有一百年不和的战争，我们的目的在于克服困难，安定民生。”

这样的典礼照例没有各国使节参加，日方按周佛海的要求不派任常驻大使，西尾总司令官当然也不参加。日本政府为这一典礼发表声明，表示积极支持。举行典礼后的4月23日，以前总理阿部信行为特派大使，派遣到南京。同时贵、众两院的议长和实业界、舆论界代表等亦到南京访问汪代主席，表示祝贺。我们梅机关的职员，大多作为阿部大使的随员参加工作。汪后来依从日本的劝告，正式就任政府主席。

继政府成立之后，日本政府通过缔结日华基本条约承认该政府，把梅机关和汪方交涉决定的内部协定条文化，于1940年11月30日，由汪行政院长和阿部大使举行签字。

金雄白作为中国方面的委员列席这一条约的签字仪式。他描述当天情况时说：“这一天汪以行政院长的身分代表政府签字。他穿着礼服，在阿部大使一行尚未到场前，站在石阶上等候着。以悲痛凄惋的表情，痴呆地站着眺望中山陵那边紫金山上空的白云，泪水缓缓地流出，一滴滴沿鼻梁掉下来。突然他用两手狠抓头发有力地拉，不断发出恨恨的鼻声。脸上泪水纵横，周围的人们看到汪的痛苦的样子，亦为国家和自身的悲哀泫然欲泣。这时奏起了欢迎大使的军乐，阿部大使慢慢地来了，给汪担任翻译的周隆庠轻声地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一边提醒他注意，一边拿出小木梳为汪梳理头发，又用手帕揩他的脸，汪才象从梦中醒来，面露勉强的苦笑迎接着阿部大使，一起走进会场。”

日本虽然把这个流泪的汪主席——革命元勋、无比的伟人作

为和平之友迎接出来，但结果未能抓住和平转变的时机，不仅迫使他演出了悲剧，而且延长了战争，最终使日本陷于战败和无条件投降的命运。古语说：“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更是难以得到”。由于在汪政府成立前后所发生的剧烈变动以及围绕日华事变的国际形势转变和日本国力的局限，遂使局势难以挽回。这是彼此对国际形势估计的错误吧，或者是由于力量不够的关系吧，也或者是命运注定的悲剧吧！……

在日本控制下的汪政府财政状况

维新政府和南京中央政府成立过程中或成立之后，为其供应经费而罗掘财源的工作，是日军特务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最辛苦的一部分工作。一般说来，财源的多少，决定于政权活动范围的大小，同时政治权力的渗透对支配财源亦有密切关系。当然汪政权的收入，是由统治者对居民的权力关系决定的，但在占领地区产生的汪政权，它的统治管辖区，等于日军的占领区，形式上虽给予汪政权以权力，但实权却在日军手里。汪的中央政府的成立虽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汪政府权力的增长和普及工作在短期内也不容易遍及各地。因此纳税者当然不必说，就是征税机关亦往往疑惑不决，是很难取得实际成绩的。尤其是在横遭战祸、困顿不堪的占领区，状况更糟。实际上，随着作战的进展，在后方产生的各种政治组织，没有日军特务部的指导和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楠木实范大佐(后为陆军中将，住小田原市1—9—11)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和我同甘共苦的，对于当时的困难情况，他曾说过：“由于登陆作战后的国际情况，日军对上海租界的一切都不插手，幸而占领了浦东方面，开始在这一地区组织维持委员会，不久就扩大发展成为大道市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但任何政府首先需要的是经费，你(著者)采取的措施是很适当的。统税的收

入开始时是困难的，由于得力于措施的成功，我们都为盐税、鸦片税等的征收而高兴。这样，汪的中央政府几乎无需麻烦日本人也可以维持下去。”

在几个新生政权中，在财政收支和预算方面有完备制度，还是从汪的南京政府时期开始的。这是由于这时的日本政府派遣青木一男，接着又派石渡庄太郎(后任大藏大臣)到占领地区担任汪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与此相配合，又派出福田赳武(现任大藏大臣)和广瀨经一(后任北海道拓殖银行总经理)等许多有能力的专家。这些都有直接关系。

汪政府的财政部长周佛海，对于他所确定的当时财政估计，可从他的遗稿《周佛海日记》中看出，如下表所示：

财政收支估计(推断月额，单位万元)

收入方面：

华北关税收入	200
江南海关及华南海关收入	650
统税收入	550
盐税收入	200
盐税华北部分收入	50
武汉地区的中央收入	150
合计	1800

支出方面

政府中央经费	950
政府事业费	500
军事费	500
国民党费	60
预备费	500
合计	2510

对于不足部分周佛海是难以解决的。当时武汉方面的占领区尚在日军的支配之下，而华北尚处于半独立状态，虽然汪政权号称中央政府，但实际的管辖地区只不过苏、浙、皖三省。就这一

贫弱的收支程度来看，究竟能发挥多大的政治力量，还是个疑问。如果根据维新政府当时的实际收支情况来判断，这一估计大致是适当的。

不妨回顾一下战前中国的预算制，那时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省之间或者与地方军阀之间，就有包税式的协议或默契等存在，因此，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并不怎么大。所以中央集中收入的障碍，未必是在汪政府时才有的。尤其是汪的和平运动和重庆政府相对立，当时是全无准备的，在供应新政府费用方面，财政上开始时并无可靠的预算。因此最初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人在香港、上海从事和平工作时，也是依靠当地金融界人士自愿供给所需经费的。他们在1940年3月30日汪政府成立前，通过现地日本机关的帮助，以上海海关收入为担保，曾向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取得临时借款（由正金银行以贷款给影佐少将的形式再转交给周佛海，并经五相会议承认。关于海关收入，见注。）

此外，由于汪本人的性格关系，对于不合理的财源筹措，是完全得不到他的批准的，周财政部长对此是煞费了苦心的。但随着中央政府用全部包下来的办法接收了维新政府以后，即能达到上述财政收入的指标数字。

不久，到1941年初，新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以周财长为总裁，并发行储备银行券，在财政上增加了许多便利。但由于当时还存在日军发行军票的关系，储备券的流通扩大具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勉强增发储备券，又会招致物价高涨，问题就更为严重，在这一点上是有很多限制的。到了1941年底，由于日汪互相呼应，在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同时进入了租界，完全控制了海关。但当时由于对外贸易几乎已处于停止状态，对于海关收入已不可能有多

注：中国的海关收入，是作为对英军事担保的，后来又作为对各种外债的担保被抵押着。海关本身的经营操纵在英国人手中，收入存入汇丰银行。故中国政府的收入，只不过是扣除了上述抵押金以外的剩余部分。因此在占领租界以前，要使用这一收入是有重重障碍的。

大希望，汪政府的财政亦很不容易办了。

前面已经说过，维新政府成立时的费用，是由日军特务部事先策划制造了一个统税局，由统税局的收入供给的。到了汪政府时期，统税局在开始时不愿意隶属于汪政府之下，要求愿在日军特务部监督下进行活动，因此政府预算(收支预测)的编成，要由日汪双方机关协议来决定，达成协议时，采取特务部和有关机关同意的形式。实际上，从1938年4月开始，是规定按月预算的，至1939年初开始进而以3个月为1期实行收支预算，政府事业亦逐渐有计划地推进。

回顾维新政府成立时所需经费，开始时为月額100万元左右，成立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增加了一倍。到了10个月后的1939年初，在占领区内成立了三省政府，又产生所属各机关，就又提出地方补助金的要求，再加上为强化政权还必须增加绥靖费(军事费)。为了增加财源以满足上述要求，于是试办了征收盐税和鸦片收入，由中央集中了这些财源，同时又要求增加地方补助金。到了同年9月间，由于恢复教育制度，又设立教育补助金制度，因此政府预算急剧增加，每月支出额一般政务费用为500万元，地方补助金为200万元，总计月額达700万元。

走私鴉片及谋杀周佛海

战前我在中国工作时，曾访问过旧式中国富豪家庭，会见过吸鸦片成瘾的人。这些经常吸鸦片的人认为，他们吸鸦片是极其快活的，在吞云吐雾中全身都感到轻松。

从维新政府到汪政府，掌握最重要的财政收入的两个人，竟然都是惯常吸毒的鸦片鬼，这就是统税局局长邵式军和裕华盐业公司总经理、创设宏济善堂一手控制鸦片经销的盛文颐。关于统税局长邵式军，劝诱其出来搞统税局，前面已说过，这里只谈盛文颐出场的经过。

盛文颐是盛宣怀的侄子，他的叔父盛宣怀是清朝末年的大臣，曾和日本金融界合作，开办大冶铁矿，给八幡制铁厂等提供铁矿石，同日本人关系密切。盛宣怀的直系亲属，战后在同以前有关系的公司的支援下，于东京芝公园经营“留园”中国菜馆，这是战后日中间发生的一个插曲。有着这种亲日渊源的盛文颐，是接受了里见甫的劝诱而出来的。对日本人来说，他确实接受了很麻烦的鸦片方面的工作。影佐少将当时在参谋本部担任搞阴谋活动的任务，当他知道现地特务部插手搞鸦片的情报以后，为了使特务部摆脱这一工作，于是指令东亚同文书院出身、在中国人中间有很多朋友的里见甫，要他在中国人中物色适当的人来做这件事，里见甫推荐的人就是盛文颐。

由于战争的影响，占领区的鸦片异常缺乏，吸食鸦片的人纷纷要求特务部设法供应鸦片。这时正好在华北亦发生同样的情况，王克敏代表华北政务委员会给特务部发了公文，要求委派必要的专门人员，建立合法的配给制度，同时委托藤田某(据今井少将著《昭和的阴谋活动》一书载，他是对前柳条沟爆炸事件提供资金的民间人士)和上海的某大贸易公司研究输入鸦片方法，我也担任交涉工作。不久，鸦片运入日本邮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仓库内。据经办人说，由于有国际条约的问题，鸦片是由无国籍船舶在波斯装载的。

为此，我曾访问了开战后即在陆军武官府任职的楠木大佐，一起进行了回忆。他说：“鸦片也是我负责亲手经办的一件工作。老前辈几次拿以前的例子要我注意，劝我不要插手这一工作，但是我没有坚决拒绝大道市政府苏锡文市长的屡次要求，以为只要光明正大的处理，总不会招致别人的怀疑，因而得到您(作者)的帮助。市长的要求认为，战事发生后不久，上海鸦片奇缺，价格猛涨，黄浦江沿岸密集着来自香港的私贩鸦片的船舶，治安上亦发生了许多问题，造成混乱。单由市政府也不能处理这一问题。于是和日本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长勇大佐商量，还因为华北政务

委员会委员长亦有同样的要求，因此利用鸦片登记许可证的办法，开始输入。这时正好里见甫来访，说是军队插手鸦片经销不适宜，要让他自己来搞。会谈之间才知道里见甫是和陆军本部有关的，我才把一分一厘都详细地编造进帐册，移交给里见甫和与他有关的中国人，以后的一切就与我无关了。”里见甫是把这一工作委托给盛文颐的，现在这两个人都已去世，也不知道他俩人合作的经过。以后汪的南京政府成立，我以经济顾问的身份，和盛文颐之间常有交涉。

盛文颐是个鸦片鬼，他的生活是昼夜颠倒的，同他会面的时间常在午前三四点钟，实在使人为难，再加上他的说话往往夸夸其谈、思维混乱。有一个可以证明他思维相当混乱的例子：在汪政府成立后，他曾发出这样一个情报，说是辻正信大佐(战后任参议院议员)在计划暗杀财政部长周佛海，致使汪方要人们极度惊慌。周部长当时为此曾和金雄白商量，金在其著作中曾谈及这件事：“盛文颐在鸦片税和盐税方面，是在周财政部长管辖之下行事的，当然处于听命于周的地位。是他利用日军的威力，巧妙地奔走于两者之间，从而和周进行了长时期的明争暗斗。有一天周佛海命我和盛接触，要我对盛做些工作，使盛改变依靠外力进行交涉的立场，进而为中国方面做事。这时正好盛也知道我和周佛海关系亲密，就要求我经营的银行向盛的事业投资，因此周盛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十分圆滑。到了大东亚战争后，有一天盛在儿子和秘书等陪同下，深夜来我家访问。这时由于日本的战事已在惨败中，再加上政务繁忙，周佛海的心脏病发作，幸赖日本名医的诊治已渐脱险。盛向我表示了对周的病情慰问之后，说是有一件使他踌躇不安十分为难的事，说：你是知道周先生和辻大佐的关系吧，据我最可靠的情报，辻大佐正在准备暗杀周先生。这一情报是绝对确实的。”金雄白继续记述道：“我拿了这一情报，第二天天不亮就跑到南京周公馆。正好在周的卧室内只有周夫人和周最信任的冈田大佐。”

我现在已记忆不清，是否如金雄白所说，这次和金见过面，但我还记得，当时应周夫人的要求，我在周的病室住宿了两三天。据金雄白记述，周听了金雄白告知盛所得到的暗杀周的情报后，经过多方商量，周夫人主张，如果暗杀者闯进来的时候，只要有冈田大佐在那里，那就没有问题了。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才要求我住宿的，但我一向不知道有这样的原委，只是要求我住宿时我才去住的。

现在辻大佐已经去世，已无法证实这件事，但他总不至于因个人的恩怨，非置周于死地不可吧。而且从公的方面来看，当时正要求汪政府和重庆搞和平，周是政府的副总理级的，又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和蒋有深厚的关系，以此来看，周对和平工作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辻大佐所深切了解的。即使敢于进行暗杀，亦等同儿戏，究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但是对辻大佐中国方面还有另一种看法：在维新政府时期，辻大佐只是为了农工部长顾宝衡在业务上有受贿的传闻，不顾上司的反对，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曾发生企图杀害顾的事件，使中国要人们极为恐惧。也许是这样的关系，才产生上述情报的。另一方面，又因为盛文颐是个鸦片鬼，有时很有可能由于错乱发出毫无根据的情报。以此看来，今天对这一事件的真假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

单就今日存在的周佛海日记来说，他本人对这件事这样记载着：“一部分中国人企图杀害我，一部分日本人也企图杀害我，而且都是有充分证据的。我的妻子对此甚为担心，但我觉得这是由于今天我所处的地位的关系。”从日记中所说的企图暗杀周的日本人以及日记所说的日期，不难推断是包括辻大佐在内的，加上周和辻大佐还有关系不很好的事实。那是辻大佐在总军参谋部任课长的事，辻大佐总是从他那一套钻牛角尖的想法出发，曾提出要同重庆的蒋介石直接面谈解决战争。于是他作出了自己乘飞机到重庆的计划，并要求我和他同行。他要我同去的意思，就是要求周佛海同去。辻大佐知道周曾受蒋介石的重用，而且十分了

解周和共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及周恩来是旧交。我想他是想在这方面利用周的。辻大佐曾扬言已得到中央的谅解并已准备了飞机，但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并不重视，根本没有批准这件事，因此我和周佛海都加以拒绝。由于这一关系，辻大佐对周的印象是不好的，但这一点也不可能与暗杀计划有联系。

此外，还流传过另一件似乎是真的暗杀周佛海的计划。这一暗杀计划的主角，也是个鸦片鬼，即统税局长邵式军。前面已说过，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着“一部分中国人企图杀害我”。看来当时搞暗杀的中国人，有两个系统：一是受重庆指令暗杀亲日巨头的人；二是单为赏金搞暗杀的人。下面所说的暗杀周的计划属于第二种。据秘密情报说，由邵式军及其一伙提供赏金，打算杀害他们的上司周财政部长。这是1945年初夏的事，当时大东亚战争的战况，已显然对日本不利。占领地区内的中国人和重庆方面都认为中国的胜利大致可以肯定了。这时候周佛海夫人暗地里邀我去跟她商量，其内容是有关她丈夫的中国朋友得到的一件情报，据称周的这个朋友看到上海游乐场一个赌棍，拿统税局长邵式军开设的大华银行的一张支票很威风地向人夸示，并到处宣扬说：“能杀死周佛海的，还可得到比这更大的赏金。”看看支票上的发票人是统税局日本顾问用中国人的名义签发的。于是周的这个朋友收卖了这张支票，拿到周家来报告。就当时周佛海的势力来说，把邵暗地里加以处决亦并不难，但这样做难免引起统税系统的混乱，作为财政部长的周佛海是不愿这样干的，因此不得已才和我商量。幸好及早发觉，未酿成大事。关于这件事，战后金雄白在其著作中这样记述道：“邵式军是日本人最宠爱最信任的人，从职别上来说，是周佛海的部下，常于夜间出入周邸，表面上殷勤从事。但周佛海对于作为汪政权财政命脉的统税掌握在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手中，是很不满意的，有时竟不客气地责备他。因此邵是不会高兴的，邵和日本人同谋是完全可能的。后来周佛海还是和邵多次会面，邵当然极力否认这件事。但是支票是由日

本顾问的户头开出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支票的用途以及它为什么会落到流氓无赖的手中，这些情况都是无法说明的。”

汪政府的日本经济顾问

随着汪精卫中央政府的成立，政府各机关也逐渐配备齐全。原来帮助和指导这些政府机关的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人员，也脱离了特务部和兴亚院转任这些政府机关的顾问了。在军事方面，汪政府设立了军事顾问部，以影佐少将为最高顾问。在经济方面，设立了经济顾问部，以石渡庄太郎为最高顾问，因此我也被选为顾问要员。由于我在汪政府成立之前就同他们有关系，故按汪精卫、特别是周佛海提出的要求，决定我兼任经济顾问和军事顾问。经济顾问部按其性质和业务情况，大都分别由日本有关各省派遣专家参加，但在经济工作业务中心的财政金融方面，则由大藏省派遣较多的重要人员参加。

为了回忆这方面情况，我首先拜访了在大藏省派遣人员中主要担任税务方面工作的广瀨经一（后任北海道拓殖银行董事长）。他一边引证他的《我的履历》，一边谈着他的回忆：“我担任经济顾问，是在1942年年中，即日军迅速地继续进击中国并向其南面进军的时候。我（时任神户关税长）因公从神户前往大藏省，关税课长秋之顺朝靠近我咬耳朵说了要派我到大陆去的话。我马上去见谷口恒二次官，他说已内定派遣我到上海担任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顾问，汪精卫政府的经济顾问大多是由大藏省派遣的，首任最高顾问青木一男因就任大东亚大臣，后决定由石渡庄太郎接替。青木说石渡也去，你也应安心地去。尊敬的老前辈们如此劝勉，我是不好拒绝的。我决心跟着时代和石渡共同行动。我的助手是吉武久贺，直接税专家松下彦十郎，间接税专家黑岩义信，以及秘书荒牧善平，他们各位都和我同行。赴任后才知道，我们

的工作，相当于日本的国税厅，是监督财政部上海税务局和各地税务局的征税业务。课税的对象是：老酒、啤酒、卷烟、纸张等等，最大的财源是被称之为统税的一种消费税。此外还有叫作所得税处以及捐税局的团体课税机关，这些都是包税制度，其危害是搞不正之风。为了防止漏税，我们坚持取缔局员因发现漏税而退赔过大的罚金。当时曾考虑把上海征收的营业税办法推广到全国，并试图把税率提高1%到2%。将草案给石渡看了以后，他提出批评意见，认为税金这东西，偏高了会减少收入。结果又新设了饮食税，想借此增加收入。实际执行这一税制改革的人是税务署长邵式军，他当时30岁左右，个人曾经营银行，据说是上海的一个资本家。他经常乘坐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并有税警队防卫身边。当时在上海有关的日本人有正金银行分行行长河村二四郎，还有副经理堀薰雄(前东京银行董事长)和世界经济调查会理事长木内信胤两人。当时上海的通货膨胀十分剧烈，商品的定价几乎天天更改。与此相比，日本在1919、1920年的通货膨胀就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了。人们拿到工资就得卖成东西放在身边。当时的通货是储备券的军票，储备券1元相当于日元1角8分，1元以下的角和分，连给予乞丐也不受欢迎。这时在上海和南京当顾问的日本人很多，在最高顾问石渡下面，有现任自民党领袖福田赳夫，后任是现任日本银行副总裁的河野通一等，都是大藏省派遣的。石渡任职约1年半，因再次就任大藏大臣而归国。其继任是小仓正恒，他原是住友公司的总理事，也曾当过大藏大臣。小仓是个具有古代武士风度的人物。任命日本银行的新木荣吉(已死，曾任驻美大使和日本银行总裁)为主任顾问。在中国人中间很有声望的特殊人物前天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以及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后任驻印度大使的那须皓博士都是顾问。此外还有大家记得的风云人物、宫崎县人森政一(海盗头子——译者注)，他的中国名字叫杨贵祥，更有名气。因当了军事顾问，他认为是人生的新起点，于是又改叫日本名字‘桢直’，一般人都称他为杨先生，

在中国人中间是有潜在势力的。我就陆陆续续回想起这一些。我们全部人员，对南京汪政府是尊重其自主性的，当顾问是作为中国方面的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工作的。特别是经济顾问工作都涉及利害关系，因此所有人员当然都坚决以廉洁奉公对待工作。”

在我看来，战前的中国，也许由于经过多次的革命和战乱，以及没有充分受到国家保护的关系，因之人们对于财物的私欲是极其强烈的；反之，廉洁的人则深受信任和尊敬。战前在中国的某些日本人，有不少人因得到要人的信任而可以自由活动，特别是在这方面有优点的人。当时存在着贿赂的习惯，为了取得一张许可证或一张汽车执照，也要送礼。我们起初对此咒骂过，但有过多次经验以后，才知道其中是有一定的惯例的，并形成一种市价，可以把它看做捐税的一部分。因此在事业收支计划中，可以事先作为必要的经费开列进去。……在战争中间，据说上海金融界有名人物的汽车司机的职位也有一定的市价，也就是以主人所给的一定工资和随主人出入庆吊场所时所得的小费的多少，作为司机职位交换竞争的标准。对我来说，我的汽车来往最多的是周公馆，由于要司机谢绝公馆所付的小费违反中国人的习惯，为此曾和对方商量可否停发固定工资，双方只以小费付给雇用的司机，这样反闹出了笑话。……

创立中央储备银行

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同年11月30日与日本签订条约，于是得到正式承认。经过筹备委员会的讨论，在日本援助下，于同年12月21日，设立该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央储备银行。

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储备银行的总裁，他于12月19日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银行的声明，说明设立银行的意义，并要求人民群众的协助。声明说：

“国民政府的重要方针，在于恢复经济和健全金融。但欲图恢复经济和健全金融，则必须组织完整的国家银行。事变以来，货币贬值，物价高涨，人民呻吟于水火之中，经济呈日形衰落崩溃之状。倘金融不加以根本调整，则难以解除人民的痛苦，亦难以稳定社会经济的基础。财政部于还都之始，曾发表有关维持币值和安定金融的宣言，继之组织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数月以来，经过慎重的积极的规划，对于准备基金、营业方针以及发行纸币等等，所有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现根据民国26年(1937年)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的草案，命名为中央储备银行，^①定于民国30年1月6日，在首都正式成立，以图发展。新发行的纸币均为法币，凡纳税、汇兑金融等一切交易均可使用。为了防止金融市场的波动和保障人民资产起见，准许现行各种法币暂时与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法币等价流通，以图今后逐渐调整达到统一。万一重庆方面发行的法币，数量愈益膨胀，币值愈益下降，造成市场混乱，影响人民生活时，本部业已准备有效办法，随时进行处理，以图安全。关于日本的军票，由于事变在继续当中等情，希望彼此共同努力完成各自所负的使命。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华北金融为中心，力图健全发展，联银券的流通区域，暂时维持现状。此外华兴商业银行，取消其银行券发行权，主要经营国际贸易金融及普通商业银行的业务。今后发展经济，充实国库，繁荣社会以及国际信用事业，悉以中央储备银行为领导，新纸币的发行，应经常稳健慎重地处理，使能保障国富而利民。政府希望各界人士共体此意，给予充分支援，使新纸币顺利流通。仅期人民群众生活早日安定，解除痛苦，安居乐业早日来临而已。”

在上述声明中已充分表明，对以往各种各样的通货，有开始

① 中央储备银行，是承袭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后的名称，有关通货的各项法规也依据旧草案。新中央政府的通货制度虽然实质上仍是纸币本位制管理通货，但仍继续依据有关本位通货和发行准备的规定。

和储备券实行统一的意图和计划。这里对储备银行的概况另行摘要记述如下：

- 一、资金 国币1亿元(全部由国库支出)。但需要时得招募私人股份。
- 二、职员 总裁周佛海，副总裁钱大钧，理事陈之硕、陈君慧、张素民、柳汝祥等，监事罗君强、陈春圃、何炳贤等。
- 三、特权 (1)发行本位货币及辅助货币之兑换券；(2)发行经理政府铸造的本位货币和辅助货币；(3)经理国库；(4)承办内外债券和支付利息等事务。
- 四、发行准备 (1)发行准备金至少保证有百分之四十的现金准备，余额为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的 有价证券及指定的 票据；① (2)兑换券的现金准备：④白银和黄金；⑤外国货币及外国货币的存款。
- 五、业务内容 除了国民政府授予的特权之外：(1)经理国营事业的经费出纳；(2)经理各银行的准备管理和各银行之间的汇兑结算事务；(3)代理地方公库及公营事业的 经费 出纳；(4)接受存款；(5)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的国库券和公债利息券的贴现；(6)国内银行承兑票据及国内商业汇兑票据和期票的再贴现；(7)支付国外的汇兑票据及买卖等。

其他详细情形可参看有关法规。下面先谈谈储备银行设立的经过。

随着作战的进展及占领区的扩大，华北成立了临时政府，华中成立了维新政府。但要求统辖这两个地区的中央政府在实现统一后继续做必要的工作。与此相适应，通货制度虽一直在加强联银券、华兴银行券以及军票作为一般通货，但又不断地研究中央银行的创立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日中双方提出讨论的各种基本方案有：(1)恢复旧法币作为中央政府的法币的方案；(2)把华兴银行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合并为新银行的方案；(3)把华兴商

① 采取4%的比例准备制(当时有全部的现金准备)加上兑换券的高度发行额须经国民政府的许可。这一发行方法是附加最高发行额限制的比例准备制。

业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的方案；（4）使发行兑换券具有军票的性质，从而使银行具有与日元相联系的银行方案；（5）与现存银行和军票无关，另行新设银行的方案，等等。但是由于以恢复旧法币作为新政权的法定通货的第一个方案，得不到日军当局的同意，而第四个方案，从日本处理事变方针来看并不适宜，因此这两个方案很快都被取消了。以第五个方案为中心继续研究，直到汪精卫政府的成立。为尊重新政府的自主性，以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的意见为中心，并取得与当时日方的联系，才达成本章开头所说的定案。也就是说，新中央银行的兑换券既无军票的性质（即不与日元相联系），亦不承袭旧法币和现有两银行的兑换券，而是有独立的计划。还考虑到华兴银行券的痛苦教训，以及当时如果迅速否定旧法币会给经济界和一般人民群众带来损害等原因，所以在开始时规定新发行的兑换券与当时的旧法币等价流通（即对当时的英镑约为3便士半），以后随实力增长，首先整理旧法币，然后再整理联银券和军票，旨在最后统一整个货币。所采取的方法是所谓正面进攻的方法。

关于由周佛海担任银行总裁的问题，日中双方均无异议，但周本人却有些不安。众所周知，周本人对于政治更有兴趣和信心，且能得到别人的支持。但对专业金融特别是技术方面似乎没有信心，为此请实干的钱大钧任副总裁，总算可以放心了。但他还有一个很担心的问题，因为在占领区当时最有势力的一般通货是军票，这就是如何与军票相协调来促进新银行券流通的问题。为此，周佛海又提出要我担任总裁顾问，由于政府经济顾问的资格必须具备一定的要求，我拒绝担任这一工作。周越来越忙，今天到华北作礼节性访问，明天到满洲国做特使，而且他每一次行动都要我跟在他的身边。正在这时，周得知日本陆军夏季人事调动即将到来，我将被调回日本国内部队服务的消息。这件事对我这个在部队服务时间不长的人来说，正是由大佐晋升为少将的一个机会。但我说明了以后，周部长还是不肯答应，最后象我这样

的小人物的人事问题也拿给汪精卫、周佛海和板垣总参谋长去讨论，结果决定，调我任京都师团的部长，期限1年，晋级后再回来担任顾问。这是我现在回忆的一件事。

果然，正如周总裁所担心的，储备券开始发行时，和旧法币及军票在流通等方面都引起了剧烈的竞争，一时难以进展（1941年6月末的发行额只有6400万元）。不久又发生了冻结英、美资产等问题，以后发行额也急剧增加，至大东亚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12月6日，发行额高达16500余万元。而且随着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日益急增，至1942年6月又全面收兑旧法币，进而统一币制。同年下半年由于储备券逐渐深入军票地区，1943年4月1日日军方面已停止发行军票，于是在华中华南逐渐全面形成以储备券为统一通货。1941年2月号的《经济学者》杂志，关于储备银行的创立，以下述赞词，发表了题为《新法币和华中经济界》的评论，评论说：

“新法币的出现，使当前华中的经济形势为之一变。首都南京固不用说，就是在有外国银行的错综复杂的上海，亦表明能顺利流通。开业后的一周间，流通额即达6403000余元。过去蒋介石政府的中央银行，发行新通货时，经过5年，才达到4000万元的流通额。与此相比，可知新法币的发行是多么良好。新法币这种迅速渗透的力量，给予重庆方面以严重恐怖。新法币在通货战中好象棒球主战的投手，向旧法币挑战，以收兑旧法币的策略，冲击重庆方面的稳定汇兑资金。事变以来，由于重庆政府乱发法币，结果造成币值暴落，物价暴涨，招致了当时人民生活的困难。新法币与此相反，它采取稳健和渐进的方针，首先专心加强它的基础。”（摘自E·甘编辑《战时中国的贸易金融》）

可见汪政府的中央银行，是在日中双方协力和援助下的一个可喜的开端。

汪精卫再次赴日和梅机关的苦恼

汪精卫派原定在1940年3月26日举行政府成立典礼。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毕，这时日方总参谋长板垣向梅机关提出，由于通过宋子良的和平工作渠道有非常的进展，在一两天内将得到决定性的成果，要和汪精卫商量把成立典礼推迟两三日举行。汪精卫对此愉快地答应，没有表示任何难色，在等待着宋子良的结果。但前面已说过，这一工作是以一场滑稽戏而告终的。这样才于3月30日举行成立典礼的。

梅机关主要是为协助汪建立政府这一使命而产生的，从开始工作起，一年余以来总算完成了一般的任务。但是梅机关所有人员这时又被任命为阿部特派大使的随员，并全部兼任新政府的顾问，如前所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梅机关的工作如果回忆一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艰苦，即从兴亚院的草案开始至进行日之间内部交涉作出结论的艰苦过程；另一点是焦虑，亦即这一交涉虽然好不容易制订出日华条约草案，但在最后达成签字承认以前所发生的麻烦和焦虑。关于前者已经说过，汪本人曾经有过想放弃建立政府的想法，这时处于日本政府和汪方之间的梅机关，正如汪本人给影佐少将的复信所说，所有工作人员都处于困境之中。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管怎样只是以兴亚院草案使对方接受就算完事，那并不怎么困难，但问题是还有一个根本课题，就是要使这个政府能早日掌握民心，并达到全国和平。此外，关于后者，由于全部有关人员都陷入焦虑的气氛之中，当然是不会有安闲的日子的，也就是说，多次费尽心思才制订出来的条约草案，在签字以前竟不能有所进展。而事情的结果却是很复杂的，其重要原因是由于急欲取得和平的日本政府的中枢人物，不切实际地表现出来的浮躁心情，把重点放在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的种种渠道上，并为之沾沾自喜。

在种种和平工作的渠道中，最受重视的，大概是宋子良和钱永铭。如前所述，前者因宋子良是假的才被放弃了。后一渠道，由于松冈洋右外相的坚持，简直就象俗语所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很有恋恋不舍的意思。据当时汪方所得到的重庆方面的情报来看，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认真地对待汪方，而且只能起这样的作用：或者是使蒋阵营骄傲起来；或者是使共产党更密切地监视蒋介石对和平的态度。为此，我在这时随影佐少将回东京，向当局、特别是急忙前往近卫声明的主人翁本人的获外庄向他请求支援；又前往外相私邸访问了称病回避见客的松冈外相，希望快些得到批准。此时，汪本人的态度是很积极的，愿为推进这些工作共同努力，而在其他同志和属僚们看来，认为事实上是极不愉快的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经过这些苦恼之后，才于11月13日将与汪政府缔结基本条约草案时，在御前会议上作出决定。

根据上述决定，于11月30日，日中双方进行了条约签字，至此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汪精卫政府。不久，本多熊太郎常驻大使到任代替了阿部特派大使，大使随员制撤销，恢复大使馆的固有组织，影佐少将就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石渡庄太郎就任最高经济顾问，我仍兼任经济顾问，与随员福田赳夫等一起工作。影佐少将在其遗著《奔波历程记》中曾说：“冈田主计大佐按财政部长周佛海的要求，仍兼任经济顾问。因为在处理日中经济关系上，以目前日军管理物资为对象的事件是很多的。”

日本政府对新政府的承认，对于在沉闷空气中从事和平的同志，虽然给了一些刺激和希望，但对中国一般人民群众的影响来说，却未必给予多少希望，特别是在占领地区的上层阶层中，显然对和平的期望已日益淡薄。因为不但条约的苛刻内容已被一部分脱离分子所公布，而且在刚承认的日中经济问题调整方面，也暴露了日方军事上的要求和权益思想，这就使汪政府的独立自主性未能如预期的那样得到发挥。这一形势，必然会反映到新政府内部的官吏和军人中来，从而对和平的前途发生怀疑。一部分市

民对从事和平的同志甚至发出诽谤言论，这也时有所闻。所有这些不能不反映到敏感的汪的脑子中来。再加上对最近国际形势变化及日中关系问题亦十分担心，汪深感就这些重要问题和日本政府充分交换意见有迫切必要，因此决定于1941年6月再次访问日本。

在汪看来，政府成立以后，已有1年多，这中间虽然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但他觉得并不符合占领区居民对和平的期望，而且被重庆方面斥为傀儡政府，同志们被宣布为叛国通敌等等，心中愤愤不平。当时的日本，趁世界形势的变化，正日益紧张地为日美关系的调整在筹措对策，并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德国的预想交战国是英、苏，同时美国也在这一范围。汪在担忧，万一日美开战，东亚前途确实岌岌可危。汪的这次访问日本，首先在于探询这一点。

东久迩稔彦王的《皇族战争日记》，对汪赴日前后日本中央政府的一部分情况，有这样的记载：“《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来访，据说汪精卫由于日本政府的援助并不认真，而心怀不满。更由于汪政府驻东京大使褚民谊回南京，向汪报告说日本首脑并无诚意帮助汪政府，汪认为前途无望，把他的意旨坦率地告诉驻南京的本多熊太郎大使。本多大使为了询问近卫内阁对汪政府的根本方针回国，一两日前已到达神户。汪精卫亦将于近日访问日本。”同时该日记还记载陆军大臣副官杉田中佐访问东久迩私邸时的报告：“驻南京大使本多熊太郎回国后曾向政府要求，日本应竭尽全力加强汪政府。但后来该大使和各方面商量的结果，对汪政府再增加援助已有困难。该大使很了解，对日本说来首要的目的是要从速结束中国事变云云。”

汪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赴日的，与周佛海等政府领导人一起于1941年6月15日乘轮船到达神户。

由于影佐少将事先到东京，因此我就和大使馆的日高一起陪伴汪主席同行。在下船地点的沿途有小学生和群众手拿小旗欢呼

着在迎接，汪一行对如此的欢呼深受感动。天皇以外国元首资格迎接汪主席，决定以霞关离宫为宾馆，以正式仪仗晋宫会见。

会见后汪主席及其随员深有感慨地说：“陛下正在朝夕祈祷日中合作，可见他是关心有益于东亚安定和世界和平的首要人物。在谈话中，我听了这位日华间真正合作者的话，从这些话中，我已充分领会陛下的真意。”他甚至说：“这次赴日的目的，由于同陛下会见，大半已经达到。”

接着汪以行政院长的资格，和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首相及有关大臣会见。总理和阁僚们都说明，对援助汪政府的方针，依然不变。只有陆相东条英机坦率说明，为何在战时情况下要求汪政府不得不尽其所能者甚多。这时决定提供3亿元的武器贷款，并决定把华中被扣留的中国人的房屋和军管工厂等尽速发还。

汪于归途中，曾在大阪逗留，出席了大阪市长举行的招待宴会，应出席宴会者的要求，发表了有关和平运动的抱负和信念的演说。他热情地说明对于和平的要求，使出席宴会者充分理解他的主张。

这次赴日的结果，大致给汪主席加了一些勇气，对同志们可能是一付清凉剂。但最近国际形势的发展是：4月13日苏中缔结中立条约；4月16日，日美开始会谈；6月25日，日本决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侵入南方对英、美开战，等等。汪回南京后的国际形势，愈益复杂，愈益渺茫。

柏如译 刘其奎校

1941—1945年外国对中国 的援助

阿瑟·N·杨格

金融和物资援助

当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失利使中国在军事上得到及时援救的希望破灭之时，美英两国正确地转向财政援助。5亿美元和5000万英镑的贷款表示了盟国的支持，同时也鼓舞了中国的士气。但是，这一大笔援助远未能收到预期效果。英国的贷款因涉及中英之间的摩擦而大大耽搁了，中国最终只利用了800万英镑。对美国贷款的使用则牵涉到双方的错误。中国未能处理好由2亿美元贷款作保证的美元债券的发行。同时，主要由于怀特，美国财政部阻挠了及时向中国运送黄金，这批黄金是2.2亿美元贷款的支付形式。

在华出售以5亿美元信贷为基础的美元证券，对遏制通货膨胀具有真正的潜在意义，但是却没有施加压力，以使富裕的人认购证券，从而迫使其改变屯积日用必需品的活动。财政部未能利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受托人，使证券更有吸引力。同时认购活动持续了16—18个月，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为20：1，而当时物价每月平均要上涨大约10%。虽然有这种便宜，那些未来的承购者发现不急于购买证券更有利可图。因为他们通过把本金用作高利贷或搞日用品投机能赚更多的钱。上述买卖活

动在指责声中收场。对于内部承购者大量套购的真相，我不得而知，这些活动损害了政府在国内外的声誉。大约有1.5亿美元如过眼烟云而对中国毫无助益。

在华出售根据上述贷款而向中国提供的黄金以遏制通货膨胀，本来可以比实际做到的要多得多。出售黄金在一些国家里被认为是战时用非通货膨胀手段提高货币值的权宜之计。尽管中国方面紧急呼吁，财政部拒不向中国运送黄金，但同时却在中东和印度出售黄金以抬高当地通货。财政部承担着向中国提供黄金的明确义务，只要财政部能坚守信义运送黄金，中国是能够在现金基础上很好地掌握黄金出售的。当时，官方的卖价与自由市场的价格密切相关，当中央银行再没有可供出售的黄金时，因为担心黄金价格暴涨会对一般物价产生严重影响，它仍不敢停售。由于相信美国财政部所承担的义务，银行开始出售黄金期货，而这些黄金期货又不能很快兑现。摩根索想帮助中国，尽快地向中国提供黄金使其得以在市场上出售。但是怀特和他的同事却加以阻止，提出了一些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是似是而非的理由。当摩根索开始注意自己的许诺——根据中国的要求运送黄金时，他迁怒于自己的下属，命令他们采取补救行动。但是，战争已临近结束，损害也已造成了。甚至到这时，这些下属还在进一步拖延。

正当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变得危险，日军夺取华东空军基地甚至威逼重庆之时，财政部却在故意拖延。这种拖延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处理美军在华费用问题上的争执。当时，中国方面无视飞涨的物价，顽固地一味坚持美军的开支以20：1的汇率把美元折合成法币。另一原因是中国未能很好地掌握以美元为本的债券的发行。美国政府还感到中国在1944年未能尽其所能来进行战争。我不知道怀特及其同事是否还有其它原因。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声称，“有30多个消息来源”表明怀特卷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

动，^①怀特则矢口否认这种指控。但是，有证据表明怀特有强烈的亲俄反华偏见。在1944—1945年间，他在阻挠对华运送黄金的同时，正在设法使100亿美元的战后援俄贷款得以通过。战争初期，怀特的行迹表明他是一个支持援华者。我没有证据说明他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与同期俄国由支持到反对国民政府的态度转变有联系。在黄金问题上，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美国的立场是错误的，有害于中国。甚至在那时，我们这些站在中国一边的人都怀疑这是个阴谋。

华盛顿早在1942年就想使5亿美元贷款附有“条件”。但是，由于中国反对而未果。当时，盟军的失利和中国在长沙的胜利削弱了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中国反对与美国就5亿美元的使用同美国商量一事达成协议。虽然中国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其结果却对双方造成损害。为了更好地掌握美元为本债券的出售，应该附有条件。这也会有助于出售黄金计划中双方的合作。这种安排本来在中美关系因战时争执充满阴云之前就可以达成。

除了5亿美元贷款外，为获得当地通货，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美元储备。这可以说包含着援助。因为按汇率提供的美元远远超出了中国方面提供的货币的合理价值。由于中国金融地位软弱，美国用现金换取中国通货，而不是按逆租借*处理。仅在华美军费用一项，美国就付给中国共计3.92亿美元；1941—1942年为100万；1943年为1.1亿；1944年5100万；1945年2.3亿。此外，到1944年中期为止，美国为购买中国战略物资付出了4800万美元。以上总计达4.4亿美元。这些支付对中国很有价值，因为它为战后提供了所需求的物力财力，并多少抵消了因美国在华军事活

① 根据国内安全法和其它国内安全法律，调查行政当局的小组委员会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1956年12月31日第84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5部分，第71页。

* 逆租借(reverse Lend—Lease)是指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国家，向在该国的美国军事等人员以租借方式提供衣食住行及医疗等生活设施和服务。这些费用战后统一结算。——译者注

动引起的更为迅速的通货膨胀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害。

如何支付在软弱的中国经济中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所需费用是一个主要的难题。只是通过更快地转动印钞机，中国才能提供所需要的额外的货币。从这种特殊计划中所得到的，会超出日益猛烈的通货膨胀中所受的损失吗？得不偿失最明显的例子是1944—1945年以华西为基地的B—29远程轰炸机的行动。

中美之间分摊费用的多少，以及美国份额所应支付的美元如何折合为法币，也成为—个棘手的问题。中国一连几个月顽固坚持要按官方不变汇率 20：1 来支付美元，而无视飞涨的物价。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应该更加通融些。但是，无论理由多么合理，中国所持态度的结果也是有害的。相互间的争吵给人造成了一种中国正在力图敲美国竹杠的感觉。中国的确能建立庞大的美元储备。但同时也在争吵中恶名在外了。经过激烈讨论争执，好不容易才达成妥协。这种摩擦与有关物资援助和军事政策的分歧汇成一体。这一时期大部分时间里中美关系、中英关系的恶化程度，并未被普遍认识到。作为盟国，各方都有意减弱这种摩擦，但这不仅于事无补，摩擦依然存在，反而更加歪曲了1944—1945年的事态。而且也为战后对华关系留下了伏笔。

外国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贷款和按对华有利的汇率购买法币，在数量上说，是与中国在1941—1945年实际发展着的战时需要相适应的。但是，中国对美元为本债券出售的处理和美国对黄金的拖延扣留，降低了援助的价值。在邱吉尔劝说下，罗斯福取消了他在开罗会议上所作的两栖联合攻缅的许诺，中国于是要求10亿美元贷款，即使在1944年初期向中国提供这笔贷款，对阻止中国国内形势的恶化也没有多大帮助。

对华租借援助远不敷用。在这里，中国深受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采取的“欧洲第一”决策之苦。这个决策在过去和现在来看都基本上是正确的。希特勒是最可怕的敌人，他的垮台将决定日本

的失败，但反过来则并非如此。租借也受到所谓“驼峰”空运*的严格限制。“驼峰”空运在1945年7月达到最高点：77691美吨，这是战时最惊人的努力之一。但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需要。在“驼峰”空运两年半后（原文为“前”，有误），1944年6月的运输量达到18235吨，方才超过1941年底滇缅公路的每月15000吨的运输能力。在1942年12月，只有1636吨物资飞越过“驼峰”；1943年下半年，平均月运输量为75000吨。中国只有在苦战7年半之后，才得到与其需要相当的西方军事援助。

为了更迅速地发展“驼峰”空运和提供飞越驼峰的物资，应该并且能够向中国分配更多的援助。美国未能实践其援助的许诺，有时甚至未能运送相对来说数目不大的可供利用的物资。中国代表以及美国政府中与其看法一致的美国人再三指出，尽管欧洲战场有优先权，与英、俄相比，中国也未能得到租借援助中合理的部分。在1941和1942年，中国得到了租借援助中的1.5%；1943年和1944年仅占0.5%；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大约是4%。1943年秋，租借管理署告诉国务院（两者都倾向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陆军部不信任中国，“极力阻止向中国运送其它有效的和易于空运的所需补给品”。^①

在孤军奋战四年多并作出巨大牺牲之后，中国感到自己被人忽视和歧视。早在1942年8月17日霍恩贝克就指出，尽管总统答应给中国以援助，但政府中各个执行机构却在作梗。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我们可能失去作为有效盟国的中国和整个远东，一旦丧失这些盟国，它们将转而反对西方——我们缺乏稍微多一点的努力使中国人相信，在我们盛赞中国的作战和……答应援助他们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②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给中国的贷款相当于大约7亿美元，包括

* 即飞经喜马拉雅山的空运，下同。——译者

①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3年，中国，第509页。

②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2年，中国，第138—139页。

美国的5亿美元贷款和英国的5000万英镑贷款(到1942年,俄国的援助实际已经结束)。而实际上,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大约只动用了7亿美元中的一半,即3亿多美元和相当于1200万美元的英国贷款(见附表)。战时美国租借援助(包括1941年的2600万美元)是约8亿美元。英国的租借援助相当于4400万美元。太平洋战争期间所利用的上述各项援助的总额为12亿美元。在1937—1941年间中国孤军奋战时,中国所利用的外援是3.5亿美元。

军 事 援 助

美国的军事援助是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这些军事活动主要包括:飞越“驼峰”的空运行动;在中国本土和邻国对日本的空中行动以及从中国起飞攻击日本的行动;从阿萨姆到中国的“史迪威公路”的建筑,以及与此相关的在缅甸有限制的军事行动;提供训练中国军队以及教授使用武器和战术的军事顾问;和由一个遍布全球并延伸至美国的组织所支持的漫长后勤供给线的活动。还有在1941—1942年缅甸大部沦陷时期和1944—1945年光复时期英国的地面和空中的作战。最后,俄国军队在战争的最后几天突入满洲,表面上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国。

中国西方朋友的努力有时是卓越和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里只提几个范例:飞虎队,“驼峰”空运,和梅里尔的绿林好汉(Merrill's Marauders)。但是,西方通过军事行动进行的援助是缓慢的,比起它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总的说来还远远不够。不幸的是一些行动铸成了大错,对此西方盟国与中国均负有程度不同的责任。俄国在最后关头对满洲日军的进攻行动成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些错误和这一侵略对以后国民政府的垮台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期间对中国来说,第一次大灾难是1942年初缅甸的失陷。正如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所说,在印度的英军当局未能认

识到：“战线只能在缅甸”。他们未能制订缅甸防务的严密计划，也没有把驻缅英军置于驻印英军指挥之下，陆军元帅韦维尔未能及时采纳蒋委员长派遣军队的果断建议。从道理上说，在缅甸的及时配合行动是有可能的，它可以守住足够的地区以维持和发展一条与中国相连的陆上通道。^①

1942年初缅甸的灾难是最终导致国民政府崩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战略储备和无法补充的重装备。陆上通路被切断使中国无法得到所需要的大炮、运输工具和其它辎重。被孤立的心理打击，使信心丧失，士气受挫，从而加重了通货膨胀。失败助长了中国和英美之间的齟齬，产生了一种不利于密切合作的气氛，而只有这种合作才能够援救中国。

正象英国官方史学家所说，缅甸大部的沦陷，“支配了东南亚战争未来的战略”。^②由于日本占领了仰光和缅甸大部，1943—1945年盟国为恢复一条通向中国的陆路通道，只能在极为艰苦的山区和丛林乡村中战斗。史迪威、英国领导人和委员长在打通陆路通道的时间和方法上的战略意图，有待于军事历史学家去评价。不管怎么说，由于缺乏足够的军费，史迪威只能小打小闹。1944年春，缅甸日军的负隅顽抗推迟了滇缅公路的开放，这样，直到1945年1月这条陆路通道才发挥作用。这一推迟关系重大，把在缅甸的强大的中国现代化军队以及大炮和汽车向中国转移，本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止1944年秋华东可怕的溃退和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政治及财政后果。

涉及援救中国的另一重要转折点是1943年底蒋介石与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的会晤。1943年秋，蒋介石与史迪威已经在改革中国军队、计划攻缅战役方面合作得很好。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答应蒋介石(但未经邱吉尔同意)，作为收复缅甸和重新打通通

① 参阅柯尔比(Kirby)：《对日战争》，第2卷，第101—104，218—220页。

② 柯尔比：《对日战争》，第2卷，第220页。

向中国陆路通道计划的一部分，盟军将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重要的两栖作战。开罗会议一散，邱吉尔立即游说罗斯福，取消这个承诺。邱吉尔后来谈到开罗会议时说，“英美两国参谋部的会议，被中国发生的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搞得心烦意乱。而且，……总统……对印度—中国地区过分注意了……”。^①

取消在开罗作出的承诺的后果立即表现出来了。它直接导致中美在财政和军事问题上摩擦的加深。关于美军在华费用的争论更加吵得不可开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怀特扣押了业已承诺运往中国的美国黄金。在军事方面，改组中国军队的进程出现了倒退，种种困难在1944年底史迪威被召回时达到顶峰。与打开中国陆路通道同时发生的是日军在华东、华中的强有力的攻势，中共压力的增强，以及通货膨胀不知不觉的加剧。

这些事态预示着未来的厄运。连绵不断的灾难，恶化着中国的局势。决心挽救它的那些西方朋友所进行的重振土气的努力也无法阻止局势恶化。取消开罗的承诺实际表明在英美行动中中国重要性的下降。密切注意着其它问题的美英两国，对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几乎是撒手不管了。在这些事件中，中国政府有它自己的责任，就象前面各章所评述的那样。但是，无论责任如何分担，很明显美英两国的政策未能认真考虑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国务院和政府其它部门的一些人对形势看得很清楚，敦促对此加以适当注意。但这些人却都被从白宫、陆军部和财政部等高层决策机构远远地调开了。与中国关系的恶化导致双方更缺少合作态度，这就使战后对华援助和如何处理与中共关系的争论与决策有了缘故。

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重视空中作战的决定，这是对中国地面部队改革和装备不重视的结果。罗斯福在1943春作出的这项决定首先应由陈纳德负责。他先说服委员长，后者又借助他的帮助使

^① 邱吉尔：《紧缩包围圈》，第328页。

总统相信这一建议，并反对史迪威及其支持者马歇尔的主张。毫不奇怪，飞虎队以小胜大的成功导致了对空军独立作战能力过分乐观的估计。现在，我们从战后材料获知，情报部门的报告大大夸大了第十四航空队对敌人船只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内河航道上的船只例外）。空中力量也未能阻止敌人强行推进，日本停止攻势多半是因为达到了有限的目标。^①当然，这种说法并不能用来说明十四航空队的出色战绩。官方空军战史专家指出：“陈纳德的飞虎队战术娴熟，用兵有方。给敌人造成的重大损失与投入的少量兵力极不相称”。一位日本军事历史学家也声称十四航空队是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在华作战的主要障碍。^②

史迪威认为空军优先权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军队的改革降到次要地位。他对中国士兵作出了最高的评价。他写道：“他们能毫无怨言地忍受难言的困苦，指向那里，他们就会毫无疑问或毫无犹豫地跟向那里；在他们单纯的心灵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某种英雄业绩”。他还说：“我了解中国战士。我见过他们打仗，他们象世界上任何战士一样出色”。^③然而，史迪威认识到，缺少正常训练和现代装备不足，并不是中国打败仗的唯一原因。出色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F·F·刘在他研究1937—1945年中国抗战的著作中指出：“这种能够用来抗击敌人的力量未能妥善地加以运用”。^④研究这一战区的美国官方史学家声称，在战争初年，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和史迪威（他在1935—1939年出任驻华武官）的报告：“中国军事的基本错误在于：忽视起码的战略战术原则；滥用支援武器；漠视军事情报；未能采用健全的参谋指挥规程；未能

① 罗曼纳斯、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36—339页；《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21—22页。

② 克雷文、卡特：《二次大战中的空军》，第4卷，第8页；罗曼纳斯、森德兰：《在中印缅战场度过的时光》，第359页。

③ 怀特编：《史迪威文件》，第124页；罗曼纳斯、森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27页。

④ 刘：《军事史》，第223页。

使运输手段和武器保持机动状态”。^① 虽然如此，上述历史学家还指出，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驻华军事观察家给陆军部“一种印象”，认为中国军队是“一支有很大潜力的参差不齐的力量，但不是有战斗力的、训练有素的纪律严明的军队”。^②

空军优先权也削减了“驼峰”空运物资中给地面部队的装备。此外，史迪威认为这种优先权使中国军队领导人部分地逃避了那种痛苦的需要——整肃军队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端陋习，同时也影响了执行他关于帮助改进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指示。史迪威力图说明，随着军队的改革，中国“在战争结束时将拥有有助于中国稳定的手段”。^③ 但是，中国方面则从未充分认识到军队彻底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尽管如此，史迪威还是帮助奠定了一个部分改革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的继任者魏德迈才能有以后的建树。

从成都起飞的B—29轰炸机的活动，在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论。现在，战后军事分析家则一致严厉抨击这一行动。这些飞机的20次轰炸行动对敌人几乎没有造成有影响的损害。但是，这一活动对“驼峰”空运物资的需求却很大，而这些物资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以加强陈纳德十四航空队和重建中国陆军。更有甚者，修建基地所需要的沉重和陡然增加的费用严重地加剧了通货膨胀。这些费用所引起的中国财政吃紧，加深了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关于如何分担和偿付战费的摩擦。

空军优先权，特别是B—29行动的优先权，促使日本在1944年下半年大规模进攻华中和华东，而此时中国军队尚未装备。史迪威在1943年4月就争辩说，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一支强大的陆军，“如果我们在准备就绪以前就激起日军的报复，那么整个局势就

① 罗曼纳斯、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

② 《史迪威使华》第32页。

③ 同上，第373页。

不可收拾”。^①马歇尔同意这一观点。虽有十四航空队的帮助，中国军队还是未能阻止这次甚至危及重庆的进攻，由此暴露出中国的弱点。这一系列的失败，对国民政府国内外声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并造成其最终在大陆的失败。

直到1943年秋，总的战略计划才是首先打开通向中国的陆路通道，然后利用重新训练和装备的中国军队进攻广东—香港地区，以密切配合盟军从太平洋发动的两栖攻势。在中国的下一步行动是向北推进，以建立猛烈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但是，对中国军援的拖延，中美之间的摩擦，以及中国军队改革的延缓，正好与太平洋战场跳岛战术的成功和远程轰炸机的发展相吻合，这就导致一个新计划的出现：无需中国基地以及在中国采取主要军事行动，就可以打败日本。1944年5月27日马歇尔告诉史迪威，他的主要使命是建立空军力量以支持从太平洋方面对日本进行的大规模强攻，而非为了在华进行重大战役而重建中国军队。与这一政策相适应，陈纳德受命从“驼峰”空运物资中建立汽油储备。^②

假如1943年的战略能够奏效，战争最后两年中国形势的恶化或许远不至于那样严重。它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会更加强大，进而可以收复更多的国土，这些战绩又会增加政府威望并增强民众信心。这本来可以与1944年华中华东的溃败对士气的影响形成迥然不同的显著对照。同时，美国的登陆部队也能够带来相当数量的日用消费品，既可用以直接偿付劳务，又可用以换取当地通货。这样，通货膨胀也可能受到遏制。

华盛顿转而主要依靠跳岛战术计划，这一计划的采纳在军事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极大地忽略了本应作为首要任务的政治目标——恢复一个自由中国的需要。正如在欧洲的行动一样，美国的

^① 《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22页。

^②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63—364页，第466页。

政策忽视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用其它手段继续的政治”。采取这一政策也未考虑维持中国士气的需要，避免中国的垮台以及战后计划的需要。这一行动印证了“赢得战争失去和平”这句老生常谈。

战争最后几天中对中国的最后一击是俄军侵入并占据满洲。为着这种假想的利益，罗斯福和邱吉尔瞒着中国，在雅尔塔以中国为代价向俄国作出了让步。俄军后来把缴获的日军武器弹药转给了中共，并干扰国军前去接收。

从一开始，史迪威就想对援助和谈判附有条件，特别是进行军队改革。早在1943年，马歇尔就把这一问题提交总统，总统认为这“纯粹是一种错误方法”。使用5亿美元贷款而无需商谈，已经开创了一个先例。但是后来，在分担驻华美军军费以及打通缅甸到中国的陆路通道的战略等问题上中美的分歧发展时，美国改变了方针。1944年4月停止租借援助的威胁迫使中国对缅甸开始西进攻势。随后是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由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担负这一重大责任所需要的权力——奖惩军事人员和调动军队——将会影响中国国内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平衡。蒋介石反对把这种权力授与一个外国人，特别是授与和他早有这种分歧的史迪威。罗斯福不得不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两者之间决定取舍。选择蒋召回史迪威，表明罗斯福放弃了上述有条件的政策。但是，中国战场的地位下降了，向中国提供主要援助以解救中国和试图使它成为第四强国的可能性也减少了。

附表 贷款和租借 1942—1945年
美国

时 间	项 目	5 亿美元贷款		租 借 (百万美元)
		利用额(百万美元)	用 途	
1942		200.0①	保证国内贷款	100

时 间	项 目	5 亿美元贷款		租 借 (百万美元)
		利用额(百万美元)	用 途	
1943		10.5	支付黄金	49
1944		12.5	支付黄金	53
		35.0②	购买银行券	
1945		111.3③	支付黄金	1107④
		20.0④	购买银行券	
		25.0	购买纺织品	
合计		414.3⑤		1309⑥
英 国⑦				
5000万英镑贷款(2.01亿美元)				租 借
利用额(折合为百万美元)		用 途	(折合为百万美元)	
到1945年底⑧已支付		12	为战争目的在英镑 区购买劳务和商品	44

注释①1942年，美国的2亿美元记入中国帐内，但大部分款项直到1944年及以后才提取。

②这些数字表示用以购买银行券的5.05亿美元逐年分配额的估计数。

③中国在1945年出售黄金时期只收到价值700万美元的黄金。即1月份为300万，6月份为400万。中国的黄金买卖于1945年6月25日停止。7月份有3700万美元运至中国。1.113亿美元的剩余数即6730万战后才交给中国。这笔款项部分用于银行券，用于纺织品的款项战后才用完。5亿美元中的1.56亿是在1945年动用的，大约只有其中的1/3被分配给战时，即1945年8月15日以前。

④这笔援助中大约有一半是对日战争胜利日(1945年8月15日)以后提供的。其中大约3亿美元是空运国民党军队去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费用。

⑤中国是以黄金形式在1946—1947年获得这笔5亿贷款中的余额：8600万美元。

- ⑥另外，2600万美元的租借援助是在1941年提供的，2.1亿美元是在1946年提供的。
- ⑦除了下面所列项目外，还有两笔官方赠款：139500英镑作为英国救济中国的基金；15000英镑赠与中国红十字会。
- ⑧除了1945年底支付的300万英镑之外，1948年7月还支付了510万英镑（即2050万美元）。5000万英镑贷款中共用掉810万英镑（即3250万美元）。

译自杨格《中国与外援》第398—409页

任东来译 李安山校

美国“1948年援华法”

产生背景新探：冷战战略之一面

有限援助

[美]约翰·H·费维*

公众舆论在杜鲁门政府制定对中国内战的政策时起了什么作用，对此多年来众说不一，争论迭起，而1948年公众态度在产生“援华法案”过程中的影响，尤其受到学者们关注。

在最近一批有关的政府文件公布以前，下述论点似乎最具权威性：是舆论和国会的态度迫使杜鲁门政府扩大了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已对1947至1948年间的蒋介石政府持悲观态度，若不是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它本不会提供那些援助。^①持上述观点者认为，1947年末美国参众两院内形成了

* 我谨此向对本文提供了宝贵帮助的罗素·D·布亥特、玛格丽特·S·费维、安娜·M·费维三人表示感谢。

① 关于这一论点，参阅刘易斯·M·普利弗伊的《杜鲁门的对华政策：麦卡锡主义与外交歇斯底里》（纽约，1976年版），第17—18，57，66—69页；罗斯·Y·凯恩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纽约，1974年版），第198—199页；邹说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1963年版），第11章，特别是第462—477页；以及H·布雷福德·韦斯特菲尔德的《外交政策和党派政治：从珍珠港到朝鲜》（纽黑文，1955年版），第260—268页。有关1947—1948年对华政策的文献可参阅斯坦利·S·巴奇拉克的《百万人院外援华委员会政治活动，1953—1971》（纽约，1976年版），第二章。在最近公开的一批文件的基础上对美国战后对华政策所作的与本文主题有关的研究，据我所知，尚且不多。在这方面可参阅欧内斯特·R·梅的《杜鲁门政府与中国，1945—1949》（纽约，1975年版）；以及多萝茜·博格和沃尔多·海因利希编辑的重要论文集：《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纽约，1980年版）。

一个松散的组织——“中国帮”，其成员为了迎合各自选区的亲国民党选民，竭力使美国卷进一项更为广泛的援助南京政府的计划中。是年11月，“中国帮”扶机威胁道：如果蒋政权得不到进一步援助，他们就要阻止对欧临时性的援助立法。杜鲁门政府担心，援欧计划在国会搁浅会对已经很危急的欧洲局势造成灾难。因此它不得不放弃较明智的政府抉择，而俯就于“中国帮”的要求。

持上述论点者由此推论：为取得“中国帮”对临时性援欧计划的支持，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在1947年11月勉强地建议国会拨款3亿美元，主要用以帮助中国政府稳定其每况愈下的经济。接着在1948年2月，国务卿为求进一步确保援欧计划获得通过，向国会提出5.7亿美元的对华援助计划。此数目大大超过了他原来的建议，这也是与更为慷慨的“欧洲复兴计划”相关联的。国会最后通过了一项经过修正的援华法，只拨款4亿美元。可是，杜鲁门政府发现自己依然漫无尽期地为一个美国官方深信因其本身无能而注定要垮台的政府纠缠着。对于这样一个政府，美国当权者是极愿与之断绝一切联系的。

最新材料证明，上述论点的论据欠足。政府无疑认为1947年秋的欧洲局势十分危急。当时刚成立的中央情报局警告说，“当前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是西欧经济的可能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克里姆林宫的走卒乘势取得政权”。^①同时，希腊的局势也呈不祥之兆。除非欧洲其他地方的危急局势得到缓和，否则共产党在那里领导的起义就有可能超出本国范围。要想避免不必要的贻误，通过尽力对欧洲提供援助的立法非常重要。杜鲁门政府无疑希望援华提案能够安抚“中国帮”，从而确保国会采取迅速行动。

然而，新公布的文件虽然表明“中国帮”施加的压力在1947—

① 中央情报局的形势调查报告，国务院编号：第一号；1947年9月26日，第2页；卷宗：77/179A，解密文件资料系统（以下引用简称DDRS）。

1948年期间制造过一些立法麻烦，但并无证据说明这些麻烦是杜鲁门政府向国会提交“援华法案”的动机。倒是杜鲁门政府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逐渐系统地估价了东亚大陆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意义，而导致了这项援助法案的产生。

实际上，1947年初期对华政策的关键问题在于：何时给予怎样的援助才能最有效地维持国民党政府，同时又不影响美国政府在其整个对外政策的责任范围内作出任何充分反应的能力。几乎直到马歇尔国务卿任期结束，这个问题一直是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中心所在，尽管政府官员在如何才能恰当地同时照顾到中美两国的利益这一点上意见不尽相同。

有关援华的决定无一不是源于政府内部或各机构内部的有关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对外政策中许多战略和策略问题，而在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公众压力的影响。尽管杜鲁门政府不愿尽全力支援蒋介石政权，它也决没想过要在1947和1948年断绝对蒋的援助。事实上，决策者们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直认为，美国的利益需要其继续给予国民党某种援助，无论是当该政权在大陆上濒于崩溃时，还是其后在台湾。

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便开始遣散军队，并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所以自1945年以来，政府在获得直接用于对外政策目的经费时便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在1946年春以后，决策者们确信克里姆林宫在实行一个经过协调的机会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计划，其对美国利益的挑战是世界性的。美国只有作出有步骤、有系统的反应，才可能有效地遏制住俄国人的势力和影响。是年秋，白宫顾问克拉克·M·克利福德在呈交总统的一份有关苏联扩张威胁的报告中，对美国把世界不同地区作为“割裂开的问题交由各地区专家分别处理”的趋势提出了警告。克利福德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是“全球范围的”才能有效，在进行全面的政策规划时不应有任何地区被排斥在外。为此，他建议：

“政府内部必须进行有效的协调，以确保我们对苏联及其卫

星国以及我们的盟国的军事和民事政策始终一贯并强而有力。任何犹豫和脱节都会立即被苏联人抓住利用，使我们遭受损失”。^①

基于这种推断，杜鲁门政府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各个部分都有其相应的重要性。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付苏联人的全球性扩张，需要有计划地确立对外政策的重点。面对苏联的险恶用心，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应该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遏阻俄国共产主义的扩张。要回答这个问题，当政者们首先必须分清什么是美国的关键利益，什么是非关键的利益以及什么是边缘的利益。国际局势要求美国绝对和相对地明晰：世界各个地区对美国各具怎样的战略意义。

美国官方认为，中国地区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全球战略计划中只占次等重要的地位。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7年春指出：“认为下一场战争必定是意识形态的，同时抱着当前给予援助必须符合我国安全利益的宗旨不放，这就使得中国在应予援助的国家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②苏联的扩张可能使任何地区变得具有关键意义。即使这样，杜鲁门政府也自付无力向中国承担漫无边际的责任，因为中国的局势盘根错节，而国民党政府明显的腐败无能继续引起许多疑虑。

然而重要的是，即使中国被列为次等重要的地区，比中国更

① 总统特别助理克拉克·M·克利福德给总统的报告，1946年9月24日，第81页，75/1398，DDRS。

② 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关于从国家安全观点出发的美国对外援助的报告，1947年4月29日，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1月》（华盛顿，1973年版），第745页（以下简称FRUS，附以相应的年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处地位的安排可参阅罗素·D·布亥特的《重要利益：美国对中国、台湾和朝鲜的政策，1945—1950》，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78年8月），第425—451页；约翰·路易斯·盖迪斯的《战略展望：‘防御圈’理论的兴衰，1947—1951》，收在博格和海因利希的《未定之秋》里，特别是第61—71页。

为重要的地区也从未得到杜鲁门政府的特别优待。决策者们一直认为，国民党的处境及中国发生的事件都会影响到美国政策在其他地区的成败。1946年以后，当权者从未认真考虑过断绝对国民党援助的问题，害怕这样做会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对中国来说，次等重要意味着格外重要。

关于高层决策者的复杂考虑，国务卿马歇尔在1948年初的一次国会执行会议上对政府关于“援华法案”态度的解释显得更具重要意义。他说，援助提案表明了政府“帮助中国的强烈愿望……。对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缺乏信心，并且断然拒绝给予它要求的援助而增加其困难，是违反美国的利益的”。不过，国务卿又强调说，在给予某些必要援助的同时，“美国政府必须格外小心……，不可受累于这样一种政策，使其资源消耗达到无法预测后果的地步”。^①

美国政府对1947年欧洲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局势日益感到不安，对苏联扩张的担心也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相对的战略地位在美国决策者们眼中也开始上升。当权者认为，1947—1948年中国发生的事件影响到美国欧洲政策的成败，这种影响意味深长，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还认为中国发生的

①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注重1944—1949年》（华盛顿，1949年版），第382—383页。国务卿在由众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参院外交委员会组成的联合执行会议上的讲话不是为迎合公众口味而作。就在这之前的一个月，马歇尔在涉及政府对援华的态度时写道：“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援助以阻止不可遏止的经济崩溃。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基础如此动荡不稳，要想实施一项切实可行的有效的长远计划来恢复经济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过，美国政府倒是愿意向处于现阶段危机中的中国政府提供一定的援助。这些援助可能暂时延缓其经济迅速崩溃，给中国政府赢得喘息之机，供其采取重要步骤以图自我恢复。”国务卿备忘录稿，1948年1月29日，分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办公室档案，第16箱；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密苏里州独立城（后引为HSTL）。沃伦·I·科恩的关于马歇尔对1947年和1948年初中国的看法的论著：《艾奇逊及其顾问与中国，1949—1950》，博格和海因利希论文集，《未定之秋》，特别注意第13—15页。还可参阅梅的《杜鲁门政府与中国》，第12—49页。

事件对美国政府争取与苏联达成战略平衡的努力也能发生重要作用。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菲利普·D·斯普劳思1947年夏在华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时，简洁地描述了这项难题。他承认，若不是考虑到“共产主义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这个问题”，美国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就是“彻底从中国撤退，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他又认为，“基于苏联的险恶用心……，美国不能对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努力漠然视之……。”^①

美国当权者虽然看到蒋政权一旦离开美援便会迅速垮台，但也没有企望美援总能挽救得了国民党政府。1947年中央情报局注意到：

“国民党政府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照这样恶化下去，不出一年就会导致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国民党政府完全土崩瓦解。扩大对华有限援助并不能扭转这种趋势，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这种趋势。”^②

通过帮助蒋介石稳定局势和暂时避免其垮台，美国官方指望以有限的美援来尽可能地推延共产主义在中国取胜后所引起的不良国际影响的发生。当权者们从不认为5亿美元的援助提案仅仅是为了中国。这个问题总是与对外政策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考虑的。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强调说，“凡考虑对华援助问题，美国都必须结合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来仔细权衡中国对我国安全和战略利益的价值。”^③因此，政府官员们认为，“援华法案”不仅是“欧洲复兴计划”的重要延伸，也是致力于遏制苏联扩张势力和影响的一项必要措施。

政府的政策反映了它的复杂考虑。从一个方面来说，这表明

① 菲利普·D·斯普劳思致魏德迈备忘录，1947年8月23日，FRUS，1947年7月，第748—749页。

② 中央情报局的形势报告，国务院编号2，1947年11月14日，第6页，卷宗77/179B，DDRS。

③ 斯普劳思致魏德迈备忘录，1947年8月23日，FRUS，1947年7月，第751页。

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的扩张面前表演平衡术。援助的水平必须让苏联明白，美国政府对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存在仍有强烈的兴趣，尽管这同时也体现了美国的继续克制。

美国政府根据它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些判断，认为自己有必要保持一个对维护蒋政权始终怀有兴趣但又不无克制的形象。美国当权者们深信，看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在中国的情形，苏联正为自己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保持低姿态占了便宜而庆幸。苏联人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很多道义上的支持，也毫无疑问地提供了不少军事指导。但与此同时，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苏联提供的物资和后勤援助极少。^①

美国官方普遍认为，苏联人是在作壁上观，想从中国内战中窥测机会。苏联人尽可能地利用形势，这样做非但无损失可言，反而有可能获得所有好处。他们耐心坐等扩张其势力和影响的最好时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很难相信苏联有意立即改变对中华民国这个已确立的主权政府的‘正确’姿态。”^②美国官方认为，尽管美国对蒋政权承担了义务，中国事态的发展仍趋于对苏联有利。因此，在1947年至1948年初，当权者们仍相信，克里姆林宫不会在东亚实行代价昂贵的与美直接对抗的政策，斯大林的明智决定了他是不会为一个现成到手的礼物再付代价的。^③

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一旦中国的局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① 例如，见中国处副处长致远东司司长备忘录，1947年7月3日，出处同上页注③，第214—215页。

② 中央情报局形势报告，国务院编号3，1947年12月17日，第2页，卷宗77/96E，DDRS。

③ 关于政府对苏联的对华内战战略、策略的推断，见中国处副处长致远东司司长备忘录，1947年12月18日，FRUS, 1947年第7卷，第404—410页；驻华大使馆二秘备忘录，1947年7月，出处同上，7：678—682；国务院情报司：《苏联在满洲的经济利益》，1948年1月27日，情报司报告，第4579号，缩微胶卷I/11，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司报告（华盛顿，1977年版）；以及中央情报局有关中国形势的总结，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第1—2页，卷宗75/1G，DDRS。

苏联的姿态也会作相应的变化。中央情报局断言，只要国民党政权的处境继续恶化，苏联人就不会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公开的物质上的支持”。1948年3月，该机构甚至提出这么一种可能性，即认为注入新的美援也许会促使苏联在中国事务中扮演更为“明显”的角色。中央情报局警告说，这样一来，其结果可能是“支持和反支持的循环”，最终增加美苏之间“利益直接冲突”的潜在可能。^①另外，这种事态发展可能促使苏联在亚洲其他问题上增加压力，以抵销美国在华升级的影响。其结果将是危机遍及整个亚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将根据它在亚洲所承担的义务的性质，被迫作出意义深远的，带根本性的抉择。基于有限的美国资源需要用在西欧应急，再要采取上述行动实在有点穷于应付。^②

相反，如果美国政府决定不增加对蒋的援助，弃之于半途，也同样会对美国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政府官员深信，国民党一旦失去美援，就会转而求助苏联来调停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苏联人只有在他们扩展影响和共产党攫取中国政权的条件成熟时才会同意介入。反过来，如果美国政府完全冷落蒋介石，同时内战仍照常进行，那无疑是公开敦请苏联人加强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若没有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共产党就肯定会赢得战争，而苏联人也就无须再作壁上观了。美国撤出中国无疑是默示苏联人：他们可以在那儿为所欲为，而毋须担心美国人会有什么反应。

① 同上页注③。

② 1947年至1948年期间，中央情报局一再警告说，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迫使美国分散资源，以图妨碍欧洲复兴的成功进行。“苏联增加在远东的行动，部分出于克里姆林宫企图诱使美国把部分精力和资源从欧洲转到亚洲来的动机。”中央情报局形势报告，国务院编号3，1947年12月17日，第2页，卷宗77/96E，DDRS。一个月以后中央情报局推论道，“苏联政策的最近期目标是通过不断增加在远东的……革命努力……，摧毁欧洲复兴计划而又不致引起战争。”中央情报局形势报告，国务院编号4，1948年1月12日，第1页，卷宗77/97A，DDRS。

政府中有些人认为，国民党在中国的垮台可能会引起一系列不利后果。中国骤陷将大大影响朝鲜三八线以南非共产党组织的斗志。共产主义在中国取胜将使日本共产党的威信增高，前景有望，从而影响美国在日本的地位。中国的丢失对致力于对付越盟领导的印度支那暴动的法国也非常不利，同时使英国在保持其在新加坡的地位、抵御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方面更感困难。

即使没有共产党人在中国胜利这个因素，美国官方依然怀疑西欧国家保有东南亚的能力，担心任何外来压力都会迫使它们全部撤出这个地区。这样的话，不仅西方文明的已有影响将荡然无存，这块地区也将对共产主义的渗透敞开大门。因此，美国决策者们忧惧，亚洲的整个南部边缘，继之以近东，都将暴露于共产党的威胁之下。几乎没有人怀疑那个有关国际共产主义活力的普遍概念：一个胜利将鼓励共产主义分子加倍努力去争取另一个胜利；如此一来，便是胜利和侵略衔接出现，循环往复。^①

另一些美国官员认为，把东南亚殖民地丢给共产党发起的独立运动，不仅会进一步削弱西欧重建战后家园的信心和意志，也将增加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中央情报局宣称：“东南亚的持续冲突和动荡，影响到美国在欧洲和远东的利益。该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对复兴欧洲和维持日本战略地位都至关重要。……”^②

于是，美国政府认为，完全撤出中国与卷入升级两者的后果大致相同：动荡普及其他地区，欧洲迅速面对与国际共产主义竞

① 关于政府对撤出中国之影响的考虑，见驻华使馆致使馆参赞备忘录，1947年7月5日，FRUS，1947年第7卷，第224页；情报司有关“中国本土和满洲对美国安全的战略重要性”的报告，1947年9月18日，同上，第7卷，第287页；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短期援华的态度报告草案，1948年3月26日，FRUS，1948年第8卷，第45页；以及中央情报局形势报告，国务院编号1，1947年9月26日，第4页，卷宗77/197A，DDRS。

② 中央情报局形势报告，国务院编号2，1947年11月14日，第7页，卷宗77/179B，DDRS。

争的第二条关键战线，美国面临扩充义务的急迫而又艰难的抉择。尽管那样可以祸福参半，政府还是认为必须给予国民党某种程度的支持，以免日益恶化的中国局势使政府穷于应付，而不得不动用本来就有限的用于其他对外政策目标的资源。这样一来，一项不断给予蒋政权有限援助的计划便和1947年初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确立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相符合。该委员会视援蒋计划为政府对外援助的一个主要目标，提请政府考虑“及时采取适量援助，莫等酿成危机后被迫急急忙忙地大出手。”^①

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政府需要顶住公众的反对意见。如果政府停止援蒋，人们就会怀疑它的信誉，可能会说美国在向中国的共产主义投降。政府将被指责为对其战时的盟国，一个反共的坚强代表的命运漠不关心。所有这些责难无疑将招致对杜鲁门政府的基本力量——精神上的力量——的疑虑。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政府为遏制共产党的侵略和挑衅而承担的义务有多大可靠性便成为问题。

杜鲁门政府不想碰到这种类型的问题。假定说，在分析1948年的国内政治时不能忽视那些责难对即将到来的那年大选的影响，然而，1947年夏秋，决策者们看到的欧洲危机局势多属心理方面的，而不是其他。由此产生的问题更多、更重要。欧洲复兴不仅包括重建社会和经济这个客观任务，还包括树立文化上的自信和重振涣散了的民心士气。官方对欧洲复兴计划的定义是重建欧洲城市、工厂，并帮助欧洲重树自尊。心理恢复和物质恢复齐头并进；“欧洲复兴计划”的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几年后，乔

① 该报告以同样的语调评论道：“共产主义运动有点‘赶浪头’的性质……面对美援和美国的勇气等积极措施，便显得脆弱。如果这些行动及早实施，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会相应地减少。”该报告把援华问题归类于“也许是零星援助中的优先项目，并附有心理上的目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报告，1947年4月21日，FRUS，1947年，第3卷，第207—208页，217—218页。

治·F·凯南这样回忆起他1947年任“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时的一些想法：

“在那些捉摸不定和经济困难的日子里，政治如此变化莫测，人们很难算计得到这些变化累积起来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只是受到他们希望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他们估计将会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一般说来，西欧人民并不愿受共产主义的控制。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在感到这种控制势在难免时不会见风使舵，甚至支持这种控制的到来。

“我们制定欧洲复兴计划，原本主要是驱逐这种危险的阴影，而非危险本身。”^①

物质上重建的进展总算是顺利的，而欧洲社会道德和自尊等心理上的恢复则显得较为复杂和微妙，但可以通过美援最终得到解决。欧洲的信心可以通过改造或重建环境得到普遍提高。加速实行美国政府的物资援助计划需要时间，而等待这些计划产生效益则更需时间。同时，美国有多大能力帮助欧洲重树对未来的信心，取决于一些较为无形的因素。换言之，目前美国政府对重建欧洲承担义务的姿态，远比这种义务本身的物质内容来得重要。正如1947年7月“政策规划研究室”在一份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必须看到，欧洲复兴计划在心理和政治这些副产品上的价值远大于它的直接经济影响。”^②

所以，尽管通过“欧洲复兴计划”，制定一项具体的特别计划以使欧洲人感到安全和前景光明十分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国会要考虑到“欧洲复兴计划”不致引起分裂，政府本身也应给自己

① 乔治·F·凯南：《回忆录：1925—1950》（纽约，1969年版），第335、369页。

② 一份报告还说：“很显然，我们不能……（对欧洲人）说……这项计划的价值主要有赖于他们对它的主观态度。因为这样可能使他们惶惑不解，正好事前破坏了我们旨在帮助产生的心理作用。”政策规划研究室有关从美国立场出发对援助欧洲复兴某些问题的报告，1947年7月23日，第三部分，第3—4页，卷宗75/26A，DDRS。

树立一个坚定执行对重建欧洲承担义务的政策形象。减少人们怀疑美国政府对欧洲承担义务的力量，以及它坚定遏制共产主义挑衅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一旦对政府的批评充斥美国政坛，欧洲人便会产生各种错觉。欧洲的非共产主义者会得出结论说，杜鲁门政府如果准备在中国认输，它在欧洲也会倾向于这么做。这些人要是接受了这个推断，就很可能考虑去与共产党人达成政治协议。其后果便是共产主义的威信上升；而且，按政府的一贯逻辑，那将给苏联带来进一步扩张势力的机会。

因此，美国政府是在看到有必要确保“欧洲复兴计划”立法过程中意志的一贯性和塑造一个美国毫不含糊地对重建欧洲承担义务的形象时，才在1947年至1948年初援华的。当然，“援华法案”的产生从部分意义上来讲，是为了安抚亲国民党的公众舆论，以便加快完成援欧的立法过程。

撇开公众舆论不论，更为重要的是援华提案表明：政府渴望表明它对朋友和盟国的义务即使在危急时刻也是可信赖的；或者，至少不会给人这种印象：该政府所承诺的义务临到困难关头便会瓦解。如果政府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不仅可以增强西欧人的信念和意志，减轻共产主义成功地破坏欧洲重建的潜在威胁，而且对有效地建立美苏两强间的国际战略平衡的广泛努力也有助益。1947年春，一个特别的，跨机构的政策计划委员会报告说：

“美国的安全不仅与一个自由国家受到的威胁有关，也与这些威胁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关。看到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在其独立受到威胁时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其他国家在维护自己的自由时将会更加信心坚定。相反，如果美国对支持这样一个自由民族处之漠然，其他国家便会深感失望，而对美国的领导地位

丧失信心。”^①

如果杜鲁门政府真想在1947年或1948年初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国内政治因素并不会构成主要障碍。也许政府不得不发动一场公众运动，以求对这样一项政策的支持。这可能会撩起亲国民党的舆论，继而招致一场公开辩论。但是，如果政府着意强调国民党腐败无能，提请公众注意国民党领导阶层无视要求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呼声，有说服力地向美国公众证明蒋政权不值得美国政府为之费时费力，这是不困难的。

尽管美国国内有些党派势力热衷于支持国民党，但美国的公众舆论并非坚定地向着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批评自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便大量存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援蒋派和反蒋派在1947年围绕着应否援助蒋介石政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②尽管批评的性质不尽相同，诋毁蒋介石的人认为政府最终可采取的唯一适当措施就是美国撤出中国，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让中国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③

①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947年4月21日，FRUS，1947年第3卷，第209页。

② 尽管1948年4月28日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被问人中有55%赞成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更多的军事装备、物资和钱”，但指出有32%的人不赞成，另有13%不表态这一点也很重要。见《公众舆论季刊》（1948年秋季版），第548页。

③ 关于1947年和1948年的反对国民党观点，可参阅美国众院、参院的对外关系和军备委员会：“关于远东军事形势的联合听证会”，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3部分，第2202—2203页。1947年对白宫邮件（信、电报）的一次检查发现了大量的对蒋介石的各种批评及赞誉。1948年反蒋的呼声似乎有所减弱。官方档案，第633箱，杜鲁门文件，HSTL。作为对这一时期美国反对国民党的舆论实力的间接估计，安东尼·库贝克的《远东是怎样丢失的：美国政策和共产党中国的诞生，1941—1949》（芝加哥，1963年版）一书第16章对公众舆论作了评论。如果政府真心希望断绝与蒋政权的一切关系，它就会培养持续的孤立情绪，号召公众普遍支持政府战后紧缩费用开支。然而，正如在1945年和1946年的所作所为一样，政府决策者们在1947年全力贯注的仍旧是怎样为对付孤立主义和公众的吝啬秉性并为其对外政策的义务和支出而进行辩解。参阅沃尔特·米利斯和E·S·杜菲尔德编辑的《福莱斯特日记汇编》，第214—215页，287—288页。官方在这方面的考虑还可参阅陆军部长致国务卿备忘录，1947年2月26日，FRUS，1947年第7卷，第803页。驻华使馆致参赞备忘录，1947年7月5日，同上，第7卷，第223页。

然而，美国政府没有选择疏导对国民党政府积怨的做法。官员们不愿纠缠于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因为这可能损害他们树立对重建欧洲承担义务的正确形象的努力。

避免公开辩论也有其他原因。尽管决策者们在1947年和1948年初全力对付的是苏联在欧洲的威胁，他们并不认为“杜鲁门主义”和当时正趋形成的遏制政策的战略、战术概念只应单单用于欧亚大陆的西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7年夏谈到总统的“广泛”政策时说，“从军事角度上看……，这项政策若想取得成效，就应始终运用于受到苏联扩张威胁的世界所有地区。”^① 照马歇尔国务卿的说法，“恢复欧亚间均势”无疑是重要的；使用充足的资源来维护西太平洋上与美国安全利益攸关的地区也无疑是必要的。^②

有限地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与美国的这一义务是一致的。尽管由于缺乏资源，或由于即使合理使用资源也没有多大的机会

① 在同一份报告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美国对处于欧亚大陆苏联控制范围边缘的国家实行援助必须有一项全面计划。”见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备忘录，1947年6月9日，FRUS，1947年第7卷，第842页，844—845页。对政府关于遏制政策的全球性的考虑，可参阅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所持态度的报告，1948年8月30日，卷宗75/278D，DDRS。关于冷战的全球意识已开始出现在美国对1946年的中国的估计中，可参阅史蒂芬·列万对马歇尔使命的新评价：《美国调停中国内战新探：马歇尔使命和满洲》，见《外交史》（1979年秋季版），第349—375页。还可参阅海因利希有关东亚在杜鲁门政府遏制考虑中的地位的探讨：《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之展望》，见博格和海因利希辑论：《未定之秋》，第3—12页。

② 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在转述马歇尔1947年11月的声明时说：“……我们的政策目标基于此，其旨在恢复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所有的行动都不应违背这个目标。”米尔斯编：《福莱斯特日记》第341页。对照一下马歇尔对凯南的讲话：“总之，我们的政策必须推动恢复欧亚力量的平衡。”“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致国务卿备忘录：《世界形势忆述》，1947年11月6日，卷宗75/43C，DDRS。中央情报局1948年评论道：“……日本被打败使苏联在远东国家中处于无敌的强国地位。恢复远东大国关系平衡的任务就落在了美国的肩上。”中央情报局对1947年11月至1948年8月的中国形势的总结，第6部分。

最终挽回局势，美国无法保证其对华政策获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大陆的不重要。政府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认为有必要在中国一冒风险，虽然中国在其整个对外政策计划中所处地位并不高。不过，美国决不可能无穷尽地卷入中国内战。有人认为美国也许最终被迫作出强硬姿态，顶住共产主义在亚洲进一步扩张。鉴于1947年和1948年中国的情况一片混乱，即使有此想法，美国也不会那样做的。面对这种现实，1947年11月“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只能承认，“……就目前形势说来，我们并不能做什么事，只能坐观事态变化，想法不让军事形势过快地有利于共军。”^①

决策者们根本不愿公开讨论美国对世界的既定看法。政府不愿披露它对中国和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的看法的细节，因为它考虑到政府中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太多了。尽管美国政府对蒋政权持否定态度，深信国民党的事业从长远来说显然已经无望，但它还是不愿出现被迫解释继续援华原因的局面。政府也想避免不必要地张扬国民党所创造的无能和不善管理的记录，因为那会在中国政府已经十分沉重的苦难包袱上再增份量。再则，政府也不想把自己有关建立两强间战略平衡的复杂盘算出示给苏联。

杜鲁门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政策是高级阶层复杂考虑的结果。这种考虑反映的推断和论点，既不代表希望美国扩大援华的蒋介石的支持者，也不代表希望美国完全撤出中国的人所持的诋毁蒋介石的意见。政府不愿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作出“或重钧或撤饵”的抉择。决策者们倾向于对蒋介石政府实行一种既不过分承担义务也不过少承担义务的中间政策。1947年秋美国驻南京大使馆认为，全面援助或全面停止援助都可能引起太多的不测

① “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致国务卿的备忘录：《世界形势忆述》，1947年11月6日，卷宗75/43C，DDRS。

后果。只有“理智和协调的有条件的援助”才最有希望“持久地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及其必然结果——苏联政治扩张主义。”^①

译自美国《外交史》1981年春季号

王一泉译 何志功校

^① 驻华大使馆致参赞备忘录，1947年7月5日。

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

沃伦·J·科恩

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费正清在1968年果敢地提出了在70年代研究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任务。尽管美国历史学会的大多数人可能都相信这一研究领域开始于费正清的这次演说，但实际上，早在1922年T.丹涅特就出版了《美国人在东亚》，1938年，A·格林斯乌德写了《美国的远东政策》。颇象是抵制当时时代和修正派的不良影响，D·博格的《美国和1933—1938年远东危机》获得了1964年度的“班克罗夫特奖”。W·海因里希的《约瑟夫·格鲁传》问世于1965年。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和《跨越太平洋》先后在1965和1967年出版。总而言之，历史学家在这些课题上所进行的著述由来已久。而且，在费正清把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告诉史学界其他人士之前，他就和博格、E·梅以及其他人在哈佛开始了一

* 沃伦·J·科恩(Warren J. Cohen)，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n Response to China)。此文系根据科恩1984年12月28日在就任“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简称SHAHR)主席时的演讲《美国东亚关系史：历史学界的边缘》编译。

项新的研究计划。^①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了解美国和东亚历史，能够运用太平洋两岸语言所写资料的双重能力的学者。费正清、博格和梅希望训练出象样的男女学者，他们能够运用多方面的档案进行研究，写出足以与B·珀金斯在英美关系，D·普莱彻和梅在需要运用各种西方语言进行研究的领域中所作出的研究成果相媲美的论著。他们将改变种族中心论，能够从美国人和亚洲人两个方面来观察问题。现在看来，“哈佛派”对训练出能熟练阅读亚洲文字的学者的可能性过于乐观了，不过在七八十年代还是涌现出几个这样的学者，并带动了这一学科。

1967年美国历史学会(AHA)指定了由梅为主席的美亚关系委员会(AEAR)。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使得美亚关系委员会得以维持一个切实可行的奖学金，研究和讨论计划。当这笔资助用完后，来自私人和其他机构的一系列特别赞助使这一计划得以继续。一些年前，在美国史学会理事会不负责任的干与之后，美亚关系委员会从美国历史学会退出，与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SHAHR)合并。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和美亚关系委员会的发展证明这一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1969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笔者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作了一次总结。博格和梅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组织了一次史学讨论会，较详细地总结了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研究。在

① T·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 Asia)，纽约，1922年版；A·格林斯乌德：《美国的远东政策》(The Far East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38年版；D·博格：《美国和1933—1938年远东危机》(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坎布里奇，1964年版；W·海因里希：《美国大使：J·C·格鲁与美国外交传统的发展》(American Ambassador: Joseph C. Gre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Tradition) 波士顿，1966年版；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寻求远东的新秩序1921—1931》(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坎布里奇，1965年版，和《跨越太平洋》(Across the Pacific)，纽约，1967年版。

此基础上，梅和汤姆森编辑出了《美国与东亚关系》一书。在该书和笔者论文中所提出的许多课题，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都实现了，并且有几项赢得了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颁发的“伯纳茨奖”。^①

由博格、费正清、入江昭、梅、J·克劳利主持的一系列讨论会，是要把美国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和研究中国或日本政策的学者召集在一起，讨论美国东亚关系中的特殊问题。所有这些方法——培养通晓美国和东亚事务的双重能力学者的理想，举行双边或多边的学术讨论会，召集美国问题和亚洲问题专家——产生出一大批新的和令人振奋的著作。1983年出版的《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新边疆》一书对这些著作的大部分都有评论。^②

目前研究20世纪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优秀著作非常丰富。但有关19世纪的就略嫌少了。但也还有些很出色的著作。M·亨特的《特殊关系的形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③亨特的第一本书，获“伯纳茨奖”的《保卫边疆和门户开放》，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研究角度。他分析了19世纪中国政治家力图从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挽救他们帝国的心理和策略。亨特摒弃了以前两代人主要利用美国档案材料进行研究的过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地利用了中国的原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他解释了中国官僚机构之间的对话，提出了它们之间相互竞争的证据。这种工作原来只能出现在对美国决策过程最出色的分析中。在其非常好的附录中，亨特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会夸大象W·司戴德这样的不甚重要的人物（他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手稿）的作用。另外，亨特还发表了几篇关于这一时期的论文，其中之一是他三次获得“伯纳

① 科恩：《中美关系的研究：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我们需要取得的成就》，载M·古斯塔夫森编：《国家档案与对外关系研究》，俄亥俄，1974年版；E·梅和J·汤姆森编：《美国与东亚关系概览》，坎布里奇，1972年版。

② 科恩编：《美国与东亚关系中的新边疆》，纽约，1983年版。

③ M·亨特：《特殊关系的形成：到1914年为止的美国与中国》，纽约，1983年版。

茨奖”中的一次。^①

最近还出现其他一些著作，为我们研究19世纪提供了新角度。E·古利克为传教士医生和外交家P·伯驾写了一本细致入微的传记。他的研究成果之一，是论述了伯驾如何利用自己的医术，特别是通过给中国官员及其亲属看病，从而赢得这些官员的好感，进而使他能够帮助顾盛使命取得圆满成功。古利克的书是对费正清的观点：中美关系中传教士起了中心作用的最好说明。^②

有关传教士的研究，明显是开始于费正清编的一本讨论会论文集：《美国与中国的传教事业》。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的观点仍在流行，但也有人提出了挑战。同时，有关传教士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对美国有什么意义的研究也多起来了：他们谈论美国什么？回国后的传教士如何影响了美国文化等。E·卡尔森，S·加勒特，J·卢茨，V·拉比和P·韦斯特都正在继承着费正清的事业。^③

有些研究还涉及妇女在传教中的作用。在过去五六年里，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已涌现出一批质量不错的著作。J·亨特最近出版的《淑女们的信念：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美国妇女传教士》，既是对妇女史，也是对中美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大贡献。^④

① M·亨特：《保卫边疆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纽黑文，1973年版；《在中国市场中的美国人：经济机会和经济民族主义，1890年代—1931年》，载《企业史评论》第51卷（1977），第277—307页。

② E·古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坎布里奇，1973年版。

③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的传教事业》，坎布里奇，1974年版；E·卡尔森：《福州的传教士》，坎布里奇，1974年版；S·加勒特：《城市中国的社会改革者，1895—1926年中国的基督教男青年会》，坎布里奇，1970年版；J·卢茨：《中国和基督教会学院，1850—1950》，伊萨卡，纽约，1971年版；V·拉比：《美国中国传教使团的国内基地，1880—1920》，坎布里奇，1978年版；P·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坎布里奇，1978年版。

④ J·亨特：《淑女们的信念：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美国妇女传教士》，纽黑文，1984年版。

现在再回过头来评论M·亨特的《特殊关系的形成》。此书为我们理解中国思想和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角度和新观点。作者把他对中国方面的分析与对美国方面的分析融汇在一个精细的模式中，从而建立起他人未曾考虑过的联系。关于“中国发现美国”那一章写得很成功，特别他对广东移民的分析，利用了人类学、人口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亨特证明了他有能力做成任何社会史学者梦想做的事情，并把他的发现综合到一个有意义和生动的故事中去。他比较了中国人对美国传教士破坏性地侵入他们生活的反应，和美国人对中国移民造成的想象中的对美国文化威胁的反应，他还谈到许多双方社会及其构成对“另一方”文化的重要贡献。一句话，这是一本富有想象力，构思大胆，剪裁得当的书。它不仅是今后所有中美关系著述的开端，而且也是一项足以与80年代任何史学著作相媲美的研究。

尽管很少有能与亨特著作相媲美的著作，但研究20世纪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出色著作还是很多的。其中涉及中美关系的有两部：《亚洲冷战的起源》和《未定之秋》。

1977年出版的、由入江昭等编辑的《亚洲冷战的起源》一书所收集的论文，涉及对英国、中国、日本、朝鲜、南亚、苏联以及美国的分析研究。其中立美国部分分析了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演变，他不同意“失去机会”的观点：毛泽东转向斯大林是因为美国拒绝了他友好的表示。^①

1978年，博格组织了一次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新闻记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专门考察40年代后期关键几年的中美关系。由三部分人组成的这次讨论会论文集尤其值得注意。J·加底斯分析了国防部、军方和国务院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和由此产生的“防御带”概念的起伏变化。N·塔克主要根据中国人口述

^① 入江昭和长居与之辅合编：《亚洲冷战的起源》，纽约，1977年版。

史写成的论文，揭露出国民党的派别活动破坏了蒋介石从美国寻求额外支持的难以置信的内幕故事。但最不寻常的是海因里希所做的工作，他把论文编辑起来，明确讨论的意义，既提供了一篇导论性的概览，又对讨论会的结果作了分析。^①

获得“伯纳茨奖”的有关著作还有K·休梅克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它对美国人在1927—1945年间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研究非常及时，恰好在基辛格历史性突破访问前夕。休梅克对斯诺、史沫特莱和F·厄特利的分析恰到好处。他对毛泽东的魅力和毛在战时驻华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的说明，则匡正了麦卡锡分子的攻击和以前的学术研究。^②另一部获奖著作是M·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它生动地叙述了罗斯福为利用中国遏制日本并保持战后东亚稳定所作的种种努力，其中包括一个非常出色的内幕故事：一个美军使团如何干预中国内政，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的盖世太保组织（军统）合作，进行反共活动。^③

这里还要提一下近10年前出版的《杜鲁门政府与中国》。当美国从越南战争脱身时，梅问道，美国何以能成功地置身于中国内战之外？他发现，美国军方对中国革命和对越南革命的分析以及对小规模干涉成功的确信惊人地相似。他认为，在这方面美国人对40年代的中国和对60年代的越南认识的乐观程度是一样的。在8页精采的分析中，他解释了两者的不同之处，以及美国军队未卷入中国内战的原因所在。通过对越南灾难发生原因的考察，梅洞悉了1947和1948年已经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情。梅可能不会选择此书作为他的代表作，但此书所运用的分析技术却是每个历史

① D·博格和W·海因里希合编：《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纽约，1980年版。

② K·休梅克：《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年，困难的接触》，伊萨卡，纽约，1971年版。

③ M·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纽约，1978年版。

学家都可以从中获益的。^①

N·塔克是位青年学者，但她并未提供研究捷径，或新的方法。她的全部工作，是按照博格的传统，比别人作更多的研究。她把辛勤的劳动与第一流分析工具：对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知识以及讲叙故事的能力结合起来，因而写出了有关杜鲁门政府与中国这一课题中最好的权威性的著作。^②

入江昭在去年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演说中曾谈到他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最终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他的著作曾影响了笔者和一批青年学者的著作。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国—东亚关系研究专家。这在他的第一本书《帝国主义之后》中就表现出来了。他能利用英国、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原始材料，熟练地综合分析20年代列强干涉中国大革命的种种动机，那时列强抵制苏联支持的中国人的各种努力，要中国人按照它们所选择的规则行事。在《跨越太平洋》一书中，他一览无遗地概括了中国、日本、美国各自的和相互之间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入江昭不只是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者的榜样，而且也是任何外交史学者（不论他们有兴趣的领域何在）的榜样。

译自美国《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1985年春季号

任东来编译

① E·梅：《杜鲁门政府与中国，1945—1949》，费城，1975年版。

② N·塔克，《尘埃中的模式：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和承认中国之争论》，纽约，1983年版。

柯乐布、戴维斯与1949—1950年 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新近公开的文件及评论

迈克尔·沙勒

在1981年春季号《外交史》杂志上，刊登了罗伯特·F·纽曼教授和美国前驻北平总领事奥·埃德蒙·柯乐布两人的争论，沃伦·科恩为此写了引言。他们讨论了1949—195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不可避免”这一问题。这次讨论的背景是，新近出版了由多萝西·博格和伍德鲁·海因里希主编的一本学术会议论文集《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这本由约翰·加底斯，南西·塔克，迈克尔·亨特和其他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为广大读者展现了学者们通过研究新公开的外交与军事档案所得出的结论。在《未定之秋》中，斯蒂芬·戈尔茨坦认为，中共颇为僵化的意识形态及其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使得即使是一种更加灵活的美国政策，也不大可能在朝鲜战争前赢得中美之间较好的关系。与此相反，亨特则认为，并不是死板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而恰恰是美国的固执己见与反共偏见，才使华盛顿拒不理睬中共的几次“试探信号”，因而美国应对促成中美之间的交恶负更大的责任。

作为在1949—1950年间与中共打交道的外交官和学者，柯乐

布能够从这两个角度来评价这一争论。他强烈倾向于亨特这一边。他指出，1949年共产党事实上曾几次放出真正的“试探信号”，但杜鲁门政府的最高层对此置之不理。柯乐布与亨特及其论文评论员斯蒂芬·列文的观点一样，反对“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提法，认为如果当时一方或双方采取更灵活的政策，或许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的部分改善。

我基本上同意柯乐布的观点和亨特在《未定之秋》中所得出的结论，但且让我就此提出一点质疑。

在柯乐布的文章中有一个没有明确指出来的观点，即杜鲁门政府中(或迪安·艾奇逊的国务院里)有一个由“温和的”和博学的职业外交官构成的核心小组。他们认识到了中共集团与苏联之间新出现的紧张关系。这个小组包括柯乐布，艾奇逊，菲利普·斯普劳斯，菲利普·杰塞普，乔治·凯南，约翰·P·戴维斯和W·W·巴特沃思。这些人长期以来就反对美国为国民党或台湾直接干涉中国事务，期待着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最近出版的研究专著《尘埃中的模式：1949—1959年的中美关系和承认中国之争》中，南西·塔克雄辩地说明了上述人员的立场。然而，塔克和科恩这两位历史学家和柯乐布一样，都没有能充分说明，到1950年春为止，“温和派”中的大多数人几乎丧失了同中共改善关系的任何信心。到柯乐布从中国返回美国时，他至少是主张暂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强硬路线”的。比起力主强硬对抗策略的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来，柯乐布在这一点上只是稍微克制一点而已。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早在1932年，柯乐布就作为那些思想深邃观察敏锐的美国中国革命问题观察家中的一员，而崭露头角。实际上，因为他那年在中国写了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后来成了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柯乐布在中国度过了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则是在苏联和其他岗位上。日本投降后，他回到了驻沈阳领事馆，1947年底出任美国驻北平

总领事。1948年至1949年间，他实际上成为向华盛顿同僚们提供和分析有关中国情报的关键渠道。柯乐布将自己的外交生涯写成了一本生动的回忆录《我的见闻》，于1975年出版。

甚至在1949年中美关系恶化时，柯乐布仍在努力向满腹狐疑的杜鲁门政府解释中共的行为。他强烈主张保持日本和西方同中国新政府的贸易往来，深信这种联系会软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削弱中共对苏联的依赖。他还力劝艾奇逊抓住周恩来放出来的在1949年夏进行谈判的“试探信号”。柯乐布反对支持大陆或台湾的国民党，请求他的同僚们耐心等待革命“极端”时期的结束。对于柯乐布和他的这一立场来说，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破坏了他的耐性。1950年1月6日，北京的共产党政权要求美国归还驻华领事馆的一部分，并声称这是美国在义和团运动中非法攫取的。不仅如此，中国还暗示对一个不承认其新政权的国家，中国无意尊重外交礼仪。

最近的研究(科恩：《艾奇逊和他的顾问》，载《未定之秋》；塔克：《尘埃中的模式》；罗伯特·M·伯鲁姆：《划线》；威廉姆·斯丢克：《走向对抗之路》)表明，中国人的行动很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有些是矛盾的。上述插曲发生在毛泽东与斯大林旷日已久的关于中苏友好条约内容的谈判期间。中国人的矛盾行动，也许是那些命令夺取美国领事馆地产的人想表明其“反美立场”，以作为促使斯大林赶快签约的手段；但另一可能性是，这一行动可以看作“极端派”所为，以便给毛泽东周恩来制造麻烦。甚至这还可以理解为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要其承认新政府。事实上，在英国承认新中国之后，中国对英国财产的类似要求放弃了，尽管英国的承认并不是中国威胁的结果。

无论中国的动机如何，艾奇逊的反应是强烈的。他下令撤回包括柯乐布总领事在内的所有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不论这是否是艾奇逊为了在与北京的关系有个眉目之前想避免不祥的偶然事件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美国人的撤离较以前更加深了两国间的相

互孤立和猜疑。一个可能说明中国对美国的行动表示惊讶和不快的信号是，北京在美国外交人员撤离过程中设置了一些障碍。1950年1月至4月间，警察和海关阻碍美国外交人员与华盛顿的联系，实行各种规章制度，没收他们的财产，常常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困境。最后，4月中旬柯乐布和他的夫人关闭了领事馆的大门，由天津返回美国。在他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他这时沮丧和预示凶兆的心情。

下面的那封信函和他同期的电文表明，柯乐布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崩溃从未感到过遗憾。可是，到他应召回国时，他对与中国新统治者缓和关系的希望几乎完全破灭了。在与乔治·凯南的私人通信中（显然是写于他与中国新政权发生对抗的阴影中），柯乐布把中共描写成苏联残酷无情和忠实的奴仆，并断言新统治集团已“不顾一切地将中国绑上了苏联的战车”。他抱怨共产党人的“思维与他人不同”，在征服世界的努力中也准备摧毁世界。在柯乐布看来，中共领导人在有些方面“同希特勒德国一样邪恶，但即使按马基雅弗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也比希特勒更笨拙”。他声称现在该是准备与中国进行一场“突发战争”的时候了。他还建议组织日本游击队来引发一场对中国的反共攻击，这可能与东欧的反苏起义遥相呼应。

柯乐布充满激情的建议传阅于国务院政策设计署。约翰·P·戴维斯也看到了。作为战时史迪威将军的顾问和亚洲事务上凯南最有影响力的顾问，戴维斯曾是国务院中对华持温和态度的主要发言人。尽管他偶尔也提议对中共的一些特殊攻势采取军事反击，但通常总是主张美国的政策应避免支持国民党或台湾及其反革命计划。他强调美国的安全应建立在重建日本和一个稳定的非共产主义的东南亚上。但是，柯乐布给凯南的信使戴维斯感到，他这位温和派伙伴对中国已经失望了。

* 意大利政治家，主张权谋术数的人。——译者

在看到柯乐布的信件6星期后，戴维斯起草了一份长达16页的有关东亚与东南亚问题的秘密备忘录，其观点同柯乐布的大致相同。戴维斯的报告表达了他个人“向敌人开战”的决心。他对这一地区动乱的分析集中于传统农业社会中政治变革和现代化这一复杂问题。他认为，把西方的政治准则移植到仅够维持生计的亚洲文化中去尤为困难。日本自然是个例外。和柯乐布一样，戴维斯认为尽管中国革命有其自身的根源，但现已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虽然东南亚民族主义反叛分子可能会起来斗争，摧毁西方的殖民主义，但他预言，除非有一种对抗势力干预，否则他们最终会为苏联的统治铺平道路。

戴维斯认为亚洲的农民是“水”，游击队是水中的“游鱼”，因而已到了开辟一条新战线，“为争取农民的思想、感情和忠诚而斗争”的时候了。美国应同英帝国或亚洲的一些非共产党国家站在一起，以便在“创造一种实力地位或在挫败共产主义活动中取得辉煌胜利”。他还特别建议，“在中国和北朝鲜发动一场反对革命的运动”，其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主义制度；暂时目的则是使它们与苏联分裂。他同时催促立即采取行动使“华南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分裂出来”，若不能如愿，下一步“合乎逻辑的”目标则是支持“自下而上出现的革命，反对整个共产主义组织的统一力量”。

戴维斯看到，迅速支援那些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团体，确保东南亚农民的忠诚非常必要。美国的援助能促进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一线政府更加稳定，帮助发展有效的政府职能，防止和镇压颠覆活动”。援助不应限于大规模发展规划和军事装备，还必须包括训练和装备警察，以及监督那些“深入到乡村集镇的政治组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与老百姓之间，而不是老百姓与煽动分子和游击队之间的鱼水关系”。戴维斯在具有保守性的估计（也是对未来的一个预示）中，得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结论，他承认“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的干涉——不断增强的干涉”。

和他所赞赏的柯乐布一样，戴维斯也基本放弃了过去的“待尘埃落定”——一种可能软化北京，促使中苏分裂或阻止共产主义发展的消极政策。他认为，日本和东南亚是中国周围遏制线上的重要据点。北京政府是需用公开的和隐蔽的方法加以攻击的敌人。同时，美国必须大量增加对东南亚的援助，并加强在那里的实力。1950年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果然与戴维斯建议中的预言相吻合：干涉的不断增强。

下面由柯乐布和戴维斯撰写的文件，是通过“自由使用资料”的申请，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署的档案中找到的。

文件1：柯乐布致凯南

绝密本人亲启

1950年4月25日

华盛顿、国务院

〔文件可在政策设计署的东南亚处和中国处传阅〕。

亲爱的乔治：

很久没有通信了，现在我想接着上次的话头，再说几句。我将把我的评论主要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亚洲，不过也要以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为背景。中国的事情没有必要再说了，因为迄今为止中国事态的大致趋势都已报告过了，要考虑的只是对策。这看来是个燃眉之急的问题。

自从1949年〔原件如此，应为1950年——原注〕1月主要通信渠道中断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对此我当然不能够一一解释清楚。有些事态在我看来是很明确的，可还有些事情却超出了我目前的知识范围。所以，我最好讲明我借以推理的基本前提，以便你能了解并据此作出你的判断。这些前提是：（1）假定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由于苏联制造出原子弹（另外，他们此时也许比我们更接近制造出氢弹），致使战争不可避免。（2）考虑到以下因素，苏联的进攻可能在最近而非以后：（A）他们认为有必要在我们西欧的防务相对薄弱时发动进攻；（B）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力与苏联的

国力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拉长；（C）中国共产党已把自己的行动纳入了莫斯科的轨道，不顾一切地把中国绑在了苏联的战车上。

在谈到“假定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时”，我并不想闪烁其词。苏联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他们能扩张到什么程度就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在他们自己的哲学中表达的十分清楚，可谓昭然若揭。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政治狂热和巴枯宁主义的混合物，与常人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他们的决心和行动是不能仅仅用我们的逻辑方式来准确推测的。无论是作为帝国主义者，还是作为政客，只要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他们就起来战斗，并不理会这是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或给自己的人民招来自杀性后果。当我给自己的评论加以限时，我只想进一步指出，只有用对抗力量来遏制和击退苏联的扩张，才能够推迟战争，这样，上面设想的第二种情况下的早期进攻才不会出现。这看来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它涉及到我们需要放弃我国目前的防御姿态（这无法赢得战争），而采取一种进攻姿态来对抗苏联的力量，扰乱敌人，使其惊慌失措，削弱其为了“大举扩张”而正在建立的地位，从而破坏其战争准备。我们必须开始使苏联势力受挫，否则，战争将在对我们明显不利，而可能对苏联最有利的较早时刻到来。同时，在亚洲，苏联的某些走卒将追随苏联的扩张，尽可能地捞取一些好处。

在是否承认中国新政权问题上，如果西方民主国家采取统一调的话，是否会对中国的形势产生一些影响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然而，至少从英国的经验来看，很明显，承认中共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即便对那些英国人认为最可能受惠的商人而言，也是如此。中国人的政治狂热，在某些方面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人一样反常，甚至按马基雅弗利的标准来衡量，也比德国人更笨拙。他们天生的排外心理却与对苏联的迷恋结合在一起（矛盾之极），简直不可思议。假如我们仍在那里，中国人民倒会希望我们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但不论我们成败与否，官方的宣传家都会在每一个转折的时候咒骂我们。但在目前情况下，他

们只能咒骂苏联人。因为他们从未对英国寄托多大希望，英国显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提供无偿援助。正如艾奇逊所主张的，让中国人向苏联人泄愤去吧（中共也会随之被当成发泄积怨的对象），他们双方都要求保持现状。我认定，除非中国人开始厌倦与苏联结盟，否则我们就无法再度真正影响中国的局势。民众的不满已经开始形成，我们的方针是使之发展得更快。同时，在今后10年里的任何战争中，中国假如站在我们一方，那将会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而它站在敌方，由于缺少海空力量，又处于赤贫状态，因而也无法有效地反对我们。

总而言之，让中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同造成的混乱中自作自受去吧。只有到中国新的抗议运动在华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地点）形成并有真正的力量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才是“为中国做点什么”的时候。在东南亚，我们知道，我们还未开始提出和实施经济复兴与教育和政治宣传计划，以便促使那些最近成为国家的初生政治组织，变成美国防务圈中强有力的一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帮助他们加入到世界大家庭中去。但在亚洲这块土地上，我们千万不要再犯全力支持蒋介石那样的错误。那无异于武装我们的敌人。让我们更明确、更坚定地支持那些同我们一条心的集团。这样我们才更有把握确保他们为我们的事业出力。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主要努力放在在“突发战争”中能发挥最大效力的地方，即那些具有潜在力量、纪律严明、组织统一的集团上。甚至象德意志这样的国家，也应该是在欧洲对抗苏联最有潜力的一支力量。同样，在亚洲，具有最大潜力的不是朝鲜、印度支那、印度或中国，而是日本。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感召力量就是统一的民族主义意识。苏联人将摧毁除自己以外的所有民族主义。德国人和日本人都渴望重建自己的国家，即使战争可能会把它们卷入某一方。他们对苏联可谓同仇敌忾，但如果我们不参加这场政治争夺，他们就有可能站在苏联一边，反过头来打我们。如果他们站在我们一边，不仅我们能够获胜，就

连他们也可能在胜利中重振民族精神和政治意识。诚然，这种复兴有其政治上的困难，但有失才会有得。不言而喻，我们在战争中的失败，即军事上的失败，从美国讲求实际的观点看来，将会是万恶之首。

必须骚扰苏联〔可能是通过鼓励东欧或苏联内部的反共起义——沙勒注〕……。①如果共产主义统治在中国遭到一场新起义的打击，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外的威信就将受到损害，而这对我们则是最大的馈赠。

这种起义的基本成员当然不能是一伙顽固的复辟派。中国人民需要一种“新政”，合乎逻辑的情况看来是，如果存在这种“新政”的话，它将会导源于新领导人，而不是曾长期统治过他们的反动的和缺乏魅力的集团。现在还看不到这样的新领导人。白崇禧、李宗仁、张学良（如果还活着的话）这样的人也不能保证成为新领导人。新领导人可能会从中国人民的苦难中成长起来，也可能从中共内部那些反对与苏联密切结盟的人中产生。不论怎样，我们现在应利用经济措施，促进这种发展。考虑到中共公开宣布与我们为敌，并经过深思后认为他们已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如果还建议我们再次向中国运送小麦，把中共从它自食其果的困境中解救出来，那是毫无道理的。这些小麦如果运去，只会落到官僚和军人手中，不会给忍饥挨饿的农民。我们不能用慈善办法收买中共。这是战争的一个方面，只能如此。至少要使中国不再享受其自行拒绝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好处，并实施敌视中国的经济管制。这种管制已运用于与苏联势力范围进行的贸易活动。根据共产党迄今为止的行动，我们理应冻结中国在美国、日本和其他我们管辖地区的国有财产，直到我国在中国被没收的财产得到体面地偿还为止。请记住我们在青岛、北平的财产，以及“经

① 此处省略可能是在文件解密时做了删节，故编者沙勒作了一个推测性说明。——译者

济合作署”^①在中国各地的设施。在我们归还其他地区的中国国有财产之前，我们一定要严格计算。中共在外交上咄咄逼人，而我们有更为雄厚的实力，理应以牙还牙。手段虽然残酷，但最终的问题是，谁能赢得正在到来的战争？中国现在是属于潜在的敌人，只有通过强硬路线才有可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行为方式，从而与莫斯科疏远。寄生的和臃肿不堪的机构是中国政体的一大包袱，加上由于通讯、交通落后和过去的法律规章体制所存无几所造成的地方主义，自然要导致中国的没落。我们切不可养虎为患，加强共产党中国的实力。对这个深怀敌意的国家，我们最好还是进一步削弱它。

〔美国必须寻求一切可能的办法，在越南人，蒙古人，西藏人以及中国西部的穆斯林和其它少数民族集团中，煽动反对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他们走向军事反抗。——沙勒注〕

在寻求目前可行的办法中，看来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充分利用间接手段，特别是日本所能提供的那些办法。在中国东北时，我为日本所收集到的包括西伯利亚在内的亚洲各方面的大量情报感到吃惊，他们是通过调查研究和间谍活动获得这些情报的。日本人的自豪感在于，他们不仅是一个好战士和一个出色的盟友，而且在其视野所及之内，均业精于勤，卓有成效。只要让他们感到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去干。很明显，他们不会替我们白干。获利动机在政治决策中如同在经济学中一样，是一个法则。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能干，并可帮助我们来判断苏联在中国的行为限度。同样有意义的是，日本在中国的统治经历告诉我们，按照不同的方式能干些什么。国共两党在1924—1927年间的历史和日本在1931—1945年间（从入侵中国东北算起）在中国统治的经历，都对研究目前事态的发展有所助益。

^① “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A)是战后美国政府负责“外援”的机构，其前身是战时“租借管理署”。——译者

〔美国的宣传工作，不应致力于唤起中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中间的民主意识，而是应致力于唤起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沙勒注〕中国人对他们的政治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资源最为关切，总之，他们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排外主义的程度。这一事实应当用来指导我们的宣传路线。宣传“中国是中国人的”比任何抽象的政治说教对中国人更有意义。因为在中国，甚至是食物短缺，也常常是老天爷和统治者一同被责难。与其简单地告诉中国人，说他们正在一场国际交易中受人欺骗，还不如说中国正在沦为苏联的经济殖民地更为有效。因为中国人会认为欺骗只是日常的一次上当而已，但如果他们感到“帝国主义”就在他们身边活动，则会怒不可遏。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民族主义情绪很强，但同时又有必要的灵活性，渴望得到具体的利益来重建日本的地位。一个和约的签订就可以成为日本重建的开始。为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事业和利益，我们还需要做些其他工作。

综上所述，我认为针对苏联在欧洲的薄弱地区，我们要在政治、经济和心理战线上开始活动，随时准备打仗，这样届时我们就可能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我们的攻势应该考虑到俄国人民自身的某些感情。并在事实上把这种感情利用到我们的攻势中。超越了这一代俄国人经验所能理解的哲学理想的宣传可以免去，因为此种宣传缺少真正的力量。我们的宣传应针对俄国的农民、工人甚至士兵，激起他们对土地和政治自由的渴望，改变目前被奴役的地位，这种宣传才会真正具有感染力。当然，俄国人也准备好了开展一场“解放”运动，最好让这种“解放”用于其自身，而不要让他们把“共产主义式的解放”带给我们。只有通过现在与敌人的斗争，再加上一系列有益的事态发展，我们才可能将苏维埃制度遏制在苏联境内，从而避免战争。万一避免不了，胜利也会在我们这边。

你忠诚的

〔奥·埃德蒙·柯乐布〕

文件 2

第 2 稿

秘密

东亚与东南亚

1950年6月6日

约翰·P·戴维斯

〔在这份备忘录前13页中，戴维斯按年代叙述了1920年以来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他把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与当地实际的结合，指出这一地区的非共产党政权既不稳定又无方向。共产主义地区可以分成以下三类：（1）苏联的傀儡或卫星国，如北朝鲜和蒙古；（2）中国，最初是独立的或“民族”的共产主义，但现已倒向苏联；（3）独立的共产主义反抗运动，如越盟，它效法早期的中国模式。戴维斯发现，与欧洲的共产党不同，亚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乡村的农民斗争，并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行动纲领。下面的段落摘自原文13—16页。〕

远东最显而易见和最有深远意义的现象是一个具有双重特点的现象：作为未来浪潮的共产主义政治气氛与这个国家（指美国——译者）尊严的广泛沦丧相结合。为矫正这种形势，我们应该（1）从消极方面来说，停止树立美国的威信，因为在这种环境和形势中，这种威望很可能被嘲弄，甚至进一步下降。（2）在中心（美国）建立起一种全面的和真正的实力核心。只有自身真正强大，我们在外围才会显现出内在的力量。（3）当我们有了全面的实力，对外宣传就会表现出沉着和自信。（4）可以和英帝国及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合作，这样就能在加强实力与挫败共产主义方面取得辉煌胜利。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问题。我们在中国和北朝鲜的目标，就是促进两国内部新生的革命运动，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目前无法渗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苏联帝国最坚定的卫星国，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当作较遥远的目标。

从纯粹现实因素上考虑，对中国也许更为可行的最初目标，与其是去掀起一场反对中国整个共产主义政治军事体制的革命运

动，不如去设法鼓动一场反对苏联在华影响和控制的起义。最理想的目标是诱导中国统治集团从与苏联的结盟中分裂出来。如果这一目标行不通，在地处中心的北京当局仍坚定地依附于苏联阵营的情况下，下一个最佳目标是使华南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分裂出来，它对北京政府可能只作口头承认，而实际上拥有自主地位。如果美国最理想的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将是最难以达到的：即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反对整个共产党组织的统一力量。

在北朝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发动一场以粮食问题为由的革命，反对目前统治的斯大林主义制度。

对东南亚那些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同共产主义作战，创造一种实力地位。在与共产主义作战中，我们必须学会区分各种不同的起义：危害极大的斯大林主义者起义；丛林共产主义（有时它会转变为斯大林主义）；左派暴动和赤贫起义〔词有歧义，可能是“乞丐起义”〕。

在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开创一种实力环境，以防止共产主义在当地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力量。

我们只有首先克服目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对东亚和南亚局势的广泛无知，才会使我们为取得自己在那里的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有效。我们只有怀着成功的希望致力于发动和促进反共运动，与共产党作战和阻止亚洲的各种革命，我们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最勇敢和耗费巨大的努力就会象投放在中国的数十亿美元一样付诸东流。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东亚和南亚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因而我们的政策应该是：

- (1)在北朝鲜和中国，努力提供革命的领导；
- (2)在东南亚，促进农民与共产党脱离或保持中立，并促使其支持政府或其他一些反共产主义集团；
- (3)在巴基斯坦、印度、锡兰和日本，加强它们对共产主义

的免疫力。

对日本以及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的南亚各国政府，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巩固它们在人民中的根基，引进必要的改革，发展有效的国家机器以阻止和镇压颠覆活动，从而创造一种我们所希望的实力地位。这不仅意味着需要一些警察行动等有效的绥靖工作，而且还要求将政治组织深入到乡村集镇。这样，人民才会与政府而不是煽动分子和游击队结成鱼水之情。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的干涉。

不断增强的干涉！

译自〔美国〕《外交史》

1985年春季号

熊京民 任东来译

王冠华 校

张作霖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远东年代与俄国反革命的联系

格·斯·卡列季娜

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苏维埃政权同俄国其他边远地区一样，是在同干涉者和白卫军斗争的复杂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一斗争在远东持续到1922年10月。与此同时，白卫军在满洲领土上，特别在中东铁路地段上建立了自己的部队。所以，中国政府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以及中国东三省统治者张作霖的态度，均对同俄国白卫军的斗争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世界帝国主义当时虽然未能扼杀苏维埃共和国，但它竭力阻止十月革命思想的传播，因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不仅解放了俄国各族人民，而且为世界各国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体被压迫民族对世界帝国主义统治体系进行斗争的共同思想体系。

中国社会先进阶层接受进步思想，孙中山在中国南方建立革命政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地位受到威胁。他们竭尽一切努力阻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不许中国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他们发现作为中国国内反动派化身的军阀制度是奉行其对华政策的支柱。帝国

主义者曾利用军阀制度的反动性，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斗争。他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恫吓中国统治者。正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下，北京才开始奉行反苏政策。

帝国主义者满洲奉行的政策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中国的这块地方使帝国主义列强垂涎三尺。满洲领土与苏联远东地区毗邻，它不仅是武装干涉的基地，而且应该保证对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封锁。所以，干涉者和白卫军在主宰满洲的同时，又以反共精神不断影响满洲的统治者和老百姓。

1917年3月，俄国工人在哈尔滨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11月29日，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夺取中东铁路地段的权力，并宣布解除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霍尔瓦特将军中东铁路局长的职务。^①中国当局根据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领事的要求，声明支持霍尔瓦特，并要求革命护路军“自行解散”和解除武装。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1万中国军队开进哈尔滨，解散了苏维埃，解除了护路军武装。^②后者被装进车厢，运往满洲里车站。谢苗诺夫在车站上将他们逮捕，并对他们进行了血腥镇压。^③中国当局的行动使霍尔瓦特感激涕零，还就此事打电报给张作霖。^④此事件以后，中东铁路正式转给当局保护，实际上由白卫军管理。北满，特别是中东铁路地段已变成白卫军袭击苏维埃领土的基地。中国当局在北满的地位可以说是不能自主的，比如，一位中国将军在关于消灭谢苗诺夫匪帮问题的谈判(1918年4月16日于马磙子站)时曾声明：“尽管中国人对谢苗诺夫采取中立态度，但是中国对谢苗诺夫的行动，取决于其他协约国对他的态度。协约国尚未承

① C·齐普金、A·舒雷金、C·布雷金：《十月革命与远东国内战争，1917—1922年大事记》，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1933年版，第28页。

② 杜冰波：《中国最近八十年来的革命与外交》，第2卷，上海，1933年版，第861页。

③ A·H·海费茨：《苏维埃俄国与东方邻国》，莫斯科，1964年版，第124页。

④ M·И·斯韦塔切夫：《中国军阀在反对苏维埃武装干涉远东中的作用，1918—1922》，载于《近现代史》杂志，1970年，第5期，第124页。

认苏俄政府，也未表示要中国消灭谢苗诺夫运动……满洲地方当局将就这一问题同中央取得联系。”^①自然，中国不能按列强的旨意行事。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中东铁路既成局势，竭尽全力将铁路控制在自己手里，为达此目的，他们曾与白卫军达成谅解。^②至于日本军阀，他们已将赌注押在谢苗诺夫身上。

日本帝国主义是列强争夺远东霸权的劲敌。早在1918年5月至9月，就签署了一系列日中军事协定，把中国卷入了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之中。^③日本根据这些协定，已将其军队开进北满，并借助其军官和教官对中国当局进行控制，获得了利用中东铁路搞军事运输的权利，中国当局则给予协助。

美国为寻求侵占中东铁路的途径，要求对中东铁路实行国际监督，并打算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与担心日本称霸远东的英法两国一起，于1919年1月迫使日本签署了关于成立协约国共同管理中东铁路及西伯利亚铁路的委员会和技术部的协定。技术部设在哈尔滨，由美国工程师约翰·史梯温司主持。委员会的真正使命是确立美国对中东铁路的控制。鉴于中国于1919年3月10日提出抗议，在1月协定中写进了新的条款。据此，宣布将中东铁路置于中国军队保护之下，美国获得了在哈尔滨驻军的权利，而日本则获得了在满洲里车站驻军的权利。允许美国和日本在上述地方驻1000名士兵，但这项协定并未迫使日本让步。日本不仅在中东铁路地段继续驻着比协定所允许的多许多倍的军队，而且于1920年初已经制定了一个侵占中东铁路的详细计划。^④

在列强开始干涉远东和西伯利亚以后，苏俄与中国在谈判中不止一次提出与在中国领土避难的白卫军斗争的问题。在1918年

① 《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229页。

② 详见В·Я·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帝国主义争夺满洲的阶段》，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181—235页。

③ 麦克默里，J. V. A.：《与中国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894—1919）》，第1—2卷，纽约，1921年版。

④ М·А·佩尔西茨，《远东共和国与中国》，莫斯科，1962年版，第152—153页。

7月达斡尔战线的军队消灭了谢苗诺夫手下的匪徒之后，在马碟子站与中国当局谈判过程中，于7月30日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中国方面答应在五周内解除谢苗诺夫的武装，而且不让他的部队越过俄中边界。^①但不久，前线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20日，红军部队离开上乌丁斯克，向赤塔方向退却。中国当局借此机会让谢苗诺夫越过边界，数日后，他的部队占领了赤塔。这样一来，中国当局所奉行的纵容白卫军的政策，使谢苗诺夫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干涉过程中，日本将更多的军队开进中东铁路地区，同时借助特种部队滋事寻衅为日军进驻这一地区“制造辩护理由”。日本更加积极地支持控制铁路的白卫军。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当局，特别是张作霖的不满，他不准备把中东铁路的权力让给任何人。日本占领铁路的威胁，不仅是决定中国当局对日政策的新因素，而且也是决定中国当局对待驻中东铁路白卫军的政策的新因素。

1919年10月，日本在“谢苗诺夫军队”的帮助下，开始了占领中东铁路的第一次尝试。谢苗诺夫为此专程去奉天，劝说张作霖不要阻挠“谢苗诺夫军队”占领满洲里车站至哈尔滨的中东铁路地段。日本驻奉天领事积极帮助白卫军首领，他对张作霖宣称，谢苗诺夫是俄国的拿破仑。但中国将军仍坚持己见。10月初，当“俄国的拿破仑”企图实际占领铁路并使开往海参崴的部队在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下车时，中国司令部向他提出了立即将这些队伍撤离中东铁路的要求。^②

1920年初，经铁路局长霍尔瓦特同意，日军试图占领满洲里车站、海拉尔、哈尔滨和博克图，但再次遭到中国地方行政当局

① C·齐普金、A·舒雷金、C·布雷金：《十月革命和远东的国内战争，1917—1922年大事记》，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1933年版，第67页。

② B·Я·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帝国主义争夺满洲的阶段》，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版，第196页。

和支持过捷克匪徒(在海拉尔武装冲突中被消灭)的中国军队的强烈反抗。^①日本占领中东铁路的尝试,使日本与满洲中国地方当局的关系尖锐化了,因而使后者对执行日本统帅部命令的白卫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20年2月,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鲍贵卿向霍尔瓦特提出立即解散中东铁路地段驻军的要求。^②

苏俄游击队从白卫军手中解放了滨海地区,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中东铁路工人于1920年3月13日宣布罢工,并要求解除霍尔瓦特的职务,鲍贵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谢苗诺夫曾警告说:“如果中国当局不能压制罢工,他将把他的配有装甲车和飞机的数团兵力开进中东铁路地段。”鲍贵卿这样做,是违背谢苗诺夫警告的。^③

到1920年北京对苏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红军和游击队在干涉者和白卫军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都对北京态度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所控制的北京新政府,与远东共和国建立了关系。北京接待了以И·Л·尤林为首的使团。不久,中国政府不顾日本的反对,不再向旧俄公使库达摄夫交付庚子赔款。1920年9月,又颁布命令不再承认旧俄公使和领事。^④9月30日,张作霖下令关闭驻吉林、黑河、奉天和长春的旧俄领事馆。^⑤在北京谈判之后,И·Л·尤林不止一次同张作霖进行会晤,他明白,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满洲统治者。

1921年3月,签署了关于远东共和国与黑龙江省之间铁路通车协定。协定包括这样一条,即中国和俄国当局允诺不在本国领

① В·Я·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1卷:《帝国主义争夺满洲的阶段》,第196页。

② 《远东观察报》,1920年2月26日。

③ А·Н·海菲茨:《苏维埃俄国与东方邻国》,莫斯科,1964年版,第380页。

④ М·С·贾丕才:《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版,第53页。

⑤ М·А·佩尔西茨:《远东共和国与中国》,莫斯科,1962年版,第122—123页。

上支持反对对方政府的一方。^① 这是指中国军队应对白卫军采取措施。实际上已经采取若干措施，但这些措施前后很不一致，不过是演戏罢了。

白卫军从不把张作霖视为敌人，并企图经常同他接触。而张作霖只有在对自己有利或形势需要时才同他们见面。但他同远东共和国和苏俄代表进行了接触，而且愈来愈相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并认识到同邻国建立关系的必要性。但是，张作霖一面奉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一面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保持联系。于是，1920年12月，谢苗诺夫就利用满洲领上进攻远东共和国一事同张作霖达成了协议。^② 1921年初，张作霖同日本驻奉天领事及首领谢苗诺夫进行了谈判，同他们讨论了反对远东共和国的具体行动计划。^③ 谈判期间，决定建立以日本军队、谢苗诺夫军队、张作霖以及在满洲的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分子组成的所谓反共联盟。^④ 这一时期，张作霖正准备对中国北方作战，他需要日本的帮助。这就预先决定了谈判的结果。据海参崴出版的《祖国之声》报透露：“张作霖答应反对满洲的布尔什维克，帮助谢苗诺夫并同意扩大日本在中东铁路南段的影响。作为报偿，日本答应给奉天以财政援助。”^⑤

1920—1921年在蒙古发生了谢苗诺夫的一名军官恩琴男爵占领库伦的事件。这一事件是说明张作霖对白卫军态度的重要明证。日本提出了作为同苏俄斗争重要手段的大满蒙计划，而恩琴则是这项计划的执行者。他的出兵一定是日本、谢苗诺夫和张作霖所支持的对苏俄发动总攻的一部分。因为蒙古受中国保护，所以北

① M·A·佩尔西茨：《远东共和国与中国》，第224—225页；П·Ф·茹科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远东共和国与中国东北之间于1921年8月签署的协定》，载于《苏联中国学》杂志，1958年，第2期。

② 《有关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第2卷，华盛顿，1929年版。

③ M·П·帕夫洛维奇：《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载于《新东方》杂志，1922年，第2期，第55页。

④ 《有关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第2卷，华盛顿，1929年版。

⑤ 《祖国之声》报，1921年1月23日。

京政府下令组织所谓赴蒙远征军，以镇压恩琴的行动。

业已责令张作霖统率远征军并授予他蒙疆经略使头衔。但他千方百计推迟出兵，目的在于得到政府对远征军的资助。当时已给他拨款300万元。尽管报纸报道说军用列车已开往海拉尔，但他并未向蒙古派一兵一卒。^①张作霖只不过向北京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日后中国对蒙政策的呈文。赴蒙远征军并未组成，红军在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协助下解放了库伦。有趣的是，恩琴根本不把张作霖当作敌人，相反，却向他表示忠诚。例如，恩琴在给张作霖属下一位将军的信中表示，“无论如何，我准备在张作霖将军领导下恢复帝制”。^②恩琴司令部向张氏表示，如果张作霖当了中国政府首脑，该司令部愿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③

红军会同蒙古革命军解放库伦以后，张作霖便辞去了蒙疆经略使和赴蒙远征军中的职务。^④这次辞职说明日本支持恩琴，而张作霖不愿同日本发生冲突。此外，他希望在即将爆发的同吴佩孚争夺中国北方政权的斗争中，得到日本的帮助，他的全部兵力已向未来的作战地区集结。因此，尽管张作霖早就梦想统治蒙古，但他目前必须巩固住自己的地盘。

在为滨海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在中国东三省云集了许多逃亡到那里的白卫军。日本支持下组建的人数众多的白卫军部队对地方当局的独立已构成威胁，日本还利用这些匪徒在满洲制造混乱。解除他们的武装有利于保证中国国内的安全。对张作霖来说，更重要的是，可借机无偿地得到武器。不过，张作霖还是准备购买武器。据日本《国民日报》透露，季捷里赫斯将军和张作霖之间已经达成在海参崴买卖武器的秘密协

① 《喉舌》报，1921年8月8日。

② Б·齐比科夫：《消灭恩琴匪帮》，乌兰乌德，1947年版，第24页。

③ 《满州每日新闻报》，1921年3月23日。

④ 《俄国之声报》，1921年8月。

定。此外，季捷里赫斯已将“义勇舰队”的三艘舰艇卖给张作霖。^①

据日本报纸报道，季捷里赫斯将军和张作霖订立了互相支持、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协定。中国报纸也报道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同季捷里赫斯“政府”及张作霖缔结了关于建立缓冲国并组织金融联合会，帮助张作霖和季捷里赫斯的条约。^②张作霖买了梅尔库洛夫兄弟的三艘潜水艇，1万支步枪和1000支毛瑟枪等武器。^③

解除白卫军的武装进行得非常缓慢，有时纯粹是形式，因为张作霖同时又支持他们建立部队和组织，反对滨海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张作霖与海参崴白卫组织的领导人希利尼科夫将军有联系。在搜查满洲里车站时，中国当局发现了这个组织的宿营地指挥部。希利尼科夫被逮捕，但不久张作霖又下令将他释放。^④中国将军同季捷里赫斯“政府”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此项协定，日军撤离后，白卫军如果被赶出滨海省，有权转移到满洲领土上。^⑤

这样一来，张作霖就耍了两面把戏。他表面上竭力表示参加解除滨海地区白卫军的武装，同时又支持后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图谋。

他发现不仅可以使用白卫军的武器，而且可以利用白卫军，吸收他们参加自己的军队，充任教官和顾问。比如，前谢苗诺夫分子克列尔泽将军即被任命为满洲“保安队顾问”^⑥（张作霖本人任保安队司令）。张作霖还吸收梅尔库洛夫驻哈尔滨的代表巴

① 苏联国家十月革命、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和国家最高管理机关中央档案馆，全宗391，案卷11，第491页。

② 《东方杂志》，1922年，第4期，第33页。

③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20卷，1917—1927年，南京，1958年版。

④ 苏联国家十月革命、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和国家最高管理机关中央档案馆，全宗391，案卷11，第124、167页。

⑤ 同上，全宗391，案卷11，第491页。

⑥ 同上，全宗391，案卷11，第138页。

雷什科夫将军充任机枪部队教官。^① 据哈尔滨一家报纸报道，在奉军中担任教官的有：佩图霍夫将军、托马舍夫斯基将军、扎维亚洛夫上校等白卫军官。^② 1922年12月，40名白卫军军官参加了张作霖的空军部队。^③ 后来有数千名白卫军加入了中国军阀部队并参加作战。例如，1922年直奉战争期间，报界指出，奉军的大炮射击非常准，并推测说，奉军的炮兵由某些外国人指挥。^④ 这很可能是指白卫军军官。

当苏维埃政权在远东的最后胜利在望时，中国东三省当局不得不正式声明承认它。1922年10月25日，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乌戈利娜娅车站拜会了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乌博列维奇，并代表张作霖向他祝贺胜利。^⑤

在干涉远东和西伯利亚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和白卫军在东北领土上的出现，使张作霖卷入了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白卫军的反苏活动。张作霖援助白卫军，提供东三省领土供掩护和组织白卫军之用，并同他们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同盟，甘心充当俄国反革命和外国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帮凶。张作霖在中国充当了反共思想的传播者之后，特别在干涉苏俄失败之后，明白了必须同日益巩固的苏维埃国家保持睦邻关系。所以在苏俄与中国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期间，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代表在奉天受到官方的隆重接待。

但由于列强激烈反对，苏中两国建交被推迟了。最后于1924年9月31日^⑥才缔结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同时签署了管理

① 同上页注⑥，全宗391，案卷11，第264页。

② 见1922年7月15日《我们的言论》。

③ 苏联国家十月革命、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和国家最高管理机关中央档案馆，全宗391，案卷12，第648页。

④ 见1922年5月9日《我们的言论》。

⑤ 苏联国家十月革命、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和国家最高管理机关中央档案馆，全宗391，案卷11，第736页。

⑥ 原文有误，应为1924年5月31日。——译者

中东铁路的暂行协定。这两个协定是当代第一次签署的平等条约。由于列强挑唆，张作霖拒绝承认后一协定。当时中东铁路已成为白卫军的反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局面，不得已于1924年9月20日同中国东三省当局签署补充协定。^①奉天协定中涉及中东铁路的部分，与5月31日协定差别不大。协定规定将铁路共管期限从80年缩短为60年，并更加详尽地规定了中东铁路理事会和管理局的组织原则及活动。^②

1924年一些俄中协定的签署对中东铁路运营正常化和发展俄中经济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但中国当局并未放弃反苏方针，并在阻挠这些协定的贯彻。虽然根据1924年5月31日协定，北京政府已允诺禁止帝俄臣民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但是中国军阀还是继续利用白卫军为他们效劳，并将他们编成新军。在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军队中，共有涅恰耶夫白匪部队1000人。中国当局断言：俄国白卫军已加入中国国籍，不能免除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中国当局在解除白卫军在中东铁路职务的问题上，不愿履行《俄中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公开支持反革命分子。北京当局没有履行关于把白卫军从海参崴偷到上海的舰艇归还苏联的协定。^③

张作霖在晋升的初期便与帝国主义列强和白卫军建立了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反苏和反共的立场更加坚定。

张作霖将军的开始晋升使人们极感兴趣，它展示了中国最大的军阀之一攫取政权的道路。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土匪头子任职10年，竟能登上东三省巡阅使的宝座。

他任公职后，担任了巡防队统领，这支队伍的核心是曾经忠

① 即《奉俄协定》，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埃(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由苏联代表和奉天代表于1924年9月20日在奉天秘密签订，1925年3月12日为北京临时政府追认，作为《中俄协定》的附件。——译者

② M·C·贾不才：《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版，第125页。

③ 同上，第136—137页。

于他的土匪，现在成了他的士兵。他一方面依靠他们，另一方面，认他的上司，原奉天省最有实力的总督张锡銓为“义父”，表明自己对他的忠诚并有益于他。

张作霖利用东三省总督和长官的保护，很快晋升为师长，将自己的队伍训练成东北最精锐的队伍，成为总督必不可少的依靠力量，从而使总督依赖于自己。

张作霖得势之后，便可以对自己的保护者（省督军和袁世凯）施加压力，后来，当力量均势发生有利于他的变化时，他便占据了奉天督军的职位。

他就是这样“青云直上”的。

张作霖取得东三省政权以后，坚信自己确有实力，便企图参加中国内部的政治角逐。起初他支持中国新的“实力派”段祺瑞对南方省份作战，奉军第一次入关。随后，张作霖借驻北京一些师搞军事演习之机，把总理职务交给段氏。因为张作霖没有从后者手中得到所期望的酬报，便于段祺瑞政府危急关头联合直系，以驱赶段氏，亲自控制政府。1920年，他支持直系军阀对安福系作战，终于达到了这一目的。

张作霖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善观形势，随机应变，玩弄权术，不择手段。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依靠下属部队，得以在奉天建立政权。继而，在数年之内，又将政权扩展到奉天省，乃至东北全境。他主宰满洲之后，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并且依附于日本。张作霖在1911—1912年间镇压革命党，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又镇压了奉天反日示威，他从一开始活动，便成了反动势力的维护者。

重要的是，张作霖在活动初期就受过反共训练，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面貌。

译自《张作霖和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政治斗争》一书第1章，

第44—53页

姚宝珠译

陈春华校

戊戌变法与日本

——论康有为对“明治维新”的理解

〔日〕山根幸夫

序 言

19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对于一向沉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太平盛世幻景之中的清朝，无疑是一次很大的冲击。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清朝以决定性的打击，他们仍然固守着中国传统思想，并未放弃视欧美人为夷狄的观念。然而，紧跟着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进首都北京，清朝在英、法联军的武力面前不得不屈服，这时再也不能死抱住中国传统思想了。清朝的当政者们，通过检讨这次失败的原因，认识到欧美近代化武器的优越。他们所看到的欧美列强的“长技”，是近代化的军舰、枪炮等先进的武器。与中国的旧式武器相比，他们无条件地承认欧美近代化武器的优越。

从以上这种认识出发，清朝的当政者中，出现了主张积极吸收欧美科学技术、用以制造军舰和枪炮的人，这些人便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官僚。他们为了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以便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在输入欧美近代化武器的同时，亦着手引进其制造技术。这种洋务运动的开始，大致相当于穆宗同治皇帝(1861—1874年)即位时期，此后的七八年，日本也

在坚定地实行明治维新。因此，有些人往往把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①但决不应忽视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明治维新至少对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制度进行了变革，而同治中兴的目的则相反，是以安定和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为其出发点的，^②洋务运动不过是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输入近代科学技术也无非是为了安定和维持传统的封建统治制度，对于引进与传统制度相矛盾的近代思想、伦理则完全被阻止。而且，即使吸收、输入近代科学技术，最初也只限于输入军舰、轮船、枪炮，以及有关的制造技术。

其后，随着洋务运动的进展，开发矿山，建设铁路、电信，引进纺织、制铁技术等亦相继而来。^③但是，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维持传统制度，从而吸收了一些表面的、形式的近代技术，它并没有注意到作为欧美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的思想。这种缺乏基础的洋务运动的脆弱性，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洋务运动开始于1861年，明治维新则开始于1868年，就起点来说，应是清朝先走一步。然而，两者的结果如何呢？从前被称为“睡狮”，还使世界各国感到有点畏惧的中国，竟然惨败于一个小国日本。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中华帝国不得不屈服于从前被蔑视为东夷的东洋小国日本的武力面前，这一事实促使一部分中国人进行深刻的反省。他们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强大不在于

① 例如，远山茂树《东亚的历史观探讨——以近现代史为基础》，《历史学研究》第281期（1963年10月）。批评远山这篇论文的有芝原拓自、藤田敬一《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涉及近三十年来的论争点》《新史学》第92期（1964年1月）、93期（同年2月）。两篇同时被收入《历史观再构成的课题、历史学的方法和亚洲》，御茶之水书房（1966年11月）。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提到，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以资攻剿”“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即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另洋务官僚的目的是扩张他们自身的实力，维持动摇了的封建统治，利用洋枪、洋炮屠杀中国人民。（第83页）

③ 对洋务运动的概说，有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另，参照中村义《洋务运动与改良主义》（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22期，1969年8月）。

近代化的枪炮和军舰，而在于应有一个能团结国民力量的国家制度。而且，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成了欧美列强争夺权利的舞台，中国面临着被列强蚕食、瓜分的危险性。他们痛切感到，为了摆脱这种危机，不能只靠移植近代科学技术，还必须对作为团结国民力量的清朝国家体制进行变革。变法运动就是以试图建立这种体制开始的。同时它亦被称为变法自强运动，变法维新运动等。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为目的的汉人高级官僚，相对来说，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决不是特权官僚，而是直接面对祖国存亡的危机，勇于献身的一些下级官僚，^①成为这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的是工部主事^②康有为。

一、康有为对日本的认识

康有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最高潮时(1858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的地主家庭。父亲达初，曾任江西候补知县，但很早便去世。康有为从少年时代起就把投考科举作为接受教育的目标。19岁时，乡试失败，他“愤学业之无成”，痛感只为投考科举而学之无意义，于是师事同邑大儒朱次琦，^③一度专攻佛学、道学等，但不久对政治、经济、地理等经世济民之学也发生兴趣。据《康

① 在《亚洲史讲座》第3卷(岩崎书店，1955年)中，波多野善大氏说：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论的有“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论的文廷式等下层宫廷官僚”。汤志钧在前引书中也说：洋务运动的主持者是上层的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相对来说，变法运动的主持者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汤志钧又说，无论洋务运动或变法运动，同样是“上层”运动，都是脱离人民大众的运动。(前引书，第88—89页)。另外，刘仁达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收入中华书局《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58年)中说：“康有为是由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转化而来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

② 工部主事，明、清时代属正六品官，由进士出身的中等成绩者担任此职。

③ 关于朱次琦，参看朱如濡《清末大儒朱九江先生学术概要》(《大陆杂志》，1959年)。

南海自编年谱》说：他从17岁起对地理尤为用心，“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①22岁那年，到香港作短期旅行，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自编年谱光绪五年（1879年）写道：

“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

如上所说，以这次香港旅行为转机，与西洋人的接触使他大开眼界，认识到讲求西学之必要。接着25岁那年，上京应顺天乡试，归途顺经上海，更清楚地领略了西洋人的实力。自编年谱光绪八年（1882年）条说：

“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之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②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

从这时起，康有为开始表现出对西学认真考察的态度。^③康有为在增长自己的西方知识的同时，对邻邦日本也开始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④中说：

“昔在圣明御极之时^⑤琉球被灭之际^⑥，臣有乡人，商于日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十三年（1874年，17岁）条。

② 这些“西书”中，亦包括李提摩太（1845—1919年）等耶稣教传教士的译书。

③ 自编年谱，光绪九年（1883年）条中说：“购万国公报、大政西学书，声、光、化、电等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万国公报》是 Young John Allen（中文名林乐知，1836—1907年）创刊的杂志，目的在于用欧美的历史、地理、法制、科学等知识启蒙中国人。

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正月，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给光绪时，附有这篇序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略记为《戊戌变法》）第3册，第2—5页。黄彰健把这篇序文当作康有为的伪作。参看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辨伪”（第570—572页）。

⑤ 所谓圣明御极之时，指德宗光绪帝即位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即明治7年之际。

⑥ 所谓琉球被灭之际，指明治8年，即光绪元年（1875年），明治政府对琉球藩主尚泰下令停止对清朝的朝贡，实际上是指日本占有琉球的事实。此年，康有为18岁。

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改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

据此可知，他自十七八岁起，就开始了解日本，对明治维新的成功尤为关注。这时，他读了日本书后深受刺激，但读些什么书则不清楚。不过他打算将这些日本书翻译、介绍给更多的中国人。但是，他的愿望在当时没有实现。随后，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当福州马尾船厂被法国舰队炮击破坏之际，他再次提倡翻译介绍日本书，劝广东当道^①“开局译日本书”，结果未被采纳。^②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日本、特别是了解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顺利地加强、发展国力的事实，康有为打算自己著述《日本变政记》。这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事。^③

如上所述，康有为很早就注意到明治维新的成功，清楚地认识到逐渐抬头的日本国力。由于他认识到日本成功的原因在于明治的变法，所以把明治维新作为焦点，着手编纂《日本变政记》。据《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说：

“臣昔译集日本群书，但割取明治变政之事，编辑成记。”

因此，《日本变政记》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明治变法的实情。他连续不断地致力于编纂《日本变政记》，费时10年，大约完成于光绪二十二年。^④此外，他为著该书搜集了相当数量的日本书。自编年谱接着说了下面有关著述《日本变政记》的事：

① 所谓广东当道，指两广总督张之洞。据梁启超《康有为传》(《饮冰室文集》卷九)说：“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康有为)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也。”

② 参看前引《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③ 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条有“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据此可知康从丙戌(光绪十二年)起已考虑编《日本变政记》，但自编年谱同年条中并无言及有关《日本变政记》。假如光绪十二年开始写作的话，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当然应有明记吧。因此，丙戌年着手著述的年份待考。

④ 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条没有说完成了《日本变政记》，但据注③考之，恐怕此年已写成草稿。

“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①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

据此，他曾将为著《日本变政记》而搜集的日本书编成书目。该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月完成，取名《日本书目志》。^②

那末，《日本明治变政考》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呢？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说：

“凡日本事自明治元年至24年^③共12卷。更为撮要1卷，政表1卷附之。”

另外，据《万木草堂藏书目录》史部称：“日本明治变政考^④16卷，戊戌正月奉旨进呈，八月被抄没。”据此推测《日本变政考》已不存在了，我以前也确是这样认为。出人意料的是《日本变政考》却保存了下来。我是读了黄彰健《读〈康有为日本变政考〉》^⑤后才知道此事。黄氏是通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库藏的《日本变政考》未刊稿的缩微胶片才弄明白此事的。我们只是从黄氏的论文里知道《日本变政考》存在的一些梗概，并不了解其全貌。

直至去年11月，我得到黄彰健氏编纂的《康有为戊戌真奏

① 关于长女同薇，据自编年谱，光绪四年（1878年，21岁）有。“是冬12月21日，长女同薇生”。这年应有19岁。另，自编年谱，光绪十八年条有记他的女儿“时年15岁，天资颇颖，勤学强记”，褒其才能。又据《戊戌奏稿》中《日本变政考序》云：“恨旧日言日本事者，不详其次第变革之理，无以窥其先后更化之宜。乙未（1895年）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今三年，乃得见日本变法曲折次第。”（参看黄彰健，前引书，第572页）。所谓同薇通东文（日语），为父翻译日本书，是要说明其女为才女吧。

② 《万木草堂藏书目录》（《戊戌变法》第4册，第38—42页）子部条有《日本书目考》之名，谓“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再奉伪旨毁板”。我认为《日本书目志》与《日本书目考》为同一部书，并推测已不存世了，但据黄彰健氏说《日本书目志》仍存在。

③ 披见现存《日本变政考》，截至明治23年。与康有为的记忆有出入吧。另，后面提到的《明治政史》亦终于明治23年。

④ 黄彰健氏论及《日本变政考》，在他所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年6月）所收的《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策略的转变，兼论转变以后至曾廉上书以前康的政治活动》之文为先，本论文（《大陆杂志》，1970年1月）是根据其要点整理而成的。但实际上公开刊行则后者为先。

议——附康有为伪戊戌奏稿》^①，才开始接触到《日本变政考》的全貌。黄氏所据《日本变政考》未刊稿的原本，现存于北京。1947年，美国的玛丽·赖特博士用缩微胶卷替美国胡佛图书馆摄制此书。中央研究院的胶片是从这里复制的。但是，这个稿本只有12卷，不含撮要及政表。黄氏说：“大概是因政变后此稿本为官府抄没之际散失了吧。”^②稿本每页8行，每行18字，全部共1050余页（在《真奏议》本是340页）。那么说字数超过15万。

《日本变政考》是用编年体，起自明治元年正月，终于明治23年12月。各卷次序如下：

卷一	明治元年
卷二	明治2年
卷二下	明治3年
卷三	明治4年
卷四	明治5年
卷五	明治6年
卷六	明治7年
卷七	明治8年
卷八	明治12—14年
卷九	明治15—17年
卷十	明治18—21年
卷十一	明治22年
卷十二	明治23年

我以前推测过，^③康有为编此书时，大概也参照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但实际上他利用的全是日本书。前述《日本书目志》中，列举有关日本历史的有下列诸书：

① 本书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史料丛书》的一册公开刊行的，16开纸，534页，底页署民国63年3月出版。《日本变政考》大约占本书的三分之二。

② 参看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以下简称《真奏议》）第96页。

③ 参看拙稿《戊戌变法与日本》（岩间彻编《变革期的社会》第185—186页）。

福田久松、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

井出德太郎：《日本开化起源史》

小中村义象：《大政三迁史》

坪谷善四郎：《明治历史》

指原安三：《明治政史》^①

中曾根淑注译：《太平记》

山口镰：《近世史略》

吉村明道：《近世太平记》

木村芥舟：《三十年史》

在以上诸书中，黄彰健氏指出：康有为编《变政考》时主要依据的是《明治政史》。^②如前所述，《变政考》搁笔于明治23年，而《明治政史》也正好绝笔于开设帝国议会的明治23年，由此可推测到两者的联系。

康有为是根据《明治政史》，^③从明治元年正月至23年末，对有关行政、制度、外交条约等重要事项巧于取舍、排列，只是翻译有些不忠实原文。康自己在卷头也曾说：“原本所译日文大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④

① 《明治政史》全24编，收入吉野作造编《明治文化全集》第2、3卷（日本评论社，昭和3、4年）吉野在本书的题解（卷三的卷首）中说：“《明治政史》系东京富山房发行，指原安三氏所编辑。全部成12卷，第1卷于明治25年6月发表，明治26年5月刊完终卷。前后分24编，第1编称首编，收集了大政奉还以来庆应3年间的历史事实，由明治元年至23年第一次议会开会的23年间的历史事实分别记于23编中，采用了每一年一编的所谓编年体的记述法。……编者不是专门治史的学者。因此，如按史学的观点对《明治政史》进行严格批评，可以举出许多缺点。……那么，我们将其全书收入全集的理由如何呢？不外乎是因为本书可以说是丰富地网罗了明治政治史、特别是明治前半期政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资料。”另，《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中附加有吉野、高野忠男合编的详细索引。

② 参看黄彰健《读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大陆杂志》第40—41期）。

③ 黄彰健氏指出，卷一的明治元年部分完全依据《明治政史》，但关于明治2年以降的事项，有许多不知所据何书。然而，实际上利用《明治政史》的部分居多。

④ 黄彰健氏指出：“其译文大多与原文相符，但有些错误为抄写誉录时所误，有些错误则是康有为有意改窜，或省略其首。”

自编年谱光绪廿四年五月条说：“时上频命枢臣催所著各国变政书，乃昼夜将日本变政考加案语于其上。……每日本一新政，皆借发一义于案语中。”《变政考》真正的特色应在康所加的案语吧！案语是以“臣有为谨案”开始，简单的数十字、数百字，亦有千字以上的。用案语阐述变法的必然性，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康有为编《变政考》重点不在于叙述日本变政的具体事实而在案语。但全编所加的案语不完全一致，前半部多些，后半部稍少。从中不难看出，康对明治维新初期的变政尤为重视。

现将《变政考》卷一，明治元年正月14日“置参与局宫中”后面所加的案语介绍如下：

“臣有为谨案：维新之政，如同再造，事事草创，无旧章可由。故非别开一司，谋议商榷，草定章程，无以为施之地也。宋王安石之变法，开三司条例司，程子实，备官其间。青苗虽不可行，而条例司一义不可易也。然置宫中，非主人朝夕亲临商榷，则一二征士，皆草茅游士，忽更大政，必大臣嫉妒，谤议沸腾，岂能任此之巨重。且变政之始，旧百官皆守旧之官，与新政相反，力加阻挠，即使极力奉行，而不通新学，不能谋议，拘牵旧例，不能破除。故非别开一司，妙选通才，拔用新进，与咨新政，统筹大局，朝夕商榷，不能推行也。且百司皆行政之官，非议政之官，无人专任论思者。故特开参与局以谋新政，实变法之下手也。”

康有为在以上的评语中，借论日本明治维新的变政，而展开他有关中国变法的设想。为了坚定地实行变法，他强调必须设立新机关，以便有力地推行新政。康氏的评语，叙述了所有与中国变法有关的方面。

《日本变政考》首先使光绪这位读者大受启发，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康有为叙述了日本明治新政的具体事实，毋宁说在于他那关于实现中国的变法应如何仿效日本的充满激情的评论——案语。

在《变政考》自序里，康有为写道：世界有由大而小，由强而弱，或由存而亡之国。这类国家皆因守旧不变，君主独裁，与民隔绝而亡。相反，变法开新，君主与民相通之国，如日本、俄罗斯是也。日本的变法其成效最速，其制度最备，也是中国最好的模式。又因中国为“地大物博”之国，日本为其难之事，中国则易。如仿日本之新政，中国变政之成效，必事半功倍。因此，中国之变政，务必以日本为模式。惜旧日论日本事者，不详其次第变革之理，为此我们无以窥“其先后更化之宜”。^①这便是康有为着自己着手编纂《日本变政考》的原因。

此外，据黄彰健氏介绍，《变政考》不少地方有增注、涂改，因此他推断这不是戊戌年进呈的正本，而是被保存的康的手迹的稿本。^②总之，根据该书，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的政治主张。

二、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如前节所述，康有为编《日本变政考》，目的在于明确日本明治新政的次第，考察为什么日本的变法能成功的原因。不只是康有为，例如黄遵宪等也曾把日本当作变法的模式。无疑，事实上黄遵宪、康有为等对明治维新的成就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即使如此，当时普通的中国人，在引进近代事物方面，并没有出现像日本着眼于欧美那样的程度。^③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是如梦如痴地追随欧美。甲午战争失败的结果，使中国直接看到了日本的实力。变法派官僚中出现了关注明治维新的改革之士。而且，他们

① 《真奏议》第99—100页。

② 《真奏议》第96页。

③ 例如《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上)的江苏松江知府濮子潼的奏折说：“邇来谈新政者，皆谓远效西人。”另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亦说：“及东事将兴，举国上下，咸昧日事，若视他星。”“及东事之兴，举国人皆轻日本之小国。”

注意到了日本和中国所处的各方面环境的共同性。作为当时改革的共同条件，首先举出地理风俗的相似之处。《日本新政考》的著者顾厚焜说：

“窃谓是国(日本)之天时、地制、风土、人情，本与中国不甚相远。”^①

康有为也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提到中国和日本同俗一事，应当成为仿效明治新政的原因：

“彼(日本)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洲大陆矣。”

松江知府濮子潼的奏折也说：

“盖(中国和日本)同文之国，性情差近，风气略同。”^②

这类变法派基于对日本和中国的地理、风俗等的共同点的认识，提出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日本又是仿效欧美，因此如仿效日本，实际可以同时吸取欧美和日本之所长。

其次，与日本明治新政的时间相隔不远，如模仿日本，可能较易成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③中说：

“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④以日本明治(帝)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则莫如

① 参看《日本新政考》自序。

②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综合(上)收录。本折是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三日上奏的。

③ 康有为这篇上书，通常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上奏，是戊戌变法的大纲。据《戊戌变法》第二册。

④ 俄国的彼得大帝，即位于1682年，殁于1725年，其统治历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期。按戊戌变法当时来看，大约相距两个世纪。一方面，在寻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的模式的主张中，怎么能说应仿效彼得大帝呢？康有为采取俄国模式的主张，不只是这篇第六次上书，在《上清帝第五书》中，亦强调“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另外，他还著有关于彼得大帝改革的《俄大彼得变法考》2卷，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进呈光绪帝，深受重视。

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

因此，在首先指出地理、风俗等共同之处的同时，举出时间相近的重要性。即美、法、英、德等国的民政、宪法虽好，但地理、风俗却异，而且各国的变法时间相去已久，如把地理、风俗大体相同，时间亦相近的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仿效的对象，变法的成功不难预见。

此外，下面所论述的日本与清朝的变法比较，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由变法派的某人^①执笔，篇名为《新党某君上日本社会政府论中国政变书》。^②文中谈到：“敝邦(中国)今日情形，实与贵邦(日本)安政庆应之时，大略相类。皇上(光绪帝)即贵邦之孝明天皇也，西后即贵邦之大将军也，满洲全族，即贵邦之幕吏也。贵邦议论之士，持公武合体之论者有之，持尊王讨幕之论者有之，而(在敝邦今日)合体之说，固万不能行矣。何也？皇上苟不图改革，一切守旧，一切废弛，一切奉西后之意，一切任满洲大臣之欲，则无不可合。然如此，则如社稷何哉？皇上赐康(有为)先生密谕有云：‘不变法则祖宗之国不保，若变法则朕之位不保。’此合体之所以难也。盖不改革则合，改革则分；不改革则亡，改革则存；两者比较，万无能合之理，此亦如贵邦公武合体之终不能行矣。”这里指出了两国变法的相似性，接着又举出与日本情形不同的三点：“第一，贵邦幕府虽威福久积，然于皇室则有君臣之分。敝邦西后则朝权久据，且于皇上冒母子之名，故讨逆幕，则天下之人皆明其义，语及西后，则天下之人或疑其名。第二，天皇与将军，一居京都，一居江户，不相逼处，故公卿处士之有志者，得出入宫禁，与天皇从容布置，而幕府无如之何。敝邦则皇上与西后同处一宫，声息相闻，且皇上左右皆西后之私

① 据《戊戌变法》的编者说，所谓某人即指梁启超。

② 此文最初发表在《知新报》第79册，进而日本的《东邦协会会报》转载。附带一提，东邦协会是明治23年由小泽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诚(口南)三人发起创办的。《戊戌变法》第3册，第601—608页。

人，皇上所有举动，西后无不立知，故此次仅下一密谕，^①图自保之法，而祸变已起矣。^②一旦废立，即使外省有举义之兵，兵未及京都而彼已可立置皇上于死地，是皇上直为西后质子也。第三，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柄，与当时贵国之皇室略同，然当时贵国有萨长土佐诸藩相与夹辅，故虽借处士之功，尤赖强藩之力，藩侯自君其国，经数百年，本藩之土民，皆其赤子，彼一举义，幕府无如之何，甚者如毛利公父子，黜其爵，讨其罪而已，而终不能削其兵力，禁其举义也。故王室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借。若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有拂逆，授意参劾，即日罢官矣。……处士以一身毫无凭借，惟有引颈就戮而已。”这篇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论，可以说是一种结果论，它是否只就通过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作客观对比后得出的，还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它是作为站在中国方面将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作对比考察后表达的一种观点却是事实。梁启超的这篇比较论是在政变后亡命日本时写的，^③但它与上述在决定推行变法以前对比中日双方的各方面条件，提出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观点是相同的。

三、康有为对明治维新的理解

据上所述，当变法派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而决定实行变法时，便明确地把日本作为所要寻求的变法模式。然而，他们是

① 所谓“一密谕”，是指光绪帝于七月二十八日知危机逼近，召见杨锐时给康有为等的如下勅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戊戌政变记》第二篇，废立始末记）。

② 所谓祸变，指八月六日发生的戊戌政变。

③ 此文末尾记有“十月三十日某再拜”，因此大概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三十日作。

怎样理解明治新政的？又怎样把握它的呢？关于这点，我想就康有为的思想见解作些考察。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廿七日在北京的粤东会馆举行的保国会集会上，作了如下的演说：①

“考日本昔为英美所凌，其弱与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湾，灭我琉球而制朝鲜，得我偿款2亿两，此日本之兵强为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博文)，其将大山(岩)为之耶？非也。尝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②之所为。高山正芝，哀国衰不能变法，愤大将军之擅政，终日在东京痛哭于通衢，见人辄哭，终于哭死。③于是西乡(隆盛)、吉田(松阴)、藤田(东湖)、蒲生秀实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仓俱视、木户孝允、板垣退助、三条实美、大隈重信，出而谈变法，日本乃盛强。……呜呼！谁知日本之治，盛强之效，乃由一诸生无权无勇无智无术而成之耶！”

以上关于明治维新的发端起于高山彦九郎的忠诚请求的看法，难道事实果真如此吗？不过，把高山正之、蒲生君平这些约一世纪前的人物与幕末、维新的活动家相提并论，这本身就表明了康有为对日本的理解不够确切。然而这是政谈演说的笔记，如果作为鼓动听众来说，那也不必过分要求其严谨性。关于他的变法理论，还是应当着重从他的奏章来分析吧！

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④以前，康有为前

① 《戊戌变法》第4册，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辞。由康有为演说，弟子麦孟华笔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第三篇，政变前记亦引用。最初登载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十一日出版的《国闻报》，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知新报》第58册亦刊载。

② 高山正芝的“芝”是“之”之误，高山彦九郎，字正之。

③ 关于高山彦九郎，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三，《国统志》中亦有如下记述，即：“外史氏曰……其后，山县昌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或伴狂涕泣，或微言刺讥，皆以尊王之意，鼓煽人心。”另，康有为说高山正之“终以哭死，”当然是指在肥后久留米自刃的事实。

④ 《戊戌变法》第2册，上谕，第17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

后有7篇上书阐述他的变法构思。^①第一次上书^②在光绪十四年九月(1888年)书中提到日本的,有“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陈述仿效之必要。此后7年的第二次上书,^③即所谓“公车上书”,强调拒和、迁都、变法三事,避而不谈有关当前敌国日本之事。第三次上书,^④是在他被授工部主事不久,同样是陈述变法进行的方案,对第二次上书的内容作了补充说明。第四次上书,^⑤“言变法曲折之故,凡万余言,尤详尽”。^⑥关于日本,不外乎“近日其国王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能更化则骤强如彼”等语。到了第四次上书,则特别意识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变法的具体情形还不大明瞭。

第五次上书,^⑦是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在首先强调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危机之后,举出具体的变法计划三策。第一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康有为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作为变法的模式是日本的明治新政,即“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但是,指出具体地仿效日本新政的要点,则还在下次的第六次上书,即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的上书,此书列举应仿效明治维新者有三点:

“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而关

① 此外还有《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06—208页),此篇不是谈总体构想。另黄彰健氏认为这是篇伪奏稿。

② 《上清帝第一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23—131页)。

③ 《上清帝第二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戊戌变法》第2册,第131—154页)。

④ 《上清帝第三书》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戊戌变法》第2册,第166—174页)。

⑤ 《上清帝第四书》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戊戌变法》第2册,第174—188页)。

⑥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2页)。

⑦ 《上清帝第五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戊戌变法》第2册,第188—197页)。

关于康有为变法的有关上奏,参看汤志钧,前引书《康有为的新政建议和光绪皇帝的新政上谕》。

于第一点，即日本明治维新的实情，所述如下：

“其誓文在决万机于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民国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①令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②

以上“誓文”，不外是指五条誓文。即庆应4年(明治元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出御紫宸殿，亲率亲王、公卿、诸侯祭天神地祇，共誓神明，向国民宣布这五条国是，接着群臣每人在誓文上署名一事。康有为把它作为适用于中国的方法，并说明如下：

“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黽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

最后康有为根据明治维新的情况，建议采取大体相同的措施。他的这些设想，在同年4月的《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③里也提出过。

其次，第二点是关于立“对策所”以征贤才。这点，日本的情形如下：

“召天下之征士贡士，咸上书于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于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

这是指明治政府为广采公议，于庆应4年2月3日征诸藩的俊才为征士(新官僚)，还由各藩选出贡士(藩代表)，设立征士、

① 康有为对五条誓文的翻译，顺序不同，译文亦不一定适当。另方面，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卷三，《国统志》译作：“曰万机决于公论，曰上下一心，曰文武一途，曰洗旧习从公道，曰求知识于寰宇。”其译文比康有为的远为正确，且简要得多。

② 在《日本变政考》中，五条誓文译作“一曰，破邪旧习，咸与维新，与天下更始。二曰，广兴会议，通达下情，以众议决事。三曰，上下一心，以推行新政。四曰，国民一体，无分别失望。五曰，采万国之良法，求天下之公道。”(真奏议101页)这种译法大概是为了忠实原文吧。但是，顺序不同这点，与上书的情形相同。

③ 亦被称为伪折。

贡士的“下议事所”^①一事。但这种制度早在同年闰4月便作了修改，下议事所被新设立的下局^②所代替，贡士成了议员。而下局成了采择公议的机关。康有为参照下局，建议清朝采取如下措施：

“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

上述的主要观点，在第二次上书中已有明确表示。^③第三次上书也说到下情上达的事，第四次上书，更具体地提到“设议院以通下情”，还说到“下诏求言”。作为这一具体策略，有如下的提案：^④

“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谓之上书处。……皆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嘉，或令召对。”

从以上所述看来，在第六次上书中康有为举出应仿效明治维新的第二点对策，可以说在第四次上书时已经形成。康有为在第五次上书中也提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日本的议事所只是召征士、贡士，对于采择公议，康有为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设立下情上达的机关，征天下之士民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对于官僚，不论其地位高低，应给予直接上陈皇帝意见的机会。康有为之所以表

① 下议事所，与亲王、公卿、诸侯的“上议事所”相对。

② 庆应4年(明治元年)闰4月21日，根据五条誓文的精神，太政官设议政、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外国、刑法七官，议政官主立法、刑法官主司法，其它各官掌行政。而议政官分上下二局，上局置议定、参与、史官，下局置议长、议员。参看《明治政史》第41—42页。

③ 书中提到中国贫弱的最大原因在于其闭塞的政治体制，君一臣一官一民，大臣一小臣之间相互隔绝，因此应“特诏颁行海内士民，令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名曰议郎。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

④ 第四次上书及其它文中亦提到“开门集议”，令天下郡县十万户而推选代表一人，还有“辟馆顾问”、“开府辟士”。

现出如此积极的愿望，不外乎是由于开始时他的上书被堂官阻挠，鉴于自己的意见难得上达皇帝之耳目的亲身体验，使他痛切地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打破清朝的闭塞的制度。

第三，关于开制度局定宪法，康有为是这样介绍日本情况的：

“开制度局^①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20人，充总裁、议定、参预^②之任，商榷新改，草定宪法。”

这是指庆应3年12月9日，以明治天皇宣布“自此废除摄关、幕府等，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万机。诸事应按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士、堂上、地下之别，皆须尽力发表至当之公议。圣意欲与天下同休戚。故望各自勉励，一扫历来骄情之陋习，以尽忠报国之诚意努力奉公为要”为令，以明天皇亲政之旨，同时设置作为新政府的中枢机关的总裁等三职^③一事。庆应4年正月定太政官制，设神祇、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制度七科，总裁下面是议定、参与，分掌各种政务。同年闰4月改革太政官制，太政官下设议政、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外国、刑法七官。议政官主立法，刑政官主司法，其他各官主行政各部门。^④由此确立了近代的三权分立制。康有为是怎样将日本的官制应用于清朝的呢？他在下面说道：

① 制度局，最初于庆应4年(明治元年)正月17日首先制定制度寮，明治2年5月18日，改为制度取调所，进而于8月25日改称制度局。但是，康有为托于制度局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的制度局所不具备。参看《明治政史》。

② 参预的预是“与”之误。

③ 被任命的总裁是有栖川宫，议定是仁和寺宫，山阶宫，中山前大纳言，尾张大纳言，越前宰相，安芸少将，土佐前少将等，参与是大原宰相，岩仓前中将，西乡吉之助，大久保一藏，后藤象二郎等二十名。

④ 其后中央官制的改变有反复，明治2年7月7日，根据古代的大宝令，设置神祇官、太政官两官，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太政官置左大臣、大纳言、参议等。明治3年闰10月20日增设工部省。进而明治4年7月29日大加改正，太政官设正院、左院、右院，正院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参议等，左院置议政、议官(初为议员)作为立法之府，右院为各省长官等议论政务之所，中央官制大略就绪。

“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重定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

这便与日本的太政官制有明显的差异，但为审议新政而选十数位天下通才入直其中这点，可以说有共通性。然而，日本的总裁、议定、参与的职务，不光是审议新政，而且是明治新政府的最高政治机关。康有为把以上诸官只是理解为新政的规划、审议机关罢了。他把制度局放在“变法之原”的位置以总其大纲，同时“立十二局分其事”。十二局是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各局，并说“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此外，关于制度局的任务，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①中说：

“臣前请用日本例，开制度局于内廷……其有变法之折，并下制度局商议，拟旨施行，然后挈领振裘，目张纲举，新政可行，自强有效，臣所请开制度局者此也。”

制度局是关于审议奏折及制订变法方案之所，根据制度局筹划决定的方案，十二局成了执行新政的机关。^②

通过以上分析，在第六次上书中，康有为有关变法的概念已表现得相当具体了，也就是仿效明治维新的各种机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又没有完全模仿日本的各种机构，可以说是根据清朝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和构思。特别是制度局的构思，表现出他与

① 《戊戌变法》第2册，第214—217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

② 刘仁达《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收入《戊戌变法60周年纪念论文集》说：“依照他的计划，在国会开会前，制度局的任务是定新制，要研究宪法如何而定，它具有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性质，又有通过法律的能力。无论任何制度或法律经过制度局商议之后，即可拟旨施行。根据这种性质来说，它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十二局的任务是行新法，按照它们的职权性质来说，相当中央各部，这些局将构成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

日本不同的独自的设想。^①而且，他还把制度局作为推进变法的中枢机关。为此，围绕制度局的设置，遭到守旧派——变法反对派的顽固抵抗，遂使制度局的设置失败。^②

另外，还没提出第七次上书，^③不过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只强调应仿效俄国，没有发表特别的新议论。总之，通过以上康有为等的一系列上奏，促成了四月二十三日的“诏定国是”，这意味着戊戌变法的开始。

四、康有为的变法设想

如前所述，康有为为推进变法，变革清朝的国家统治机构，设计了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各种机构的新构思。可以说由这个新构思提出了进行变法的具体的程序表。那么，康有为打算怎样实现他的政策呢？特别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各项政策，怎样试图使它具体地适用于清朝呢？

首先看看有关经济政策，第六次上书写道：

“且我民穷国匱，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源通流，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④

另外，《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⑤也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初，频仍变乱，国库乏绝，因而创设国家银行，安定财政。这是指庆应

① 康有为之所以筹划设置制度局，是因为当时皇帝的咨询机关无论总理衙门或军机处，皆为顽固守旧派所把持，阻碍着光绪帝推行变法，几乎没有能作为皇帝的相谈对手者。新设制度局，将变法派中有才能的官僚集中此处，反复研究改革的具体方案。

② 参看北山康夫《关于围绕着戊戌变法政治的诸情势》（《东洋史研究》一五一—，收入《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米涅瓦书房）。

③ 《上清帝第七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2—206页。

④ 关于发行纸币，康有为曾在第二次上书中提倡过：“富国之法第一是行钞法，户部用精工制钞”，设官银行使“上下相通”。在第三次上书中亦重复了这点。

⑤ 《戊戌变法》第3册，第2—4页。

4年闰4月，根据参与由利公正的建议，最初发行太政官札，^①明治新政府设立国立银行发行纸币，以安定国家财政一事。康有为鉴于以上日本的成就，建议清朝也设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但是，明治初年的日本币制改革，并非如康有为所想的那样顺利进行。如明治5年12月15日公布了“国立银行条例”后，开始有了第一个银行，随后许多国立银行也跟着设立，这使纸币的发行额大量增加。还有，当西南战争之际，政府增发了大量的不兑换纸币，使纸币的价格急剧下跌，引起经济界的大动荡等事实，康有为果真认识到了吗？他对日本的银行制度和纸币制度的理解有很多问题。

其次，康有为仿效日本新政的另一个方面是教育制度。他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对推进变法的重要性。他在《请开学校折》^②里写道：

“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吾国任举一政一艺，无人通之。……不可不亟设学以育成之矣。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③

因此，康有为建议乡设立小学，州、县设立中学，府省设立高等专门学校、大学，七岁以上者务必入小学，并且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日本于明治2年2月3日，政府在《府县施政顺序》的第十三条中列有“设小学校管理所”，鼓励设立以庶民为对象的小学

① 关于明治新政的货币制度，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亦有相当详细的记述。例如，同书卷六，《食货志四》，国债条记道：“维新之际，以王师东征，岁入不足……乃从由利公正之言，制造纸币，名曰太政官金札”。参看《明治政史》第1编，37—41页。

② 《戊戌变法》第2册，第217—219页。光绪三十四年五月。黄彰建氏谓此为伪折。

③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戊戌变法》第1册，第457页），读西学书法条说：“欲周知四国，成一家言者，非习西文不可。日本举国之人，能通英法文者凡及其半，此人才之所以盛也。”

校。明治3年制定大学规则及中小学规则。继而5年9月为了确立国民教育的基础,仿法、美两国的学制颁布新学制,发布太政官布告,以期“自今后一般人民(华土族农工商以及妇女)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确定义务教育的方针。这种义务教育制度的确定,毫无疑问给尔后日本的国力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康有为注意到这点,^①表明他对明治新政理解的一个方面。

康有为变法的最后阶段是开设国会,^②制定宪法,目标是要建立立宪国家。我想他是清楚地认识到明治维新的大致终点是明治22年2月11日的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次年(23年)的开设国会。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内阁学士阚普通武奉呈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③提出请定宪法开国会,但事实上此折是康有为起草的,折中说道:

“外采东西强国(之所长),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继而同年六月的奉《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事折》^④中,有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定国会(召开)之期,明诏布告天下”。这大概是仿效明治14年10月12日,明治政府以明治23年为期,宣布开设国会的敕谕吧。^⑤另外,康有为建议在开设国会实施之前,必须征募全国人才以议论政治。他说:

“日本未开国会之先,亦先征一国人才,以议政事。”^⑥于是

① 梁启超在上引书《戊戌变法》第1册,第455页)中说:“变法之本原,曰官制,曰学校”,指出教育的重要性。

② 最早主张开设国会的是“中法战争后,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具有资产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陈虬、陈炽等”,但“最早直接向皇帝提出(这个意见)的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61页)。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条中说:“今日本行之(议院),亦勃然兴起。中国尚可不亟行哉”。

③ 《戊戌变法》第2册,第236—237页。黄彰健氏谓此乃伪折。

④ 《戊戌变法》第2册,第240—242页。黄彰健氏谓此亦为伪折。

⑤ 参看稻田正次《关于戊戌政变》(《近代中国研究》好学社,1948年)。

⑥ 大概是指上述“议事所”之事。

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出，臣所写进日本变法考，已发明之。伏乞皇上特下明诏令群臣各荐才俊，……概行征集阙下，大开懋勤殿，令入直行走，……日轮二十人，置之左右，以备顾问。”

同时，天下之士民，不论其身分高低，皆许其上书，请自由上达意见。此外，如上述制度局也是作为制定宪法的准备委员会。因此，康有为的制定宪法，开设国会的设想，是希望能更全面地学习日本的变法。

与开设国会相关，康有为在第六次上书中，指出中国也有组织政党的必要，还编有《日本会党考》，附在《日本明治变政考》中一起进呈光绪帝。^①此外，笔者不明白《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年四月十六日的会事续闻条^②中说的：

“皇上盖深知外国之兴皆由于会，且会并非有碍国家，有碍君权，而论者纷纷疑会即为民主，此真不察之甚。……日本会几千百，而国势日强，君位日固，且能拓地日多，威名日盛，尊内攘外，皆彼爱国会^③进步会之功也。”^④这既是针对日本经发布开设国会敕谕后，相继组成自由党、改进党等各种政党而发的议论，又是为中国开设国会作准备而提倡必须积极地组织政党。

与上面各项政策相比，次要的问题有，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康有为在奉《请设新京折》^⑤里，建议现在的京师即北京，由于其位置偏北，望能在江南奠定新都：“皇上……先为巡幸(江南)，及文物咸备，乃定为京邑。”这个想法也是仿日本明治新政之际，为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条(《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3页)。

② 《国闻报》是由严复等发起，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一日在天津创刊的报纸，与《时务报》一起成为变法派的重要的宣传工具。《戊戌变法》第4册，第383页。

③ 所谓爱国会，大概是指明治7年1月，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等，联名向左院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从而组织的“爱国公党”吧。

④ 梁启超在《南学会叙》(见《戊戌变法》第4册，第419—422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中亦指出：“改进、自由诸会党，继轨并作，遂有明治之政也。”

⑤ 《戊戌变法》第2册，第259—262页。这里所说与迁都的意思稍有不同，康有为已经在第二次上书中展开讨论了迁都问题。黄彰健氏谓此乃伪折。

一新人心，实现维新之理想，不如迁都的议论高涨，于是将京城由京都迁往江户(东京)之例罢。

与上折前后上呈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①中说：

“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

这是康有为自己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际劝诱断发、废刀令和采用洋服等事项而发的议论。但是，辮发和日本的结发不同，因为它是汉民族对清朝服从的象征。所以他的断发的主张被满洲贵族视为革命的要求，是不无理由的。继而关于改元之事，他说：

“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与天下更始。”

尽管在中国明太祖洪武帝以降曾打算采用“一世一元制”，但康有为这种破弃惯习，敢在光绪帝在位期间提出改元的主张，这种变法主张大概是为了加深国民的印象罢。

以上是对戊戌变法实施时，康有为所筹划、设想的各项政策中，就其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而构思的政策试举若干条。这样看来，康有为的变法概念，更多的是采自日本明治维新，这是不言而喻的吧！

五、日本舆论评戊戌变法

对于变法派康有为和梁启超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新政，当时日本的舆论表示怎样的反应，给予怎样的评价呢？当然，作为舆论，只能通过当时的报纸、杂志去推测。^②

对变法运动表示最深理解的是《万朝报》。例如，它记载变法运动有如下的说法：清朝自咸丰、同治以来，所有论时务者，没

① 《戊戌变法》第2册，第263—265页。黄彰健氏谓此乃伪折。

② 关于本条，完全依据志村寿子《戊戌变法与日本——论甲午战争后的报纸》（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六一二，1966年）。可以说，志村氏之说不过是介绍，特记于此，表示对志村氏之谢意。

有一人像今日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提出既广且深的改革建议。在日本人中有这样的看法：“亲居彼间，交其朝野人士，视察内情形势者，往往认为清朝改革之气势无甚足恃，改革派的领袖即使如康有为、汪康年^①，其人物皆非有旋转乾坤之大气魄大力量。加之一国人民柔惰怯懦之风，此容易约束，改革之建议虽层出叠见，以此为其风气大开之征，为时过早。”^②但是，明治维新时提出过改革建议的日本人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嘲笑清朝的志士不懂外语，所学的西学也只是一知半解的陈腐货色，不符合最近的西学，不能作为清朝的救国之策。不过，在我国维新前后的诸豪杰中，又有几个懂外语，通西洋之事？此外，日本人将太宝令的复古与新时代的新组织并立，那样难道可以说要比现在清朝的改革论远为优越吗？^③以上《万朝报》对中国的变法论的评价，较之对明治维新时日本的改革论的评价还要高。

《日本》亦高度评价筹划期的变法运动，主张日本应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引导其实行内治、大制的革新。^④提倡假如国家间的协力有困难，则日本及大陆的志士应团结个人的力量，组织以“人道的进步”为目的的结社，进而必须缔结挽救亚洲衰亡的“亚细亚的亚细亚”联盟。^⑤杂志主编福本日南于1898年4月访问了清朝，报告了变法运动的实情。据他说，近来清朝官民之间亲日本，学日本的思想抬头。曾经是对日主战论者的张之洞、刘坤一，这时也成了热心的日清同盟论者。如康有为主张以日本明治的新

① 关于汪康年，内藤戊申有《汪康年传稿》（《东洋史研究》十七—三，1958年），又《强学会记事——汪康年传稿之二》（《东洋史研究》十九—四，1961年）。1895年冬，强学会被禁之际，他在上海与梁启超共同创办旬刊杂志《时务报》，鼓吹变法运动。

② 《万朝报》，明治31年9月11日《清朝改革的风气》（上）（评论）——据志村论文引用（以下同）。

③ 《万朝报》，明治31年9月13日《清朝改革的风气》（下）摘要。

④ 《日本》，明治31年5月13日《应当促进中国内治的革新之议》（社论）。

⑤ 《日本》，明治31年1月24日《为东大陆必须振兴福兰库（音译）、共济会的秘密结社》（论文）——福本日南。

政为政法。还有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说：如欲得欧美的新知识，不必远去欧美，求之日本便可。此外，各地出现了报纸、杂志、译书、学校，组成了社团、学会，充满革新的气象。特别是广东，可与明治维新时的水户或萨长相比。并说如此的革新气象，“其程度以我过去40年的历史视之，其在嘉永之末，安政之始欤。盖彼之革新愿望，当前官民朝野不一。而且其中公武合体论有之，尊王讨幕论亦有之，水户流的勤王论亦有之，平田流的复古论亦有之，象山流的外交论亦有之，南洲流的国权论亦有之，是等相执不相下，相竞不相合，是为此国还不至引起国民的大运动的重要原因，故今日之急务，在于导彼等合于大同，即尽早促进其气象达到庆应初年。”^①强调应当此任者，唯有我日本。进而主张我国对清策之要道为“以彼国之革新为原动力”，从外部施加压力，革新清朝的国家制度，这是扶植东亚和平的根本。^②

福本日南的这些论调，不只是对康梁变法派的革新运动进行了评价，而且还得出结论：我国应乘此机会，促使清朝变革，假如清朝自己力量不够，必须从外部施加压力，以达成此目的，而完成这些的，应是我们日本。这也可以叫做一种亚细亚主义的扩展吧！

尽管如此，《万朝报》和《日本》还是表现出对变法派有一定的了解，对他们抱着同情的态度。而政府系的报纸可以说一致对变法派表现出非常冷淡的态度。首先，伊藤系的《东京日日新闻》，对变法派持冷淡和否定的态度。大隈系的《报知新闻》，关于变法运动有这样的话：“如康有为一派的志士各地奔走鼓吹改革的聚会，要么只是空言”，^③即否定它的效果。不过对作为改革而寻求日本模式这一点都是喜欢的。其次，《时事新报》说，中国能进入文明之门是非常好的事，为此请日本人为教师则最为有益。他们

① 《日本》，明治31年4月15日《日中的时局》（论坛）——福本日南。

② 《日本》，明治31年5月16日《对清策的要领》（社论）。

③ 《报知新闻》，明治31年7月15日《清朝谈》（上）。

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对康有为等人的改革方法又表示怀疑，说他们即使有皇帝的庇护，但地位如此低下，难以进行彻底的改革。并批评说，康梁的过激方法，只会惹起混乱。^①

对变法运动表示否定的《东京日日新闻》和《报知新闻》的论调同样都是主观论。将日本的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的《时事新报》，则可以说是对正在清朝发展中的政治形势进行冷静观察之后作了客观的判断。

总之，当时的日本，对变法运动的看法，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存在着积极评价和予以否定的两种态度。以同情的立场评价变法运动者，表现出他们同时对日本国内的革新的期待感。相反，对变法运动表现出否定观点和冷淡态度的，他们从掌握着现政权的角度，对变革有着本能的嫌恶感。或者是因为牵涉到变法的事，担心与清政府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吧。这种观点，到底对清朝的政治状况是否有正确的、客观的理解，是值得怀疑的。大概只有上述《时事新报》的论调，在当时可以说是颇为正确的分析吧。

结 束 语

鉴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试图改革清朝国家体制，实现富强的变法维新运动，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政变而瓦解了。^②从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以来，只不过百余日，因此欧美人称之为百日维新。

那么，为什么变法运动会以惨败告终呢？如最初所说，变法运动的目标是废除旧制，采用新法，改变作为团结国民力量的清朝国家体制。这决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统治制度，可以说是

① 《时事新报》，明治31年8月8日《关于设置制度局议》（上海通信）。

② 参看汤志钧《戊戌变法简史》（中华书局，1960年），稻田正次，前引论文，及北山康夫，前引论文等。

基于改良主义立场的改革。然而，变法派想在保存传统的封建体制下采用一些新政策，这种改革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康有为的变法观念，一方面是寻求日本明治新政，另一方面可以说对明治维新的重大变革都被忽略了。明治变革的不彻底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如废藩置县，改正地租等措施，却是对以前幕藩体制的根本否定。此外，对明治政府在积极采取培植近代工业，从而发展日本资本主义方面，康有为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始终只是从表面的、形式的方面去模仿，这就意味着重蹈洋务运动失败的覆辙。不过，变法运动明显具有与洋务运动不同的积极意义，即它是甲午战争后针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出现的一场民主政治运动，并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①

此外，当时的清朝宫廷，被以西太后为首的固守传统体制的顽固派把持着，变法遭到他们的强有力的抵制，以不过是拥有虚位的光绪帝和没有实权的康有为及其变法派官僚的力量来看，失败的趋向可以说从一开始便已显现。康有为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那么，戊戌变法可以说不过是“小变”，因为真正的变革，或全变，即应有将旧体制从根本上破坏的必要。

追 记

由于黄彰健所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的出现，康的《日本变政考》首次被介绍，还指出以往在他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奏折中，存在很多伪折，于是本稿似有全面再检讨的必要，这次只是作了最小限度的订正。

译自山根幸夫著《近代中国与日本》(论文集)，日本

山川出版社1976年出版，第1—36页。郑海麟译

① 关于论戊戌变法的积极意义，有邵循正《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意义》(收入中华书局《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② 《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

一代鸿儒康有为和他 服务的日本女性

〔日〕鸿山俊雄

一、前言

有人说，在世上偶尔碰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往往决定自己将来的命运。笔者说不定也是受这种偶然奇缘影响的一个。

我与中国有缘份是从四五岁刚刚懂事时开始的。因为我父亲常常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进行交往，通过交往，进而和他的一家也都熟悉起来。那时，笔者很小，已和康有为的儿子一起玩。另外家中房间里挂有康有为赠送父亲的诗，我也常常走到跟前看。就这样，不知不觉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但是，这里有一件奇事，这件事是我前些时候偶尔遇到一位名叫绫子的妇女后才知道的。原来是64年前康有为一家住在须磨时，有个叫做鹤子的妇女帮助康有为料理家务，后来她跟康有为到上海做了康的第四夫人，下述绫子就是她在上海期间偶然与康有为长子康同箴的一次同房生下的，说来的确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复杂的事情。

笔者不是文学家，所以对这种受不幸命运摆布的人，不能有声有色、感人肺腑地将其身世描写出来，感到十分遗憾。但考虑到康有为这样的历史人物，觉得这件事对了解中国要人家庭内部的一个侧面很有用，无论如何要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

于是就命笔写下这篇文章。

昔日性格刚强的鹤子，认为年轻时犯了重大罪过似的，对上述情况一直守口如瓶，就是对关系密切的人也只字不提，长期埋在自己心里。可是，想到自己已进入老年，寿命不会太长，所以就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全部告诉了女儿绫子。绫子突然听到母亲这一告白，知道生父的出身，感到非常惊奇。与此同时，就和世上一一般人那样开始寻找自己的父亲。由于她们母女俩常常通过一些人到我这里来打听康家的身世，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与之相遇的奇缘，经过一番了解后，我决定把她们谈到的有关康家的一些事情发表出来。

二、一代鸿儒康有为

康有为别名祖貽，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原籍广东省南海县，一般都称他南海先生。他生于咸丰八年，民国16年逝世于青岛(1858—1927年)，享年70岁。

康家是广东的一个名门，世代从事政治活动，父亲康达初曾任江西省知县，弟弟幼博也是戊戌政变时的“六君子”之一。

康有为小时候就抱有经世之志，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从爱国爱民做起，所以他的论点是以重视民权为主要内容的。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以一个普通举人的身份，大胆地向当时的皇帝德宗上奏意见书，其内容要求实现君主立宪政治，同时也陈述了当时社会的弊病，认为应当及时变法(改革)自强，即改革各种制度，以此培养强大的国力。可惜他提出的新意见未能上达皇帝手中，因此他在四年时间里，连续上奏7次。可见他是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人，这种伟大的精神，使他始终没有放弃原来的志向，因而他上奏的意见终于被光绪皇帝知道了。皇帝

破格地召见了他和梁启超，召见后他们很幸运地得到皇帝的重用。根据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频频发出上谕，宣布接受西洋文化和改革制度。然而守旧派不喜欢这种激进的改革，他们拥护西太后，对改革采取反对态度，因此新政仅仅实行了一百天就告结束，接着发生了戊戌政变。也就是说，变法时毫无疑问激怒了慈禧太后这就不必多说了，此外康梁等人为了除掉这些守旧派，打算把拥有武力的山东总督（应为候补侍郎——译者）袁世凯拉到自己一边，可是被出卖了，结果造成光绪帝被幽禁，许多同志被捕，有的则遭到杀害。

就这样，变法失败，清室也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孙文领导的灭清兴汉的共和新政的民国。民国的诞生，是因为康有为等人进行了戊戌变法。因为它是一根导火线，导致了民国的成立。康有为是第一个提出改造中国的，作为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抹煞。

康有为主张变法自强，光绪十七年（1891年），当他作为当代第一流学者上书皇帝要求改革国政时，已在广州长兴里建起一个万木草堂，把天下有识之士聚集一堂，讲解新知识，倡导变法。作为门生受到熏陶的梁启超等人，都是一些立志进行维新的天下俊才。

康有为在改革国政之前曾说：进行气势磅礴的文化教育改革，比如：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校，创建报社，翻译欧美书籍，开设书店，组织学术研究机关，展开宣传等，乃是从君主专制时代一步一步向民主社会前进的初步改革。这种新思想，已稳步而顺利地付诸实践，若干个学堂和学会建立起来了，例如在北京建立的强学会，在上海建立的时务报馆，在长沙建立的时务学堂等等。同时还发行了一些报刊杂志，翻译了许多外国书籍。

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变法失败流亡到国外以后，也没有停止。先期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在东京发行了机关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这些报刊不仅对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影响很大，而且对国

内的知识阶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梁等人的设想在日本华侨中也做了一番尝试，他们对那里的一些私塾教育进行了改革，明治31年（1898年）在横滨建立了第一个新的教育机关——大同学校，校名就是根据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命名的。第二年，在神户也建立了一所同文学校。

康有为擅长诗文，著作很多，其中《大同书》、《书镜》已作为名著而闻名于世。他的名著已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而且研究他的“康有为研究会”也在美国建立，会员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南朝鲜等国的学者。

另外，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须磨住了一年多的时间返回上海。此后脱离政界，晚年他把长期搜集起来的古书画拍卖后，移居青岛。在这里，他时而去天津，时而去大连，来来往往拜访旧知和参观名胜，过着清廉的生活。

民国16年（1927年），因为他已进入古稀高龄，他的门生梁启超和其他朋友，送他祝寿诗和大摆筵席为他庆贺。然而，这时候他已心身衰老，当年被称为保皇党领袖而和革命党孙文相提并论时的那一英姿已不复存在了。就在这一年，他离开了人世。

三、第四夫人鹤子的自白

“我前年春天害了一场大病，加上年龄已过70，想想晚年时间不会太长，于是就把自己曾是康有为第四夫人的这段经历告诉了女儿绫子。但是，不幸中之大幸，我的病渐渐好转。随着病情的好转，女儿便根据我的自白，拼命地去寻找自己的宗系。不料，这一次却打听到您的门上，请您来帮忙寻找。在和您这样那样的交谈中，我想起小时候在须磨康家帮助料理家务时，看到过您父亲，他对我很亲热，他的女儿对我也很热情。我觉得非同寻常，太巧了，这种奇缘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您父亲身材高大，留有胡须，是一个很漂亮的人。他的女儿也很美丽、善良。

“然而，我知道世上有许多人，往往被奇特的命运所摆布，在苦难中度过一生。我的一生虽然算不上那么坎坷，但也可以说走过的道路与一般人不同。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交织在一起，我的经历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觉得事情已经过去。只要守口如瓶，也可以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所以至今半个字也未透露。可是事到如今，我已向女儿绫子全部讲了出来。讲过之后，女儿得知在台湾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于是去年（1970年）又到台湾会见了他（康保延）。见面时，姓氏名字自我介绍后，姐弟得以相认。既然相认，也就没有什么不可讲的。因此我毫无隐瞒地把当时的所有情况全部告诉您。（文中括弧内文字，均系笔者所加，下同）

“我父亲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译者）结束时，从县的淡路岛来到神户，在市政府担任公务员。

“我生于明治30年（1897年），当时家境不富裕的孩子，小学毕业后，一般男的出去当小伙计，女的则去为人帮佣。我是个女孩子，在明治45年（1912年）即16岁的时候，经居住在市内的婶母介绍，到康家作女佣，因为平时经常在神户市区里看到欧美人和中国人，所以去康家帮佣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安。康家位于离兵库神户市不远的须磨寺附近，住的房屋非常漂亮，听说这个寓所原是兵库地方小西先生的别墅。当时康家有康有为、夫人，和一个年幼的儿子（同凝），我后来才知道康的夫人已是第三房夫人（何金兰）。此外还有两个中国厨师和一个阿妈（张喜），以及一个姓阮的日语讲得非常好的秘书（阮鉴光）。康有为一家人都穿着中国服装，房子虽然是日本式的，但在榻榻米上铺有地毯，地毯上放着桌椅，房间照西式风格布置。因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虽然感到有点不适应，但是大家对我非常热情，而我又努力做事，所以康有为夫妻和家里人都很喜欢我。康家经常有客人来，其中以中国人居多，也有不少日本名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经常来访，但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些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我

才知道，康有为是在中国能与清朝皇帝直接对话的数一数二的伟大人物。

“我在康家的工作是打扫房间，把客人引进客厅和跑来跑去进行传达等。在这里度过一年左右，康有为决定全家回国到上海去。

“康有为回国后过了三个月，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一切不必担心，请你务必到我这里来做客。接到这封信后，觉得他们一家盛情难却，而我对他们的为人又很了解，到那里要做的事，和在日本无甚两样，再说到那之后，还可以知道一些以往不知道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就产生了去的念头。虽然到遥远的外国去多少有点不安，但父母答应了，所以我就鼓足勇气启程了。

“到了上海一看，完全与神户不同。上海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都市，有许多高楼大厦，人口稠密，使我这个18岁的小姑娘非常吃惊。因为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看到的听到的都感到新奇。到了上海，我受到热情而周到的接待，顺利地走进了座落在法国租界的康有为的寓所（上海愚园路192号天游园康公馆电话号码〔西〕1479），他们对我远道而来都感到非常高兴，并把家里人一一介绍。通过介绍我知道，康有为除了正妻第一夫人（张妙华）外，还有第二夫人（梁随觉），以及从须磨随康有为来的第三夫人（何金兰），由于这些夫人都有孩子，全部家庭成员有十余人，这样的大家庭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除家庭成员外，在雇佣的人当中，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他们头上包有卷起来的白布，满脸络腮胡子，另外还有厨师、男仆、阿妈等共七八个人。房子除一幢砖瓦结构的西式洋房，和一幢纯中国式的房子外，尚有一些附属建筑。庭院里有池塘，由于康有为喜欢日本风味，所以家中的一些灯笼都是特地叫人从日本弄来的。康有为藏书很多，简直像个小图书馆，他还收藏有一些古董，我在他家没有多少事情好做，有时用鸡毛掸掸上面的灰尘。有时教英语和教钢琴的家庭教师来了，就跟着大学一起学习。我就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下度

过的。

“另外，康有为还常常带着家属到苏州、杭州去游览。到了夏天因为特别热，就到青岛的别墅去，在那里我陪着他愉快地进行海水浴，有时还和他一起骑着小毛驴到他喜欢的古庙、古寺去参拜。

“康先生非常善良，是一个很体贴人的长者。但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波折，我并不清楚。他在书斋里装有一个机关，只要推书架的一个部位，书架就开始转动，一转动，他就可以逃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也许是为了防备随时来袭的刺客，这个问题姑且不谈。再说康先生在这个书斋里总是面向桌子用毛笔写什么东西，有时候写坏了，就搓成一个圆团投到字纸篓里，并且常常把纸团拣起来，做个皱皱眉头的动作给人看。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自然而然地听懂了康先生的广东家乡话，生活也习惯起来，丝毫也不感到寂寞。当康先生长女康同薇到日本去新婚旅行时，我陪同前往，借此回国一次，在东京还去拜访过大隈侯爵。

“康有为的第一夫人虽然生了两个女儿，但没有一个男孩子，所以又娶了第二夫人。第二夫人除生了长子同钱外，还生了两个女儿。康有为带到日本来的第三夫人，也生了次子同凝。在中国有盼望子孙满堂的传统，生不出男孩就娶第二或第三夫人。因为第一夫人可以谅解。所以这些夫人不象日本的妾那样被人瞧不起和心情郁闷。因此，他们生活在一幢房子里还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同时，在身份高或者有钱人家里，也有一些女方主动自愿地去委身事主。这种情况不一，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听说第二夫人是后一种。我虽然做了第四夫人，但是没有和康先生同房过。可惜好景不长，不知不觉地我将要度过20岁的青春年华，这时突然在一个偶尔的时刻我和康有为的长子同钱要好起来。当时同钱是20岁，在上海的大学里读书。当我觉察到的时候，已经怀孕了。从表面的名份上说，我毕竟是康有为的第四夫

人呀！尽管如此，我竟然和康氏儿子发生不义关系，这种行为在中国是最令人厌恶的。因为身居异乡，也没有可商量的人，在懊悔之余，只向同箴讲了此事。由于没有引起什么麻烦的事情，于大正4年（1915年）结束了我在中国的生活回国了。回国后生下我的女儿绫子。此后，康有为曾来信叫我再回上海，因为我已经生了孩子，所以就放弃了去的念头。在昭和14、15年（1939、1940年）时，好象同箴曾通过什么人打听过我的住处，但我把自己身世隐匿下来。那时候，同箴好象在铁路局当工程师。上述情况，我即使讲出去，也不会得到信任，只会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所以我仍然守口如瓶。

“回国后和往常一样，过着苦难的日子，有时带着孩子投亲靠友，有时去人家帮佣以维持生活。女儿绫子小学毕业后，就去学习剪裁，到能独立生活时就结婚了。现在有一个儿子，这个孩子正在准备升入大学。在这期间，同箴也已去世。如前所述，绫子的同父异母弟在台北，她知道后就去台北相见，而且以后能够通信，感到很高兴。

“现在我把背在身上的一个沉重的命运包袱，全都放下了，心身都感到很轻松。回想起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和以后的苦难生活，已象走马灯那样一幕一幕过去了。”（昭和46年（1971年）秋记录）

鹤子作了这番自白后，我想再详细打听一下康有为在世的情况而又去访问了她，哪知道她已离开了人世。原来，在一年前的昭和49年（1974年）2月19日，鹤子对她女儿说，她到附近的王子公园散散步，结果一去不复返。由于她耳聋，脚也不大灵光，离开家后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须磨那边走去，结果走到铁道上自杀了，也许是她回忆一生时，想起60年前到康有为家帮佣时的那段情景，引起她对一生的回忆，觉得自己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从而产生自杀念头的吧！据说在遗书上她草草写下这样的几个字：“生活的煎熬已使我身心憔悴。”

四、康有为流亡须磨时的临时住宅

大约在10年前，有人来问我：你知不知道在须磨曾住过一位清国的大人物？经他这么一问和向他进一步了解一些康有为的情况后，得知他所问的就是当年我五六岁时，父亲曾带我和有时我随姐姐一起去拜访过的那幢康家住宅。房子虽然几经易主，但仍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我感到很高兴。于是就想：无论如何要去确认一下，并借此机会把当时一些情况重新回忆出来。但因事务繁冗，岁月如流，未能如愿。

然而，我知道当时曾在康家帮佣过的鹤子仍然健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和康家的人所生的女儿。所以我就产生一种想法：一定要把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的康有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写出来。我打算先调查一下康有为住过的房子。不料在我着手进行的这一期间，鹤子已经离开人世，她是于去年年底在前往须磨时不幸死去的。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我不得不赶忙去看看康有为的旧居。

我是事先与房主进行一番联络后，于4月4日，樱花初开时出发的。乘坐国铁在须磨站下车后，沿着公路稍微偏东的一个昔日叫作兵电（今日山阳电铁）的地方走去，那里有一座立交铁桥，穿过立交铁桥后，留存下来的一排排古老的房子就展现在眼前。这里有净土真宗现光寺，寺的面貌依然如故，寺院的上空已被楠树、椎树、松树、银杏等参天大树覆盖起来。当时可以看到，在寺庙前面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道路的一侧，有小溪流过，清澈的水把山上的细沙冲向下游。现在这条路已变成暗渠，路的下面有污水流动。道路的西侧，屹立着12幢房子，由此往里有一个长达10米左右的突然高起来的小丘，小丘一直延伸到须磨浦的观潮台，地势也逐渐升高。从这条道路稍许往里走，在一个高台的地方，有一间问事的房子。

进门后，登上几阶小石头铺的台阶后，便是房子的正门。从

东首的正门往里走，有一条走廊，走廊西边并排着10个房间，每个房间可铺上6张草席，南边的4个房间，是利用土地断层建造的，下面用10几根木桩支撑起来，使其突出地面，靠近池子，池子的水就是经过这里流向小河的。房顶上的瓦片经过风化后有的已经变脆，但室内的地板和天井却非常牢固，而且精工细作，十分别致。可以想象，建造这样的房屋不管当时的物价多么便宜，也要付出相当多的金钱才能办到，否则是无法建成的。

我记得63年前，被父母带去品尝广东菜的那个房间好象很大，可以铺上6张席子，恐怕后边的一个房间也打开了吧！现在那里的院子已变得狭小，窗外只能隔墙看到一排排房屋。在我的记忆中，由许多树木围起来的那一别墅的幽静环境已经变得淡薄了。房子的面积是66坪（计算面积单位，一坪相当于36平方尺——译者），这一点和当年相同，不过2300坪左右的土地，除了现在用于造房子的150坪以外，其它的全被零碎出售。从正门往下走，在一段台阶上，竖有一尊珍贵的雕刻石像，它很象仁王像，身躯有一间半房子那么高。其造型与一般雕刻不大一样，我感到很奇怪，像这样一尊与众不同的石像，怎么在我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印象？也许当年我的好奇心只集中在房间里带有喇叭的留声机，和坐下去就会发出乐曲的椅子，以及那些操外国语言的异国人身上，而没有注意石像。至于厨房，在房子的紧里边，厨师们在那里进进出出等情况我还记得。仆从的住处好像在离开主体房屋稍远些的另一幢房子里。

整个房子都是很巧妙地利用斜坡建造起来的，所以有谷、有河、有池。康有为似乎对富有山水之美的日本式庭院非常喜爱。

康有为通过什么关系和从谁那里租来这幢别墅，以及他与房主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我做了充分调查，但都难以作出定论。在这期间，好不容易了解到房主，原来这里的房子是住在兵庫的湊川神社西门前（当时据说是放高利贷的）一位从事金融业小西某某的别墅，他和康之间没有政治联

系。

顺便提一下，康有为有一位广东同乡叫麦少彭，他和当时在神户的华侨富豪、浙江出身的吴锦堂地位相埒。麦的住处靠近生田神社的西边，那里有他一所漂亮的宅邸，里边有假山、水池等，他常常在这里招待到神户来的清国要人，后取名叫“留春别墅”。另外，麦在康有为来神户的10年前，就沿着须磨海边、即现在海滨公园附近建造了一座别墅，取名为“双涛园”，有空时则到这里来娱乐、消遣。

康有为在明治45年（1912年）晚秋来到神户，在麦的好意照顾下，暂时住在双涛园，直到第二年樱花开放时才迁居到这里（现在是须磨区千守町一丁目五之六），一直生活到大正2年（1913年）秋，他返回上海时止。这幢房子现在是纤维批发商三条胜二的住宅。

五、客居须磨的日日夜夜

关于客居在须磨的情况，遗憾得很，我不太清楚。这里只能根据见到的一些片断记录，了解康有为的活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他有时参加神户著名华商在神阪中华会馆举行的茶会，并发表讲话，有时在有影响的华商俱乐部——商话别所进行恳谈，有时到布引的瀑布那里去游览，或到諏访山洗温泉澡，并从这里眺望神户港的景色，或者如后面谈到的那封信的内容，于大正元年（1912）年11月30日，持着犬养毅写给片冈直温（前日本生命社长、后任大藏大臣）的介绍信赴京都，参观京都的寺院佛阁、庭园和川岛甚兵卫的葛布兰式壁毯。

平日康有为除到须磨寺前大池和须磨海边散散步外，有时还和梁启超等门人，及神户华侨等进行恳谈和会餐，有时则与来访的客人谈话，或者挥笔作诗，大概这就是他平时的一些活动吧！不过，他的诗文和笔迹留下的并不太多。

上述神阪中华会馆，是明治25年（1892年）作为旅居大阪神户两地侨民的开会场所而建造起来的，它位于旧神户市的里山——諏访山的山麓。因为是一幢纯粹中国式的建筑，所以在神户的街上大放异彩。旅居神户的华侨，经常在这里招待来访的本国要人，从举行欢迎会、演讲会、聚餐，一直到赠送书画、对联等（例如合肥李鸿章、福州郑孝胥、出使各国钦差大臣戴鸿慈、出使日本国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这些诗联都悬挂在馆内的梁间、壁上和圆柱上。可惜这幢房子罹灾，所有东西都烧成灰烬，其中就有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书翰。梁启超的诗（另稿刊登）虽然抄录下来了，但康有为的文字却因过于狂放而无法识录，这一点则是非常遗憾的。

现在，这座中华会馆已变成一所中华同文学校。学校是在梁启超的发起和麦少彭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

犬养毅致片冈直温的信笺

片冈直温阁下：

敬启者，现介绍康有为君，他的大名也许你已听到过。这次康君想到京都参观各个寺院的文物，麻烦你给以充分方便，特此拜托。

另，著名的庭园及川岛甚兵卫的葛布兰式壁毯等也想顺便观赏一番。

犬养毅

十一月三十日于相州汤河原

这封书笺一直保存在康家。从留存在他身边的这一点看，说明康有为来神户之前，已经到日光汤河原游览过。当时他带的这封介绍信，也许没有使用就带到京都去了，或者说不定到京都参观时没有递交出去。

六、康有为写下的遗书和被刺经过

凡是参与和掌管国家大事的人，常常会遭到刺客的暗算，这是世上常有的事，康有为也不例外；同时，以往在不测风雨之前而写下遗书的人，也为数不少。康有为在戊戌政变时，从北京逃到上海，那时他也写下一封遗书，内容如下：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 康长素遗笔”

如上所述，康有为是在向光绪皇帝出谋献策后，正准备对各种颓废制度进行改革和意气风发地振兴国势的关键时刻，被西太后揭露出来，结果这一计划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的戊戌政变。

政变后不久，康有为等冲破大批军队的包围，越过北京、天津的严密警戒网，从天津乘英国轮船逃到上海。抵达上海后他受到英国领事的庇护。在这里他听到一些谣言说什么：康有为是毒死皇帝后逃亡出来的。根据这一谣传，康有为以为皇帝已性命不保，而自己也只有一死相报，于是他决心投海自杀。但是英国官员察觉他并非等闲之辈，劝他在真实情况得到证实以前耐心等待，所以康有为在这期间写下上述遗书。这就是他自杀未遂的经过。

这份遗书，是由当时在康有为身边的徐君勉送呈康母的。徐是横滨的一位华侨，政变后任横滨大同学校的校长，是康有为的

热情崇拜者，他常常到神户中华会馆或同文学校发表演说，从事启蒙运动。他的言行和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给神户的华侨以很大启发。徐的口才很好，悲愤慷慨地谈到光绪皇帝的苦恼情况和西太后的专横残暴，据说学生们流着眼泪听了他的讲话。戊戌政变时，除徐以外，还有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就是原住横滨后搬到神户担任同文学校校长的华侨汤觉顿。他和康有为情同手足。至于麦少彭，那就不必多说了，他在神户给了康有为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很大援助。

再说，如同鹤子在上面所讲的那样，在上海法租界愚园路寓所的书斋里，装有一个可以潜逃的机关。这个机关是为了防御突然闯入者而备的，房屋的内外还有印度警卫监视来访者。

在此以前，康有为曾到过新加坡，是在明治32年（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后去的，在那里，他得到英国当局的保护。恰巧此时，传来一阵风声，说来自日本的一个刺客已秘密出发。不久，曾跟孙文通力合作，在促进两派联合方面作出努力的宫崎滔天等人到达新加坡，英国当局加强了戒备，康有为也怀疑滔天他们是不是刺客。由于这一原因，滔天等人被英国当局逮捕。有关逮捕经过，他已写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

另外，横滨华侨出身的著名文人苏曼殊，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21岁时，曾企图暗杀一度逗留在香港的康有为，但没有成功。这件事在《苏曼殊年谱》中已有记载：

“1904年2月，忍受不了惠州的贫困生活，就偷了师兄的度牒逃到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从此使用别号曼殊。并企图用手枪暗杀保皇党的康有为，但被陈少白阻止未遂。”

这位苏曼殊系出生在横滨的华侨，他的母亲是一位日本妇女。因为适逢明治31年（1898年）梁启超开办的大同学校开学，他入学了。4年后的明治35年（1902年）毕业，接着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大同学校读书时他的一个同学冯懋龙（自由），是当年援助梁启超建立大同学校的冯镜如的第四子，后担任国民政府

要职，第二次大战后随国民党移居台湾，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其父冯镜如为了帮助孙文革命，曾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并参加革命活动。（关于冯镜如、冯自由的情况请参照本刊第64号上的文章）可以看出，旅日华侨在动乱时期的清末到民国初年的这段时期，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也受到很大影响。

另外，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特别是流亡到日本后，得到大隈重信、犬养毅、品川弥二郎等人的庇护。其中品川弥二郎和他分别时送他一幅书联《松荫遗墨》，使他非常高兴。这件礼品是松荫用汉文写的，康有为非常珍惜地把它保存下来。康有为说：

“这是日本吉田松荫的遗墨，是他的弟子品川弥二郎子爵送给我的。在日本维新时的要人中有许多是松荫先生的弟子，品川子爵是一位思想和行为都很坚定的人物，他给了我极为热情的帮助。我在明治32年（1899年）秋9月从新加坡来到日本，日本政府拒绝我登岸，当时品川子爵就拚命地和山县有朋争相援助，在他们的援助下我得以入境，这仅仅是帮助我的一个方面。这些明辨事理的人给了我非同一般的恩义，对此不胜感铭。康有为谨志。”

七、康有为的家庭

康有为家庭到底怎样组成的？这个问题恐怕也是读者感兴趣的吧。因此我决定把它发表出去，供读者参考，不过它不包括直系亲属以外的人。康有为有好几个妻室。想想在过去的中国妻妾同居乃是大家族主义的一个极为普通的陋习，资产阶级也是把妻妾奴婢作为家庭的一员的。所谓妾，字典上是这样解释的：“古代有罪的女子，都作为女仆来使唤。故把‘辛’（罪）和‘女’合起来，表示是一个女仆的意思。后转化为侍奉主人的女人——妾。”

康有为的家庭成员有：

第一夫人	张妙华	
长女	同薇	
次女	同璧	
三女	四女	长男（夭折）
第二夫人	梁随觉	
次男	同吉（夭折）	
六女	同复	
七女	同环	
三男	同箴	
	女	绫子（庶出）
	长女	保庄
	长男	保延
	次女	保娥
第三夫人	何金兰	
四男	同凝	
八女	九女（夭折）	

如上边揭示的那样，除原配第一夫人外，也把第二、第三夫人纳入家谱，至于其他一些人则都未列入进去。如同上述辞典中所解释的那样，第二、三夫人恐怕指的就是女仆的意思吧！康有为生有四男九女，其中长男、次男夭折，三女、四女、八女、九女也夭折，因此三男、四男就列入长男次男的序列。五女过继给胞弟幼博为养女，所以不列入家谱内。

此外，在子女中较为出色的是次女同璧，她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晚年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以诗词书画的出类拔萃而闻名于世。

八、结束语

最后，再补充几句。以往日本人看中国，虽不能说主客颠倒，但往往缺乏主体性和客观性。不管批林批孔也好，还是为秦

始皇歌功颂德也好，都是从中国国内问题开始的，它说明坚持路线会出现一种烦恼。我们不要为变幻无穷的眼前一些现象所迷惑，要客观、仔细地静观事态，抓住本质来进行判断，不要产生错误。

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自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后，经过清末到民国革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历史的进程和起伏，实在是波澜万丈的任何时代都未曾有过的一部兴亡史。在这滚滚洪流中，康有为是革新的先驱。

在我国研究康有为的团体学者，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现任奈良大学教授的小野川秀美氏和东京大学教授岛田虔次氏、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小野和子氏、关西大学副教授坂出祥伸氏、讲师增田涉氏等，听说他们都把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其中，坂出祥伸氏目前正在翻译康有为的《大同书》，听说他还要在书中把康的传记写出来，但愿这本书能早日排版发行。

原载《日华月报》第106号、110号

陈家麟 马洪林译

- 78.1.7 (光3.12.5) 守礼说
- 78.1.9 (光3.12.7) 口琮庵主自强要策
- 78.1.15 (光3.12.13) 东游纪盛
- 78.1.23 (光3.12.21) 论练兵以固边防
- 78.1.24 (光3.12.22) 论练兵以固边防接续前稿
- 78.1.25 (光3.12.23) 论出洋庸工
- 78.1.26 (光3.12.24) 海防要策
- 78.1.28 (光3.12.26) 论俄潜移碑石
- 78.2.16 (光4.1.15) 论中国终当盛行新报 (选录香港中外新报)
- 78.2.28 (光4.1.27) 论俄澳失睦
- 78.3.6 (光4.2.3) 论日本募民开耕
- 78.3.13 (光4.2.13) 论欧洲近事
- 78.12.3 (光4.11.10) 论日报录西征事
- 78.12.13 (光4.11.20) 平寇宜不分畛域说
- 78.12.19 (光4.11.26) 论高丽与日本失和
- 78.12.24 (光4.12.1) 辨近日所传李杨村事
- 78.12.26 (光4.12.3) 论日本国人不用泰西器物
- 79.1.10 (光4.12.18) 论俄人专意铁路中国不可不备
- 79.1.13 (光4.12.21) 论土耳其欲使埃及归英管辖
- 80.2.14 (光6.1.5) 论钱买日贵
- 80.2.16 (光6.1.7) 论保甲团练宜分别举行
- 80.2.17 (光6.1.8) 论港督振兴文教
- 80.2.18 (光6.1.9) 1.论港督为政执中, 2.西报论灭琉球事 (选录《申报》)
- 80.2.19 (光6.1.10) 华人不宜往旧金山说
- 80.2.20 (光6.1.11) 论法国越南
- 80.2.23 (光6.1.14) 论英俄争结好于波斯
- 80.2.25 (光6.1.16) 论西报纪俄国事

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包括对他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政策观点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美国的研究人员对孙中山的兴趣最初表现在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孙中山就任中国南方革命政府大总统时期的活动上。关于这一时期的书籍很少，这清楚地说明美国对孙中山的评价不高，对他的政策还不太理解。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公开背叛了他的遗训，走上了一条对内为封建买办服务，对外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的道路。这个期间出版物的特点是，美国研究人员显然想把孙中山写成美国的追随者、帝国主义列强的朋友和顽固的反苏分子。在这方面，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观点，正好与反动势力的代表、国民党和梵蒂冈的“理论家们”的主张相吻合。然而，就在当时，美国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发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歪曲孙中山理论的清醒呼声。

中国革命胜利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界中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最近几年，除了有人仍然企图把孙中山说成西方的忠实朋友，“共产主义阴谋”的牺牲品之外，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客观的著述，承认孙中山活动中总的反帝倾向。目前，在美国的研究者中间，对孙中山活动的评价问题仍然存在争论，美国不同时期对华政策中的错误，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属于第一阶段的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记者F·麦克·科尔米克撰写的《中国革命》一书。该书于1914年译成俄文发表。^①麦克·科尔米克当时是几家美国报纸和通讯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他在自己的书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1911年10月10日兴起的反清革命的态度，客观描述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政府严重的财政支绌状况，阐述了他与孙中山的谈话纪要，在谈话中孙

^① 弗列杰克·麦克·科尔米克：《中国革命》，圣彼得堡1914年出版。

- 80.4.9 (光6.3.1) 论考举真才
- 80.4.15 (光6.3.7) 书言官论俄约难行疏后
- 80.4.16 (光6.3.8) 论日本拟遣人来学中国
- 80.4.17 (光6.3.9) 论御俄
- 80.4.19 (光6.3.11) 再论御俄
- 80.4.20 (光6.3.12) 论中国急务在固结民心
- 80.4.21 (光6.3.13) 成败是非论
- 80.4.22 (光6.3.14) 论裁汰差役
- 80.4.26 (光6.3.18) 书黔抚拨解兵饷摺后
- 80.4.27 (光6.3.19) 论俄日结好
- 80.4.28 (光6.3.20) 阅各报洋烟事书后
- 80.4.29 (光6.3.21) 论日本设兴亚会
- 80.4.30 (光6.3.22) 兴亚会事续录
- 80.5.1 (光6.3.23) 论各国关心中俄事
- 80.5.3 (光6.3.25) 论整顿水师
- 80.5.5 (光6.3.27) 论理财不可惑于人言
- 80.5.7 (光6.3.29) 论县府考录案宜严
- 80.5.8 (光6.3.30) 论日耳曼议通商高丽
- 80.5.10 (光6.4.2) 日本人论中外大势
- 80.5.11 (光6.4.3) 接录中外大势论
- 80.5.12 (光6.4.4) 接录中外大势论
- 80.5.13 (光6.4.5) 论西报述俄事
- 80.5.14 (光6.4.6) 1.论中日当释嫌, 2.译东瀛报论中
东事
- 80.5.15 (光6.4.7) 论善举宜设善法
- 80.5.17 (光6.4.9) 论亚洲大局可危
- 80.5.18 (光6.4.10) 论筹赈款
- 80.5.19 (光6.4.11) 论试士宜参变其法
- 80.5.20 (光6.4.12) 论俄人逐客

《孙中山评传·他的生平及其意义》^①一书。该书根据有关孙中山生平及其活动的许多原始材料和翻译材料写成，尽管作者意在客观叙述孙中山的生平，但他采取了所谓“西方文明”代表先入为主的立场，毫不掩饰自己对孙中山和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比如，他轻率地认为，中国人民没有组织才能，具有盲动性，^②总想破坏而不愿创造，^③认不清自身的民族利益。^④作者除研究中国内政问题外，还用了很多篇幅来讲述孙中山对外政策的观点和他的对外政策，并企图贬低孙中山晚年的活动，认为孙中山晚年的行动是不自由的，他实际上只不过充当了应邀前来的苏联顾问的驯服工具，^⑤似乎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反帝行动只是偶然的现象。

沙尔曼没有注意到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这就是孙中山走过了一条既漫长又曲折的道路，最终明白了帝国主义正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活动，大无畏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以及对苏维埃俄国真实情况的认识，使孙中山走上了一条积极反帝的道路。

作者一方面指出：1919年“在学生们的奋起反抗日本的行为爆发之后，孙中山赞同他们对于把中国‘日本化’的抗议”；^⑥另一方面，他错误地断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的反帝方针，以及1924—1925年间孙中山发表的一系列文件和谈话似乎与孙中山本人无关，完全是“俄国”对他“施加影响”的结果。^⑦

沙尔曼在书中叙述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所作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内容时，千方百计地企图贬低关于“民族主义”演讲

① 莱昂·沙尔曼：《孙中山评传·他的生平及其意义》，纽约，1934年版。

② 同上，第346页。

③ 同上，第361页。

④ 同上，第290页。

⑤ 同上，第254、259、263、267页。

⑥ 同上，第224页。

⑦ 同上，第263—264页。

- 80.6.29 (光6.5.22) 论葡人建议助俄
- 80.6.30 (光6.5.23) 论印度烟利
- 80.7.2 (光6.5.25) 阅西报论中国军政书后
- 80.7.3 (光6.5.26) 论盗劫官衙
- 80.7.5 (光6.5.28) 论中国创造机器
- 80.7.6 (光6.5.29) 论查办教匪
- 80.7.7 (光6.6.1) 论中国军务
- 80.7.8 (光6.6.2) 论出洋学童不必再遣
- 80.7.9 (光6.6.3) 论习西学宜知变通
- 80.7.13 (光6.6.7) 1.论禁鸦片宜行之以渐, 2.琉球琐纪
- 80.7.15 (光6.6.9) 论法在因时变通
- 80.7.16 (光6.6.10) 论亚洲已半属于欧人 (载《弢园文录外编》)
- 80.7.20 (光6.6.14) 论御俄宜用士勇
- 80.7.26 (光6.6.20) 论出使
- 80.7.27 (光6.6.21) 论西国兵额日增 (载《弢园文录外编》)
- 80.7.28 (光6.6.22) 谣言不足深辨说
- 80.7.30 (光6.6.24) 论土耳其大势
- 80.7.31 (光6.6.25) 吏役为奸说
- 80.8.2 (光6.6.27) 论筹办军需
- 80.8.4 (光6.6.29) 论练兵宜先练将
- 80.8.5 (光6.6.30) 中国战和说
- 80.8.10 (光6.7.5) 论拒外寇官军不如义勇
- 80.8.12 (光6.7.7) 论西报述中俄近事
- 80.8.13 (光6.7.8) 论各国断难合从
- 80.8.14 (光6.7.9) 续录各国断难合从论
- 80.8.16 (光6.7.11) 论中外筹办军务不同

而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对惨无人道的帝国主义殖民制度斗争的必然结果。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在难明的长夜中起了光芒四射的灯塔的作用,这座灯塔给中国人民指明了通向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指明了反帝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苏维埃国家成了中国可靠的盟友。^①

30年代,前面提到的美国第一部孙中山传记作者林百克的儿子保罗·迈伦·温特沃思·林百克教授出版了两本书——《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三民主义解释》和《中国共和政体》。在这两本书里,作者认为孙中山是复古派,主张恢复中国古老的道德和中国古老的社会政治学说——儒家学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科学。他把孙中山描写成一个十分温文尔雅的人,在国内问题上几乎象一个保守派。林百克教授还把这种评价搬到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观点上,断言他在对外政策中遵循儒家学说中的“王道”(君主以仁义治天下的政策)和“霸道”(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政策)。按林百克的说法,孙中山仿佛把中国传统的对外政策“王道”和英国及其它帝国主义的暴力、掠夺政策“霸道”对立起来。林百克认为:孙中山政纲和实际行动中的反帝观点,都是受了苏维埃俄国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他试图证实,孙中山个人的政见仿佛从根本上与第三国际的“反帝”不同,因为孙中山愿意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援助。

林百克教授和他的父亲一样,想在书中把孙中山描写成一个美国生活方式的崇拜者,似乎他一直都处在美国“民主”思想的影响之下。

在公开伪造历史、企图“证明”孙中山亲美外交政策的美国作者的著作中,X·阿班德的《我在中国的经历》^②一书以其反动倾

① 在评论上述沙尔曼的书时还应当注意到,这本书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时写的。当时在中国国内,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民主运动被迫转入极秘密的地下状态,孙中山留给国民党的遗训受到蒋介石集团粗暴的践踏,后者公开投靠了帝国主义列强,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显然,中国的这种局势赋予该书以悲观的笔调。

② X·阿班德:《我在中国的经历》,纽约,1943年版。

- 80.10.15 (光 6 . 9 .12) 论中国宜助高丽开设口岸
- 80.10.16 (光 6 . 9 .13) 希腊国沿革考
- 80.10.19 (光 6 . 9 .16) 论观俄国日报宜有辨别
- 80.10.20 (光 6 . 9 .17) 1.波斯有志振兴, 2.阅黄崖教匪事
书后
- 80.10.25 (光 6 . 9 .22) 书机器织布局章程后
- 80.10.27 (光 6 . 9 .24) 论西人未谙中国政体
- 80.10.28 (光 6 . 9 .25) 论民间善举以美邦为最
- 80.10.29 (光 6 . 9 .26) 论旧金山人轻侮华官
- 80.10.30 (光 6 . 9 .27) 书西报论高丽通商事宜后
- 80.11.2 (光 6 . 9 .30) 论战守具宜剔除积弊
- 80.11.3 (光 6 .10.1) 论俄欲索台湾
- 80.11.4 (光 6 .10.2) 论中国不可一日亡战
- 80.11.6 (光 6 .10.4) 论绥靖洋盗
- 80.11.8 (光 6 .10.6) 论缉捕宜求善法
- 80.11.9 (光 6 .10.7) 阅贵州巡抚奏摺书后
- 80.11.10 (光 6 .10.8) 论日本结好俄罗斯
- 80.11.11 (光 6 .10.9) 论官役巡查
- 80.11.12 (光 6 .10.10) 论高丽不宜遽绝日本
- 80.11.15 (光 6 .10.13) 辨琉球属于我朝
- 80.11.20 (光 6 .10.18) 论俄近事
- 80.11.22 (光 6 .10.20) 论士廷割地
- 80.11.23 (光 6 .10.21) 黑龙江中俄分界考
- 80.11.24 (光 9 .10.22) 论富强自有水务
- 80.11.25 (光 9 .10.23) 答筹饷捷径论略
- 80.11.26 (光 6 .10.24) 论购办军火亟宜变通
- 80.11.27 (光 6 .10.25) 论防守陆路宜设地雷
- 80.11.29 (光 6 .10.27) 论天时
- 80.12.1 (光 6 .10.29) 论兵强不足恃

述，正是复兴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统一战线点燃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并使这场运动壮大起来。毫无疑问，正是统一战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①

亚佛在为上述蒋介石两书英译本加的编后语里还指出：蒋介石闭口不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孙中山的遗嘱，而且还歪曲苏联对华政策的性质。亚佛写道：“苏联是唯一放弃‘所有不平等条约’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努力获得民族自由，愿意帮助中国为民族自由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而斗争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和日本则在不择手段地妄图保住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权。”^②

亚佛揭露蒋介石及其帮凶说：“作者完全歪曲了孙中山的学说，在前述两本书中常常断章取义，而没有引用孙的任何主旨。孙中山满怀解放中国、使其摆脱外国统治和使中国人民解脱封建压迫的决心，而国民党的当权者则极力要换汤不换药地恢复封建主义。”^③可以认为，亚佛所写的编者注，标志着美国存在对孙中山的客观评价。

违反孙中山遗训、堕落为外国帝国主义傀儡的、中国人民怙恶不悛的叛徒汪精卫、蒋介石和他们的帮凶，长期以来利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战士孙中山的名字，来掩盖自己的卑鄙勾当。

现今，美国孙中山研究的特点，是旨在反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偏见的论著数量大增。

1953年，美国女作家皮尔·伯克(作家的笔名是康福尔特·西登斯特里克)的《改变中国的人·孙中山的故事》一书在美国问世。该书是故意歪曲孙中山生平和活动的一个典型。^④这本是写给年青人看的，算不上什么“重要”的参考书，然而书中反映了美

① 见《蒋著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的经济理论》，菲利浦·亚佛注释本，纽约，第108—109页。

② 同上，第328页。

③ 同上，第327页。

④ 皮尔·伯克：《改变中国的人·孙中山的故事》，纽约，兰顿书屋，1953年。

册

- 81.1.24 (光6.12.25) 论造士
- 81.2.3 (光7.1.5) 1.论制造2.俄人通商高丽
- 81.2.5 (光7.1.7) 论炮匠赴俄
- 81.2.7 (光7.1.9) 论俄人窥伺日本
- 81.2.8 (光7.1.10) 节录海防臆测一
- 81.2.9 (光7.1.11) 节录海防臆测二
- 81.2.10 (光7.1.12) 论备敌不可存幸灾之心
- 81.2.11 (光7.1.13) 1.节录海防臆测三, 2.整顿茶务,
3.振兴农务
- 81.2.12 (光7.1.14) 论中国待俄宜有区别
- 81.2.14 (光7.1.16) 1.节录海防臆测四, 2.东瀛筹办防
务
- 81.2.15 (光7.1.17) 1.论中东近事, 2.日使回国续耗
- 81.2.16 (光7.1.18) 论日本建筑炮台
- 81.2.18 (光7.1.20) 论高丽通商利害
- 81.2.19 (光7.1.21) 节录海防臆测五
- 81.2.21 (光7.1.23) 论招工
- 81.2.22 (光7.1.24) 节录海防臆测六
- 81.2.23 (光7.1.25) 论西贡发回华人
- 81.2.24 (光7.1.26) 论中国武备不可少弛
- 81.2.26 (光7.1.28) 论车路宜先建于边省
- 81.2.28 (光7.2.1) 攘敌非佳兵辨
- 81.3.1 (光7.2.2) 论船政宜早为整顿
- 81.3.2 (光7.2.3) 保民说
- 81.3.3 (光7.2.4) 论火器不可全恃购诸外国
- 81.3.4 (光7.2.5) 论教民垦耕
- 81.3.5 (光7.2.6) 连阅虐婢案情有感
- 81.3.7 (光7.2.8) 论调和息争

意的批评，只是想帮助孙中山认识并纠正错误。惠廷在全书中反复阐述的，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苏联对孙中山政策中的“两面性”，苏联外交家“挑拨”中国南北方对立，“日本与中国相对抗”^①和“亚洲与西方相对抗”的“企图”^②，以及苏联对中国边界地区的“侵略计划”等等。惠廷在该书的结尾写道：“对1917到1924年中苏关系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苏联的政策不只有一种，而且有多种。”^③

惠廷对孙中山怀有的敌意与他片面选择的说明孙中山外交政策原则及实践的材料，与他所表示的对苏联的强烈仇视恰好一脉相承。^④惠廷还挖出了阿班德关于1923年孙中山曾向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提出组织五大国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计划”的说法，只是在本书末尾的注释中，惠廷才承认“在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中，没有找到有关这种说法的任何记载。”^⑤这就是资产阶级多年养成的客观主义方法，这一方法使其拥护者得以肆无忌惮地散布诋毁、挑拨的臆想，而后随便在什么地方——读者不注意的“著作的”边角处，羞羞答答地加以“解释”，说您看到的他们挖出来的“材料”，“未经完全证实”！按照这种方式，惠廷断言：“从他（孙中山——C·齐赫文斯基）过去的活动来看，很多旁观者会认为孙的亲俄方针，只是他一时的微弱热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⑥惠廷虽千方百计地证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只是象他所说的那样，向来没有任何原则；但又与他在书中所引用的很多有凭有据的文件明显地相悖，因后者恰恰说明了伟大的十月社

① 艾伦·惠廷：《1917—1924年苏联对华政策》，第204页。

② 同上，第254页。

③ 同上，第248页。

④ 作者在粗暴地攻击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时，不惜笔墨赞扬美国对远东的外交政策，妄图把美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说成是友好的行为。他写道：“要不是美国军队在1919—1920年间的武装干涉时期所起的抑制作用，日本很可能已经控制了整个西伯利亚。”（同上，第133页）。

⑤ 艾伦·惠廷：《1917—1924年苏联对华政策》，第323页。

⑥ 同上，第242—243页。

- 81.5.7 (光7.4.10) 论高丽明党
- 81.5.10 (光7.4.13) 论日本政俗可虑
- 81.5.13 (光7.4.16) 论西陲未得安靖
- 81.5.16 (光7.4.19) 礼节异同说书后
- 81.5.19 (光7.4.22) 论高丽近事
- 81.5.21 (光7.4.24) 论日本裁减经费
- 81.5.25 (光7.4.28) 论修戎备
- 81.6.6 (光7.5.10) 论中国宜自造枪炮
- 81.6.8 (光7.5.12) 论船政
- 81.6.10 (光7.5.14) 论日本民变
- 81.6.11 (光7.5.15) 论出洋谋生
- 81.6.13 (光7.5.17) 端尼士暨尼罗河考
- 81.6.15 (光7.5.19) 论省宪查办出洋
- 81.6.17 (光7.5.21) 论宜特设海军大员以专责成
- 81.6.18 (光7.5.22) 书西报论中国水师事后
- 81.6.20 (光7.5.24) 1.答客问, 2.为高丽谋意见不同
- 81.6.21 (光7.5.25) 阅澳门户口册有感
- 81.6.24 (光7.5.28) 书日本新报后
- 81.6.25 (光7.5.29) 论俄船留华
- 81.6.28 (光7.6.3) 论承充人不可有必得心
- 81.7.1 (光7.6.6) 论欧洲时局
- 81.7.4 (光7.6.9) 论俄拟增铁路
- 81.7.5 (光7.6.10) 论练兵宜自为号令
- 85.7.7 (光7.6.12) 论出洋事
- 85.7.8 (光7.6.13) 1.论官场陋习, 2.琉球难民不应交日本领事
- 81.7.11 (光7.6.16) 书西报论琉球难民事后
- 81.7.13 (光7.6.18) 论招工
- 81.7.18 (光7.6.23) 论体制不宜

切林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为在落后、混乱的国家里建立俄国威信和影响而作的顽强努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耳目一新，并使人们看清，苏联是如何成为新中国主要同盟国的这个事实。20年代初期产生并得以实施的苏俄对华政策的某些影响，构成了两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内容。”^①

1961年夏天，在纽约出版了由华侨冷绍佺和美国人诺尔曼·帕尔默合著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②一书。

两位作者大约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来论证孙中山不是共产主义者。为了使其“发明”言之有据，他们多次重复国民党人崔书琴的诽谤^③，并“意味深长”地告诉读者：“孙中山批判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④，“不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喜欢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学说”，等等。这样一来，人们完全糊涂了，两位作者竟在气势汹汹地证明早就为人所知的孙中山绝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事实。

冷绍佺和帕尔默象他们的前辈特别象惠廷一样（两位作者经常援引后者的书），都试图贬低伟大十月革命对孙中山的革命化所发生的影响，把它仅仅局限于孙中山邀请苏联顾问到广州一事上。他们闭口不提1919年中国大规模的反帝运动高潮和人民群众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帝斗争对促进孙中山革命化所起的特殊作用。不但如此，他们还进行诬蔑，似乎“孙中山因与共产党合作而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⑤从这类言论中可以

① 艾伦·惠廷：《1917—1924年苏联对华政策》，第262页。

② 冷绍佺和诺曼·帕尔默合著《孙中山与共产主义》，宾西法尼亚大学对外政策研究所，外国研究丛书第10期，纽约，1961年出版。

③ 《三民主义·广州—莫斯科联盟对孙中山政治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与政治评论》，第18卷，第1—3期，第26—145，177—209，341—388页；第20卷，第1期，1936年，第101—139页。

④ 同注②。

⑤ 同上，第172页。

- 81.9.16 (光7.闰7.23) 论琉球事宜速办理
- 81.9.23 (光7.8.1) 论驻洋星使宜多带翻译人员
- 81.9.27 (光7.8.5) 论通商未必尽得利益
- 81.10.3 (光7.8.11) 论俄国徙民以实边
- 81.10.7 (光7.8.15) 论日本扩商务
- 81.10.11 (光7.8.19) 论召学童回华
- 81.10.14 (光7.8.22) 论台匪滋事
- 81.10.17 (光7.8.25) 论俄法近事
- 81.10.19 (光7.8.27) 论中国宜亟求真才
- 81.10.21 (光7.8.29) 地兰士华路考
- 81.10.24 (光7.9.2) 论俄人不忘并土
- 81.10.26 (光7.9.4) 论小吕宋华商请设领事
- 81.10.27 (光7.9.5) 论取兵宜严
- 81.10.29 (光7.9.7) 论招华佣
- 81.10.31 (光7.9.9) 论日商维持丝业
- 81.11.1 (光7.9.10) 论波斯练兵
- 81.11.2 (光7.9.11) 论宜拔真才以讲武备
- 81.11.5 (光7.9.14) 论军火被窃
- 81.11.7 (光7.9.16) 论日本搜获金银
- 81.11.8 (光7.9.17) 论高丽近事
- 81.11.10 (光7.9.19) 论西人作事认真
- 81.11.11 (光7.9.20) 波斯兴替论
- 81.11.12 (光7.9.21) 论土耳其易于振兴
- 81.11.14 (光7.9.23) 论意国与普奥立约
- 81.11.15 (光7.9.24) 论秘鲁华民亟宜保护
- 81.11.17 (光7.9.26) 论德国查禁造船
- 81.11.18 (光7.9.27) 论德国有志经营南洋
- 81.11.21 (光7.9.30) 论开通红河
- 81.11.22 (光7.10.1) 论中国茶利将为印度所夺

依靠的是反人民的反动制度。书的作者“注意到这个沉痛的教训”(即西方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中国——C·齐赫文斯基),面对苏联为争得不发达地区人民的支持而展开的激烈竞赛,他们认为:“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应该认真听取好的建议,采取支持和推动这些地区革命运动的果敢政策,以代替维护‘原状’或支持衰亡的反动领袖的做法。”^①

下面,他们大谈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实行这种非同一般的政策,会遇到的种种困难。单凭两位作者列举的这些困难就足以表明,他们的“建议”在大垄断组织的利益左右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条件下,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冷绍铨和帕尔默承认:“在实施这类政策的过程中,困难确实非常大,对西方已确立的民主政治来说,与亚洲的革命运动合作是极不容易的。首先,要在许多情况下去否定、有时要完全公开地反对这些国家现行的政体。如果是本国人掌权的政府,那么不管它多么不高明,它都拥有优势,因为它就是国家的合法政府,即使不承认这些政府的合法性,它仍把持着实际权力并控制着这个国家同外国联系的渠道;如果是外国人操纵的政府,那么操纵者本身就是西方国家的代表。其次,如果说不是根本不可能,有时也很难清楚地区分真正的革命运动,很难辨别谁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谁拥有实力,因而是大有前途的人。”^②

两位作者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洪水猛兽,并以共产主义将在亚洲国家获胜相威胁,以此来恫吓读者。他们力劝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重新考虑对弱小国家的政策。他们在书中写道:“亚洲民族运动与共产主义的紧密结合,在亚洲最脆弱的地区引起了许多新的和棘手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完全可能通过对当地民族运动的

① 冷绍铨和诺曼·帕尔默合著《孙中山与共产主义》,第175页。

② 同上,第172页。

- 82.1.28 (光7.12.8) 论日本优待琉王
- 82.1.30 (光7.12.11) 论轮船管驾须慎选真才
- 82.2.1 (光7.12.13) 论西报述中东事
- 82.2.2 (光7.12.14) 论中西民情不同
- 82.2.3 (光7.12.15) 阅晋源西报论中国炮船书后
- 82.2.4 (光7.12.16) 论筹饷
- 82.2.6 (光7.12.18) 论合兵以和万国
- 82.2.7 (光7.12.19) 论差役不可过多
- 82.2.9 (光7.12.21) 论埃及近事
- 82.2.10 (光7.12.22) 论出洋雇工
- 82.2.11 (光7.12.23) 论西陲防备宜周
- 82.2.22 (光8.1.5) 中国振兴说
- 82.2.23 (光8.1.6) 论美邦干预秘智二国事
- 82.2.25 (光8.1.8) 论岁除查封赌馆
- 82.2.27 (光8.1.10) 论俄普近事
- 82.3.2 (光8.1.13) 阅旧金山新例书后
- 82.3.3 (光8.1.14) 论高丽遣人学制造
- 82.3.4 (光8.1.15) 论剿台匪
- 82.3.6 (光8.1.17) 论东洋票贻害
- 82.3.7 (光8.1.18) 论波斯援阿富汗逆酋
- 82.3.8 (光8.1.19) 论查办猪仔
- 82.3.9 (光8.1.20) 论鸦片厘税
- 82.3.13 (光8.1.24) 阅西报述中俄事书后
- 82.3.14 (光8.1.25) 阅外国日报述中国事书后
- 82.3.20 (光8.2.2) 论日本甚俄人图高丽
- 82.3.22 (光8.2.4) 论中朝宜助高丽以拒俄
- 82.3.24 (光8.2.6) 论治国当内外相维
- 82.3.25 (光8.2.7) 海防设官考上
- 82.3.27 (光8.2.9) 海防设官考下

詹森的书对孙中山早期的反帝观点和他帮助阿古纳多领导的菲律宾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践活动，有一些颇为引人入胜的记载。作者著述的下限是1915年，对孙中山最后10年（1915—1925）活动的叙述，只占了几页，从而回避了对孙中山生活最光辉灿烂的篇章即十月革命后那段时期的反帝斗争做客观的研究。作者承认：在“1919年5月4日”中国群众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开始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对华政策。但是，詹森基本上只是把孙中山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对者来介绍的，说他直至弥留之日仍打算在同主要敌人——欧、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亚洲国家的联合阵线（包括日本）。这样一来，詹森就公然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东西：中、日人民及所有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人民与苏联人民团结起来，为消灭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制度而进行共同斗争的思想，和日本与汪精卫的“理论家”为掩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及其它亚洲国家的侵略而散布的泛亚细亚主义的理论。^①在书的结尾部分，詹森出于敌人反共宣传的需要，试图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散布泛亚细亚主义的理论，以便在亚洲国家中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

詹森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缺陷，是他尽力贬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在詹森的笔下，孙中山根本不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几乎从1895年起就是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制度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

以上我们分析了美国历史学家们最有代表性的一系统研究孙中山的著作，这些著作直接涉及孙中山在各个时期对外政策的观点与他作为革命政党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领导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领导者和最后担任中国南方革命政府总统等各个时期对外政策方面实践活动的问题。

上述各书远不能囊括美国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大量著作，但

^① 莫里斯·詹森《日本人与孙中山》，第209—212页。

- 82.5 .19 (光 8 . 4 . 3) 论日本不欲高丽与各国通商
- 82.5 .20 (光 8 . 4 . 4) 论西人虑事周详
- 82.5 .25 (光 8 . 4 . 9) 1.论使署下旗, 2.美国禁止华人新例
- 82.6 .1 (光 8 . 4 . 16) 跋申报书美将致美员信后
- 82.6 .2 (光 8 . 4 . 17) 书洪侍御奏摺后
- 82.6 .3 (光 8 . 4 . 18) 论德俄近事
- 82.6 .6 (光 8 . 4 . 21) 论华人难安居美国
- 82.6 .7 (光 8 . 4 . 22) 论埃及时事
- 82.6 .8 (光 8 . 4 . 23) 述录戈将军事迹
- 82.6 .10 (光 8 . 4 . 25) 论高丽待日本人
- 82.6 .12 (光 8 . 4 . 27) 论俄人欲在高丽开口岸
- 82.6 .13 (光 8 . 4 . 28) 论南洋各岛宜设官以宜教化
- 82.6 .16 (光 8 . 5 . 1) 论法人不认越南为中朝藩属
- 82.6 .17 (光 8 . 5 . 2) 论土廷不允法国所请
- 82.6 .22 (光 8 . 5 . 7) 论载华佣出洋
- 82.6 .26 (光 8 . 5 . 11) 论俄人谋攻南洋诸岛
- 82.6 .27 (光 8 . 5 . 12) 论俄人背约
- 82.6 .29 (光 8 . 5 . 14) 论西报传高丽事
- 82.7 .3 (光 8 . 5 . 18) 论俄国岸宜设领事
- 82.7 .4 (光 8 . 5 . 19) 论法人谋攻黑旗党
- 82.7 .7 (光 8 . 5 . 22) 美绅驳苛待华人书
- 82.7 .8 (光 8 . 5 . 23) 接录美绅驳苛待华人书
- 82.7 .10 (光 8 . 5 . 25) 论高丽民俗
- 82.7 .11 (光 8 . 5 . 26) 论日本民间设会聚党
- 82.7 .12 (光 8 . 5 . 27) 书美绅驳苛待华人新例后
- 82.7 .14 (光 8 . 5 . 29) 论英攻埃及
- 82.7 .15 (光 8 . 6 . 1) 论西报述美高和约
- 82.7 .21 (光 8 . 6 . 7) 论日本学生暗通电信

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相逢

兼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久保田博子

前 言

宋庆龄的一生，同以辛亥革命为开端的中国革命历史是分不开的。她诞生时，孙中山已在她周围从事革命活动，她成年之后再次遇到孙中山，此后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孙中山逝世之后，宋庆龄牢记“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立即坚持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展开革命斗争。接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一方面为革命的胜利一心一意地坚持正确的路线，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正义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也以主要精力关心国家建设。人们不仅认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而且感到她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怎样看待宋庆龄的这种重要作用呢？我认为应该重新认识她是怎样开始同中国革命发生关系的。她同孙中山的结合是她自己决定的。她也是一个独立的革命家。他们的合作，难道不是促进了孙中山在他的晚年创立新三民主义学说吗？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阐述。

(一)

宋氏家族与孙中山，即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与孙中山相会，一

- 82.10.26 (光 8 . 9 .15) 述高丽全境形势
- 82.10.27 (光 8 . 9 .16) 续述高丽全境形势
- 82.10.28 (光 8 . 9 .17) 论中国宜力庇越南
- 82.10.30 (光 8 . 9 .19) 婆罗洲游记上
- 82.10.31 (光 8 . 9 .20) 婆罗洲游记下
- 82.11. 3 (光 8 . 9 .23) 论越南存亡有关边省安危
- 82.11. 4 (光 8 . 9 .24) 论越南宜去虐政以爱民
- 82.11. 8 (光 8 . 9 .28) 论使臣宜探悉外情
- 82.11. 9 (光 8 . 9 .29) 论埃及近事
- 82.11.14 (光 8 .10. 4) 论斋提督劝美廷迫勒中国
- 82.11.16 (光 8 .10. 6) 论回人欲助埃及
- 82.11.17 (光 8 .10. 7) 阅西报论平朝鲜乱书后
- 82.11.18 (光 8 .10. 8) 论中国宜联络南洋
- 82.11.22 (光 8 .10.12) 朝鲜人心忿怒说
- 82.11.24 (光 8 .10.14) 论中朝办理越南事
- 82.11.25 (光 8 .10.15) 论琉球事未易调停
- 82.11.28 (光 8 .10.18) 论法人干预埃及事
- 82.11.30 (光 8 .10.20) 论会党宜解散
- 82.12. 4 (光 8 .10.24) 书富强奇策后
- 82.12. 7 (光 8 .10.27) 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一
- 82.12. 8 (光 8 .10.28) 旧金山领事官新政纪二
- 82.12.11 (光 8 .11. 2) 华人可到旧金山
- 82.12.12 (光 8 .11. 3) 旧金山领事新政纪三
- 82.12.13 (光 8 .11. 4) 旧金山总领事新政纪四
- 82.12.14 (光 8 .11. 5) 论查禁放火
- 82.12.15 (光 8 .11. 6) 论通商宜知各国情形
- 82.12.19 (光 8 .11.10) 论报穷滋弊
- 82.12.22 (光 8 .11.13) 论朝鲜民情
- 82.12.30 (光 8 .11.21) 论欧洲患俄侵扰

住在上海……

还有，埃米莉·哈恩在《宋家姐妹》一书的第三章开头写道：“查理回到中国——至少在1886年到了上海”，并说：“查理23岁回国，一年之后就结婚了”。^①由此可知，宋嘉树是1885年至1886年回到中国，住在上海的。

宋嘉树在上海建立家庭时，孙中山正在香港的西医书院学习，课余常同称为“四大寇”的杨鹤龄、龙列、陈少白聚会谈论革命。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1895年10月）。这时，陆皓东这位最先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孙中山的同乡，也从上海来到这里，同孙中山等四人进行联络。^②不久，1892年7月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在澳门开设西药房。1893年，孙中山把西药房迁到广州，并以行医为掩护，正式致力于政治改革工作。

据1912年孙中山书信记载，1892年孙中山与宋嘉树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友情。

“宋君嘉树者，20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20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居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③

信中所写的20年前，按字意理解就是1892年。当然，“20年前”这一词，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大概的数字。然而，如果以“20年前”这一数字进行推算，根据前述1892年陆皓东从上海来到广州，与孙中山等从事革命运动的同志进行联络这一事实可知，孙中山和宋嘉树之间的关系，可能由于陆皓东的联络，在1892年两

① 埃米莉·哈恩：《宋家姐妹》，1943年。

② 《陆皓东传》，见《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1965年，第1—2页。

③ 《卸临时大总统职后致李晓生函，1912年4月》见《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1973年，第242页。

- 83.3.23 (光9.2.15) 论朝鲜祸尚未已
- 83.3.24 (光9.2.16) 论拐贩猪仔亟宜查办
- 83.3.26 (光9.2.18) 论日官识治体
- 83.3.27 (光9.2.19) 论学校宜核实
- 83.4.13 (光9.3.7) 琉事近闻
- 83.4.14 (光9.3.8) 1.论日人多疑, 2.琉事传疑
- 83.4.21 (光9.3.15) 论台湾近事
- 83.4.24 (光9.3.18) 论会党不利于国家
- 83.4.28 (光9.3.22) 论俄人戍边
- 83.5.3 (光9.3.27) 论檀香山近事
- 83.5.5 (光9.3.29) 论中朝宜力保越南
- 83.5.9 (光9.4.3) 论法国派船来华
- 83.5.10 (光9.4.4) 论外情宜洞悉
- 83.5.11 (光9.4.5) 论日使议琉球事
- 83.5.12 (光9.4.6) 论和约宜详为修改
- 83.5.14 (光9.4.8) 论欧洲党人近事
- 83.5.19 (光9.4.13) 论日本整顿军制
- 83.5.22 (光9.4.16) 论中国宜先筹海防以备法人
- 83.5.24 (光9.4.18) 论中国与法构衅宜兼防俄
- 83.5.26 (光9.4.20) 阅西报论中法事书后
- 83.6.2 (光9.4.27) 1.论黑旗拒法人, 2.越南军报
- 83.6.4 (光9.4.29) 1.论法人不许华军人越境, 2.越南战事续闻
- 83.6.5 (光9.5.1) 越南军务续闻
- 83.6.7 (光9.5.3) 阅外洋日报论越事书后
- 83.6.11 (光9.5.7) 论黑旗不进攻河内
- 83.6.12 (光9.5.8) 论黑旗智败法人
- 83.6.14 (光9.5.10) 论和议当操权于己
- 83.6.15 (光9.5.11) 黑旗进攻河内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沙曼和哈恩关于孙中山与宋家孩子相遇时间的记载。如果根据沙曼所说，宋嘉树与孙中山开始成为朋友时，宋嘉树已经有了5个孩子，那么第二个孩子宋庆龄的生年同宋嘉树与孙中山相会的时间就有矛盾。

关于宋庆龄的生年，过去在辞典等书中都认为是1890年。仁木富美子曾受到宋庆龄的会见，最近她说：“……宋庆龄是1895年出生在宋家。”关于此事的谈话是这样的：

“您是1890年生的吗？”

“不是。”

“您的生日是哪一天？”

翻译冯先生感到为难，说：“忘记了……”

接着又问：“另外，请您告诉结婚的时间可以吗？”说是1915年10月25日。^①

结婚时是二十岁，以此推算1895年生。

这个1895年出生的说法，同哈恩关于1900年的记载相符。哈恩说：“1900年，孙逸仙从欧洲回到日本时，未来的孙夫人恰好要开始上学。”^②当然，当时中国还没有推行义务教育制度，特别是女孩子上学，一般从几岁开始，没有统一的规定。然而，宋家是在美国生活过的基督教家庭，通常会按照美国的习惯，孩子满五、六岁时送到教会学校上学。因此，我认为，宋同孙相会与孙中山同宋家孩子们的交往，不是同一时间，而在同一个时期。于是，宋嘉树与孙中山的相会，使得孙中山与宋家孩子们有了交往。父辈们的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交谈，以及决心进行变革的志向，当然无论在感情上、思想上都给孩子们以重大的影响。

① 仁木富美子译：《宋庆龄选集》，家庭出版社，1979年，后记。

② 哈恩：《宋家姐妹》，第40页。

- 83.9.5 (光9.8.5) 论中朝欲救越南亟宜发兵
- 83.9.6 (光9.8.6) 论法越议和
- 83.9.7 (光9.8.7) 论军火宜招商制造
- 83.9.8 (光9.8.8) 论防内河宜多制小战船
- 83.9.10 (光9.8.10) 中国不必畏法人辨
- 83.9.14 (光9.8.14) 中国以守为战说
- 83.9.17 (光9.8.17) 法军败绩汇记
- 83.9.18 (光9.8.18) 节用以裕饷说
- 83.9.19 (光9.8.19) 论法人拟攻粤东
- 83.9.20 (光9.8.20) 1.弭乱说, 2.敌忾国心
- 83.9.25 (光9.8.25) 论朝鲜近事
- 83.9.27 (光9.8.27) 论官民皆宜知和约
- 83.9.28 (光9.8.28) 论红河为法所必争
- 83.10.4 (光9.9.4) 论举事宜先去民疑心
- 83.10.13 (光9.9.13) 论中朝并未预黑旗事
- 83.10.15 (光9.9.15) 论法人断不与中国构兵
- 83.10.18 (光9.9.18) 黑旗战捷纪事
- 83.10.19 (光9.9.19) 接录黑旗战捷纪事
- 83.10.23 (光9.9.23) 论越南事势可危
- 83.11.1 (光9.10.2) 论法人筹兵
- 83.11.5 (光9.10.6) 详述黑旗事
- 83.11.8 (光9.10.9) 论边防不可因无事稍弛
- 83.11.10 (光9.10.11) 论法人筹饷
- 83.11.13 (光9.10.14) 论维持商务
- 83.11.15 (光9.10.16) 续论维持商务
- 83.11.16 (光9.10.17) 中国非助黑旗辨
- 83.11.21 (光9.10.22) 论法人拟向中国索赔兵饷
- 83.11.22 (光9.10.23) 论法人探察越矿
- 83.11.23 (光9.10.24) 阅字林报论沪市书后

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①在宋庆龄的文章中涉及到对孙中山这一革命理论的理解，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时候，孙中山和宋庆龄之间还没有交往，宋庆龄大概通过父亲的关系，阅读了《民报》等革命刊物，从而知道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状况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但是，从当时宋庆龄的年龄和所处的环境来看，对这些的了解并没有超出想象的境界。

当然，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况，并不象当时宋庆龄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而是产生了严重的曲折和反复。当听到辛亥革命最初成功的消息时，大概还是充满了理想主义，青年宋庆龄说：“革命已在中国实现了自由和平等。为了赢得这两项个人不可少的权利，无数先烈高尚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然而，博爱尚待争取。”这里她引用了科罗拉多大学克劳肖院长关于博爱的解释：“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没有人类相爱之情，自由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而除非人们彼此情同手足，真正的平等就仅仅是梦想而已。”并深有同感地说：“博爱是以自由与平等这两项权利作基础的，因此实现这个理想，必须是20世纪的目标。”

革命的目标，必须达到自由、平等与博爱。博爱必须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应该说，正是对博爱的同感，促使宋庆龄从此靠近孙中山，有了同革命发生紧密关系的思想基础，并成为一切决心的关键，以及促进其不懈地努力奋斗的源泉。青年时期的纯洁的理想，其意义在于它变成了人生的主流，一有机会就要喷发而出，成为蓬勃行动的动力。“博爱必须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正是博爱才是今后的最重要的课题。”从这一思想可知，青年时代的宋庆龄已经具有革命家重要的品质。

“博爱”一词，如果单纯从字面上去理解，大致还是资产阶级

^① 《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1906年12月2日，见《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1973年，第201页。

- 84.3.22 (光10.2.25) 论民团
- 84.3.24 (光10.2.27) 答客问
- 84.3.29 (光10.3.3) 御法管见
- 84.4.1 (光10.3.6) 论刘提督募苗御敌
- 84.4.2 (光10.3.7) 论法人穷兵
- 84.4.4 (光10.3.9) 垦荒即以防寇论
- 84.4.5 (光10.3.10) 致乱有源说
- 84.4.7 (光10.3.12) 中国战胜续闻
- 84.4.8 (光10.3.13) 论御敌与剿贼不同
- 84.4.9 (光10.3.14) 论防军退守凉山
- 84.4.10 (光10.3.15) 论兵溃
- 84.4.12 (光10.3.17) 论总署宜藉使臣以悉外情
- 84.4.19 (光10.3.24) 论中国民心大可用
- 84.6.20 (光10.5.27) 法越交兵记序 (《弢园文录外编》
收录)
- 84.7.8 (光10.闰5.16) 刍言
- 84.7.9 (光10.闰5.17) 续刍言
- 84.7.11 (光10.闰5.19) 续刍言
- 84.7.15 (光10.闰5.23) 续刍言
- 84.7.21 (光10.闰5.29) 续刍言
- 84.7.26 (光10.6.5) 论中法战机 (录沪报)
- 84.8.14 (光10.6.24) 论中国此时机会不可不战
- 84.8.19 (光10.6.29) 论不战必不能和
- 84.8.22 (光10.7.2) 论汉奸当诛
- 84.8.25 (光10.7.5) 论中朝胜法情形
- 84.8.27 (光10.7.7) 论军情电音难得确实
- 84.9.1 (光10.7.12) 论招商局仁和济和贵池各股宜早调
停
- 84.9.8 (光10.7.19) 论粤民迁徙之非

知道了结婚时间与出生时间有关系，是1915年10月25日。关于这一点，从《莫理循书信集》第2卷中收录的有关孔祥熙的史料，和收在《日本外务省文书》的1915年10月25日前后的《孙中山的动向》中，很肯定地得出孙宋结婚的时间是1915年10月25日的结论。^①

成年的宋庆龄与她的父亲宋嘉树的朋友孙中山，是怎样的重逢，以及经过怎样的过程，终于迎来了1915年10月25日的呢？

1913年春，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这时，她写了一封给恩师的很有意思的信：“我不久就要回国了。我受本地孙博士崇拜者的委托，给孙博士捎去一箱加利福尼亚出产的水果。于是，我又成了给他捎带个人信件的引以为荣的高级使者。”^②由此可知，宋庆龄尽早回国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去会见孙中山。值得注意的与后述事情有关的是，“我又成了给他捎带个人信件的引以为荣的高级使者”。从这句话可知，宋庆龄想通过与孙中山重逢，向他表示自己的一些想法。此事可证明孙宋结婚的积极意义，以及宋庆龄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发自内心、主动的一个重要证据。于是，宋庆龄同孙中山经过幼年以后的重逢，要向他表达的事，据仁木富美子在《宋庆龄选集》的译后语中推测，是“想帮助革命”。关于此事，科妮莉亚·斯宾塞也说：“当她（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曾说，那个人（孙中山）说中国在睡着，他是有眼光的人”，全家听了都很惊异。稍长，不知不觉中又脱口而出，“我也决心那样做”。这就是献身革命。她只觉得中国革命在召唤她，虽不知那是采取怎样一种方式，总认为应献身于这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③

据说结婚以后生活也很美满。宋庆龄关于结婚的情况，给她的一位美国学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次婚礼尽可能的简单，因为我们俩都不喜欢铺张和仪式之类的东西。我很幸福。”图在

① 久保田文次：《研究笔记》，见《朝日新闻（晚刊）》，1979年7月2日。

② 哈恩：《宋家姐妹》，第87页。

③ 斯宾塞著、姜君辰译：《宋氏三姐妹》，译学社上海1940年，第167—168页。

- 85.1.13 (光10.11.28) 条陈高事
- 85.1.16 (光10.12.1) 书日人论台湾后
- 85.1.21 (光10.12.6) 书本报昨录津电法人议和后
- 85.1.28 (光10.12.13) 能战而后和论
- 85.1.29 (光10.12.14) 接续能战而后和论 (无名氏稿)
- 85.1.30 (光10.12.15) 拨电援台不宜再迟说
- 85.1.31 (光10.12.16) 亟宜查办猪仔以清其弊说
- 85.2.23 (光11.1.9) 1.拟筑炮台说, 2.同仇敌忾
- 85.2.24 (光11.1.10) 中必胜法论
- 85.2.25 (光11.1.11) 书本报谅山惊耗后
- 85.2.26 (光11.1.12) 联民团以同敌忾说
- 85.2.27 (光11.1.13) 接续联民团以同敌忾说
- 85.2.28 (光11.1.14) 接续联民团以同敌忾说
- 85.3.2 (光11.1.16) 接续联民团以同敌忾说
- 85.3.4 (光11.1.18) 宜密布水雷说
- 85.3.12 (光11.1.26) 缅甸故事考
- 85.3.14 (光11.1.28) 论谋生不必远适异地
- 85.3.16 (光11.1.30) 三续缅甸故事考
- 85.3.18 (光11.2.2) 论士宜求实学
- 85.3.20 (光11.2.4) 四续缅甸故事考
- 85.3.21 (光11.2.5) 论星嘉坡法船购煤事
- 85.3.24 (光11.2.8) 朝鲜人上总理书
- 85.3.26 (光11.2.10) 论法好用兵以残民
- 85.3.28 (光11.2.12) 论法人断敢窥伺粤垣
- 85.3.2 (光11.2.17) 中法和议未定说
- 85.4.9 (光11.2.24) 书中法和议电音后
- 85.4.16 (光11.3.2) 和战务以得才为要论
- 85.5.5 (光11.3.21) 中英有可合之机说
- 85.5.14 (光11.4.1) 日本报述中日订约事

字，而有秘书宋霭龄的名字。^①宋霭龄是宋嘉树的长女，宋庆龄的姐姐，据说1912年1、2月，孙中山最初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她作为英文秘书在孙身边工作。从这一情况看，我认为，哈恩记述的孙中山北方旅行的随行中，不应有宋庆龄，只能有秘书宋霭龄。但是，北方旅行这一期间，宋庆龄已经回到中国这一事实，也是不能否定的。

2. 科妮莉亚·斯宾塞的说法

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大学毕业，是1913年的事。她立刻就和朋友们的回到中国。……当她在横滨登岸，忽生奇感，往日的忆旧之情，一时都涌上心头。她固然知道孙中山及另一人在欢迎她，但情形很恍惚。……那年青一点的人走上前来，说：“我是你姐夫孔祥熙。我们在这里度夏。……你记得孙中山博士罢！”“啊，是的。”……这人是革命领袖呢！这是她情感的中心。……他（孙中山）脸上有皱纹了，老了，并表现出憔悴苍白之容。^②这是《宋氏三姐妹》一书中的内容，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它的材料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它究竟是否忠实于事实，这是人们所关心的。在此应注意之点是：在日本横滨的重逢，时间是从夏至秋的一段时间，即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之后；当时孙中山还在流亡中，好象很憔悴的样子。

3. 莱依安·沙曼的说法

宋庆龄1913年回到东方以前，她所衷心爱戴的共和国，已经遇到了暗礁，产生了裂痕。由于革命的挫折，她自己的家庭已经陷入多么严重的困难中，这些情况她到达日本之前是不知道的。她父亲帮助老朋友孙中山，为革命筹划资金。由于孙中山等人的计划受到挫折，宋查理也流亡到日本。他同长女霭龄在东京生活。在那里，宋庆龄也就参加了流亡者组成的失意的革命家集

① 陈健夫编著：《孙文传》，香港1964年，第240页。

② 斯宾塞著、姜君辰译：《宋氏三姐妹》，第16页。

○85.12.10 (光11.11.5) 船政(选录《华洋新报》)

以上是目下认为确属《循环日报》的论文和主要报道的目录。浏览以上论文目录应注意：(一) 论文的题目涉及国内外范围极广的问题；(二) 王韬于1885(光绪十)年春回上海后，《循环日报》登载的论文篇数明显减少。但是，也许王韬回上海后还在继续给《循环日报》写论文(如1884年6月20日的《循环日报》登的《法越交兵记序》)。关于《循环日报》后来的情况还不大清楚，这将是今后探讨的课题之一。

注 释

- ① 白瑞华：《1800—1912年的中国报纸》(台北，1976)，第41页。
- ② 林语堂：《中国报刊和舆论史》(芝加哥，1936)，第79页；保尔·柯亨：《传统和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中国的改革》(坎布里奇，1974)，第81页。
- ③ 载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1卷。
- ④ 参照(本论文)三，《王韬研究略史和〈循环日报〉》。
- ⑤ 后年，王韬称鸦片战争后的新局面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载《弢园文录外编》第1卷《变法上》)、“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载《循环日报》1880年7月15日《论法在因时变通》)。
- ⑥ 外山军治：《王韬和长毛贼》(载《学海》二——八，1945年12月)。
- ⑦ 参照谢兴尧：《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考》(载《国学季刊》第4卷第1号)；罗尔钢：《上太平天国书的黄毓考》(载《国学季刊》第4卷第2号)。
- ⑧ 前引保尔·柯亨书，第61—73页。
- ⑨ 实藤惠秀：《王韬的来游和日本文人》(载《近代日支文化论》)。
- ⑩ 前引保尔·柯亨书，第80页。另，王韬给《万国公报》投稿是从1889年至1896年，尤其集中在1890—1893年间，这期间投稿有40余篇论文，大半录入《弢园文录外编》。
- ⑪ 詹森、史贝斯著，三石善吉译：《改变中国的西方顾问》，讲谈社，1975年，第185页。另，王韬从1886(光绪十二)年至1893(光绪十九)年，选出格致书院学生的优秀答案亲加评释，每年以《格致书院课艺》为题出版，对研讨晚年王韬的思想是极珍贵的史料，在此谨向给我提供这些珍贵史料胶卷的神户大学伊藤秀一教授表示谢意。
- ⑫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1981年6月)，第68页；保尔·柯亨：《王韬和早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1967年第26卷，第133—162页)。
- ⑬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66页。
- ⑭ 白瑞华：《1800——1912年的中国报纸》第42页；保尔·柯亨：《传统和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中国的改革》第74页；另据白瑞华说，这份报纸和近事

团体流亡日本的时间，据《国父年谱》、《孙中山年谱》记载，1913年8月在神户登岸的时候，由于袁世凯同日本政府联系，检查非常严厉而苛刻，当时山本内阁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准予入境，9月以后就到东京。^①当时，就是革命团体的老干部来日本，也没有见到孙中山去横滨迎接，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事前没有商量决定也不会去，因此到横滨迎接宋庆龄的事儿几乎是不存在的。

关于1913年以后孙中山的活动，可以查看日本方面的资料。根据外交史馆所藏的《外务省文书》中大正2年(1913年)的《孙中山的动向》，我想可以确定宋庆龄与孙中山重逢的时间。

8月29日“上午9时30分宋嘉树外出，10时20分回家。11时10分再外出(因本人的女儿从美国来日本，大概是到横滨去迎接)。”

8月30日下午“9时50分，宋嘉树及两个女儿回到家。”

9月1日“下午2时30分，不知名的十二、三岁的中国男孩来拜访宋嘉树”。“宋嘉树的两个女儿及上述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共3人，下午6时20分秘密地离开家，乘7时从新桥开的火车至神户，打算到上海去(据说上述的男孩是宋的儿子)。”

9月4日“孙中山的秘书宋嘉树2日夜去横滨，次日到神户去。”

9月9日“下午11时，神户东方旅馆宋裼龄来电报。”

9月16日“上午9时50分，宋的两个女儿带着中国人的随从来访。”

从这份记录知道，宋庆龄是1913年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以后，回国的途中顺路到日本(横滨)的。从到日本后的情况看，开头三日的记录是互相衔接的，而且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就是说，宋庆龄8月29日到横滨，父亲宋嘉树去接她。30日，她同父亲和姐姐一块回家(东京的神田地区)。9月1日，弟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76年，第128页。

长女结婚，见柯亨书，第292页。

- ④④ 前引柯亨书，第77页。
- ④⑤ 前引柯亨书，第77页。另，蒋益沅任广东巡抚是在1866（同治五）年2月至翌年2月期间（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第190—191页）。
- ④⑥ 前引柯亨书，第80页。
- ④⑦ 同上，第77页。
- ④⑧ 前引戈公振书，第154页。
- ④⑨ 前引柯亨书，第78页。
- ⑤① 王韬在撰文时确实用“遁窟废民”、“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欧西寓公”等许多笔名（忻平：《从王韬的名号观其坎坷曲折的一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8期，第166—167页），但据方汉奇说（前引书第69页），《循环日报》登载文章时，不见用“笔名”，执笔者几乎都无署名，1884年6月20日（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七日）登载的《法越交兵记序》大约是唯一例外有署名的。
- ⑤② 前引方汉奇书，第69页。
- ⑤③ 同上。
- ⑤④ 同上。
- ⑤⑤ 同上。第70页。
- ⑤⑥ 王韬：《答强弱论》（载《弢园文录外编》第7卷）。参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37—38页。小野川先生指出：“《答强弱论》是对香港《循环日报》发表的强弱论的看法，为应日报主笔所求，从英国致答的文章。”但王韬旅英是在1867年冬——1870年春，其时还未创办《循环日报》，如果说旅英期间答香港《循环日报》这种解释正确的话，那么我想向先生提出疑问，无奈先生已做黄泉中人。这恐怕是把《华字日报》误作《循环日报》吧。或者王韬在《循环日报》创刊后再次渡英？由此则是我孤陋寡闻了。
- ⑤⑦ 黄毓 = 王韬与太平天国暗通，引起世人注意，首先是由于陈其元的《王毓上李秀成陈攻上海策》（载《庸闻斋笔记》，第12卷，同治十三年序文）。据陈其元说，王毓在墨海书院于同治元年中死去。王韬死后（1897年），出现几种王韬小传，正式的研究应该是在1930年以后。
- ⑤⑧ 譬如，关于日本侵略台湾、琉球，胡滨严厉批评王韬对此视而不见，把中国的独立“寄托”于同日本的和谈（见《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第80页）另一方面，据方汉奇说：王韬“反对日本当局借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强迫清廷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见《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70页）。此说较为适当。
- ⑤⑨ 管见所得，直接引用《循环日报》的唯一论文是铃木智夫的《洋务运动和帝国主义》（载野泽丰，田中正俊编《讲座中国近现代史》二）。铃木氏引用清法战争期间的《循环日报》的若干论文，指出“《循环日报》论文评论在东京湾清法两军之间发生的武力冲突，自1883年11月后调子变得更为强硬，这个报道被广东的广大民众读到后，煽起了他们的排外热情，起到了促进民众对洋务派的批判的作用”（前引书，第41页）。
- ⑥① 前引柯亨书，第292页。
- ⑥② 笔者在内地研修期间，得以阅读国立国会图书馆及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文库

龄的一封电报”知道，宋庆龄6月下旬回国了。

另外，还记载了9月2日至23日，孙夫人卢慕贞住在孙中山的寓所，并陪着孙中山到上野参观和到银座买东西；22日卢夫人把一包行李寄到美国。

从上面的记录可知，1913年9月是宋庆龄女士与孙中山重逢的时间；此后宋庆龄几次回国与来日，逐渐地离开姐姐霭龄成了孙中山的秘书，但1915年夏回国不在孙中山那里。对于这一期间的研究，要明确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如上所述，宋庆龄于1914年10月至1915年3月回到中国，因此认为台湾过去出版的《国父年谱》和日本几乎所有的孙中山研究者都确认孙宋结婚时间是1914年10月(或11月)25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在这一期间由于出现了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事问题，所以宋庆龄回国是为了同在国内的父母商量这个问题。为了证实这一说法，可以参阅《孙中山致戴德律函》。

1914年11月20日的信：“请原谅我未能及时一一作复，因为我的英文秘书目前不在此地。”

1914年12月25日的信：“日前我身边没有英文秘书。我之前的两位女秘书，是姐妹俩，姐姐宋霭龄女士刚结婚，妹妹宋庆龄女士最近已回上海。所以，我不得不亲自用英文写信。”^①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据盖理给莫理循的信说：“这个姑娘(宋庆龄)在母亲到山西探望女儿即孔夫人生孩子期间，在上海与父亲住在一起。(但是)，她母亲回上海的那天晚上，她随孙博士派来的人一起到日本去了。”宋庆龄大概由于家里反对同孙中山结婚而陷于苦恼，知道孙中山派人来，就从家里出走，又回到日本，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外务省文书》中《孙中山动向》记载，大正4年(1915年)10月24日的情况：“下午1时10分，孙中山乘汽车外出，1时50分到达东京车站，迎接从上海来的宋庆林(龄)和另一

① 《国父全集》第五册，台北1974年，第403页。

科士达1895年马关日记

译者按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士达 (John W. Foster), 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期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及李鸿章马关议和中被聘为顾问, 他的日记记录了这两件大事的经过和一些内情, 也记述了他在这些活动中以及随后在马关条约的批准、交换、执行(据约割让台湾)中的作用, 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有用资料, 他本人在撰写《外交回忆录》(Diplomatic Memoirs, 1909年出版)时利用了这些日记以及他在当时写给夫人玛丽(Mary Parke Foster)的信; 他去世多年后, 这些资料为他的外孙艾伦·杜勒斯(Allen W. Dulles)发现, 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近年开始为研究者所利用, 这从德万因的《科士达传》(Michael J. Devine, John W. Fost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Imperial Era, 1873-1917. 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等著作中可以看到。译者在1984年春访美期间结识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司马晋(James D. Seymour)先生, 承他赠送科士达1895年马关日记打印本一份, 现全文译出, 供我国的近代史研究者参考。司马晋先生还送给译者一篇他在60年代初写的文稿(未发表过), 里面多处引用科士达给夫人的信, 其中有若干部分是上述科士达本人及德万因等人的著作

日卢夫人来日，大概就是为了办理离婚而来的。然而，孙中山身边的同志，对他们的结婚，似乎持批评的态度。

但是，有材料证明，对孙中山来说，宋庆龄是很重要的。孙中山致恩师康德黎的信，可以证实这一点。

“……我的妻子是在美国大学受教育的，是我最早的合作者与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享受前所未有的生活，这是美满的家庭生活，她是一位伴侣和助手。

“我以前的妻子不喜欢到处旅行。所以，她在我流亡时代也不同我出国。她与老母在一起过平静的生活，她常常劝我，按习俗再娶。但是，我所钟爱的女性是新式的女性，不会同意那样的做法，我也不能将她遗弃。至此，我除了同意与前妻脱离关系外没有其他办法。”^①

两人重逢，当初对宋庆龄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而现在应该说对孙中山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正处于失意之时，他与宋庆龄的重逢，给他倾注了新鲜的活力，不久经过倒袁运动，他把握住了重新再起的机会。正如孙中山在1916年4月20日致邓泽如等函中说的：

“此盖鉴于辛亥之往事，以倒袁为成功者，实与往日以倒满为成功者同一比例。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振兴民国。”应该说他们俩人的重逢，成了孙中山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原则立场，以及恢复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②从结婚起，周围的同志对他们进行了许多批评，几乎没有听到热烈的祝愿，特别使宋庆龄感到周围充满了冷淡的气氛，但不久人们终于看清了真实的情况。如赫尔哈说的：孙中山得到宋庆龄这样卓越的助手作为终身伴侣，给他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这位新夫人总想着怎样减轻她丈夫的负担，实际上成了他的

^① 《国父全集》第五册，台北1974年，第416页。

^② 野泽丰：《孙文——革命尚未成功》，第178页。

请他注意信内没有说明他们有签订条约之权，这是不足之处，日本的全权大臣们可能提出反对，因为报纸上一直在指责他们不是抱着诚意而来，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张说田贝曾指出他们的权限不足，他就何以这封信以及他们的委任状都写得如此不完善做了很多解释。看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这些文件不完善，应当重写新的。

回到住所，丹尼森已在等我。他说他相信是有意不让中国全权大臣们发任何密码电报，日本人这样做是因为在战争前夕中国人不许北京的日本代办发密码电报。我告诉他，如果坚持这种做法，将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因为国际惯例允许全权代表及谈判人员与其本国政府自由通讯。

下午见到全权大臣们，他们已开过第一次会议，约持续两小时。会上互相交换了委任状，有备忘录致中国全权大臣，问他们的委任状中是否包含他们的全部权力。伊藤伯爵也告诉了他们不能发密码电报，所述的理由同丹尼森说的一样。全权大臣们昨晚提出的一份致北京的电报遭到外务省的拒绝，不给发出，外务省一名官员下午来通知全权大臣们说，收到了一份上海拍来的密码电报，但除非向外务省提供密码底簿，否则不予传递。我劝告全权大臣们不提供密码底簿，目前也不求再发任何电报，暂时把那个问题搁置起来，而努力去继续进行谈判，力求至少能做到使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以后如有必要再提那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对备忘录的答覆应慎重准备，我就此提了些建议。

晚上（7时半）他们送来备忘录覆文草稿，我做了些修改，8时半送还给他们。

2月2日 在广岛

上午11时往见全权大臣们，得知他们于今日上午9时送出了对日本备忘录的覆文，而日方曾派一名官员来问他们能否于昨天晚上送出。

关于宋庆龄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中，具体地怎样起作用，以及她自己怎样同革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准备在以后的论文中阐述。

译自《庆祝中嶋敏先生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卷第625—646页。文中孙中山的英文信请沈自敏先生校对过。

齐福霖译

2月5日

夜晚，在全权大臣的请求下，美国领事××^①电告田贝公使：科士达和全权大臣将于12日乘第一艘轮船赴上海。

2月7日

田贝来电说，〔人们〕正努力使日本政府准许全权大臣留在长崎，等候授予新的权力。××代全权大臣回答说，重要的是他们应返回中国做充分而坦率的报告。

2月9日

夜晚，田贝来电说，〔清政府〕决定寄发新的证书，应在长崎等候之。

2月11日

下午，田贝来电说，刚签发了谕旨，命全权大臣立即返回中国。

2月12日

上午11时登上法国邮船“圣西门号”，下午4时开往上海。

2月15日 在上海

途中为大雾所阻，上午11时才到达。

张看到李鸿章总督来电，里面说他已被任命为议和全权特使，由此看来现在的议和代表团就到此结束。李拟于开始谈判前先去北京请示并进行会商。他问张，我是否能受他聘用。议和代表团致电北京，就其出使情况提出长篇报告。特威^②自天津致电这里

① 据《外交回忆录》第2卷第118页，美领事为艾勃科容比博士。——译者

② 原打印本作“Teway?”，疑有误，姑译“特威”。——译者

神，把崇拜偶像斥之为迷信，但对孙逸仙却是个例外，因为他已成为新兴之神。”特别是他的三民主义，被宣布为国府的政治理念。我们一般把三民主义理解为由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构成的思想体系，而实际上，它是中国当时对付“挑战”的“救国主义”的应战纲领。这一纲领以孙文的史观为依据，其要点为，人类历史循着进化的法则发展，进化是生存竞争的中心，生存竞争问题派生出各种进化现象和事体。换言之，生存竞争是进化的中心，进化是世界史的中心。三民主义以世界之中心为纲领，是包括过去人、现在人、未来人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事实上，他的思想是在革命和建国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很奇特，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东西贯通、新旧调和而集大成之创造性。孙文早年曾说过，革命的基础在于学问造诣之高深。而这种高深的学问造诣没有哲学的思索和活动是不能建树的。那么，他的革命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其特点又是什么呢？

二、革命思想的哲学基础

本来，革命就意味着社会价值、结构、政治体系等整个社会根本的急剧的变革。严格地说，这种意义上的变革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未曾发生过。那时的运动只停留在以政治暴力改变部分社会结构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是人们从相信自己具有支配和变革环境能力的信仰中出发的斗争。

T·T·梅多斯(T·T·Meadows)在《中国人及其起义》一书中说，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革命最少、起义最多的民族，在其历史上，只掀起过一次革命。中国人在历史上虽然不断地掀起反对暴君的斗争，然而，没有否定当代政治原则。当然，还有诸如“易姓革命”和“放伐”等政治传统，只是掌权的权力主体的变换而已，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

3月13日

晚10时登“公义”轮，同船有总督、李经方、毕德格、罗、伍、亨德森乘“礼裕”轮。^①这两艘轮船都是租来运送总督及其随从人员的，随从人员有33名官员和92名仆从，共125人。14日晨7时离开码头。15日上午过沙洲，下午8时离开。16日上午10时到达山东××，17日下午1时启航。3月19日上午8时到达马关，抛锚停泊。一路上与总督多次会谈。

3月19日 在马关

井上先生来迎，上岸后提供了膳宿。下午1时半收到照会说，伊藤和陆奥为议和权全代表，并指定明日下午3时举行第一次会议。同丹尼森交谈。

3月20日

第一次会议于下午3时举行。交换了证书，据说双方都认为满意。总督提出停战建议，伊藤伯爵说将于明天的会上对此做出答复。

3月21日

在下午2时半举行的会议上，伊藤提出同意停战的条件（见抄件）^②。李总督请求允许在一星期内给予答复。日本全权代表说太长了。于是要求四天。最后达成协议，休会三天后做答。总督将那些条件电告北京，并指出其无道理。经商议，我建议迅速予以拒绝，总督同意要我照这个意思准备复文，但要等三天休会期满后提出，希望能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

① 原打印本这一句中的标点不明确。——译者

② 原打印本这一句中的标点不明确。下同。——译者

无数人探索的结果而形成的理性的体验和实证。说“知难”理由就在于此。孙文所说的“知”过去如此，将来也必须由“行”中获取。因而，“行”是“知”的必要条件，“知”是“行”的充分条件，能认识就能实践；即使不能认识也有实践的可能。

孙文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方面，特别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性。人群中有少数的先知先觉者，也有多数的后知后觉者；有各种各样的实践，有在科学理论与知识基础上的实践（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实践）；也有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实践（多数人的实践）。如果要使绝大多数人民的实践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知识基础之上，就要使人民接受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教导，学习他们的学说与思想。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落后，多数人民大众愚昧无知，因而，要引导他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认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为此，不打破过去几千年来束缚中国人的“知易行难”的现象，不来一个意识上的新变化是不可能的。由这样的必要性出发，他提出了“知难行易”说。孙文指出，中国人民由于在传统上偏重“行”，而忽视了“知”。他的这一判断可以在中国传统的“反知识主义”的特点中很容易得到证明。孙文进一步论述说，中国将来的不振不在于不能实践，而在于不能认识。这是因为把已经认识而没有实践的误认为前者易而后者难的缘故。如果能向中国人证明，认识不易，实践不难，使中国人无所畏惧，勇于实践，必使将来大振。他的“知难行易”说的现实根据是使中国人民了解西方民主社会的科学文化，理解三民主义的必要性，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建设卓有成效。孙文之意识革命的意义在于把中国人将历史发展看作循环的发展逻辑转换为科学与进化的逻辑。

三、三民主义及其特点

如上所述，三民主义是为了拯救衰老的中国的“救国主义”。

须使用），所以医生们决定至少目前不去动伤口。

李经方接见天皇的专使，他是来询问总督的情况的。收到许多询问情况的电报。

3月27日

总督昨夜安适，情况良好。

井上告知，尚未得到伊藤伯爵已离开广岛的消息。

3月28日

陆奥子爵来访，与总督进行会谈，并留下照会，代表天皇提出无条件停战（见抄件）。下午4时半李经方在会议室与陆奥相晤，收到陆奥提交的停战草案。晚8时总督向井上说明希望修改的各点。

3月29日

应井上的要求，上午10时3刻给陆奥送去拟议中的停战专条修正草案中、英文本（见抄件）。下午8时陆奥拜访总督，进行了长谈，就停战条款达成协议，并商定应誊抄出来，明日中午签字。

3月30日

上午11时3刻，李经方前往会议所在地校对停战专条的各文本。中午12时半，陆奥拜访总督，共同签订停战专条。

下午2时，总督照会日方（见抄件），请其书面提出和平条件，或确定今天或明天的一个时间为此举行会议。

3月31日

伊藤伯爵下午2时半拜会总督，确定明日上午10时李经方与陆奥子爵在会议室相晤，以商定进行谈判的方法。

价洪秀全的文章中写道，这一革命从社会标准来看是不可轻视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的失败是由于在“民权”思想未成熟的状态下进行而招致的。他认为，革命的成败决定于“民权”思想的有无。

孙文主张的“民权”是以所谓“革命民权”理论为根据，同西方的“天赋人权”具有不同的理论根据。前者主张只有革命的民众才有享受民权的机会，而后者则承认所有的人一律享有权力。孙文的“革命民权”理论是以其进化论为依据的。在他专攻医学时，风行世界的达尔文主义给他以很大影响。他的进化的观点是从民生史的角度解释人类历史的，分为“人与禽兽的斗争”、“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人的斗争”、“人民与皇帝的斗争”等。在第一时期，人与其他动物进行斗争，谋求自身的生存；第二时期，人类为了生存同自然进行斗争；第三时期，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进行斗争；第四时期，人民为了生计同君主进行斗争。民生史经历了“神权时期”、“君权时期”与“民权时期”等政治史的发展过程，这最后的时期就是为了伸张民权的“革命民权”时期，并主张只有参与民权运动的民众才享有民权。

作为“革命民权”的结果，虽然建立了伸张民权的制度机构，但并非没有弊端，孙文认为，在中国实行民权，不能照搬欧美的制度，他把民权分为“权”与“能”两部分，给人民以“权”，给政府以“能”。人民的“权”即政权，政府的“能”即“治权”之意。他所说的政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治权”就是所谓“五权宪法”，还独自维持了立、司、行三权外的考试与监察等中国传统的制度。

笔者认为，三民主义的重心也是民生问题。孙文很早就曾指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是历史的重心，历史的重心归结为“民生”。民权也不过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因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主体是人，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不伸张和保证

四两款外对其他各款的答复交给他。伊藤拒绝接受，坚持全面作答。

4月9日

总督送去条约各款的对案草案（抄件），并要求面谈。

4月10日

按口头约会，下午3时半总督与伊藤伯爵在会议所在地相晤（这是他遇刺以来的第一次）。一直谈到6时半。陆奥因病没有出席。伊藤提出备忘录，载明日本可以允许的对第一个条约草案所做的改变。总督希望对此进行讨论。伊藤说讨论没有用，这是日本的最后通牒，必须在三天内作出答复。总督说希望在四天内给予答复，但首先必须向北京请示。（备忘录见抄件）

4月11日

伊藤伯爵送来照会，重申昨天会上所做的宣告，必须在从昨天起四天之内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抄件）

4月12日

总督发出对伊藤昨天的照会的答复。（抄件）

4月13日

总督收到北京的指示。经我建议并得他批准，我打电报给张荫桓，请要求皇帝授权给总督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抄件）。我想总督已拥有这个权力！总督收到伊藤的另一个照会，重申不容许进一步争论。

4月14日

见丹尼森，向他说明总督想多有一天时间对最后通牒作答

的重心是极为合理的。他的思想，具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基础，他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① 他还说：“马克思在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② 他还特别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对与民生问题有直接联系的重要事业如上地、铁路、邮政、电气、矿山与山林等实行国有，制止资本家的恣意横行。

通常，把孙文的民生主义理解为修正资本主义或社会政策，但如上所述，孙文的民生主义是以“保民”（保障人民生存）和“养民”（维持生存）为目的的，因此，他虽然主张消费资料和生产工具私有，但却强调对与国防和垄断事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必须实行国有国营，以图阻止资本主义的垄断发展。在生产与分配方面，主张“计划生产”与“合理分配”。计划生产就是在国家的计划下，谋求国营与民营均衡的发展，极大地提高国营与私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加速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合理分配就是通过分配的社会化和大众化，使大众共享工业发展的成果。上述民生主义之精神，不论在原则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是同资本主义相区别的。对此，孙文曾指出，民生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的不同点是，资本主义以盈利为目的，相反，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的。

孙文的民生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修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当然，孙文自己也把民生主义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等。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他还把民生主义称作共产主义。平素，他乐意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但是，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决不是一致的。因为，民生主义只主张对主要产业实行国营化，奖励民营，这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区别；

① 《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18年10月初版，《民生主义第一讲》，第16页。

② 同上，第22页。

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在通过劳资合作，增进劳动者福利，保护个人企业等方面，民生主义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有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民生主义同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不同，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所制定的特殊的经济制度。孙文认为，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此，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也不可能一样。

特别是，民生主义一方面要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过程中，要实行社会化政策，阻止资本主义的垄断，谋求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利益。

其理由如下：第一，“互助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也就是说，社会的进化促成了多数人经济利益的互相调和，而不是冲突。多数人经济利益的调和就成为多数人的利益，这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他的这种见解认为，人类进化的原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斗争”。因此，他在民生主义中也认为，人类发扬互助合作的精神，通过计划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实现社会的调和和进化。他认为“中国的实业在合作的基础之上可以建成”。他相信在和谐的环境中，通过计划生产与合理分配，人民的一切生活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第二，“政治与实业的民主化”。孙文认为，因为自由与面包是一切文明人所追求的，因此，他主张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必须结成互相补充的关系。他还认为，政治的民主化必须在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才能开花结果；经济平等必须在民主政治下实行，才能符合全体国民的需要。因而，经济平等只有在民主政治的保障下才能圆满实现。

第三，“民生主义就是科学”。在孙文的民生主义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面包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要领一是增加粮食生产，其次是粮食分配的平衡。增加粮食生产就是使用科学方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粮食分配的平衡就是以科学的方法，合理的进行分

配。这些话都是期望以科学的方法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合理的运用国家和个人的资本。如上所述，孙文的三民主义是根据中国的客观现实，如何合理合法地解决中国传统重视的民生问题的理论体系。

结 语

对孙文研究有很深造诣的美国人史扶林(Harold Z. Schiffrin)曾经说过：“孙文同他同时代的大部分政治家的不同点是，他决不利用政治权力建筑个人地盘，他唯有一个伟大的目标，追求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独立、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孙文确实是大展经纶的优秀政治家，也是具有贯通东西、调和新旧素质的杰出的思想家。他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摆脱了传统的“尊古”观念，具备了进步的“崇今”思想。他的思想是在科学的基础上，经过中国式锤炼的时代产物。特别是由于他的革命思想打破了传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中国式答案。

目前，中共正向着2000年推进四个现代化，其主要势力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派，不如说是重视社会主义建设的所谓实用主义派。中共实用主义者们推行的现代化模式是什么样的呢？即使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和技术，新中国的建设模式同台湾模式也不会有大的区别，因为它们都不会越出孙文的理论体系。

译自南朝鲜《政经文化》1980年第7期

洪韬译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1925—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

〔苏〕A.Б.列兹尼科夫

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领导下,广大群众奋起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欺凌,反对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反动军阀和地主,反对为半殖民地剥削创造了条件的国内分裂状态。^①中国共产党的人数和影响在革命进程中急剧增长,当时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工人的。中国共产党表现为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

当国民党还是一支革命力量的时候,共产国际曾经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它支持国民党,但同时实行独立的阶级政策,并争取将革命过渡到更高的阶段。共产国际向东方共产党人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经受了实践的检验。鉴于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在本节中只限于分析共产国际在中国国民革命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由共产主义小组合并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高涨的

* 本文是列兹尼科夫著《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一书中的一节。——译者

① 详见M·Φ·尤里也夫《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中国现代史(1917—1970)》,197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8—121页;B·И·格魯宁、M·Φ·尤里也夫《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问题》,《远东问题》杂志1975年第2期。

条件下很长时期内不认为有必要“在有群众的地方”，即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经常给予帮助的共产国际建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以便使共产党人為自己打开通向群众的道路，而国民党则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反帝机会。早在1922年夏，共产国际就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议中谈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合作的具体方式就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7月起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着强烈地反对国共合作的倾向。只是在克服了“左派”的这种反对倾向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6月）才通过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正式决议，从而承认后者为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国民党（其领导人当时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之间曾保持着直接的接触。1923年底，鲍罗廷被派往广州，作为当时控制着华南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国民革命政府的政治顾问。

1923年秋，国民党的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在代表团逗留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决议阐述了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立场，并对国民党提出相应的建议。建议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依靠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实现中国独立的斗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应导致建立地方资产阶级的政权。建议把民权主义解释成应为中国劳动大众和一切进行反帝斗争人士的利益服务的原则。共产国际建议把民生主义看作是将外国资本的财产实行国有化的方针。共产国际表示相信，国民党将同中国无产

阶级的阶级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①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1月）在组织上正式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孙中山的压力下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解释三民主义的意见书。共产国际向国民党提出的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因为在这个民族主义的组织中地主分子拥有相当强大的影响（加之还有与地主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人士）。

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积极活动使国民党成为比较群众性的、比过去更有组织的具有反帝纲领的政党。

然而，这种活动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这是由于中共中央内部“左倾”的继续存在，这种“左倾”表现为竭力企图将共产党迅速变为国民党的领导力量或者与国民党决裂以便赢得它的群众基础。这种企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月）上，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国民党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阶层为首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联盟，他们决不打算将党和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共产党人；国民党的威望在增长，并具有全国的规模。^②

1925年5月，中国开始进行国民革命。这场革命的动力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地主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国民党是当时革命力量的政治领导。

当国民党还是国民革命组织的时候，是否可以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地主）的政党呢？全部问题在于对“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地主政党”这些术语的理解上。当然，如果资产阶级和地主对参加某个政党的群众实行绝对的政治领导，那么这个政党的群众性（即便大多数是劳动者）本身也丝毫不能改变它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地主的性质。但当时的国

① 《共产党人》杂志，1969年，第4期，第12—14页。

② 当然不能不估计到，国民党的领导集团企图破坏共产党人的影响，将其排挤出国民党或者把共产党变成它的附庸，而国民党领导人的这种政策客观上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情绪。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的党；在联盟内部进行着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因此在联盟内部活动的各派力量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同新兴军阀势力（以蒋介石及其扈从为首）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分子无疑曾是这个国民革命党内最有组织的和最有影响的势力。但是参与争夺国民党内领导权的斗争的，还有其他的现实政治力量，其中包括共产党。在革命的条件下，工农群众运动对联盟党内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上层分子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换句话说，从事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个广泛的政治组织，在国民党内最有影响的和决定性的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同军阀集团保持联系的资产阶级地主阶层。但是在这个组织内部，只要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组织不被消灭，那么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还会继续存在。当奋起进行斗争的群众还有其自己的组织时这些阶级虽然会加强国民党的力量，但毕竟保持着一定的政治自主以及要想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和明显地对该组织领导人施加一定影响的愿望。^①这一点使国民党有别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共产国际对仍然保持着国民革命性质的国民党正是抱着这样一些看法的。资产阶级地主分子后来同反动军阀勾结起来，最终投入国民党怀抱并把国民党变成为一股反动势力，从这一情况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国民党本来就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地主）政党。

随着中国解放运动的高涨，共产国际指示各支部给这个国家的民族革命力量以切实的支援。

中国发生五卅事件（为革命奠定基础的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运动）以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分析了国内的形势，

^① 例如，陶里亚蒂曾认为国民党是比一般政党“更加广泛”的组织。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广泛的组织，其中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为争取占统治地位的影响而斗争。这个思想是同托洛茨基的见解截然对立的，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无非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党，而拥有自己组织并在国民党内从事活动的人民群众，用他的话说，无非是一群“牲口”。

于6月17日打电报给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主席团在电报中说：

“鉴于中国日益发展的事态和帝国主义者主要是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日益扩大的进攻正在变为公开的武装挑衅，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主席团除采取一系列支援正在斗争的中国人民的其他步骤外，决定向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发出呼吁采取共同行动，以便揭露帝国主义者和阻止对中国的进一步进攻”。主席团号召各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吸引广大工人群众的舆论注意中国人民争取自己独立的斗争”，同社会党人和无党派工人们一起组织抗议集会和募捐，“建议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人采取统一行动。口号是：1.帝国主义者从中国滚出去；2.废除对中国的可耻条约；3.废除治外法权；4.满足罢工工人的要求；5.立即将枪杀上海、汉口、青岛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学生的凶手交付法庭审判”。^①

共产国际的行动促进了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反帝力量的团结，为西方工人政党的行动统一、为旨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支援的行动奠定了基础，它也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明显表现。共产国际的立场促使千百万人加入到支援中国人民的运动中来。中国的革命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迫切事业。在“不许干涉中国！”口号下进行的运动扩展到了全世界。在法国、德国、美国、英国、奥地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意大利、埃及、土耳其和其他国家都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抗议集会。

早在革命前，在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一方和以国民党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已形成。这个相互关系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具有代表意义。共产国际、共产党人给予国民党以支持决不是把国民党作为工农政党，而是作为国民革命的政党。然而，国民党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使共产国际相信，似乎国民党正是工农

^① 转引自《共产国际简史》俄文版第262—263页。

的政党或者甚至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1925年底，国民党代表胡汉民到了莫斯科，他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有过几次谈话。胡汉民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他是代表国民党的左派的；而根据他和蒋介石的意见，右派即资产阶级很快会转向反革命立场。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帮助国民党的革命派制定纲领，拟定以“世界革命原则”为基础的理论。胡汉民实际上是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的，无疑他得到指示把国民党说成是要比实际上更加接近于共产党人的政治势力。采取这样一种方针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国际有着强有力的后盾——苏联，它是劳动者执掌着政权，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的国家。国民党那时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集团，它诉诸共产国际，指望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切实援助。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面来说，有理由把国民革命政党——国民党的求助看作是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有利因素之一。中国当时正开展规模广泛的反帝运动，国民党领导着这个运动并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估计这个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取得的）将大大改变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预计，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只是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而这个胜利越彻底、越坚决，为过渡到下个阶段，即建立革命人民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地主领导的政治大杂烩，其中右派和中间派的势力很强大，而这个组织整个说来依然是革命的组织，它的最终政治立场将取决于其内部成员的斗争进程。

在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交谈过程中，胡汉民表示：国民党认为资产阶级是反革命力量，因此不愿意同它结成联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任务原则上没有不同，因此也有可能国民党将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目前中国正在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国民党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是必要的，既然在中国，不仅工人而且农民都是无产

者，那么国民党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并希望加入共产国际。胡汉民玩弄的手法很简单，他竭力替国民党“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从而企图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是多余的。“左”的词句必然是用来掩饰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存在本身的攻讦。共产国际执委会识破了这一企图，曾对胡汉民说，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得出结论，两党——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中总有一个党是多余的。共产国际坚持列宁主义的策略，主张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革命的联盟，但认为两者必须划清界限，明确制定每一方的目标和任务。国民党主张建立独立的中国，建立革命民主的政权，以满足几亿工农的最低限度要求。至于中国共产党，那么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为争取民族革命运动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这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国民党的任务是接近的，这也是结成联盟的基础所在。然而，中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阶级政党。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运用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公式，即在保持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独立性的必要条件下共产党人和东方民主派结成联盟。

在同胡汉民会晤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部的代表还讨论了中国在国民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何种国家的问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人们认为它自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时，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也不能满足奋起进行革命的群众的愿望。革命政权的形式将是什么样的呢？在会谈中没有使用相应的术语，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们无疑认为是过渡型的民族民主国家，即革命反帝力量联盟的政权。共产国际代表还提请胡汉民注意，在未来的国家里，民族问题将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总之，国民党想把中国共产党溶化在国民革命组织中的企图没有得逞。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在为加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而斗争。当然，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指望在不久的将来领导国

民党并把它变成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组织，这是一种空想，而他們要把非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员排挤出一切领导岗位的策略则是冒险主义的。但是否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将来领导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单是根据1927年中国共产党遭到惨重失败这个理由，是不能提供肯定的回答的。假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形势下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同国民党的“平等”合作上，那么实际上这种力量悬殊的合作只能意味着共产党服从于国民党。此外，这样的政策只会使本来在革命进程中可能会转向比国民党给予更多东西的政党的广大群众离开中国共产党，只会束缚这些群众的积极性，阻碍革命的进程。

然而，共产党人参加反帝统一战线，是试图通过这种途径使革命具有更坚决、更彻底的性质，争取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并依靠劳动群众把革命转向下一个阶段。这只能说，中国共产党内在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中曾经存在着某种急躁情绪。

在1925--1926年期间，国民党领导人不止一次地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国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这类要求是在1926年2月。这是当时还在莫斯科的胡汉民提出来的。他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据他说国民党接受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的思想。3月，这位国民党代表得到正式的答复，其中说到，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未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准备在第六次全会上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回答实际上是否定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无视这一点，诽谤共产国际领导，似乎它愿意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1926年9月，国民党的另一位代表邵力子来到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转达了蒋介石的以下建议：他（蒋介石）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而共产国际应当承认国民党（蒋介石指的自然是由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军政上层）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国民党代表又一次表示了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蒋介石十分关心国民党被接受加入共产国际。当时，国民革

命军已开始反对反动军阀的北伐，而蒋介石当时特别需要得到援助。同时，他希望使中国共产党丧失活动能力，因为他认为后者是竞争对手。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识破了蒋介石的真正用意。

邵力子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了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权问题，并将此问题转交给“小委员会”。过了几天，决定向在中国的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魏金斯基征询，问他们的意见如何，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如何。原来预定，在得到征询答复后，这个问题再重新讨论一下。但从中国没有得到答复，而蒋介石在1927年4月的叛变自然结束了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谈判。

因此，总的说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段时期内在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没有给蒋介石以明确和断然的拒绝（因为这可能会被利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也没有同意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即使作为“同情党”也好。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3月）通过了一项有关中国革命的详细决议。

在这个决议中，国民党被认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这个联盟是建立在上述这些阶层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整个封建军阀制度、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革命统一政权斗争中的共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的。全会指示中国共产党支持建立革命的武装和实行军队民主化。在决议中，农民问题被称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全会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将在反对下面两种同样有害倾向的斗争中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右的取消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企图抹杀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另一方面是“极左情绪”，决议指出，这个情绪的代表人物力图“越过运动的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忘记了农民是中国民

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其次，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反映农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的口号下把农民联合起来，同时要把这些要求与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一般政治任务结合起来。^①

当时，在中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变。1926年春，蒋介石在广州策划了反对共产党人的政治军事阴谋。这是在共产党人加强了自己国民党内的地位时发生的。那时，广州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和争取在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抱有幻想。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了旨在反对共产党人的政变；革命根据地的政权落到了国民党军队上层的手中，而广东的工农组织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下。然而，蒋介石还没有把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组织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他采取这一步骤，他的军队进行北伐——当时国民党已经准备北伐——的胜利可能性将受到极大限制，或许甚至化为乌有，因为国民党的军队需要群众的支持。蒋介石在发动政变时，不可能走得太远，这还因为他懂得：采取这样的步骤将会导致苏联政府停止援助。3月20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存在着，斗争着并扩大着自己的影响。革命的命运将在以后的斗争中见分晓。

1926年7月，北伐开始了。国民革命军向华中挺进，粉碎了军阀的反抗。同时，出现了工农群众斗争的高潮。北伐的计划是由以布留赫尔为首的苏联军事专家小组制定并在它的干练的指挥下实现的。

1927年1月，在武汉建立了国民党政府，然后，国民革命军挥师东进，进军南京和上海。一半的国土已为国民党所控制。^②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俄文版第619—623页。

② 关于北伐的情况详见M·Φ·尤列也夫《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又见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75年莫斯科俄文版。

早在北伐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1926年7月），全会得出了完全正确的结论：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小组织和群众性政党”的过渡阶段。然而，“左派”集团过高估计党的力量，认为3月20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发动攻击后已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力量了。典型“左倾”幼稚病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袭击客观上就是对人民大众的袭击，而人民大众就应当藐视它。但是，从群众方面说，必须使他们把共产党的政策同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下这样的结论。不过，这需要经过多年的时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需要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争取群众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远没有达到如此巨大的群众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七月全会上，“左派”又一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建议。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北伐开始前，中国共产党拥有11000多名党员。其中工人占66%，知识分子占22%，农民占5%。拥有1万名团员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加入了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现实的力量。同时，共产党人指挥着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及其影响的这种巨大增长早在革命时期就出现了。随着北伐的展开，党员人数进一步迅速增长。^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12月）在制定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方面是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全会认为革命是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归根到底领导中国人民从异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统一国家，建立工农民主革命专政，解决土地国有化和没收外国资本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

① 1927年3月前，中国共产党已有大约58000名党员，其中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见《共产国际简史》俄文版第268页）。联合着大多数工人的工会以及人数众多的农民协会都处在党的影响之下。

会明确了这一原理之后认为，目前中国革命还需要经过一个全民族的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处在自己发展的初期阶段，革命的动力是由无产阶级、农民、中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广泛的反帝联盟。^① 在全会的一些决议中还阐述了过渡性质的土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地租、废除各种捐税、没收反革命地主的土地，即确认中共中央七月全会所提出的那些口号。此外，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也被作为前景提了出来。

共产国际在制定中国革命问题的策略路线时，找到了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正确答案。全会强调指出中国1925—1927年革命在其初期阶段的全民族性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全会指出军事因素在这次革命中的巨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的而且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新的提法。另外，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中国问题委员会中作出的对中国军阀的深刻而确切的评价也是新贡献。^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估计中国革命总的前景时指出，这一革命的结果“绝不会造成使国家朝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社会政治条件”；^③ 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它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的国家”。^④ 全会召开的时候正是国民革命军对军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支柱——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全会认为，帝国主义的干涉正在加强，国内的环境异常特殊，因此国民革命“跟19世纪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俄文版，第668—680页。

② 共产国际积极参与制定对于中国的条件来说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的观念，这些根据地可能在这个政治结构十分松散的国家的某些地区建立起来。全会后不久就提出了在中国西北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正如中共领导人强调指出的，那里“外国干涉的危险较少，我们将与苏联接触并可能得到它的支援”。（《共产国际简史》，俄文版，第265页。）

③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俄文版，第672页。

④ 同上，第673页。

西欧各国的旧资产阶级革命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有很大的不同”。^① 全会指出了参加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社会力量迅速集积的过程以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方面的历史必然性。^② 全会认为土地问题是“当前局势的中心问题”。^③ 全会制定了具体的纲领，提出旨在“吸收工人阶级群众参加运动和加强它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并将农民争取到革命方面来。^④ 全会指出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般民主任务，特别强调了共产党人同那些企图把国民党变为资产阶级地主政党的国民党右派人士进行经常的坚决斗争并同国民党左翼实行合作的意义。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后，共产国际执委会预料，蒋介石迟早会坚决起来反对中国的革命势力。第七次全会指出：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化，大资产阶级将得出结论，今后的反帝斗争将威胁到它的利益，因此它会脱离革命并竭力将革命摧毁。正如全会的决议中指出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争取时间以便进一步发展革命，加强共产党并做好反击反革命进攻的准备。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无疑是个复杂的文件。

一方面，它强调统一战线，必须维护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在军官阶层中地主势力十分强大的军队的联盟。另一方面又指出必须强化农民争取土地的运动，以便做好同资产阶级地主势力不可避免地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通过各该时期作出现实主义的决议，通过克服日益成熟的实际困难，通过采取灵活的政策以便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力量对比对共产党较为有利的时机以前推迟不可避免的冲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要解决的任务。当时中共领导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工作的同志们活动条件极其困难：从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670页。

② 同上，第671—672页。

③ 同上，第673页。

④ 同上，第675、678页。

1926年底开始，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对反动军阀采取军事行动而取得成功，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地准备对共产党实行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选择了一条唯一可能的——尽管是复杂的道路。假如共产国际象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历史学家事后所“建议”的那样，指示中国共产党拒绝为争取日益展开的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斗争，那么这实际上就等于将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之中而归于灭亡；假如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分裂统一战线并同蒋介石闹翻——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想要干的，那么局面就会是共产党立即被军阀所消灭。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估计到具体的形势，不上挑畔之当，并保持同国民党的联盟，从而得以扩大和提高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威信，并加强武汉国民党集团的地位（后者鉴于蒋介石建立军事独裁的威胁日益严重，企图争得群众的支持，同时提出一些民主改革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还是蒋介石的独裁”，这个问题必须通过现实力量的对比来加以解决。

1927年4月12日，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的打击，蒋介石在上海实行了军事政变。^①

在1927年春季前，当蒋介石采取公开分裂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时候，优势明显地在他一边。这是由许多情况造成的。广大人民群众继续相信不久前还是革命政党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不站在国民党革命原则的旗帜下，那么许多拥护者就不会跟它走。军队的大部分指挥人员处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地主上层人士

① 当时在中国的水域内集结了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170多艘军舰。3月24日，英美的舰队向南京进行炮击；4月6日，张作霖的士兵闯入北京苏联使馆，逮捕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4月11日，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惩罚参与反对外国人活动的肇事者；最后，4月12日夜，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者及武装部队勾结起来逮捕了1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清晨，雇佣军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白色恐怖开始。这是决定革命命运的一次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自己的政府，在国民革命军控制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建立了军事独裁。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也实行了改组。

的影响之下。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给予反革命政变和军事独裁的拥护者以有效的反击，而中国共产党与之打交道的又是这样一个有经验的、手段残暴的、且又远没有丧失群众支持的对手蒋介石。正如共产国际所预见的，阶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27年4月，取得胜利的是客观上力量强大得多的一方，即与军阀相勾结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上层分子。

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历史学家们不遗余力地跟随在托派的屁股后面硬说，似乎共产国际想要人为地“阻挠”中国的农民运动，从而促使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有鉴于此，让我们来看一看说明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国农民斗争上的立场的一些事实。

这场斗争的口号和规模是怎样的呢，它的主要阶段和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又是怎样的呢？

由于北伐的广泛开展，在中国掀起了越来越高的农民运动浪潮。正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926年7月)时，中共中央全会在决议中指出，国内各地的农民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过高租税，反对提前征税，反对贪官污吏，争取结社自由，争取建立武装自卫团，等等。全会将党的土地纲领推迟批准到党的代表大会上解决，只提出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要求，例如确定最低限额的地租。全会认为，农民的打击矛头应针对“恶霸”地主。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开始后立即发表声明，阐述了这一决定。

在北伐过程中，1926年秋，国民党通过了农民问题纲领。纲领规定在业已解放的地区减少地租25%。顽固坚持自己立场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上层不打算执行这个纲领；然而，共产党人则依据这个纲领在农民中进行工作。农民协会的人数不断增长。例如，1926年10月，江西有6千多名农民协会会员，在革命军到来后，农民协会的人数增加到30万人。湖南农民协会的人数发展得特别快(到1927年4月就有500多万会员)。但是，农民协会的大规模出现和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只是在国民革命军所控制的地区

内。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决定，同意建立区和地区的农民自治机关，并大大减低地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支持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业已起草的土地法草案规定，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将按人口分配。然而，军阀集团坚决反对这个草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开始时同意草案，预计将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建立地方的农民自治机关。但是后来得到专门委员会赞同的这个草案被“枪毙”了。

1927年4月—5月（即蒋介石发动政变和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除了讨论其他问题以外还讨论了土地问题。“左派”号召立即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实质上这就意味着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要求。在代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的陈独秀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只能在北伐成功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罗易驳斥了陈独秀的观点，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鲍罗廷发言赞成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最后，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指出，农村中的关系仍具有封建性质。必须没收出租的、公有的、宗族的和寺庙的土地，并将它交给农民。至于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则不应没收。这不是号召实行土地革命，但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应当说是一个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激进的纲领。当时，农民的斗争继续在发展，在许多省（特别是湖南和湖北）这一斗争遭到了反动军阀越来越残酷的打击。阶级对抗的尖锐化引起了仍然主张同共产党人结盟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担心。^①

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担心农民运动的开展会使左派国民党政府吓跑而投向蒋介石阵营，同时也指望左派国

^① 关于农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土地政策，详见捷柳辛《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农民土地问题（1921—1928年）》一书，莫斯科1972年俄文版。

国民党政府会同意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于是就开始阻止农民运动，抑制运动的锋芒（尽管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自己在土地问题上的要求）。当将领们破坏农民协会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同这些“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划清界限，并声明，其责任应由“反动派”来负。7月初，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管制。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但是，就在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破裂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总之，北伐时期的中国农民运动是具有群众性的（到1927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材料，中国拥有将近1000万农会会员），但是，农民奋起进行斗争只是在国民革命军到来之后，尽管运动的规模和形式往往直接违背国民党及其军队指挥人员的利益和计划。

在上海事变后由武汉政府管辖的地方，农民运动继续高涨，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运动的目标也不是消灭地主阶级。这是由于中国土地关系的性质本身，特别是由于大批赤贫农民存在决定的。农民群众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意见不一。一部分贫农支持中农，他们与富农地主一起担心大批赤贫农民会侵犯他们的财产。同时，在中国许多地区，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商业高利贷剥削和税收，而不是地租；而中国的地主往往并不是大土地所有者。这样，中国的农村在反封建的革命中并不是明确地分为地主和农民的。

托季反对派（后来支持他们的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历史学家）硬说，似乎从北伐一开始，在整个中国，土地已经在地主的脚下燃烧，农民到处都夺取了政权，表现为一支准备同国民革命军进行胜利决战的力量，这是严重歪曲现实的说法。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的土地政策提出了哪些具体建议呢？

众所周知，托季反对派企图“证明”，似乎共产国际人为地“阻止”中国的土地革命，千方百计地让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

1926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一个文件，指出：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村上层的斗争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危险的。

文件中提到，这种加剧会使资产阶级、商人和农村上层倒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只要来自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威胁存在和将来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那么，国民党就应当保持自己的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和同路人。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土地问题应当切实地提上议事日程，没有农民的支持，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文件中强调指出，在农村中立即发动内战——在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战争正酣的情况下——可能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

1926年10月，当这个文件起草好时，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地主领导人尚未脱离革命，统一战线尚未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然而，国民革命军已处于困难的境地。它在主要战线上(江西省)遭到了重大损失；单是在指挥人员中，这一损失已达到50%以上，而国民革命军的指挥人员大部分出身于作战地区一些省份的地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村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尤其是在战事极其微妙复杂的时刻——可能会使国民革命军瓦解。共产国际根据1926年秋的具体情况，不能不认为这一口号是为时过早的和危险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估计到蒋介石的政策中会出现导致统一战线破裂的趋势，在这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几次指示中出现了新的提法。例如，在1927年3月通过的文件中谈到了武装工农的必要性(指的是组织合法的和秘密的工农武装队伍)。

当中共领导人在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上采取审慎立场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共产党发出一系列指示，大力发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特别是在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部队中。共产国际最初向中共发出这类指示是在5月初。当时，武汉集团必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倾向已经明显表现出来——这是由于蒋介石和该集

团领导人的阶级利益和军事党阀利益的共同性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估计到4月的教训(原来预料的打击竟然是恐怖行动),指示中国共产党准备给敌人以反击。共产国际执委会抱着这个目的认为共产党有必要大力加强在湖南省十分活跃的群众性农民运动,建立和武装工农队伍(同时建议与武汉集团的个别领导人联合行动,以便维护对群众来说非常重要的“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

在这个时期(1927年5月—6月)的共产国际文件中,特别强调有必要在“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口号下系统地开展土地革命;在土地运动蓬勃开展而反动军阀大加镇压的那些省份里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例如在湖南和广东)。文件中指出,目前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切实没收土地,共产国际建议“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指出,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就会变成将领们手中的玩物。文件指出,左派(武汉)国民党的某些领导人正在畏缩、动摇和妥协;有鉴于此,建议将尽可能多的工农领袖吸收到武汉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特别强调,必须克服武汉政府对军队将领的依赖性,动员共产党人、两湖的革命工人和农民成立几个新军,并尽快建立革命军队。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阻挠土地革命是不能容忍的。

由此可见,很明显,托季反对派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历史学家所喜欢重复的、什么共产国际人为地“阻挠”中国的土地革命,完全是一派胡言。相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张开展农民运动,同时建议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估计到1927年政变后国内的现实形势。

蒋介石之所以能在上海成功地发动政变,并不是因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的建议“为时已晚”,而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及其武装部队力量更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在武汉也遭到了挫折。共产国际提出在农村发动内战的建议是及时的,当时在武汉集团控制的地区,群众反对土豪劣绅的运动正开

始展开，与准备同蒋介石勾结一起的地方军阀的冲突必不可免，形势很明显，将领们正准备给运动以毁灭性打击，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统一战线已失去现实的政治基础，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武汉集团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盟只是原来统一战线的残肢（军事独裁的建立使武汉集团成为瞬息一现的昙花）。

上海政变后革命转向新的更高的阶段以及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政府之间具有阶级对抗的结论自然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问题不在于公式。

实际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从1927年5月上半月开始就指示中国共产党领导，要发动人民大众起来反对指望同反动军阀妥协的武汉国民党领导人。问题曾经这样摆着：在蒋介石4月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打击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应当放弃新的战斗，还是相反，在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利用仍然使中国共产党享有一定行动自由的形势，竭尽全力积聚残存的力量，以便进行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共产国际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共产国际对武汉集团并不抱任何幻想，它指示中国共产党采取行动，这实际上就是同武汉集团进行战斗的准备。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的实质就是：在共产党的先锋作用下团结国内一切反帝力量，这条路线遭到了托季反对派的疯狂攻击。反对派利用中国革命问题来攻击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总路线，后来反对派又企图利用革命的失败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共产国际关于必须支持具有革命性质的民族运动的结论被歪曲地解释为同并非共产主义的那些反帝力量实行决裂的方针。反对派根据中国阶级力量的配置和革命的性质，认为中国革命在原则上同1905年的俄国革命没有什么不同。托洛茨基分子宣布中国的民族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直接的前景，革命的三民主义被认为不是广大劳动

群众准备过渡到更高的意识形态的前进步骤（共产国际的观点正是这样的），而是基本上反动的意识形态。反对派把建立代表一系列阶级联盟利益的政府的思想宣布为“一无可取”，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国民党被看作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从来不是站在革命立场上，而只是“乔装打扮的”革命组织。反对派要求在中国立即成立作为政权机关的苏维埃，而且首先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换句话说，反对派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要求立即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在一般民主的口号下吸收更广泛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以便使他们在斗争过程中根据亲身经验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托洛茨基则否定关于群众亲身经验具有巨大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立场必然要导致冒险主义。

共产国际坚决驳斥了反对派企图强加于它的策略路线。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9—25日）上分析了1927年中国革命力量遭受失败后的形势。共产国际认为：“波澜壮阔的工农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阶级的、民族的任务都没有解决；认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是“不断革命”，是错误的；“想要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与托洛茨基在1905年所犯的错误相似。这样提出问题也就取消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作为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民族特点，因而这个错误也就更为有害”。

全会认为，在中国由于阶级的重新改组，出现了反动派实力的加强：资产阶级不仅完全同反革命封建势力和军阀勾结起来，而且实际上还同外国帝国主义达成妥协。

全会还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许多省份，农民运动在向前发展，而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遭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正处于某种低潮阶段”。

这样，在1928年初，共产国际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其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以后的年代里在诸多方面决定了革命的发展。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工农群众参加斗争，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团结在党和党所提出的口号周围，领导他们进行日常的发动。在全会的决议中谈到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必要性；它认为共产党“在农民苏维埃地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以便使这些队伍今后逐渐汇合成一支全国性的红军。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广州起义（1927年12月）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的英勇尝试”。同时指出，起义表明，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对参加国民党工会的工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党中央完全不了解广州事件的情况。“尽管有这些领导上的错误，但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是中国工人的极其伟大的英雄主义范例，中国工人有权担负起领导伟大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使命。”共产国际警告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忽视盲动主义的危险，不要“把起义当作儿戏”。

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全中国的统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推翻现政权，建立工农专政，组织苏维埃等要求被建议作为党的口号。在国民党上层叛变、1925—1927年革命失败以及当时缺乏建立广泛反帝统一战线条件的新形势下，共产国际主张支持作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苏维埃的口号。^①

共产国际清楚地了解了中国阶级政治力量的现实对比和共产党内的状况后，制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失败后时期内的策略。共产国际从来自中国的消息和信件中得知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困难处境。根据劳工部的正式材料，到1928年5月前，大约有1万名工人积极分子被害。在许多省份，地方党委会遭到彻底破坏。被捕者受到惨无人道的拷打并游街，强迫他们供出共产党员或工人积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俄文版第764—767页。

极分子。

广大工人群众处在由于1927年春夏的事件以及残酷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政治上受压迫的境地。工人阶级曾经站在革命的最前列，因此它所受到的打击也最惨重。工人们失去了革命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被剥夺了参加除国民党工会以外的任何工会运动的权利，他们受到了军队警察的监视，在他们的非法组织和协会中派去了奸细。共产国际执委会了解到，在新的形势下，工人群众的群众性发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农村地区，白色恐怖还不可能具有如此全面的性质，因此未来革命的最初浪潮将在农村地区开始掀起。

共产国际执委会越来越得出结论，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进行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毫无希望的，党必须采取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在革命的年代里，工人们的发动唤醒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在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广大农民中还有不少的“风潮地区”。农民们没有忘记，共产党人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积极地维护他们的利益。广大农民阶层根据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所能理解的程度，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反对地主的压迫、争取农民的权力、争取建立独立的农民武装力量的运动。

共产国际执委会不遗余力地指示中国共产党领导要在无产者中积极开展工作，期望重新建立和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然而，这件事没有办到。其原因不仅在于残酷的反工人恐怖，也不仅在于国民党的改良主义的工人立法。

非无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对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历史的实践表明，用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重新教育非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和重要的任务，要解决这项任务只有思想上久经考验和政治上富有经验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才有可能。

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建议中国共产党人，要争取由无产阶级革命家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指示党建立工农红军。然而，一些农村流氓无产者阶层出身的领袖和革命年代里分散在军阀部队中的

军官越来越多地参加了党的领导。很自然，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对无产阶级斗争也采取蔑视的态度。改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落到“新领导”的肩上，然而新领导不但不去排除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本身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译自《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

1978年俄文版第247—273页。

宋洪训译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杜宾斯基

一、针对日本的威胁苏蒙 加强远东边界的措施

1935年以前，由于南京政府方面的原因，苏中关系并不令人满意，这明显地反映在苏中贸易额的不断减少。1934年，中国从苏联进口计854.2万美元，向苏联出口584万美元。1935年和1936年，进口分别减少到770万美元和125万美元，而出口减到423.8万美元和421万美元。^①国民党内一批倾向对日媾和的政客积极活动，亲日派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难以”调整。但是，南京政府中持有必须调整对苏关系看法的势力逐渐占据上风。

1935年2月，中国政府驻英国公使郭泰祺同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И·М·梅斯基举行了会谈。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国形势带有“危急”性质。三年多来，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日本的进攻”，中国指望西方援助的打算落空了。“同盟国只停留在虔诚的决议上，不能阻挡日本人侵占满洲……就在前不久，美国人在经济领域内给了中国以不寻常的打击。由于约在一年前通过

* 节译自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一书 译者

① 见М·С·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65页。

的‘白银法’的结果，美国人开始抓紧收购白银。因此中国白银流入美国，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郭泰祺强调说，“不列颠政府并不比美国强……三个月前西蒙同我会谈时声称，大不列颠对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特别关心，但是西蒙没有动一个指头去帮助中国对付困难。总之，中国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对西方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国驻苏大使颜博士(颜惠庆)那时离开苏联，现在又重返莫斯科，这“应看作是中国对苏关系的重大转折”。^①

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表示要同中国建立亲密睦邻关系的愿望，表示要全力响应中国人民的需要，并博得中国舆论界广泛赞扬的真心实意。

1935年8月10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给予中国遭受水灾灾民援助的决定。为此通过红十字会给中国捐款1万美元的中国货币。早些时候，应中国当局和新疆省政府的请求，从苏联向喀什派出了3架飞机运载防治瘟疫支队，于7月底以前制止了瘟疫蔓延。苏联医疗支队给全体居民接种疫苗。9月15日，驻守和田地区的第三十六师指挥部请求苏联驻喀什领事报告苏联政府，周围许多地区瘟疫流行，希望苏联派出防疫支队。

苏联政府立即同意这一请求。但是从苏联向和田派遣防疫支队需经南京政府同意。南京政府中有些人坚持认为，苏联正对新疆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似乎准备对该省采取“侵略性行动”。苏联驻华大使П·В·鲍格莫洛夫接到莫斯科指示，向南京政府通报第三十六师的请求。^②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18卷，第469页。

② 同上，第518页。南京政府通过外交部长汪兆铭对苏联政府准备参加防治和田地区近来发生的严重灾害深表谢意，并给新疆省政府发电，指示“该地区对苏联防疫支队放行和给予必要的协作”。(同书，第18卷，第535页。)

还在1935年5月9日，苏联政府就通过鲍格莫洛夫大使表示，愿意同中国发展业务上的联系。有一段时间，南京政府对苏联的建议不给任何答复。1935年10月鲍格莫洛夫同蒋介石举行会谈时，说明了苏联政府打算改善苏中关系、缔结商务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

蒋介石答复他完全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对两国的威胁来自同一个根源”。蒋介石指出，“已经收到了他的代表的报告，可以确定，不仅他本人，而且政府其他成员，过去的疑虑已经消除。他相信苏联对新疆不存在任何侵占的意图。”谈到同苏联缔约问题，蒋介石表示，他想“不作为政府代表而作为中国军队统帅”，同苏联政府签订协定。蒋介石让苏联大使明白，中国打算同苏联签订一个秘密军事协定，要求苏联一旦有了肯定性的意见时就告诉他，苏联是怎么考虑“这一协定的”。^①

1935年12月14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B·C·斯托莫尼扬科夫电告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不反对协定，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②在12月28日的信中斯托莫尼扬科夫向鲍格莫洛夫说明，首先签订互助协定，苏联政府想“摸清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为此，鲍格莫洛夫建议单独会见蒋介石，并且“向他确认，苏联政府准备签订他所建议的协定，取名为抗日互助条约，并向他提出了要求他澄清立场的一些问题”。苏联政府不清楚蒋介石将如何具体实现他本人所提出的建议。他想让苏联承担什么样的义务？中国政府的义务又是什么？双方的义务从什么时候开始履行？鲍格莫洛夫要求蒋介石澄清，他具有什么样的个人力量。

斯托莫尼扬科夫指出，苏联承担极其重要的义务的同时，也应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即蒋介石是如何考虑抗日救国的，其中包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18卷，第537页。

② 同上，第590页。

括一旦日本进攻苏联，中国将如何援助苏联的计划。信中强调说，“这尤其必要，各方面的情况都使我们确信，南京政府的一切考虑只建立在其他国家对日作战的基础上，它并不认为自己能同日本作战。”

信中提到了蒋介石同中国红军的关系问题。苏联始终不明白，如果国民党武装力量忙于同中国红军打仗，蒋介石怎能认真对待抗日。斯托莫尼扬科夫强调，苏联清楚地认识到，“不实现蒋介石军队同中国红军部队的统一战线，就不可能真正地抗日”。^①

后来事态的进程证明，南京政府并没有一心一意去抗日。此外，日本新闻界报导说，南京政府同意关于日中共同反共的广田三点纲领，这自然引起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真实意图的警惕。

蒋介石显然回避对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是鲍格莫洛夫根据1935年12月28日斯托莫尼扬科夫的信向蒋介石提出的。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向鲍格莫洛夫表示，“他认为最后一个问题——关于红军问题是向他所提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蒋介石说，“如果我们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坚持要求苏联政府在南京和中国红军之间调停，以便说服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才能抗日”。^②

苏联政府认为，国共关系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蒋介石“满可以同中共直接议和，无需任何调停”。1936年2月29日苏联外交部给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正是以这种方式阐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③

在进行这些会谈的同时，苏日关系更加紧张起来，这是因为日本在苏满边界，同时也在友好的苏蒙关系中推行挑衅政策的缘故。日本准备对苏作战，企图利用满洲和蒙古作为据点来达到这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18卷，第601—602页。

②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19卷，莫斯科，1974年版，第35—36页。

③ 同上，第723页。

一目的。他们打算同满洲国一样，成立日本庇护下的“蒙古国”。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个国家不仅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而且包括内蒙古省(察哈尔、绥远)。①

日本对蒙关系中的侵略意图，要求蒙古和苏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远东防线。还在1934年11月27日，应蒙古政府请求，苏联同蒙古达成口头协议，责成两国在防止战争威胁事务中互相支持，一旦第三者进攻蒙古和苏联，两国有义务相互给予支援。1935年秋特别是1936年2月，蒙满边境上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形势。②日本军阀不仅耀武扬威，而且大摇大摆地杀将出来。日本军阀的挑衅活动要求苏联和蒙古采取积极的步骤，以便筑起自身边境安全的坚固屏障。

1936年3月12日，苏蒙两国在乌兰巴托签订了为期十年的互助议定书。议定书第二款规定，当缔约的某一方遭到第三方攻击时，另一方将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③苏蒙相互援助议定书是警告日本帝国主义的文件，也就是说它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在加强苏联南部边境和中国北部边境安全的同时，1936年3月12日议定书还为保证中国西北的安全以及保护穿过新疆和甘肃两省的交通干线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前提。④

然而，南京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反对该议定书的抗议照会。⑤在中国报刊上，这一由于苏蒙安全利益而决定的行动几乎被视为侵占满洲和华北的事件。中国报刊反对1936年3月12日议定书的表现，显然是在促使“中国人民和其他

① 见M·C·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62页。

② 见《苏联对外政策史》，第1卷(1917年—1945年)，莫斯科，1976年版，第334页。

③ 1936年3月12日议定书的全文，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19卷，第136—137页。

④ 见M·C·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63—264页。

⑤ 见《消息报》，1936年4月9日。

国家……”反苏。^①

后来的事态进程清楚地表明，苏蒙外交是多么地卓有远见。假如1937年前日本侵略蒙古的阴谋得逞，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有可能因此给自己向中国西部进一步渗透创造有利条件。他们有可能在苏中之间构成一个巨大障碍，“开始以深入的侧翼迂回并从后路包抄进攻中国军队，同时切断穿过新疆、连接苏中的交通干线，即当时一条重要的给养动脉”。^②

二、完成苏中谈判。1937年8月 21日签订苏中互不侵犯条约

1936年11月，在第八次非常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M·M·李维诺夫声明：“苏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和平政策。苏联所追求的这一和平既为自己，也为别人，因此愿意为此而提供自己的合作。苏联期待着别人的不是侈谈和平，而是实现这一和平的行动。但是，苏联并不强求搞任何同盟，任何集团，任何联合，而是心平气和地让别国去衡量和估价在他们同苏联的密切合作中给和平事业带来的好处，并且明白，苏联能够多给而不多得。”^③

苏联致力于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立场，促进了南京政府以后的行为举止，使得它在远东的复杂形势下，迟早总会采取接近苏联的建设性步骤。

在日本侵略威胁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力量形成了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19卷，第276页。

② 见M·C·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63页。在中国西部，涉及到日本和英国的某些利益。他们（各代表自己利益）竭力要把新疆分离出去。对日本来说，新疆作为从南面和西南面占领蒙古的据点，作为侵略苏联的理想基地，因而引起对它的关注。对英国来说，它害怕苏联影响印度，在喀什噶尔建立一个反苏缓冲地带是很重要的。

③ 见M·李维诺夫《反对侵略》，莫斯科，1938年版，第41—42页。

新的格局。1936年底，德日“反共产国际条约”刚签订，蒋介石政府里主张同苏联亲善的人士就形成了一派强大的势力，1936年指派主张中苏合作的蒋廷黻担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就是这种情绪的某种反映。蒋廷黻确信，一旦中日爆发战争，“苏联将以物资供应和武装力量支援中国”。^①

1936年12月9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同蒋廷黻会谈时向蒋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同新疆发展贸易关系，并希望那里不再发生动乱……苏联关心新疆的中国政权，为的是不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往那里渗透。苏联在新疆的利益不过如此而已。”^②12月15日，中国大使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举行会谈。会谈中蒋廷黻询问苏联是否愿意向南京政府出售飞机，用来交换茶叶和中国其他产品。李维诺夫反问，不通过日本人检查用什么方式能把飞机运到中国。蒋廷黻表示，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以零散方式”得到飞机。李维诺夫建议中国大使就此问题继续同斯托莫尼扬科夫谈判。^③

1937年上半年，苏联政府建议召集太平洋国家（英、苏、美、日、法）签订区域性互助公约。若太平洋公约不能签订，苏联建议就苏中互助条约问题开始同中国直接谈判。然而，中国政府对区域性公约的态度含糊不清，^④也不打算签订苏中互助条约，担心有可能给中德关系带来“不利影响”，^⑤同时也给对日议和造成麻烦。^⑥南京政府有些成员始终主张同日本缔约。

上层当权派的这种立场引起中国社会进步舆论的严重不安。他们对国际舞台上的苏联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还在1935年10月，中国就成立了中苏文化联络协会。协会开始出版苏联刊物，

①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第3卷，第827页。

②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19卷，第654页。

③ 同上，第669页。

④ 见M·C·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66页。

⑤ 见A·K·吴《中国和苏联》，纽约，1950年版，第264—265页。

⑥ 见M·C·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66页。

传播苏联文学，举办有关苏联的公众讲座。1937年4月10日《世界日报》表示，苏联无疑是一切反法西斯斗争力量的中心。1937年6月19日《新民报》指出，苏联反对战争、维护集体安全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①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郊区挑起“卢沟桥事件”，开始了侵入华北的军事行动。中国的进步舆论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苏联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不会不给予惩罚。1937年6月和7月阿穆尔河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人企图侵占那里的两个岛屿，遭到苏联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击。^②

卢沟桥事件立即引起苏联的密切注意，苏联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军阀所发起的挑衅活动，对于远东的和平事业潜伏着严重危险，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反华战争开始升级。后来华北战事的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一估计的正确性。

1937年7月底，德意驻莫斯科外交代表通知中国外交官，如果苏联站在中国一边，那么他们的国家就参加日本的军事行动。^③英美在日中战争初期采取了观望态度。

事到如今，蒋介石中国政府还得依靠苏联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向东北亚的侵略渗透引起苏联理所当然的不安。中国和苏联都很关心，决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得逞。

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解释了南京政府亲近莫斯科的依据所在。日本硬要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其中第三点叫做“共同反共”。这意味着日本想利用东北四省(满洲)为基地，逐步吞并其余中国领土，确立起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并勾结轴心国，

① 见M.C.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66—267页。

②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戴维斯证实，日本高级官员向他透露，这一事件是日本人挑起的，日本人想试探苏联武装力量的强大程度。见J·E·戴维斯《赴莫斯科的使命》，纽约，1941年版，第116页。

③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年，第3卷，第288—289页。

着手准备一起进攻苏联。因此，中国政府拒绝日本的要求，并于1937年8月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①

条约的序言写道，苏中两国政府“渴望维护共同和平，在坚定不移的基础上加强我们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并根据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防战条约更加明确地确认相互承担的义务，决定缔结本条约……”。

条约的第一条说，苏中两国郑重声明，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双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第三条规定，本条约之条款，不得解释为对于在本条约生效以前两缔约国已经签订之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对于两缔约国所发生之权利与义务，有何影响及变更。

条约有效期为5年。

8月21日于南京签署的这一条约，充满着对中国人民斗争的深切同情，目的是要向所有国家表明反对战争威胁的道路。^②条约加强了中国的地位，因为签订条约后中国人民可望得到苏联方面的贷款、军事物资、技术和军事专家的援助。

美国认为这一条约有重大意义。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亨德森指出，条约无疑会增强中国继续斗争的决心，保证苏联援华的军事供应。他同时指出，条约对中国的“亲苏派”有利，使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莫斯科”。

这就是美国的正式反应。

① 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纽约，1947年版，第130页。

② 见《苏中关系》，第161—162页。

条约签订后，立即开始执行。

1937年9月，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有机会观察了苏联的军事技术。在谢尔科夫斯克机场，中国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杨杰、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张群和王叔铭仔细观看了带有电控装置的高射炮，45-M M反坦克大炮，两辆T-26坦克和四种型号的飞机：轰炸机CB、战斗机И-15和И-16型两座位教练机。然后飞机在空中做了操作表演，给中国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在同中国签订条约之前，苏联政府就向南京政府表明，苏联准备贷款。接着苏联政府表示将竭尽全力，以保证用苏联的军事技术——飞机和坦克装备中国军队，在苏联为中国西北某地的军事院校培训教官。

如果日本人威胁到通过甘肃连接中国和苏联的“唯一交通运输线，应中国军队指挥部的要求”，苏联准备向中国派去一批“空军和坦克部队”，连同苏联人员“加入中国军队，保卫这条交通运输线”。^①

当时还达成协议，苏联在几年之内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②虽然第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到1938年3月才谈妥，但实际上早在1937年10月苏联已经开始向中国运送武器。^③苏联需要在相当短期内给20个中国师运去装备，因为中国军队受到了严重损失。

三、日中战争前线的形势。

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立场

卢沟桥事件之后，日本军队在中国北部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军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701—702页。

② 详见M·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年)》，莫斯科，1977年版，第127—154页。

③ 见A·Г·雅可夫列夫《苏联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1—1945年)——苏联对华关系中的列宁主义政策》，莫斯科，1968年版，第99页。

事行动。7月底他们进入天津和北平，八月占领南口和张家口。8月13日日本舰队抵达上海并向中国阵地开炮射击，发生了上海战役。日本在这一地区集中了10万兵力。9月日军攻占了大同（平绥铁路和同蒲铁路的重要交点）。9月下半月进入保定（河北省），10月10日攻克重要铁路枢纽石家庄。1937年11月初上海失陷。到此为止，已有30万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作战。

日本在中国展开军事行动，计划在两三个月之内结束战争，对战争要求保持缄默。日本侵略者以为会像1931—1932年中国东北事件那样，他们不会遇到美、英、法方面的抵制，因为这些国家的某些集团广泛宣扬臭名昭著的所谓“东亚的共产主义危险”的思想。这种思想是由反动新闻界鼓吹起来的，他们发起疯狂的反苏宣传，同时伴随着对苏联的恫吓。

中国的政治形势日益紧张起来。南京政府惊慌失措。由于进攻上海的日军明显地威胁着南京，一些机关和工业企业匆忙撤向汉口、南昌、长沙、重庆等城市。

广西、四川和广东省的军队奋起抗日。蒋介石在接见1937年11月作为苏联驻华武官前往中国的М·И·德拉特文师长时评价说，根据战备情况来看，这些军队不是什么理想的武装。“他们训练很差，几乎没有炮兵”。蒋介石向德拉特文表示，中国各省掌权的省长实行老一套的“保险”策略：将差的部队派到前线，好的正规部队留在省里，以防省政府遇到麻烦。其中四川省长就是这么干的，他把警卫部队派到前线，而把正规部队编入警卫部队；甘肃省长派出的部队都是缺乏武器和训练很差的部队，还没开到前线，就已逃跑过半。

12月13日，日军进入首都南京，并在那里施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日本结束对山西的进攻，一直打到黄河。中国（阎锡山）的一支部队开到黄河西岸，另一支部队留在日本人后方。日军从北面

一直攻到津浦铁路，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1938年3月，日本人在台儿庄大败。^①国民党军事将领(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表示，中国将继续抵抗，不怕任何困难。

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跟日本这样的敌人作战，准备很不充分。

中国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日本军队，(加上地方将领的部队共有官兵2873970人)^②，而实际打仗的至多只有1/5，而且技术装备(机关枪和迫击炮)极差。

中国空军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中国自己不能生产飞机。南昌的意大利飞机修配厂生产低质量的“菲亚特”战斗机。老式的“萨瓦亚—梅切特”也不顶事，只能作为运输机来使用。

1937年中国拥有下列型号飞机：“豪克-3”60架，“豪克-75”75架，“德华钦”18架，“马吉克”(轰炸机)12架，“宝梯斯”8架，“比安克”4架。但是，在最初的空战中，中国人的战斗机几乎被日本人摧毁殆尽。中国的领空为日本空军所霸占。

1938年，在英国订购的38架“斗士”飞机只有18架运到中国，其余的都被弄到欧洲各国，以后大约于1939年8月才收到。

虽然自1932年年中起在美国政府非官方援助下，有一支美国飞行员小队在中国活动并在汉口建立了一所军事航空学校，但是中国并没有组织和培训出自己的航空干部。1934年墨索里尼派遣一个意大利航空代表团访问中国，此后大部分美国飞行员离开了中国。^③据1937年春到过中国的美军退役上校陈纳德证实，一些

① 详见Б·Г·萨波日尼科夫《日中战争和日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政策(1937年—1941年)》，莫斯科，1970年版，第67—69页。

A·扬格指出，“俄国的坦克和步枪……在1938年8月山东省台儿庄战斗中为中国的胜利起到了自己的作用”(A·N·扬格《中国与外援。1937年—1945年》，坎布里奇(麻省)，1963年版。)扬格是1929年—1947年美国驻中国财政顾问。

② 见Б·Г·萨波日尼科夫《战火中的中国(1931年—1950年)》，莫斯科，1977年版，第83页。

③ 前引A·N·扬格的著作，第24页。

意大利军官在中国战略地区进行空中视察，把有关这些地区的计划“以高价”出卖给日本人。^①

战争初期，中国除了拥有16门中等口径的克鲁巴高射炮，48门施奈德—克雷佐野战炮和将近60门中等口径的克拉图利迫击炮外实际上没有现代化大炮。^②大炮的牌子和构造五花八门，有德国的，法国的，瑞典的和日本的等等。中国的工业还不能生产这些大炮的炮弹。有的大炮配备不到10枚炮弹。此外，一旦这点“储备”用完，大炮就算报废。196个步兵师中只有35个师有炮兵营编制，每个营有大炮6—12门。^③

炮兵军官的培训令人很不满意。这些军官的知识非常有限，他们不会从隐蔽阵地开炮，射程只有4—6公里，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炮兵培训中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帮助。1938年4月，华中战线的中国军队收到了苏联制造的大炮，苏联炮兵教官和顾问随之来到中国。到1938年8月，中国军官通过适当的培训学会了从隐蔽阵地开火。^④德国顾问不愿意认真培训中国军官，他们10年期间未完成的事情，苏联教官几个月内就完成了。

1938年8月，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以苏联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机械化师。^⑤

中国军队由于地对空手段有限，躲避空中敌人极其困难。正因如此，前沿部队无法防止日本空军对城市 and 居民点的袭击。

早在1934年，中国就建立了国家防空主任视察责任制，下设防空处，同时在南京开办了培训炮兵军官的防空专科学校。但

① 见前引A.N.扬格的著作，第25页。

② 见A·Я·卡里亚京《沿着陌生的道路(在中国的军事顾问记事)》，莫斯科，1979年版，第102页。

③ 同上，第102页。

④ 同上，第104页。

⑤ 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莫斯科，1975年版，第51页。

是，1937年中国还没有组织起空防，空防的形成是苏联专家努力的结果。

蒋介石是整个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总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白崇禧将军任副总参谋长，许玉成任战役局长；何应钦任军需部长，白崇禧任军训部长，陈诚任政治部主任，宋子文任空军委员会主席，蒋大椿任空军委员会副主席（实际上的空军首脑）。联络和军事通讯处的职责由通讯联络部完成。

中国指挥部的战役战略思想原来是极其贫乏的。实际上中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没有实行抗战的战役战略计划。中国指挥人员中间通常的观点是遵循“围困战略”，“我们中国人打仗，不是靠军队，而是靠国土”——这就是作战部长何应钦及其下属战役局长许玉成等人的主导思想。中国指挥部确认，中国国土极其辽阔，日本人深入内地，定会使之疲劳，因此诱敌深入，不同其决战，把他们拖垮，就能取得重大战果。中国指挥部提出这一战略的根据是中国军队不准备进行积极的行动，因为中国军队装备很差，空军太弱，同武器精良的日军作战困难不少，总的经济也不如日本。

中国将领论据的内在含义不难猜透。事情不在于中国军队不善战和装备差，而在于每个将领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即无论如何也要保全自己的军队完整无缺，以便战争结束后用于争权斗争。

前线咄咄逼人的形势和日本的空中垄断要求中国军队指挥部采取紧急措施，于是委托陈纳德将南京现有的空军整顿就绪。陈纳德来到南京后，发现中国的驾驶员“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训练出来的，这对空军来说是个危险。战斗机飞行员应当准备好去厮杀，而当他们进入螺旋线时，便在教练机上坠毁”。^①

中国飞行员最初参加空战时，毫无作战经验。1937年8月14

^① C·L·陈纳德《回忆录。战上之路》，纽约，1949年版，第40页。

日，接到命令去轰炸停泊在上海公共租界附近的日本“出云”号巡洋舰，中国飞行员执行的结果是，炸弹不是在巡洋舰上爆炸，而是在上海中央银行大楼旁边开花。接着飞行员绕到上海最繁华的大街扔下炸弹，致使数千人成了牺牲品。中国飞行员还错误地袭击了英国巡洋舰，只是侥幸没有击中。与此同时，炸弹还投向停在海上的美国轮船“总督”号，不过没有造成重创。^①

美国的立场加重了中国所经受的困难，这种立场正好同英法的立场吻合。美国当权集团通常认为美国不应参加中国的任何战争行动。因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要求地方当局禁止民航公司的美国人员从香港飞往中国。美国害怕卷进对日战争。

1937年9月14日，罗斯福总统随即表示，属于国家所有的美国舰船不能运送武器、弹药和装备去中国和日本，属于私人所有的美国舰船可以做，但是责任自负。^②这是根据美国通过的中立法行事，按此法律，美国政府制止了在美国订购的19架飞机和小型装备通过美国运输部门运往中国。

美国驻华大使汤姆逊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使形势复杂化，这意味着美国“在中国150年的文化和商务活动”的破产。他警告华盛顿，“当前过于匆忙地亮出自己的立场，以后得要加倍努力才能弥补”。^③然而，1937年9月15日国会仍持这种立场，美国政府不同意美国人为外国政府效劳，那些愿意留在中国的美国人所做的一切，责任自负。

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仅仅是在中国空军学校保持着为数不多的美国飞行教官和技师，以及替蒋介石私人飞机服务的美国飞行技术人员。美国大使馆搜集有关日军的侦察情报并转交中国机构。美国武官处从事研究日中战争的经验，并研究中国领土及其经济能力。1938年年中，美国武官处共有十名军官，他们走遍全中

① 前引A·N·扬格著作，第25—26页。

②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3卷，第514。

③ 同上，1937年版，第4卷，第520—548页。

国，并经常出现在某些前线地区，对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给予明显的注意。助理武官考尔松在八路军驻地呆了近两个月，并同八路军部队一起去过日军后方。

1937年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1922年华盛顿条约签字国和参加国的会议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实行集体抗日的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不愿意。西方国家和美国表面上反对日本对华战争，实际上是在扩大战争，千方百计地延长战争，以图在战争中削弱日本。他们更愿意让触及他们在华利益的战争重担全都落在中国人民肩上。西方国家不愿采取那些可能真正减轻中国战争重负的措施。与此同时，他们对苏联参加抗日战争兴趣盎然，希望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在这次战争中来一次大出血。

苏联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坚决捍卫集体安全的原则。根据同盟国宪章，^①苏联坚决要求集体制裁日本侵略者。中国代表团赞同苏联的立场。

1937年11月24日，会议在事先审查英美代表团提案之后休会，通过了以宣言形式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违背了华盛顿九国条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决议没有提到对日本采用同盟国宪章第16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②

扬格写道：“对中国来说，在国际舞台上的挫折是最大的悲观失望。”^③

英、美、法和其他西方国家对欧洲的希特勒和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实际上是持纵容侵略者的政策，使日本有可能继续进攻中国。

中国想争取西方国家贷款也是徒劳。布鲁塞尔会议后中国要

① 详见前引Г·В·叶甫莫夫和А·М·杜宾斯基的著作，第2册，第127—129页，М·С·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77—280页。

② 《布鲁塞尔会议(1937年11月3—24日)》，华盛顿，1938年版，第76—78页。

③ 前引А·Н·扬格著作，第16页。

求贷款5亿美元用来购买军事装备，以关税和盐税担保，但遭到拒绝。与此同时，美国给日本借款和贷款数额为1.25亿美元，还卖给日本机床、军事设备和装备。

英国同日本战略物资贸易额不断增加。继美国之后，不列颠帝国成了日本这些商品的第二个供应国。1938年，英国向日本的出口额占美国向日本出口额的20%。英国银行家为军国主义日本同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贸易业务提供资金。

1937年秋，法国迫于日本压力，停止了通过印度支那向中国运送武器，这对中国军队是个沉重的打击。^①

这种为侵略者输血的行动同苏联的一贯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七·七事变”之后，苏联政府停止了同日本贸易，对军事物资——石油、煤、锰矿等类产品的出口严加禁止。当西方国家和美国实际上拒绝真正援助中国的时候，在苏联，已在认真安排有条不紊地向中国运送中国军队急需的飞机、大炮和弹药的事宜。

苏联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表示愤怒抗议。苏联公民，包括苏联军人在内，数百次地向苏联有关部门表示，要求派他们去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例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我是俄国人……不是中国人，但是我热爱中国人民……同样也热爱日本人民，不过，憎恨日本帝国主义……我非常明白，日本军阀除了其他目的之外，主要想分割中国人民的土地，为进攻我们的祖国准备好基地。”

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引起国际进步力量的愤慨。共产国际号召工人阶级和整个世界舆论最大限度地援助中国。

许多国家(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居民的广泛阶层，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开始起来保卫中国。^②中国人民得到了世界进步力量特别是苏联人民的道义支持。

① 见前引A·N·扬格著作，第50页。

② 详见B·A·鲍罗廷《苏联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937年—1941年》，莫斯科，1965年版，第71—72页。

苏联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给予中国民主力量大力的援助。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政治生活民主化，其中包括中共活动合法化。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指望同苏联建立牢固关系。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建议国民党缔结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抗日合作协议。中共中央表示自己一定贯彻执行，同时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组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构，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归中国武装力量统一指挥。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报纸公布了中共中央宣言，9月23日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准备同共产党建立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开始合法化。蒋介石政府同意拨给中共武装力量相当于55万美元、45000人月薪的现金，并供应他们武器。按蒋介石的指示，1938年6月份拨给八路军120挺机枪和6门反坦克炮。

中共同中央政府的联系通过王明和周恩来进行。周被任命为军委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是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机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形成。

承认中华民族必须团结抗日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对于日本实现“闪电般”地征服中国造成了严重障碍。苏联的无私援助是中国人民能够同技术和军事均占优势的日本侵略者坚持长期战争的可靠保证。

四、苏联人开辟通路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

在中国同外部世界经常交往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新疆作为中国联系苏联和欧洲最重要的途径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1937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修建萨雷奥泽克—乌鲁木齐—兰州公路，以便从苏联往中国运送武器、弹药、飞机和备件等等。苏联政府表示同意。

修筑这条通过中国境内(新疆和甘肃省)的公路要求苏联方面付出巨大努力。天山山脉地区以及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公路敷设工程,在技术方面特别复杂。

公路全长2925公里,由萨雷奥泽克开始,通过苏联境内到毗邻新疆的边境站霍尔戈斯镇(230公里),然后通过中国新疆省(1530公里),接着经甘肃境内一直到公路终点站兰州市(1165公里)。^①沿途设有20个食宿和汽车加油站(其中16个在中国境内),设立了公路养护和航空基地维修的专门服务,维修人员除苏联人外,还有一部分是中国人。除公路外,阿拉木图—兰州空中航线也很快开始运营。

向中国运送物资是在艰苦条件下进行的,相当长的一段路是在海拔1500—3000公尺的山路上盘绕。^②由于存在一些弯道山口以及像吐鲁番盆地那样的路段,给运输造成不少困难,那样的地段长达500公里,夏天阴凉下的气温高达50—60摄氏度。

公路经过的中国地区,卫生和卫生防疫状况糟糕透顶。^③

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总的领导工作由设在阿拉木图的业务总部负责。1937年10月17日第一批运送军事物资的卡车由萨雷奥泽克开出,接受的任务是1937年11月20日以前将货物从苏联运到

① 见前引Г·В·叶甫莫夫和М·А·杜宾斯基的著作,第131页。

② 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夏天被任命为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他在自己的回忆著作中指出:“数以千计的苏联筑路专家以英勇的劳动铺筑通过新疆的公路。迄今为止,历史文学中似乎还没有描写这些‘生命之路’的建设者以及它的‘运营者’——司机、服务人员的真正业绩。不过,我有幸读过一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译文,他热情而诚挚地歌颂了沿着这条通道运送装备的苏联朋友。”

“应当指出,这条通道的最后一段所经过的地区,离中共控制的地区相当近,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优先得到援助。”(前引А·И·切列潘诺夫著作,第603页)。

③ 整个运输车队人员的组织和不间断的卫生服务工作由苏联医生负责,这些医生是从自愿报名援助中国人民的人士中挑选出来的。1938年,兰州霍乱流行,苏联医护人员积极行动并迅速地防止了流行病的扩散。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消灭了肺病在乌鲁木齐地区的蔓延,这支防疫队是1938年9月从苏联来到这里的。

终点站兰州。1937年10月17日至11月20日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运行表上规定,货物由萨雷奥泽克到达乌鲁木齐(900公里),第五昼夜;由乌鲁木齐到达哈密(690公里),第11昼夜;由哈密至安西(400公里),第16昼夜;由安西至肃州(260公里),第17昼夜;由肃州至凉州(490公里),第22昼夜;凉州到兰州(260公里),第24昼夜。^①

从苏联运送飞机,除了一段路程空运外,都是靠载重汽车ЗИС-6来完成的。飞机机身就固定在这种汽车上,机翼、机尾、螺旋桨、各种配件和备件装在箱子里,再装到ЗИС-5载重汽车上。

运送飞机的汽车车队通常由50辆卡车组成。载着飞机的车队只能限制在白天行进。车队制订了准确的运行示意图。遇有河流、山口和其他困难地段,车队派出调度员指挥通行。行进过程中绝对禁止超车。一旦对面来车,要互相避让是很耽误时间的。

汽油的供应困难很大,中国当局只能提供少量汽油。因此一部分汽油只得从苏联运去(算作有效的军事物资份额)。

第一期工程结束后,在整个公路线上进行了清理和山路加宽的补充工程,修复了桥梁并进行了其他工程,比如改善道路状况、配备宿站设施等。

尽管条件复杂,到1937年11月中,从萨雷奥泽克到兰州将近3000公里的公路全线打通。1938年1月,汽车平均每昼夜可以跑到168公里。虽然大雪封山和严寒达到零下32度,事故率仍然降到了零。现在,到兰州的路程18个半昼夜就能跑完。

苏联人以高度的紧张投入工作,突破了汽车行程纪录和汽车零部件的保养限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表现出真正的英雄主义,完全不愧为国际主义者、中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友好捍卫者这一崇高称号。

^① 见A·M·杜宾斯基《苏联在日中战争时期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及中共的立场(1937年—1945年)》,载《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6期,第73页。

到1938年初，对于如何组织土路上的远距离汽车运输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苏联载重汽车“ЗИС”证明自己承担这样的运输是够格的。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年中这段时间里，在萨雷奥泽克——兰州公路上忙于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汽车超过5260辆，^①汽车总行程将近1850万公里。4000多苏联人忘我地劳动在这条公路上，保证了苏联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在哈密地区，苏联专家在条件艰苦的野外组装苏联卡车运去的战斗机。^②

苏联也通过海路向中国运送装备。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这段时间，由轮船“洛德·柯克林”号、“博克斯·赫尔”号、“托威·菲尔德”号向中国运去了炮兵的^③，空军的，装甲兵的^④装备，76毫米大炮，榴弹炮，重机枪和轻机枪以及弹药^⑤。据中国方面证实，1937年到1939年间，苏联经过奥德萨港运往中国的武器和弹药将近6万吨。^⑥

但是，在中国海岸被封锁的情况下，由苏联通往中国新疆和甘肃的陆路通道一直是供应中国前线的主要动脉。1938年，应中国方面要求，将公路延长到咸阳。这样，公路全长达到3750公里。这是中国军队最可靠的一条供应线，因为它深入后方，远离前线。

五、苏联向中国供应飞机、武器和弹药

1938年3月1日苏中签订的总额5000万美元的第一个贷款协

① 见A·Г·雅科夫列夫《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第102页。

② 见前引A·Г·雅科夫斯基著作，第102页。

③ 到1937年中国军队仅有各种构造的大炮近千门。只有几十门是当时比较新式的（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第49页）。

④ 战争初期，中国只有60辆坦克，15辆“维克斯”两栖坦克（同上，第50页）。

⑤ 详见前引A·М·杜宾斯基著作——《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2期，第73—74页。

⑥ F·L·刘《中国现代军事史。1924年—1949年》，普林斯顿，1956年版，第168页。

定中指出,从1937年10月31日算起,3%的年息应当计入5年期间每年平均1000万美元的数额中,本利一起偿还。第一个协定规定,在协定签订以前苏联军事供应的价值计入贷款数额。^①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杨杰认为这是苏联大力援助中华民国的诚挚愿望。^②根据协定的条款,中国应当用协定补充清单上的商品和原料偿还贷款。贷款项目下的所有供应,都是以合同形式固定了每一批装备和军用物资。合同上确定了装备清单并指出供应期限。中国提供的商品和原料清单,在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同中国有关机构签订的合同中写得更加详尽。^③

在贷款协定的基础上形成了苏联装备供应的三个合同。1938年3月3日签订的第一个合同,从3月5日开始实行,到1938年6月10日彻底完成。向中国提供:飞机“СВ”62架,“И-16”94架,“И-15”62架,“УТИ-4”8架,飞机备用发动机,价值653000美元的飞机备件,价值421000美元的专门载重汽车,坦克“Т-26”82架,后备发动机和后备部件,价值374000美元的修理厂,拖拉机和拖车ЗА和ЗИП582台,45毫米口径高射炮50门,高射炮弹100箱,价值182000美元的骑兵挽具,价值312000美元的军事器材,3179000美元的大炮和坦克弹药。根据第一个合同,中国得到的军事物资总值估计为27057000美元。^④

根据1938年3月11日签订的、3月15日—1938年6月20日履行的、总额7447055美元的第二个合同,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800挺托卡列夫的“马克西姆”机关枪,1100挺德格加列夫机枪和1000万发子弹,160门76毫米迫击炮,80门115毫米野战榴弹炮,80门37毫米反坦克炮,16万枚75毫米野战炮炮弹,8万枚115毫米野战

① 协定全文见《苏中关系》,第167—170页。

② 见前引Г·В·叶甫莫夫和А·М·杜宾斯基的著作,第2册,第132—133页。

③ 见Г·В·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28—129页。

④ 同上,第129页。

榴弹炮炮弹，12万枚37毫米反坦克炮炮弹，1000万发步枪子弹。

根据1938年3月22日签订的总额8789166美元的第三个合同，从1938年3月25日到1938年6月27日，中国共得到60架И-15飞机，5架УТ-1飞机，成套设备，备用发动机，价值3642000美元的其他装备和400辆ЗИС-5汽车。^①

1938年7月9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杨杰同苏联政府讨论了关于修建飞机工厂的问题。杨杰指出，考虑到苏联И-15和И-16飞机的高超战斗性能，中国政府打算修建飞机工厂，生产这种唯有苏联技术才能装配起来的飞机。杨杰说，“我们希望苏联在乌鲁木齐援建一个飞机装备厂，以便满足中国空军的需要。”^②同时杨杰还赞扬苏联37毫米口径反坦克炮的高超性能。他要求向中国提供2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指出中国缺乏必要的防空手段，不可能同日本空军在低空进行较量。8月10日杨杰致函苏联政府，再次要求苏联加紧发运新的飞机，中国大使表示：“这些飞机对于中国面临的武汉大会战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空军的支援，战役会变得极其困难。新型飞机亮相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军队的极大鼓舞，可以增强他们抗日的决心。”^③

苏联有关部门立即考虑了中国方面的请求，他们接到苏联政

① 见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30页。

② 见前引，А·М·杜宾斯基的著作，《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6期。

1939年8月11日，苏中签订了在乌鲁木齐建立飞机装配厂的议定书。根据议定书，工厂每年用苏联运来的零件、配件和部件装配出300架И-16飞机。工厂的第一期工程于1940年9月1日完成。

1942年6月5日签订了关于全面完成建筑设计飞机装配厂及其补充设备的议定书。到规定时间工厂的装配能力达到年产450架飞机，并且掌握新型战斗机的装配（И-16于1941年取消生产）。

1940年中国国内形势紧张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政府确立了亲美方针并开始疏远苏联。最后结果是国民党政府拒绝批准关于飞机装配厂的议定书（见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贸易史》，第140—141页）。

③ 见前引А·М·杜宾斯基的著作，《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6期，第75页。关于1938年秋中国空军的形势，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一书，第77页。

府的指示，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1938年8月17日杨杰被告知，苏联政府决定满足中国的要求，除了100架И-15飞机及其成批的弹药配备外，再从苏联紧急运去2000挺轻机枪及其2亿发子弹，100门37毫米大炮及9万枚炮弹。此外，用于76毫米大炮的16万枚炮弹和用于155毫米榴弹炮的5万枚炮弹已经装车起运。同时，中国还收到了300辆卡车(200辆ЗИС-5和100辆ЗИС-6)及其备件^①。

根据1938年7月1日签订的总额5000万美元的第二个贷款协定^②，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又签订了两个合同书。按合同规定，从1938年7月5日至1939年9月1日向中国提供了116架СВ飞机及其12套设备，120架И-15飞机及其10套设备，30架И-15运输机及其3套设备，20架(四挺机枪式)飞机及其2套设备，10架И-16(炮式)飞机及其配套设备，24架ДБЗ-2М87飞机及其3套设备，60台М-100备用发动机，83台飞机发动机，46台М-25发动机，120挺ШКАС机枪，1500挺德格佳莱夫机枪，50⁰挺托卡莱夫的“马克西姆”机枪，100挺37毫米反坦克机枪，200门野战炮，2000万发步枪子弹，510万发机枪子弹。^③

1939年3月1日行政院长孔祥熙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写道：“自从中国开始武装抗日以来，贵国政府一直以贷款方式给予我国慷慨和珍贵的援助，共贷款1亿美元，用来购买军用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使我们有可能削弱敌人的侵略势力和继续进行长期斗争。为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激之至。我作为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对于这一援助表示特别的感谢，因为它使我们财政的紧张状况根本好转。对于您的积极同情和诚挚友谊，请接受我的最深厚的谢意。”^④

① 见前引A·M·杜宾斯基的著作，《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6期，第75页。

② 第二个贷款协定的全文，见《苏中关系》，第172—175页。

③ 见M·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贸易史》，第130—132页。

④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和平而斗争(1938年9月—1939年8月)。文献和资料》，莫斯科，1971年版，第219页。

1939年6月13日，签订了总额1.5亿美元的第三个贷款协定。^①苏联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认为从苏联运去的所有装备，只能用于抗日斗争。

根据1939年6月20日签订的议定书，向中国提供了价值1460万美元的专门设备和军用物资。中国收到了250门大炮，4400挺机枪，5万支步枪，500辆载重汽车，近16500枚飞机炸弹，5万枚炮弹，1亿发子弹。^②

随后的三个合同保证向中国提供300架飞机，350辆卡车和拖拉机，250门大炮，1300挺机枪以及许多其他军事设备。^③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9月，中国方面一共收到苏联提供的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多门大炮，14000多挺机枪。^④

1939年6月16日签订了苏中贸易条约。条约关系到两国间的贸易活动，因此两国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进出口以及征收关税等问题上，双方都享有相互权利中的最惠国待遇。

根据条约第六款，苏联在中国设立了商务代办处：“鉴于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律，构成苏联宪法所固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基础之一的对外贸易垄断权属于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自己驻中国大使馆设立商务代办处……”商务代办处被认为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享有外交特权。商务代办处在中国领土上的活动，受中国法律制约，受中国法庭审查。

条约的有关条款规定了中国代表在苏联领土上同苏联国家业务单位进行业务活动，享有苏联代表在中国领土上同样的权利。另有一系列条款调节了海上贸易问题。

条约三年满期，如果缔约的某一方在期满前3个月不声明条

① 协定全文见《苏中关系》，第176—179页。

② 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年—1945年)》，第2卷，莫斯科，1974年版，第7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约终止的话，可以延长限期。^①

苏中贸易条约为发展两国间商务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中国沿海受到封锁的不利情况下，保证了两国间的经济交往。1941年，苏联一共向中国提供飞机1235架，各种口径的大炮16000门，汽车和拖拉机1850辆。^②

到1941年6月，除了飞机、坦克、各种口径的大炮和机枪外，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将近1.8亿发子弹，31600枚飞机炸弹，近200万枚炮弹以及其他装备和器材。^③这不是援助国民党，而是援助为独立而坚持长期斗争的中国人民。

六、苏联军事顾问的活动

日中战争开始之前，蒋介石利用德国顾问团为其效劳。以法根豪森将军为首的30人顾问团指导中国军队。德国顾问和各种专家共约70人。为了加强跟日本的同盟关系，希特勒同意召回顾问团。德国政府以中立为由对此作了说明。^④

德国顾问团离开中国时，正是苏联装备开始运进中国和苏联志愿飞机员、军事顾问到达中国的时候。德国顾问动身之前，法根豪森匆忙表示，苏俄是“未来中国的最大威胁”。^⑤

1937年11月底，M·И·德拉特文师长作为苏联大使馆的武官来到中国，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熟悉情况之后，提出了中国军队由消极防御过渡到反攻的必要性。1938年建立了军事顾问体制。自1938年6月起，A·Я·卡里亚京担任

① 见《苏中关系》，第179—184页。

② 见前引A·Я·卡里亚京的著作，第103页。

③ 见M·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贸易史》，第138页。

④ 见《中央新闻》，1938年5月24日。

⑤ 见前引F·L·刘的著作，第166页。

工程兵顾问组长。是年年底，Г·И·特霍尔上校被任命为空军顾问组长。他取代了久经锻炼的飞行员П·Ф·热加莱夫。特霍尔丰富的经验（他是共和西班牙战斗的参加者）、坚强的意志和特殊的胆略，保证了他的巨大威信。1940年以前，特霍尔一直担任中国空军顾问。

在中国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顾问组长有И·Б·阿尔费罗夫，А·А·阿里亚布什夫，П·Ф·巴季茨基，А·К·贝莱斯托夫，Н·А·鲍勃罗夫，А·Н·博戈柳波夫，А·В·瓦西里耶夫，С·П·康斯坦丁诺夫^①，Р·И·帕宁，Р·С·雷巴尔科^②等等。军事顾问组长：空军：П·Н·安尼西莫夫，Ф·П·波雷宁，В·П·雷加切夫，Т·Т·赫留金；坦克兵：П·Д·贝洛夫，Н·К·切斯诺科夫；炮兵：И·Б·果卢别夫，Я·М·塔本钦科，И·А·舍洛夫；工程兵：И·П·巴布罗夫，А·П·科瓦列夫等等。^③

1938年3月—10月，在苏联军官格罗鲍夫斯基、布拉托夫、茨冈科夫、加里钦、米哈依洛夫的领导下，安排了15—20名苏联志愿飞行教练^④教中国人对苏联运来的所有器材进行研究。

苏联军事专家在总顾问的领导下，很快地弄清了中国的既成形势，以自己的实干精神和深思熟虑的见解迅速赢得了中国指挥机关的好感，蒋介石在同德拉特文师长的一次谈话中说：“由于苏联顾问的到来，中国军队开始会打仗了”。

军事顾问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军队在日军进攻下全线败退的时候。中国军队实际上没有统一的编制。1个师有3—4个团，有的师有6—8个团。正如А·И·切列潘诺夫所指出的那样，1个步兵师的编员经常在

① 见他的回忆文章，载《在中国的土地上。回忆1925年—1945年苏联的志愿飞行员》一书，莫斯科，1977年版，第330—362页。

② 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第73页。

③ 同上，第73页。

④ 见前引А·Я·卡里亚京著作，第100页。

7000到11000之间摇摆不定。^①

按照人数和射击武器计算，3个中国师才等于1个日本师。部队的侦察工作做得很差，师和军之间缺少相互协作。对于敌人部署和装备的情报常常出现失误，对敌人在前线某个地区的具体意图捉摸不透。尽管日本人也有弱点，但由于中国军队战术考虑不周，步兵与空军配合不够，敌人的据点安然无恙。工兵部队名不符实。

在日本指挥部顺利进行北部和中心两线会师、日军攻陷徐州（1938年5月）之后，位于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的中国军队形势十分严峻。东面，日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津浦铁路。北面，他们占领了部分陇海铁路，中国军队只掌握郑州以西线段。南面，敌军侵占了平汉线上的汉口至信阳路段（含信阳）。

因此，华中几省的主要铁路交通线，中国军队仅保住了平汉线上郑州至信阳一段。假使日军再把这一段掌握到手并设防固守，将会导致河南东部和安徽西部的丢失，那时北线和中央两线日军就将汇合在一起。

形势要求中国军队转而采取坚决的行动。在中国军队面临失去重要基地的地区，必须迫使日军从那里抽走自己的力量。但是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实际上同不愿意实行经周密考虑的机动战术的中国指挥部发生了冲突。中国军队的上层领导把自己的“围困战略”同指望别的国家由于矛盾激化必然会参加抗日战争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必定会干预日中战争。苏联军事顾问不断听到有人在说，“苏联参战以后，抗日战争就会毫不费力地迅速结束。”

当时前线的形势对中国军队来说，日益困难。

日军完成徐州战役的结果，打开了通向武汉之路。^② 不过，为

① 见前引А·И·切列潘诺夫的著作，第610页。关于中国军队的性质和编制，见同书第607—610页。

② 见Б·Г·萨波日尼科夫《战火中的中国》，第110页。

了控制住这一最重要的枢纽，尚需时间，因为日军战线延伸500多公里，部队同自己的后备力量脱节。

中国统帅部没有利用展开反攻的有利条件，使敌军得以为8月20日攻打武汉集中起12个步兵师，这些师获得4个重炮团和两个坦克团的配合，因而得到了加强。150架飞机和内河舰队支援了日军的进攻。^①

中国军队把战术建立于在敌人运行道路上制造防御性的“堵塞”。当日军较容易地“敲开中国式的堵塞”之后，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堵塞”，因为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力资源，能够经常不断地在日军进攻的道路上制造“堵塞”。为了阻挡日本人推进，特别是在山区，中国军队毁坏道路，使日军的坦克和供应难以通行，而自己的武器弹药并不因此而中断，因为中国人运输步枪和机枪子弹靠的是搬运工人——这是中国广泛采用的“运输”手段。

由于采用“堵塞”战术，一部分中国军队参加战斗，另一部分则处于消极状态，等待“轮流”，以使用新的“塞子”替换旧的“塞子”，消灭日本人。因此，任务就在于让经常处于消极状态的那部分中国军队投入行动。

1938年下半年，А·И·切列潘诺夫接替德拉特文担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他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中国军队统一到什么程度，在“何种程度上才算是忠实完成指挥部的决议和命令”。他参观过一些兵团、师团和连队，对中国军队的战斗质量和训练素质已经心中有数。^②他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借助于德拉特文的经验，制订了积极保卫武汉的计划。他向中国指挥人员解释说，日本攻击部队起着“楔形冲击”作用，“就像蜘蛛从蛛网上顺着树枝往下爬，随着敌军向纵深推进，最后挂在‘蛛丝’上”，从而中国军队有可能把“蜘蛛”截下来。为此，在保持敌人进攻道路上堵上防御

① 见前引Б.Г.萨波日尼科夫的著作，第110—111页。

② 见前引А·И·切列潘诺夫的著作，第608页。

“塞子”的同时，应当在主要方向的南北两边，集结中国的预备队，“犹如高山雪崩，压向敌军攻击部队的两翼和后方，切断它同供应基地的联系，并将它逼向长江沿岸”。^①军事总顾问说明中国军队必须狠击敌人，转入进攻，“突入敌后并在日寇的两翼周旋”。至于日军牢固占领的前线地区，中国军队必须作出准备进攻的姿态；但是也应当“用侦察战术不断骚扰日本人”。

切列潘诺夫提请中国指挥部注意，中国军队，特别是那些处于敌后的兵团，尽可能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威胁敌人占领的行政中心，使敌人不得安宁。切列潘诺夫强调，中国军队的所有这些行动，概括说来，将不可避免地分散日寇的力量，迫使敌人停止进攻。^②

总顾问深思熟虑的建议是苏联顾问集体研究制订的，完全可以实现，不需要对主要方向上中国方面的80个师作任何大规模的重新部署。切列潘诺夫指出，“只要他们不过于密集地层层设防就行了，他们半数以上应当部署在长江南北，以便在反攻时能够插入敌人的两翼和后方。部队需要的是进行较短距离的调动，而中国军队的师和旅都没有车马辎重，对他们来说，条条小路都能通行”。^③

中国指挥部口头上并不否认反攻的必要性，但实际上是回避和拖延反攻。他们对于这一新战术一时难以理解，只是在战斗进程中才慢慢地相信苏联顾问的建议是正确的。苏联顾问制订的、中国军队采纳的反击敌军进攻长沙的战役^④，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敌军不仅被阻止，而且被击退到离长沙很远。

在同进攻汉口以南的日军作战中，坦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在苏联专家参与下中国军队中新编的坦克团。^⑤

① 见前引A·И·切列潘诺夫著作，第631—632页。

② 同上，第633页。

③ 同上，第635—647页。

④ 见前引A·Я·卡里亚京的著作，第99—100页。

⑤ 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第38—39页。

1938年秋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日军实际上转向战略防御。日中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中国军队利用前线的暂时平静，实行了加强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切列潘诺夫回国以后，从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K·M·卡恰诺夫师长（后为少将）担任了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接替卡恰诺夫的是B·И·崔可夫将军。到1941年初，在中国共有140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当中有像П·И·巴托夫（西班牙战争的参加者）、M·И·潘克维奇、С·С·奥格涅夫等这样一些经验极丰富的军事专家。

在中国工作的都是红军当时著名的指挥员，后来的高级军事首长。

在组织部队和战斗训练方面，在建立军事服务和后勤工作方面，苏联军事顾问给予中国指挥部以很大帮助。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在中国高等军事院校授课。九万名中国军事学员在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指导下进行了军事培训。^①

1939年初，由于苏联军事专家的努力，中国军队的损失大大减少。如果说1937年中日两军的损失是5比1的话，那么1939年的比例是1比1。^②到1939年秋，日军死伤人数达到2—3万人。^③

许多军事顾问荣获中国“国家陆海空军建设和作战有功”勋章的奖励。^④

① 见前引B·A·鲍罗廷的著作，第171页。

② 见A·C·季托夫《纪念中国人民民族抗日解放战争40周年》一文，载于《远东问题》杂志，1977年，第4期，第172页。

③ 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莫斯科，1974年版，第175页。

④ 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第73页。1939年，苏联政府给在中国表现出勇敢和无畏精神的242名苏联军人受了勋，其中49人死后获奖，14名苏联志愿战士荣获“苏联英雄”崇高称号，14人获“列宁勋章”，193人获“红旗勋章”，125人获“红星勋章”，81人获“勇敢”、“战功”、“忘我劳动”、“卓越劳动”等奖章。（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第79页）

七、苏联志愿飞行员参加中国空战

1937年战争行动一开始，中国空军就同占有巨大优势的日本空军相遇。

日本空军拥有下列型号的飞机：CB-96——中型轰炸机（双引擎单翼），双直尾翅，带有收缩起落架和空气冷却发动机，配备3—5挺机枪和1000公斤炸弹运载量，飞机活动半径为2000公里，最高时速330公里（乘员7人）；“萨沃亚”——双引擎轰炸机，配备3挺机枪，炸弹运载量800公斤，燃料储备可用10个小时，时速350—380公里（乘员5—7人）；战斗机И-95、И-96和И-97（时速350—450公里）。

1937年，中国指挥部在保证有效地培训空军干部的同时，还面临着重建空军的艰巨任务。^①用苏联飞机И-15、И-16、ДБ、ДС-3来充实中国空军，在中国被视为对敌空战中能够成为转折点的措施。^②

1934年—1939年期间，由苏联卓越设计师Н·Н·波里卡波夫设计制造出来的И-15、И-16（有各种型号）的飞机是当时出色的战斗机。机动灵活的双翼战斗机И-15（最高时速360公里）、单翼战斗机И-16（带有收缩起落架，时速460公里）以及А·Н·图波列夫1934年主持制造的СВ飞机（三乘员轰炸机，最高时速420公里，飞行距离1000公里，炸弹运载量500公斤）^③，在30年代中后期成为苏联空军的基础。1935年又补充了С·В·伊柳辛的高速

① 1937年10月10日，中国指挥部只拥有130架飞机。（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第61页。）

② 见А·雅科夫列夫《生活的目的——飞机设计师的笔记》，莫斯科，1970年版，第167页。

③ 同上，第166、168页。“СВ名叫‘喀秋莎’”（见С·В·斯柳卡莱夫《参加中国空战》——《在中国的土地上》，第190页。）

远程轰炸机(配有两个M-85空气冷却推进器)。标名“ИЛ-4”的这种飞机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伟大卫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飞行距离(3300公里)超过德国的“亨克”轰炸机。^①

中国指挥部收到苏联飞机以后,起初只能指靠苏联志愿飞行员,因为他们懂得,让苏联飞行教官培训中国空军干部需要不少时间。集中搞这项工作的省会兰州,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空军基地。在Ф·Ф·热莱布钦科的领导下,在这里对中国飞机技术人员进行了强化训练。^②

1937年11月,第一批苏联高速战斗机和轰炸机开始集中到兰州和徐州机场。П·В·雷恰戈夫旅长从事建立苏联志愿飞行员空军小组,并把他们分配到华中和华南前线工作。政治委员А·Г·雷托夫协助他。^③1938年3月中旬以前,雷恰戈夫一直是中国空军司令部的首席顾问。^④

苏联把自己优秀的飞行员派到中国,其中有后来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С·И·格里来维茨、С·П·苏普龙、Г·П·克拉夫钦科;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А·С·勃拉戈维申斯基、О·Н·博罗维科夫、С·С·盖达连柯、А·А·古宾科、К·К·科金纳吉、М·Н·马尔钦科夫、Е·М·尼古拉伊科、Ф·П·勃雷宁、И·П·塞里瓦诺夫、С·В·斯柳萨莱夫、И·С·苏霍夫等人。^⑤

第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不得不在中国机场网点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同占有数量优势的敌人作战。^⑥

① 见前引А·雅科夫列夫的著作,第167页。

② 关于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第63页。

③ 见前引С·В·斯柳萨莱夫的著作,第194页。有关А·Г·雷托夫的活动情况,见他的回忆录《第五大洋的海盗》,莫斯科,1970年版。

④ 见前引А·Я·卡里亚京著作,第85页。

⑤ 详见И·М·卓加、И·И·库兹涅佐夫《抗日战斗英雄在中国》,载《苏联历史》杂志,1972年,第3期,第106—112页。

⑥ 见前引С·В·斯柳萨莱夫的著作,第194—195页。

苏联飞行员的战斗活动具有大胆、勇敢和英雄主义的特点。1937年12月1日，在“苏联英雄”Г·М·普罗科弗耶夫带领下，23架И-16战斗机到达南京机场后，立即同日机交战。这一天，普罗科弗耶夫小组五次进入空战，表现特别突出的是飞行员贝斯帕洛夫、科夫里京、库尔久莫夫，他们击落了好几架日本轰炸机。

同一天，吉达林斯基指挥的20架СВ轰炸机在南京地区的另一个机场着陆。过了不一会儿，Ф·П·勃雷宁和Г·Н·扎哈罗夫小组的志愿飞行员投入了战斗。И·Н·柯兹列夫上尉率领的苏联轰炸机组在抗战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2月2日，九架СВ轰炸机在柯兹列夫指挥下（组长是聂斯美洛夫、斯科罗姆尼科夫和隋索耶夫，机长是安诺索夫、道贝什、牛西申、尼吉钦、聂莫斯卡尔和萨若宁），^①轰炸了日本运输舰聚集的上海港，击沉了巡洋舰，重创了另外六艘日本战舰。^②

到1937年12月12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为止，轰炸机组以南京机场为基地，每天都同日寇交战，轰炸日本在长江的舰队，使进攻的日军战斗秩序大乱。1938年2月初，苏联飞行员袭击了杭州的日本空军基地，在那里摧毁了30多架日机以及机库和军用品仓库。

1938年2月中，华中地区的长江、汉阳、成都、重庆和桂林等机场投入使用。有了新建的机场，苏联飞行员的战斗活动范围更加开阔。特别出众的是轰炸机飞行员安诺索夫、巴勃洛夫斯基、克列夫绰夫、卡尔平科、穆拉维也夫、诺沃德拉诺夫、波梅兰采夫、费多罗夫、沙里莫夫、斯科罗姆尼科夫和普罗科弗耶夫等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完成了大量的战斗飞行任务，在空中停留达130—290小时。^③

1938年2月—3月，新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小组来到中国。他

① 见前引А·Я·卡里亚京的著作，第86—87页。

② 同上，第87页。

③ 同上，第90页。

们当中的B·鲍罗达、B·达多诺夫、H·科兹洛夫、З·普罗特尼科夫、P·克拉夫钦科、A·谢明纳斯，奉命前往南昌。^①

科兹洛夫上尉和他的轰炸机机组以及И-15、И-16型飞机，由A·C·布拉戈维申斯基统一指挥，基地设在南昌机场。^②2月23日“苏联红军日”这一天，苏联轰炸机在Ф·П·勃雷宁的带领下，完成了对台湾岛上日本空军基地的大型战役，击落了近40架敌机，击沉和击伤了一些舰艇，摧毁了机库和港口设施。日本人损失了足够使用3年的燃料储备。轰炸机组毫无损失地返回南昌机场。^③对台湾空军基地的袭击是苏联飞行员的一大功绩，在中国引起一片欢腾，人们以此热烈赞扬苏联志愿人员的勇敢和高超技术。

1938年5月20日轰炸机对日本列岛的袭击是大胆而果断的行动。这次示威性袭击的目的，是要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的城市极容易遭到打击。由中国和苏联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投下去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④

南京失陷后，日本指挥部又全线扑向长江，展开攻势。1938年2月，武汉地区的形势严重起来，日本轰炸机每天都向武汉投下杀人的炸弹。

保卫武汉需要在武汉机场集中大量飞机。该机场位于汉口以西、汉水河口以北和西湖以东的中间地带。这里有轰炸机CB(“喀秋莎”)、战斗机И-15和单翼圆头机И-16(“燕子”)。

武汉上空的空战也像在其他城市上空一样，苏联飞行员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技巧和勇敢，表现出他们非凡的纪律性和对事业

① 见前引A·Я·卡里亚京的著作，第93页。

② 见前引C·B·斯柳萨莱夫的著作，第196页。

③ 详见前注，第197—200页，并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一书，第67—68页。关于勃雷宁小组的活动，见他的回忆录《战斗的行程》，莫斯科，1972年版。

④ 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第71页；前引A·Я·卡里亚京的著作，第94页。

的无比忠诚。^①

2月18日，苏联志愿飞行员在武汉上空击落了12架日本飞机。^②

2月29日，61架日机再次出现在武汉上空。苏联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组投入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战斗。这一天，在武汉上空击落了21架日机，中国方面损失两架。^③5月31日，在武汉机场以东15—20公里处，18架日本轰炸机在36架И-96战斗机掩护下，同苏联志愿飞行员驾驶的И-15和И-16战斗机交战。^④苏联飞行员古宾科在结束这场苦战之前离开了自己的机组，扑向日本战斗机。古宾科的炮弹已经用完，但是这位苏联的爱斯（空中之神）还是决定迫使日本人留在汉口机场。日本人猛地冲向一边，以为可以摆脱跟踪。古宾科利用高度上的优势，追上敌人，冲撞

- ① 关于苏联志愿飞行员，郭沫若在他回忆抗日战争的著作中写道：“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纪律是严明的。他们睡在自己的银燕的翅膀底下，不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都不愿意离开机场。这些谦逊的小伙子一点也不像美国兵，美国兵开着他们的吉普车满城横冲直闯，压倒行人，寻衅打架，施暴居民。很少有人知道，抗战初期苏联志愿兵给我们做了许多好事（特别是在保卫武汉期间），他们不惜生命，捍卫我们的国土。”（郭沫若：《惊涛骇浪中的歌》，莫斯科，1962年版，第144—145页。）

陈纳德在回忆自己在中国工作的著作中指出：“……正如通常那样，日本人躲开机场，因为他们清楚，那里是俄国人的基地……”

“自从中国人战前积攒起来的7架意、德、法飞机在战斗中奇怪地消失之后，中国飞行员几乎有两年时间都是驾驶俄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前引陈纳德的著作，第62—63页）。

- ② 见前引Б·А·鲍罗廷的著作，第160—161页；另见Н·Г·科兹洛夫的回忆录《在中国的天空》，莫斯科，1966年版，第19—33页。
- ③ 详见前引С·В·斯柳萨莱夫的著作，第203—205页。

А·扬格写道，他“部分地目睹了这一扣人心弦的空中搏斗”，按照他的评价，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历史上最大的空战”。扬格说，“我记得，1个驾驶员跳出机舱，从日机队列中穿过，直到那时他才打开降落伞……当日机汽油耗尽不可能返回自己的基地芜湖和南京时，俄国人出其不意地扑向日机松散的队列。”（前引А·И·扬格的著作，第54—55页。）

1937年7月8日—1938年5月1日期间，日本空军死亡700人，伤386人，被俘20人，失踪100人，（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第70页）

- ④ 见前引А·Я·卡里亚京的著作，第95页。

过去。^①古宾科是俄罗斯空军史上（继聂斯泰罗夫之后）进行冲撞的第二位。他在中国上空以进攻者的理想结局完成了任务。^②

5月31日的战斗中日本人损失了31架飞机。^③

日本人在长江水路上也遭到巨大损失。用苏联飞机充实起来的中国轰炸机队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击沉击伤70艘日本军事运输舰，其中包括大型军舰和航空母舰。^④所有这些迫使日本指挥部不得不开始组织对长江沿岸和江上舰艇的空防，在舰艇集中的地方设置高射炮部队。日本人还沿江匆忙着手修建机场，以保障自己战斗机队的行动。

1938年6月9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5架CB飞机从汉口机场起飞，开始轰炸荻港（芜湖西南40公里）地区。他们遇到了高射炮的火网（每艘舰艇上有8门高射炮），然而，苏联飞行员仍然把炸弹投中目标，全部CB机丝毫未损，返回汉口机场。

6月19日，8架CB飞机从汉口机场起飞，轰炸了日舰集中的安庆地区。苏联飞行员击沉两艘日舰，两艘爆炸，还有两艘起火。轰炸机组在该地遭到9架H-95日本战斗机的攻击，但全部CB飞机顺利地回到基地。

翌日，4架CB飞机从南昌机场起飞，再次轰炸日舰集中的安庆地区。日本H-95战斗机试图攻击CB飞机，但是没有得逞。轰炸机组依靠熟练的技巧躲过日机的攻击并顺利回降南昌机场。

① 见C·C·贝洛里比茨基《在战斗的中国》，载《在中国的土地上》，第296—298页。

② 见前引H·Г·科兹洛夫的著作，第29页。

A·A·古宾科是苏联空军史上首先采用冲撞者，他被中国政府奖以“中华民国金质勋章”（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卷，第73页）。1938年，苏联志愿飞行员、空军上校古宾科由于立功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38年他由中国返苏后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古宾科后来在审核空军高级飞行特技时牺牲（见前引C·C·贝洛里比茨基的著作，第261页）。

③ 见前引A·Я·卡里亚京的著作，第95页。

④ 见前引C·B·斯柳萨莱夫的著作，第219页。

保卫武汉期间，苏联志愿飞行员一共击沉93艘、击伤16艘日舰。（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第75页。）

6月21日，盖达连科率领的航空大队遭到九江东北的日本И-95战斗机的袭击，结果一架日机在空中着火，另外1架逃之夭夭。航空大队平安返回基地。

6月24日和25日，CB机航空大队轰炸了汉口北面日本陆战队，袭击了日舰集中地以及芜湖机场。仅25日这一天就完成了22次飞行，并在安庆地区摧毁20架日机和6艘军舰。6月26日，日本空军袭击南昌机场，所有CB飞机及时躲过了打击。在引起的空战中，5架日本战斗机和1架轰炸机被击落。A·A·古宾科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伞得救。在这次战斗中驾驶员A·Д·史图敏牺牲，他的飞机被日本人击中。

6月27日，六架CB轰炸机轰炸了各种日舰集中的马当地区，击沉日舰两艘，第三艘起火。日本高射炮兵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CB飞机以其熟练的技巧躲过日本高射炮的射击。28日的空战中，两架日本战斗机被摧毁。

苏联志愿飞行员的飞行经验、周密考虑和完美无缺的战斗策略保证了他们战斗飞行的成功。

1938年年中以前，主要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及有中国乘员参加的CB轰炸机单独作战。后来在苏联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对中国驾驶员的培训工作，^①中国飞行员在中国指挥部许可下参加了苏联飞行员小组。C·B·斯柳萨莱夫回忆说：“苏联飞行员还兼有带领中国飞行员参加战斗的艰巨任务，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就感到充满信心，战斗时胆子大，不掉队。应当指出，共同的战斗行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友谊是诚挚的，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②苏联飞行员在训练中国飞行员时身教言

① 1939年夏，中国空军拥有苏联训练出来的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射手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

1938年8月，苏联军事专家在新疆伊宁创办了航空学校。1940年中，在苏联教官指导下，328人在该校通过了训练。（见A·Я·雅科夫列夫《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第105页。）

② 见前引C·B·斯柳萨莱夫的著作，第231页。

传，教他们从高空(4500—3500公尺)向敌人目标投掷炸弹，跳伞时先不张伞，在急速滑行中张伞。中国空军缺少同地面的无线电联络，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介绍，利用一些简单手段进行联络，例如将装在机场上的对空信号板放大幅度等等。

日军兵分三路进攻武汉：南路、中路（至长江）和北路（至郑汉铁路段）。1938年9月，北路的突破造成了严重威胁，日本人在那里成功地控制了洛山站（武汉以北45公里）。①

苏联飞行员小组在武汉防线的北部地区展开了战斗行动。日本人在洛山的西郊和西北郊拥有相当的实力。为了阻止日军推进和压住敌人炮火，要求苏联轰炸机飞行员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勇敢精神，在苏联和中国战斗机驾驶员协同下作战。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底。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日军猛攻下放弃武汉，蒋介石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

武汉失守并不意味着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战斗活动因此而减少。

整个1939年期间，日本指挥部拼命想消灭转移到兰州的空军基地。兰州空战具有顽强和持久的特点。例如，2月20日，30架日本轰炸机袭击兰州，40架苏联战斗机参战，10架日本轰炸机被击落。

2月23日，57架日本双引擎轰炸机的袭击只有20架到达了目标。②苏联空军小组没有损失。

11月28日和30日日机对兰州的两次空袭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引以自豪地迎战了占有数倍优势的210架日本战斗机。日机无法向该城投掷炸弹，在力量悬殊的搏斗中4架敌机被击落。

除兰州外，苏联志愿飞行员还保卫了重庆、成都、西安和其

① 见前引C·B·斯柳萨莱夫的著作，第227页。

关于1938年8月—10月战斗的性质和日军进攻武汉期间中国地面部队同轰炸机中队协作的详细情况，同上，第220—221页，224—228页。

② 同上，第233页。

他城市免遭敌机袭击，并轰炸了敌人后方。^①中国历史学家彭明指出，1940年，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40个月来日本飞机先后被击落和炸毁的有986架。这是和苏联志愿空军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②7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作战（包括航空技师），他们当中有200多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独立献出自己的生命。^③

苏联人的勇敢无畏和他们忠于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思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45年，中国的冯玉祥将军悲痛地说：“当灌满美国汽油的日本飞机向中国的和平居民投下用美国钢铁制造的炸弹时，苏联给我们运来了武器弹药和志愿飞行员，帮助我们顶住外国侵略者，我亲眼见到一些受伤的苏联飞行员死在中国的野战医院里。是美国人一直把钢铁和汽油卖给日本，而把药品卖给中国，以便医治他们的炸弹所造成的创伤。现在请你们想一想，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④

汤宜标译

① 见A·Г·雅科夫列夫《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第113页。

② 彭明：《中苏友谊史》，莫斯科，1959年版，第211页。

③ 见前引B·A·鲍罗廷的著作，第169页。

④ 引自M·C·贾丕才《苏中关系》，第285—286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满洲形成的历史过程

Ю.М.奥夫钦尼科夫

几乎从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开始，原东北军的许多部队就不顾蒋介石和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军队的命令，自动地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以后，以这些部队为核心，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自卫队、抗日救国军和抗日义勇军。根据满洲省委的估计，到1932年4月，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超过了30万。^①

抵抗运动在开始阶段带有自发的性质，既没有统一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没有一致的军事计划和统一的斗争纲领。^②为了使这一运动成为有组织、有正确方向性质和有领导的斗争，满洲的共产党经历了失败和错误的艰难历程。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这一地区数量少，势力单薄。只是在1930年初，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帮助下，才成立了北满特委会（哈尔滨）和南满特委会（延吉），以及一些县委和市委。^③1930年9月，遵照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刚刚成立的党组织就被改组为所谓的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全东北的罢工，在满洲建立红军和苏维埃区域。

①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第5页，载于《党史资料》1954年，第9期。

② 《满洲国消息手册》，第37页，1937年，新京（长春）。杨松（音）：《关于满洲反帝统一战线》（载《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

③ 《共产国际在满洲的阴谋》第17页，1940年，日本。

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使整个满洲共产党的活动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它给东北地区抗日游击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

“九·一八”事变以后，满洲的地方党组织仍然执行旧的方针，没有认识到这时满洲地区内部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依然认为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以及地方军阀、资产阶级和地主是一切灾难的制造者。因此，在中共满洲省委告满洲劳动人民的宣言书中，指责国民党军阀集团自动地撤退军队，放下武装，放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指出国民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人民群众应该起来斗争，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样去反抗国民党。在宣言中还号召抗税和抗租，普遍地实行土地革命，夺得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阶级。在工厂则要举行罢工，建立工农游击队，等等。^①当时，满洲省委急切地通过了在东北军旧部开展工作的决议。这项决议就是要使那些被打散的和被击溃的东北军旧部“布尔什维克化”，把他们改造为红军，还打算吸引土匪的游击队同日本人作战。^②这条路线一直贯彻到1933年中期，遵照这条路线，1932年在磐石县组建了朝鲜农民游击队，这支部队以后改编为红军第三十二军。这个军不断地同日军作战，并且也同国民党的游击队作战。在延边地区，遵照东满特委的指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的农民”为成员，组成了抗日救国军特别行动队。^③在延吉，汪清、和龙等县，成立了由共产党县委领导的游击队。^④同时还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继续执行没收和重新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

在朝鲜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在饶河、勃

① 《共产国际在满洲的阴谋》，第32页。

② 同上，第33页。

③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第5—6页。

④ 同上，第13页。

利、东江、琿春、巴彦等县建立了少量的游击队。他们试图在黑龙江省的平原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但是遭到失败。^①大部分“红色游击队”的人数是不多的(100—200左右)，而且在部队刚刚成立以后就常常遭到失败。

在创建“红色游击队”、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东北军和土匪的部队中去，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共产党对这些部队的影响。比如象共产党员周保中、李延禄、徐泽民、刘铁钢等人就被派到吉林省的东部，在王德林的救国军和丁超的自卫军中工作。据周保中说，到1932年夏天，由于共产党干部的工作，解决了这两支部队之间的冲突。他们召开了有两支部队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确定了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和建立战斗联盟的原则。9月，又成功地建立了自卫军和救国军的联合指挥部，丁超为司令，李杜和王德林为副司令，周保中为参谋长。以后还制定了进攻牡丹江两岸日军的战斗计划。^②但是到1932年12月，满洲省委东吉局却把周保中的活动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命令他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的“红色游击队”。^③这时，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开始脱离“红色游击队”，并企图组建游击军和所谓的同盟军，这就使军队内部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一方面是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李延禄，另一方面是副司令孔宪荣和先锋队司令吴义成)，并延及到“红色游击队”和其他的部队中。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内讧，在1933年击溃了丁超和李杜的部队，以及王德林的部队。^④

一系列的因素阻碍着满洲省委及时地纠正“左”倾方针，分析新的形势，制定新的方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由于日本间

①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第15—16页。

② 同上，第8—9页。

③ 同上第14页。

④ 同上，第8—9页。H·费得洛夫：《满洲游击队的英勇战斗——日本侵略满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第123页，1937年莫斯科版。

谍机关的破坏，迫使中共经常变换省委领导和组织机构。还在1931年11月，省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省委被迫在1932年1月从沈阳迁到哈尔滨。同时，新的辽西特委开始在泰安地区开展工作。但很快又取消了北满特委和它的从属机构，收归为哈尔滨城市工作委员会，南满特委则改组为沈阳特委。1933年，由于日本军队的围剿，沈阳特委和辽西特委又被打散了。^①满洲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关系被割断了，他们无法得到中央的指示，实际上是在独立地活动。1932年底，中共满洲省委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监督和领导，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赞同这一意见。共产国际认为，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服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积极地帮助满洲省委制定新的方针。在认真分析了满洲的复杂形势之后，共产国际在1933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在东北地区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应当成为这一战线的基本力量。^②

对统一战线策略作了全面论证和解释的是王明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新的进攻和满洲的形势》一文。这篇文章说，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不但推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抗日斗争，而且也促进了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这一重要论断意味着要重新修改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着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阶级的“左”的评价，意味着要重新规划在国内广泛团结一切爱国主义力量的基础上的抗日斗争前景。王明指出，为了有力地同日本侵略者斗争，满洲的党组织应当动员和组织群众，而联合一切现有的力量则应该是现阶

^① 《共产国际在满洲的阴谋》，第36页。

^② 杨松：《关于满洲反帝统一战线》，载《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又见刘永安（音）《1931—1945年中国东北的游击运动史》（载《历史问题》1954年第8期）。

段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为了共同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甚至还要联合那些统一战线中的动摇和不可靠分子。该文还在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叛徒财产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开展群众性的游击运动，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民选的人民革命政权。但是，在这篇文章里也还有一些不适合于满洲形势的“左”的论点。如文章认为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整个来说是反革命的，他们的领袖是革命的叛徒。与此相联系的是，还提出了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国民党。王明认为，推翻“民族叛徒和民族耻辱”的国民党政府，是武装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它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独立和统一，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王明还提出要建立“下层统一战线”，为夺取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斗争。^①王明的观点虽然有一定“左”的——宗派主义的倾向，但同中共满洲省委的政策相比，无疑是进了一步。

由共产国际帮助制定的新的政策，在开始阶段被满洲省委领导认为有右的倾向。为了阐明新的政策和帮助实现统一战线的策略，杨靖宇和白杨(音)被派到满洲。^②由于共产国际认为，现在还不是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适当时机，因此，杨靖宇被派到吉林省的东部地区磐石县和海伦县，在那里着手改组所谓的红军第三十二军。1933年9月18日，红三十二军被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这一天还召开了群众大会，独立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军和抗日义勇军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上通过了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纲领，在纲领中提出要在所有的抗日游击队中建立抗日统一战线。^③1934年初，独立师和老长青领导的抗日救国义勇军联合后，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由杨靖宇指

① 王明的文章载于《共产国际》1933年第4—5期。

② 杨松：《关于满洲反帝统一战线》，载《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

③ 王亚：《东北义军抗日记》，第107页，巴黎1935年版。

挥，部队的游击区域也扩大了。^①

1933年底，在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的领导下，在延吉县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第一师。这支部队由李光(音)的“红色游击队”，抗日救国军和部分土匪部队组成，朱镇任司令员，王德泰任政治委员。1934年夏，在珠河县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这支部队的基本骨干是共产党游击队和地方游击队，赵尚志为这个军的负责人。

遵照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满洲的各级党组织改变了群众工作的方法。以前的“抗日联盟”是由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其基本成员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现在被改编为“抗日救国联盟”，并且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②但是，反抗国民党的口号仍然没有抛弃，这就引起民族资产阶级、自卫军、义勇军和救国军首领的不满。事实上，“救盟”依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从1933年底到1934年初，中共满洲省委遵照新的方针，开始准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组织中国东北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联盟”本应成为人民政府的雏形和基础，但是，广大居民和游击队对共产党的号召持消极态度，创建人民政府的计划不得不取消。虽然这个口号一直宣传使用到1936年，但到这时它已改变为另一个口号——建立民族的国防政府。^③

1934年2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统一战线问题给满洲省委发了一封指示信。^④遵照这个指示，从1934年秋开始，满洲省委开始用更多的精力去联合所有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时已制定了成立抗日联军计划，并规定这个抗日联军应该把所有活动在满洲的游击队都包括进来，而不应区别这些游击队首领的党

① 王亚：《东北义军抗日记》，第40页。

②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第46页。

③ H·费得洛夫：《满洲游击队的英勇战斗——日本侵略满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第127页。

④ 《共产国际在满洲的阴谋》，第14页。

派和民族。^①但是，在开始的阶段，抗日联军的部队还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组成。比如象杨靖宇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王德泰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二军。赵尚志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抗日联军第四军则是由李延禄领导的游击队和中共密山县委领导的密山游击队组成的。

1934年，李延禄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办的《救国报》上发表《告驻国外的中国各组织和华侨书》，呼吁他们帮助满洲的抗日游击队。从这个呼吁书来看，在当时，即1934年底，中共满洲省委还没有制定出建立真正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国民党依然被指控为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而独立于共产党，活动在满洲的自卫军和救国军的首领则被指控为是不坚定分子和逃跑分子。^②

1935年初，由绥棱县的“红色游击队”和共产党员周保中领导的所谓联盟军联合组成了抗日联军第五军。在抗联第五军的成立宣言中说，虽然工人和农民是抗联的主要力量，但一切志愿者，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商人、手工业者，不应区别他们的政治信仰，都可以参加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斗争。但是，在以后重新发布的宣言中，又指责了南京政府、蒋介石和国民党。^③

除了上面所说的5个军外，根据周保中的说法，由汤原县委创建的汤原游击队被改编为抗日联军第六军，夏云阶为军长，而饶河“红色游击队”则被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李学福任军长。^④

然而，尽管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中仍未完全根除“左”的倾向，他们仍然坚持

① 孙哲(音)《游击战争在满洲》，第15页，莫斯科1939年版。

② 《救国文选》，第21页(没有时间和地点)。

③ 同上，第14页。

④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第20—21页。

抗日联军的成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必须以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为先决条件。为此,在1935年初,共产国际在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必须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为了真正地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放弃以承认共产党领导为联合的先决条件的提法。^①到1935年7月中旬,统一战线策略发生了连续的变化。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府的口号被取消了,连打倒被认为是民族叛徒和汉奸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口号也停止使用了。

1935年7月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一次给满洲省委发了指示信,信中再一次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杨松(音)发表了详细分析满洲地区形势和解释统一战线策略的文章。他在《关于满洲反帝统一战线》一文里直接指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缺点在于它还带有自发的性质,还没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来说,所有的条件都是现有的,因为这时不但是农民阶级、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而且相当数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也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文章指出,新的策略路线现在还遭到党内部分领导人的反对,这些人“否定上层统一战线,反对同其他的抗日武装建立统一的司令部。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了下层统一战线之后,才能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文章着重指出,巩固和扩大已经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分党派、信仰和民族,联合所有游击队的指挥员和战士,应当成为满洲共产党的基本任务。^③

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中共满洲省委按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积极地行动起来了。大概在1935年秋天,吴义成和孔宪荣的义勇军同其他的游击队恢复了联络和调整了关系。打

① Б·М·莱布索恩和К·К·希里尼亚合著:《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第120页,莫斯科1975年版。

②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第21页。

③ 杨松的文章载《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

倒蒋介石的口号也放弃了。1935年底，中共满洲省委进行了改组，满洲青年团组织也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称为“青年抗日救国联盟”。^①1936年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倡议，在汤原县召开了有满洲所有抗日军、游击队和爱国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1936—1937年成立了11个抗日联军。到1937年7月，抗日联军共有4400人，而整个满洲所有的武装游击队的数量大约是1万人。^②比1932年少了30万，比1935年则少10万。这个数字也说明了满洲抗日运动形势的危机。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是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军队经常地围剿讨伐抗日游击队，经常逮捕和杀害党的领导和活动家，再加上中共满洲省委在工作中的错误。以后由于日本军队的经常围剿，满洲的游击运动遭受到沉重的失败，以至几乎快没有了。直到1945年，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才重新恢复起来。

尽管在满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有许多错误和沉痛的失败，但是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丰富经验，却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提供了不少的原则和经验，这些原则和经验也预防了统一战线中“左”的倾向。

译自《第十届中国社会和国家科学讨论会提纲报告集》第3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杨江华译

① 《共产国际在满洲的行动》第18页，1940年，新京(长春)。

②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第24页。

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

(1918—1920年)

B·乌斯基诺夫

在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中，对于那些曾加入俄共(布)的外国组织的研究，始终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而这些组织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年代做过大量的工作。列宁曾在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总结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外国组织的工作，称它们的工作是“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页”。^① 这些外国组织在以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培养留居苏俄的外国劳动者方面功绩尤其卓著。

在加入俄共(布)的众多外国组织中，华人的党组织占有显著地位。近年来我国相继出版和发表了若干历史著作和文章，介绍华工参加抗击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以及捍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事迹。^② 这些著作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对1917—1922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6页。

② 例如：Л·拉波、А·麦里钦：《伟大友谊的篇章》，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版；Н·波波夫：《他们和我们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并肩战斗》，苏共列宁格勒州委报刊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彭明：《中苏友谊史》，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版；Л·扎罗夫、B·乌斯基洛夫：《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国际部》，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外国劳动者与苏俄各族人民的战斗的友爱团结(1917—1922年)》，“苏维埃俄国”出版社，1957年版；《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版；以及《历史档案》杂志1957年第4期、《历史问题》杂志1957年第10期、《苏联中国学》1958年第4期、《各国人民友谊》1957年第11期刊载的文章和资料。

年期间留居俄国的华工与所开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个别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与介绍中国志愿者参加苏联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事迹比较，这方面探讨仍很不够。究其原因，主要是史学家运用文献资料和报刊不充分。例如：有关的研究工作者很少引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收藏的文献资料，以致不能深入地阐明俄共(布)中国组织的产生及其在留居俄国的华工中间所从事的政治和军事工作，不能详细地介绍俄共(布)中央华人共产主义者组织中央组织局的活动，等等。本文将就1918—1920年苏俄境内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及其活动作一扼要的介绍。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俄共(布)所面临的首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是扩大和巩固年轻的无产阶级国家同外国劳动群众的联系。党极为重视在那些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因种种原因而留居俄国的众多外国劳动者代表中开展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量中国人，这些中国人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政府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而招募来的。他们来自中国的新疆、河北、山东等省及哈尔滨和大连等城市。根据极不完全统计，当时留居苏俄的华工多达20—30万人。

在莫斯科、彼得堡、乌拉尔、顿巴斯、北部地区和远东都有华工。华工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他们从事的劳动最繁重，而报酬却明显地低于别国工人。摩尔曼斯克铁路修建工程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参加这项工程的外国工人是招募来的。英国工人的日工资为7—8个金卢布，俄国工人为1卢布20戈比，而华工只有80戈比^①。不仅如此，英国工人日工作8小时，俄国工人和华工日工作10小时，甚至10小时以上。^②

十月革命改变了华工的地位，使他们摆脱了社会压迫和民族

① 苏联摩尔曼斯克州委会党务档案馆《回忆录汇编》，第3页。

② 同上第8页。

压迫。苏维埃政权竭尽全力从根本上改善华工的生活条件。

华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保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成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民代表人物的切身事业。其中有些人深受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敬佩，被选为地方苏维埃代表。例如留居苏俄的华工著名领袖刘绍周和徐才^①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在外贝加尔地区阿尔巴盖煤矿也有华人当选为苏维埃代表。^②

列宁会见过华工代表。1918年11月29日，列宁接见了华南和华北的两位代表刘绍周和张永魁。^③刘、张二位代表向列宁报告了中国政局，并允诺中国劳动人民将全力支持苏维埃俄国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的正义斗争。

俄共(布)为使广大的华工认清苏维埃俄国革命变革的深远意义，向他们开展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在这方面党首先依靠华工中的积极分子，即地方苏维埃代表和工作者。那些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先进华工尤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中国的国际主义者努力联合华工积极参加俄国的各项伟大革命变革。经过少数加入俄共(布)的中国同志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华工的第一批革命组织终于诞生了。

1918年初，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许多大工业中心和东部若干地区即已建立起华工革命组织。成立之初，其活动宗旨是：支持苏维埃政权，拥护苏维埃政府的措施，组织华工支援年轻的红军。1918年年中，在莫斯科成立了“莫斯科侨民协会”，会员皆为华工，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国家内政的干涉，坚决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称“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唯一的与人民休戚相关的政权”。^④1918年初，在乌拉尔地区的华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21/22，目录1，储存单元20，第8页。

② 见《为了苏维埃政权》文集，赤塔，1957年版，第427—428页。

③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711页。

④ 1918年9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6期。

工中间开展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叶卡特堡、彼尔姆也相继建立了华工组织。

1918年华人共产主义者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积极创建留居苏俄华工的统一革命组织。俄共(布)穆斯林组织中央常务局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常务局设有东方民族国际宣传部，宣传部下设中国处。^①在中国处的协助下，华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团结教育大为加强了。1918年年底，创建留居苏俄的华工统一组织的筹备工作完成。同年12月，各地华工革命组织的代表会集彼得格勒。出席会议的代表正式成立留居苏俄华工联合会，^②下设地方分会。联合会成立不久，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组织，会员达6万人之多。联合会属于共产主义组织，受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在一份文件中谈及这个联合会时说，它是“无产阶级组织。业已办理合法登记手续，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土上的积极活动的组织。该组织……成立了共产主义者支部，出版名为《华工报》的中文共产主义刊物，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与工农政府密切合作”。^③

设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特林堡、上乌丁斯克、彼得格勒、乌克兰、中亚细亚及其他地方的分会也都建立了共产主义者支部^④。这些支部一成立，便立即归入俄共(布)地方组织，它们纷纷表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也就是他们的切身事业。以斯柳

① 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会记录》，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版，第498页。俄共(布)穆斯林组织常务局正式成立于1918年11月。

② 见1918年12月15日《真理报》，第273号。

③ 见H·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并肩战斗》，第29页。

④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21/12，目录1，储存单元10，第2页；储存单元17，第7页；储存单元33，第1页。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华工联合会地方分会的共产主义者支部改组为共产党团。

坚卡火车站(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为例。该站华工共产主义者支部成立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我们华工推举自己的同志与俄共(布)地方组织联络,从而我们彼此打成一片,组成共同的工人共产主义大家庭。”^①在上乌丁斯克华工支部成立大会上,华工通过决议,强调指出:“俄国工人同志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为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起见,特建立共产主义者支部。今后,支部将同俄共(布)上乌丁斯克市委员会合作,共同开展党的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②

同俄国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华人包工头和商人,企图瓦解工人组织。多亏华工共产主义组织开展工作,资产阶级妄图拉华工共产主义组织下水的阴谋才未得逞。华工拥护共产主义者,使资产阶级分子陷于孤立。例如,1918年9月底彼尔姆的华工毅然退出了原先的“华侨联合会”,理由是:“侨联有资产阶级的色彩。”^③在全国各地只要阶级敌人施展阴谋,妄图使华工背离革命轨道,华工就必然奋起给予有力的回击。华工第一批共产主义组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俄共(布)内能够产生这样的组织,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以统一的、实行集中制的、战斗的组织而出现的,它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全体无产阶级。中国的同志加入俄共(布),使他们实际受到政治领导的严格锻炼,受到了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的统一阶级大家庭成员彼此实行同志式合作的严格锻炼。

忠于国际主义义务的苏俄共产党和政府,为留居苏俄的华工组织从事富有成果的活动,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使他们得到了印刷厂、物资和房屋。自1918年11月起,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宣传部开始出版了《华工日报》,并以大量的篇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372,目录1,储存单元219,第19页。

② 同上,第19—20页。

③ 1918年10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0号。

幅报道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

华工的地方共产主义组织用中文出版了大量的政治刊物。例如，在阿穆尔州，自1920年5月起，每月出3期《共产主义之星报》，印数达5000份。^①仅从1920年5月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主义者在阿穆尔州散发各种号召书和传单就有23000份，中文小册子5000册，《共产主义之星报》58000份。^②中国共产主义者为开展革命宣传，经常举行群众大会和劳动者集合，就中国革命运动、国际形势、留居苏俄劳动者的任务等问题，发表演说和报告。为培养宣传干部，俄共(布)的中国组织举办了党务训练班和宣传鼓动员培训班。有许多中国共产主义者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外国组织的别国同志一起学习。例如，有39名中国同志参加匈牙利宣传鼓动员培训班学习。^③

到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者在苏俄的活动更趋于组织化。由于各地党组织的大量发展，亟须成立一个能直接联合指导各地党组织活动的中央机关。1920年6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华工共产党党团提出建立中央机关的决议案。6月25日即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成立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④次日，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华工共产党党团致函列宁，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中国工农得解放的一天终将到来，那时，5万万中国劳苦大众将同俄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⑤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储存单元173，第18页。

② 同上，第70页。

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目录1，储存单元29，第19页。虽然俄共(布)外国组中的中央联合会未设中国工作部，但实际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全部活动与俄共(布)外国组织的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④ 同上，全宗54/64，目录1，储存单元11，第3页。

⑤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461，目录1，储存单元47842，第3页。

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是俄共（布）外国组织的组成部分。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成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唯一中央机关。^①该局设在莫斯科，^②并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经中央组织局决定，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俄华人共产主义者组织代表会议，该代表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组织局制定了苏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章程。^③中央组织局的执行机关是主席团，主持日常工作。主席团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并就华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的原则问题同俄共（布）中央进行磋商。主席团还指导秘书处的的工作，秘书处负责处理组织与技术方面的问题。中央组织局由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他们都是经受过革命斗争严酷考验的人。中央组织局委员之一尚伯丰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任团长，另一位委员单富相具有组织才干，曾组织过国际部队。^④

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机关由俄共（布）中央确认。地方组织则由俄共（布）省一级委员会确认。为了加强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组织工作，中央组织局派出50名党员到彼得格勒、叶卡特林堡、东里雅宾斯克、伊尔库茨克、乌克兰、中亚细亚和其它地区。^⑤为领导党组织，还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同俄共（布）委员会协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下面设立了这样的组织局。领导该局的是共产党员赵永禄。^⑥

中央组织局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问题，中

① 同上页注⑤，全宗21/12，目录1，储存单元17，第1页。

② 1920年秋，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组织局迁到赤塔，因为大多数华工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而且，华人共产主义组织也集中在这些地区。

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储存单元29，第24页。

④ 同上，全宗514，目录1，储存单元4，第8页。

⑤ 同上，全宗17，目录2，储存单元29，第6页；全宗514，目录1，储存单元4，第7页。

⑥ 同上，全宗54/64，目录1，储存单元4，第41页。

国人民的革命民族解放问题，在华工中间开展工作问题，都是中央组织局讨论的问题。例如，1920年7月31日，组织局讨论了华工的状况，8月7日讨论了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问题，10月5日讨论了加强对鄂木斯克华工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群众工作问题。^①不过，中央组织局的工作不限于向在苏俄境内的华工开展党的工作。中央组织局还设法联络本国的革命组织。据我们知道，1920年中央组织局就派遣了10名党员回国联络。^②同样，中国国内的革命组织也极力希望与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国内的革命组织为本国同胞参加俄国工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正义斗争和向布尔什维克学习革命斗争本领而感到自豪。华南工人在告留居苏俄的华工书中写道：“当你们返回祖国，在本国同胞中播下俄国革命种子时，全国同胞将奋起共同斗争，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而在东南亚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使全世界为之一变。”^③中国曾有代表专程来到苏俄介绍中国劳动人民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进程。为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天，刘少奇同志同几十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道首次来到苏俄。^④

留居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者深知孙中山领导的广泛民主运动的革命意义。他们力图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中央组织局1920年度在一份电报中谈到，中央组织局曾派遣1名党员与孙中山建立私人联系。^⑤

中央组织局自成立之日起，就与共产国际取得密切联系。1920年7月，中央组织局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允许组织局派代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储存单元29，第1、2、12页。

② 同上，全宗514，目录1，储存单元4，第7页。

③ 见1960年12月8日《真理报》，第134号。

④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储存单元4，第5页。

⑤ 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刊出版社，莫斯科1934年版，第621页。

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满足了这一请求。出席代表大会的组织局两名党员代表获得发言权，^①并参加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1920年7月28日，刘绍周代表侨居苏俄的华工，并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他介绍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刘绍周向代表大会指出：“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都具有意义，这是因为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亚洲深深扎下了根，并且妄图把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西伯利亚，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以及南美洲。今天能够与日本帝国主义抗衡的唯一因素就是中国劳动群众的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②

中国共产主义者认为，以实际行动支援苏维埃共和国英勇反抗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是自己主要的革命义务。他们主要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并带动本国同胞也随着参加。同所有的国际部队一样，中国部队是完全自愿建立起来的。

必须指出，苏维埃政府为华工自由出入俄国国境提供了一切条件。截止1918年5月，回国的华人达4万余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以及高尔察克的反革命叛乱，使苏俄同中国经西伯利亚的交通线长期中断。随着外国武装干涉和协约国舰队的入侵，经敖德萨的海上交通线也受阻。留居苏俄的华工同阶级兄弟苏俄工人同舟共济。他们积极参加保卫苏维埃国家，坚强地克服战时的一切艰难困苦。1919年，加入红军、游击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华人同志已达4万人之多。

主持成立华人国际部队的都是华人共产主义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还协助俄共(布)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指导军事委员部组建国际部队的工作。在组建国际部队方面，功绩卓著的华人共

① 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刊出版社，莫斯科1934年版，第125页。

② 同上。

产主义者有：单富相，任辅臣，沈成贺，单伯峰。^①

由华人志愿者组成的部队始建于1917年。先是组建了1个营，由共产主义者单富相主持组建工作。首批华人志愿部队的建立，为组建国际部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华人共产主义者倡议，1918年秋在莫斯科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所有华人部队的特别司令部。由共产党员沈成贺任组建部队的政治委员。凡有中国居民的城市，均派驻司令部的代表。在组织上，司令部并不隶属于俄共(布)中央外国小组联合会，但是它与中央联合会所属的负责组建国际部队的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司令部还得到红军国际部队组建委员会（1919年春改名为红军国际部队组建管理局）的帮助。该委员会由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共产党员、捷克斯拉沃亚尔·恰斯捷克担任领导。

1919—1920年，华人志愿军以连和团的规模，分别在东线的苏军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南线的第十和第十一集团军，西北战场的独立第七军团和北部战场的独立第六军团中英勇地作战。华人部队表现出高昂的战斗精神，他们勇敢杀敌，视死如归。他们与红军中的其他国际部队并肩勇敢地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为苏维埃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援助。

节译自《苏共党史问题》1961年第4期

罗峪华译

林荫成校

^①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全宗17，目录5，卷宗820，第83页；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储存单元4，第8页。

长江流域战场的一段往事

(苏)K.П.卡扎科夫

译者按：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卡扎科夫现任苏联国防部总监察员组顾问军事监察员，炮兵元帅。1938—1940年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当顾问。本文是作者的回忆录《进攻弹幕》的一个片断。

1939年底，长江流域中日战场局势紧张，我不得不绕大圈经南部地区奔赴到任地点。虽然10月过去了一半，但秋意不浓。我们的汽车在山路上奔驰。四周是一片绿色的热带树林。天气闷热，连夜间也不觉凉爽。我们在落满小蚊子的蚊帐里，在山间猴子的哀鸣声中睡觉。这个在画片上如此诱人的热带，竟令人不胜厌倦。

我的旅伴是宋(译音，下同)翻译和传令兵李贵(译音，下同)。同路西行使我们很快就互相认识了。在衡阳附近，我们遇到了空袭。宋慌忙从车上跳下来，朝道旁的沟壑扑去，由于跑速过猛而绊倒在地，把脸摔破了。李传令兵一把抓住我的手，冲我说了句什么，把我拽到路边一个深坑里，在那里，我们一直呆到日寇空袭停止。“可信赖的小伙子！”我想。后来的前线生活证实了这一点。李原来是上海一个玻璃吹制工，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士兵。他成了我的战友和助手。而宋翻译依旧是一个旅伴。他有两个长处：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和精通俄语。缺点较多，其中主要一个是过分胆怯。平时，他显得萎靡不振和无精打采，到了危险时刻却格外机灵，逃跑起来活象个短跑运动员。他长了一双凸眼，可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听觉也不灵。要是我事后问他往哪儿跑和为什么跑，

那他会什么也想不起来的。在战场上和这种翻译打交道真伤脑筋，可又找不到别的人。

10月底，我们的长途旅行总算结束了。我们从南方起程，穿山越岭，终于进入长江流域，朝上海—南昌铁路线方向进发。这两座城市均被日寇占领，但是，它们之间的通路，确切地说是一部分通路，仍在中国军队手中。我们改乘火车。烟囱象大蘑菇的旧式机车拖着5节肮脏的车厢，把我们送往目的地——上饶车站，送往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中国军官前来迎接我们，把我们领到一所有两间干净和凉爽的房间的、摆着行军家具的竹结构房子里去。

翌日，我向战区司令长官（按照我们的标准，中国的战区等于一个方面军）顾祝同，以及炮兵团长娄绍凯作了自我介绍，我还和司令部其他将领与参谋们认识了。最初的印象是：司令部，用水兵的话形容，是“风平浪静”。人们走路慢慢腾腾，说话滔滔不绝，干活磨磨蹭蹭。大家一同去吃早饭、第二顿早饭、午饭……这给本来就慢条斯理、无所事事的他们增添了一些消磨光阴的时机。“真有意思！”我想，“也许，他们早已作好进攻的准备，所以再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和作战处的参谋、侦察兵以及炮手交谈后才明白，首席军事顾问A·H·博戈柳波夫在重庆时对我讲的进攻计划，顾将军的司令部根本没有拟定。

我同参谋们俯视长江（中国人常把这条河叫做“江”，“江”在俄语要大写）流域日军与中国军队部署图时的谈话就是一例。我问参谋：

“听说，战区部队准备7月12日进攻，是吗？”

“是的。”他们答道：“不过，大本营已将日期改为7月27日。”

“什么原因？”

“后方的道路和桥梁没有修好。”

“现在是否在修？”

“我们没有接到完全的情报。需要询问工兵。”

补充一句，进攻日期由7月改为9月中旬，后又推迟到10月中，眼看这个月快过去了，而新的作战日期还没有定下来。我把工兵叫来。这才发现，道路也好，桥梁也好，都没有为调动和集中炮兵作好准备。这是怎么搞的？半年来，蒋介石在重庆的大本营一直谈论在长江流域向日寇发起总攻，可是在这里，在前线，谁都不想先动手。

唉，我想，算了，在新日期确定以前，我们先把炮兵的突击力量集中起来。工作进展缓慢，因为炮兵分散在各个战线上，必须使它们向预定的突破地段集中。我连续两夜坐在自己的竹屋里，在炮兵文件上分别说明将大炮由非主攻方向重新配置在主攻方向的情况、弹药使用量、未来进攻地形的预先勘察。我尽心尽力地干，因为这是我作为军事顾问的头一项工作。它经过司令部各处处长、以娄绍凯将军为首的炮兵专家的讨论。他们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面见顾大将军，他理应批准我的计划。顾仔细审阅以后说：

“计划是好的，但有很大的缺陷。”

“什么缺陷？”

顾说了句什么，宋给我作了翻译。

“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我不明白。”我说，“到底是什么缺陷？”

“很大的缺陷。”宋再次翻译，“长官先生不能批准您的好的计划。”

现在回想起这一次谈话来，感到有趣，甚至可笑，然而当时却顾不上笑。计划是好的，可司令官就是不予通过，为什么，人家不愿说。简直是恶作剧！我直截了当问顾将军，他依然重复“计划是好的”和“有很大的缺陷”那套老话。我只得克制住自己，走了出去。

炮兵团长娄绍凯将军消除了我的疑惑。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解释我计划中的“大错”何在。原来问题很简单。我初步

计划从八十六军、五十军和二十一军抽调炮兵连组建集中指挥的炮兵群。但是，据娄绍凯说，这几个军的军长死也不肯交出自己的炮兵。他们的炮是从德国和英国进口的，他们是用自己的钱买的。炮弹也是买的。他们凭什么要交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产。

“如果司令长官下命令呢？”我问道。

“他不会下命令的。”娄绍凯答道，“所以才认为您的计划不合格。”

“懂了！”我说，“这么说，我们不可能在突破地段部署炮兵突击力量了，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这个中国人表示同意，并且说明，主要取决于我在军长和集团军司令会议上的报告。如果我的报告合他们的意，如果它切中要害，那他们大概会交出自己的炮兵，他们终究还是军人和爱国者嘛。此外，从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预备队抽调的炮兵将要到达。

我只好坐下来重新修改进攻战役的炮兵保障计划。我改写成：从预备队调来的炮兵充当主力。我又一次面见顾祝同将军。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文件，仔细审阅了方案，随即在计划下面签上自己的连笔名字。接着对我说：

“我们这里不能随意调用和在军与军之间来回调动炮兵。这会引来军长的不满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当然，处在我这地位的任何一位炮兵专家都可能起来反驳：部队的战斗力、他们在进攻中的成败主要取决于炮兵，取决于炮兵对进攻的步兵支援的强弱。然而，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反对意见毫无用处。我已经确信，国民党将领之间的私人关系对军事的影响远远超过战术和作战原则。我对宋翻译说：

“请你问一下将军，为什么他不当即说清楚，我的计划的缺陷何在？”

宋翻译了。顾将军回答了半天，甚至查阅了中国古代军事史。

他回答的总的意思是，据他说，他当时不可能指出我那“好的”计划中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事关重大。症结何在，我始终没弄清楚。

翌日，顾祝同在第三战区司令部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4个集团军的司令和10个军的军长，以及参谋。炎热的11月的一天，上午10时。大家各就各位，靠桌子坐了下来，并且摊开了地图，顾将军宣布开会。宋凑近我耳边，低声翻译顾的讲话，说着说着突然打住了。从他那瞪得圆圆的眼睛和空荡荡的眼神中我觉察到，宋从大伙的情绪中预感到危险逼近。果然，天上飞机马达的轰鸣声听得越来越清楚。“渣潘！”（把英语的“日本人”念歪了）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于是，大伙慌忙朝门口奔去。转眼间，只剩下我和李贵两个人呆在那些被推倒的椅子、摊开的地图和摆着瓷茶具的桌子当中。

我给传令兵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把椅子扶起来，我则把地图收拢。我们开始行动。当然，倘若我处在自己人当中，那我不会逞强，也会往防空掩蔽部跑的。但是，此时此刻，我和中国指挥员彼此都很熟悉，记得有一次，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叙述了他生活中的一件事。他来到了骑兵第一军，开始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时，白匪的飞机前来空袭。大伙四散逃跑，唯独他仍旧站在敞篷马车上。为什么？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认为，躲避白匪，对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来说，是很不相称的。他承认，当时心里非常害怕，但外表却装作若无其事。眼下在这里，在中国城市上饶，我不仅是康斯坦丁·卡扎科夫本人，而且是红军的一名少校。是它的战斗威信指引着我，我应当用自己每一个言行来维护这个威信。在危急时刻更是如此。

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中国将领们一直等到空袭结束才从防空掩蔽部返回司令部。宋也露面了。我请顾将军让我发言。我说：

“诸位！看来，日本人很守时。你们看到，他们在10时整我们宣布开会时准时到达。我建议下一次得给他们的谍报机关摆个

迷魂阵，迫使敌机会后才来。”

这席话把大伙逗乐了，尽管玩笑中包含着痛苦的真理：日本侦察机关四处竖起耳朵听。我报告以后，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我开始感到，他们在第三战区对我所存的戒心已经消除了。

大家开始比较认真地准备进攻战役。修复了后方的道路和桥梁。总司令部预备队的炮兵和新补充的步兵师即将到达。但是，进攻日期仍然不清楚，从11月26日推迟到12月5日，后来又推迟到11日，最后竟延至12月16日。对于再三延期一事，蒋介石的大本营和顾祝同司令部列举了许多理由。然而从话语中可以感到，他们显然不想发起攻势，害怕又一次失败，不相信所部的战斗力和专业技能。

苏联军事顾问早在1939年6月就打算通过实施在长江流域发起大规模攻势的计划围歼华中地区的日军，然而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此计划逐步被国民党的将领们放弃了，他们含糊其词地说：“决战不会获得应有的效果，相反，可能对我们的策略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这种想法，我们早在准备进攻过程中所收到的蒋介石的手谕中就已领教过了。手谕强调：“如果敌人采取小兵力作战，则予抵抗……万一战线被突破，则撤到新的防线去……在日军战斗力薄弱的地方，可用不超过一个营的兵力进攻。”

你说，这是什么话？部队在准备进攻，而最高统帅在自己的手谕中公然一开始就号召谨慎从事，号召务必作防御的准备。要用不超过一个营的兵力进攻！简直是胡说八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长江流域发起攻势的准备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为了选择炮兵阵地乃至一个炮兵连的独立发射阵位，我忙得不可开交。问题在于，中国炮兵的观点和方法多半极其陈旧。他们只知道把大炮推到山丘或者陡岸这些较高处，从暴露的发射阵地开炮。日本人则把他们的炮垒隐蔽在褶皱地带。我认为，他们能够尽情地观察中国炮兵是怎样按照老的作战传统作战的，并且利用这一点从隐蔽的阵地向对方开炮。

娄绍凯将军比起他的许多同行来，军事素质更好一些。当然，这对我们合作共事是有利的。他帮助我了解当地军人作风的特点。比如，向我解释为什么顾祝同司令长官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来准备进攻战役。

“他无暇顾及。”娄绍凯对我说：“他一人统辖浙江、福建、皖南和赣东地区。此外，他还是一个大土地占有者。蒋介石委任他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不是因为他有指挥军队的才干，而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他是自己人。现在，他所控制的田庄供给他的军队以粮食，顾将军则毫不吝啬地用国家的钱财支付这些粮款。他让其他经商和经营土地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挣够捞足。您明白我们这个复杂的内幕吗？”

“完全明白！”我说。

“那好！”娄绍凯将军最后说：“顾将军还十分起劲地同外国公司做生意。他整日东奔西走，时常为商务操心。因此，军事问题最好别找他。即使他愿意也帮不了忙。他是一位将领，却不是个军人。”

按照经过6个月一再缩减和反复磋商的进攻计划，第三战区部队当前必须肃清长江南岸的日寇，即且战且进10至20公里。乍一看，任务完全可以完成，因为与配置在60公里战线上的中国第五十军、第八十六军和第二十一军这三个军对峙的是日本四个步兵营组成的防线。那是一些独立的据点，从总体上说不是防线，而是“一串据点”。然而就是这“一串据点”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江边，而装载着日本军用物资的汽船和帆船就在江上日夜往来穿梭。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39年12月16日，娄绍凯将军从观察所发出了信号，响起了首次大炮齐射的轰隆声。山丘前方清晰可辨的战线被大炮爆裂产生的烟柱遮盖了。泥土向上喷吐，黑色的烟幕中闪烁着炮弹爆炸时的火光。在这浓密的炮火中有时会突然出现空白点，就是说，不知是哪一个炮兵连没有遵守规定

的射速。于是，娄绍凯在话筒里怒吼，要求向“空白点”开炮。偶尔可以看到，敌步兵从他们射击的堑壕里跳出来和跑到一边去，企图躲到山脊后面。不过，炮兵准备的精密程度的最好证明是敌炮兵连的沉默。炮兵第十四团的重炮朝它们猛轰，并且击中了目标。

关于这个团，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它的平(译音，下同)团长，我可得多费点笔墨。平有亲日倾向，这在当时国民党军队里不算犯罪。就连国防部长何应钦也不掩饰他的亲日观点。不过，国防部长远在天边，而平团长却近在眼前。他很有礼貌地留心听了我的建议，临末尾说了半天保证和许诺的话，然而根本没有将我们一起制订的计划付诸实施。须知，炮兵第十四团是对付日军炮兵主力的。我只好和平谈谈。他不再妨碍我了，而且后来还帮助我。我们使该团充分做好反击敌炮兵连攻击的准备。因此现在，当我从炮队镜观察第四炮兵连向泮枫(译音)山山丘上严密设防的、大炮林立的日军据点开炮的情形时，心中充满喜悦。他们打得真准！命中率高的炮兵准备使敌人猝不及防，不仅使它在军事上，而且在精神上遭受损失，在日军当中引起一片恐慌。我和娄绍凯用望远镜观察惊恐不安的敌阵地，并且把自己的印象告诉参谋们，他们听后立即相互祝贺胜利。现在祝贺是否为时过早？繁难得多的战斗阶段即将到来。步兵突入了敌防御纵深，继续推进能否成功将完全取决于基层指挥人员。

经娄绍凯许可，我前往炮兵第二团团长张文(译音，下同)的观察所去。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营进攻时的战斗队形。日军的机枪或者射击组一开火，中国步兵就开始聚拢，结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山坡上躺着许多死、伤士兵。

显然，炮兵对步兵的支援很不力。张文同炮兵连失去了联系。将近中午时分，我们同它的联系才得以恢复。但是另一件倒霉事又降临头上。炮兵连连长相继报告炮弹告罄。第八十六军各个战线停止了射击。

下午5时，第十师的步兵奋不顾身占领了一连串制高点，第十六师下属的团包围了布林(译音，下同)山上的日军据点。这是最后一次战斗冲击。从前沿阵地到后方，一长队抬着担架的卫生兵在缓缓行进。

暮色渐浓，四处的篝火闪烁着飘忽不定的橙黄色的亮点。中国士兵聚到铜锅跟前，领取自己那一份大米饭。

娄绍凯将军打电话找我。我们谈了几句。我说，我不准备回司令部。没有时间。清早以前，我还要同张文拟定攻克布林山的计划。如果我们拿下这座山头，我们就可以向长江的新、旧河道，以及大通附近的桥梁开炮。

12月17日晨初降瑞雪，并且很快就融化了。天气晴朗，它给几乎把布林山围得水泄不通的中国士兵带来了胜利。当我和张文跟随步兵登上山顶时，我们在坍塌的堑壕、毁坏的掩蔽部、杂乱的铁蒺藜当中发现了第一批战利品——日军的反坦克炮和山炮、迫击炮和火箭筒。

从布林山可以眺望长江。只有一部分看得比较清楚，但这足以置日本的军舰和运输船于我们射程之内。火力网严密地封锁住长江，我们接二连三地把敌舰船打沉。面对这种场面，连那个胆小的宋先生也鼓起了精神，似乎尝到了战场上翻译工作的滋味。

娄绍凯乘着轿子，带着一帮参谋和警卫来到我们这里。他察看了向长江开炮的情形，随即给重庆蒋介石的大本营拍去了报喜的电报。他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但蒋介石回电了。大伙相互祝贺，也向我表示祝贺，宋翻着白眼低声说：“您明白吗？卡扎科夫先生！最高统帅蒋亲自拍来了电报！亲自！”他用北京话称蒋介石为蒋。大概，这种称呼听起来更有份量。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中国第八十六军继续唱进攻高调，但没有丝毫实际行动。战场上空出现了日本的机队，它们从早到晚轰炸和向中国步兵扫射，进攻的激情完全消失了。距离长江南岸还不到三四公里，步兵就躺下隐蔽起来，你是推也推不动，叫也

叫不起的。在这些日子里，我头一回听到，后来不止一次听到像参谋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们大大激怒了日本人！”这句话的意思自然而且必然引伸为：“我们不该激怒日本人”。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作为中日战争的参加者，我看到，蒋介石的所谓“我们的策略”不过是企图用困惫敌人的办法，在力求“不激怒”他们的情况下温和地取胜。

这种奇怪的策略在长江南岸交战中的具体后果就是中国指挥人员不敢投入预备队。预备队人数众多。12个步兵师中，积极作战的只有第十和第十六两个师，其余师充当配角。无论是12月19日，还是以后的日子里，它们都没有投入战斗。中国步兵仅仅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才得以把日军几个营的残部扔进长江，并且得以展开突击，逼近大通和安庆，彻底摧毁日军的防线。

“为什么不投入预备队？”我问娄绍凯。

“日本人可能袭击两翼。”他答道。

我同中国将军和参谋们交谈不止一次，他们的说法大同小异。他们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必须保存预备队，以应转入守势之需。炮兵第二团团长张文有一次含着温和的笑容对我说：

“我们的将军学会了躲避日本人。至于追踪日本人，他们眼下还不会。”

12月20—22日，趁精力、决心和对胜利的追求尚存之际，还可以干点什么。可是到了12月23日，这种可能性就化为泡影了。

12月24日清晨，情况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前一天，我从布林山回到了第三战区前沿指挥部。我睡得很死。突然，我被一阵喊叫、喧哗、沉重的脚步声吵醒了。我来到了室外。只见院子里许多士兵和参谋忙成一团。他们把马和骡套在板车上，把箱子、口袋、折叠桌椅以及指挥部其他用具装到车上去。院子当中有人正在火堆上烧一大摞文件。宋翻译急速跑到我跟前，大声说了句什么，俄语里夹杂着汉语。我明白，日本人已经到了五溪桥镇。这是第八十六军的后方。

“五溪桥！”宋嚷道：“我们还等什么？他们说话就到，说话就到！”

李传令兵向我解释，宋想独自乘我们的轻便马车逃跑，但李掏出手枪来吓唬他。

成千上万的军人，当中有步兵、骑兵、坐大车的和乘轻便马车的军官，在乡村的街道上一窝蜂地往前涌。在人流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将校军官，李贵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他们是怎样“溜走”的。无疑，第八十六军（可能还有邻近的几个军）正在仓卒撤退。

我们乘上自己的轻便马车加入了人流。我们向东南方向的青阳撤退。一路上不断有大批士兵、军官、苦力加入这个人流。据我目力所及，道路已被狼藉撤退的部队挤得水泄不通了。日寇的歼击机偶尔从部队头顶上面飞过去。它们超低空飞行，用机枪向人群扫射。人群纷纷倒下和四散奔逃。日机飞走以后，路上又恢复了拥挤的原态，人群绕过马和人的尸体向远离战场的地方涌去。我们在青阳追上了炮兵第十四团。我们同平团长彼此点头打招呼。我从他嘴里又一次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什么“我们可是把日本人给激怒了，现在休想阻止他们前进。”我从另一个我认识的军官那里得知，顾祝同命令第八十六军军长向日军实施反冲击，但军长已经往南走得很远了，他打电报给顾将军，说他决定在山区同日军进行游击战。

部队继续狼藉地撤退。我通过宋向士兵和军官打听为什么撤退，在什么地方和如何攻击敌人。谁也没有回答清楚，不过，大伙一再强调，日军已从两翼迂回包抄。这就是士兵们惊慌失措、集体出现精神变态的来由，而这种精神变态正是国民党军的战斗行动完全缺乏原则性造成的，是国民党将领们萎靡不振的行动造成的，是那种甚至在拥有明显压倒敌人的优势的情况下的恐惧心理造成的。

日军用小量兵力实施反冲击本身，说明了国民党军队后来的整个行动。日军击退了第八十六军和收复了他们在一排山丘上的

据点以后，就不再前进了。截至12月26日，日中两军之间的间隔已达20至30公里，一切又开始平静下来。饿得瘦弱不堪的士兵在寻找自己的部队，因为别人的锅里没有他们的口粮。坚决抗日的指挥员把士兵集中起来，在仓促挖掘的小堑壕里建立相似的防线。我发现一张熟悉的圆脸。哦！这不是张文吗？他为什么在此地，而不是在屯溪？他挥了挥手说：

“往屯溪跑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我到那里干啥！再说，这里没有人。”

他说明，必须调炮兵第二团的大炮来支援步兵，并说，如果我助他一臂之力，他将不胜感激。我们开始行动。我们给每一个炮兵连找到了发射阵地，并确定了方位。总之，在这个阵地上建立了火力系统。傍晚时分，前沿指挥部，后来还有娄绍凯同我们用电话联络上了。晚上，传令兵送来了首席军事顾问的信。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博戈柳波夫祝贺我生日。可我在忙乱中竟忘记我已满37岁了。

翌日，我被叫到第三战区司令部，他们希望我在原来那个方向组建炮兵群。顾将军声明，他准备重新向长江流域发起攻势。

译自〔苏〕《今日亚非》1986年第10期

丁如筠译

关于陈炯明致列宁的信 和李烈钧告苏俄人民书

后来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曾经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8年夏，陈炯明在孙中山策动下，率领粤军攻占了福建漳州等地。陈炯明攻占漳州以后，不仅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思想，而且也同孙中山一样，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为此，他曾在孙中山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漳州进行了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从而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很高评价。在国际上，尤其是受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注意。苏俄、共产国际不仅发表文章赞扬陈炯明的种种进步行动，^①而且派人亲自到漳州拜访陈炯明。波达波夫就是其中最早会见陈炯明的苏俄友好人士。

波达波夫原是沙俄军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浪潮中，迅速转向了布尔什维克。^②波达波夫于1919年前后在中国活动。他曾与当时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多次会晤。^③1920年4月底和5月初，他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双方进行了交谈。此后，波达波夫又到香港，与在那里的国民党又一重要领导人李烈钧会晤，然后回国。波达波夫回国时，陈炯明托他带回一封《致列宁的信》，李烈钧托他带回一份《告苏俄人民书》。波达波夫于1920年10月回莫斯科，向苏俄政府领导人汇报了他在中国同孙中山、陈炯明、李烈钧等人

① 见《共产国际》德文版，第2卷，第16期。

② 见叶菲莫夫：《孙中山——道路的探索，1914—1922年》，第117—119页。

③ 见韦慕庭：《孙中山，一个受挫折的爱国者》，纽约，1976年版，第115—116页。

会见的情况。^①随后，苏俄政府就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上发表了陈炯明致列宁的信和李烈钧《告苏俄人民书》。《公报》还赞扬陈炯明“坚信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将军，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并得到群众的拥护”。^②

尽管孙中山早在1918年夏就致电苏俄政府祝贺十月革命胜利，1921年8月又复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感谢他于1920年10月的来信。但是，据现有资料来看，孙中山直到1922年底才亲自写信给列宁表示友善之情。^③尽管陈炯明后来背叛了孙中山，并表示了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但他却是第一个直接写信给列宁祝贺十月革命和欢迎苏俄对华宣言的中国人，下面就是陈炯明致列宁的信和李烈钧告苏俄人民书。

陈炯明致列宁的信 (1920年5月)

列宁吾师！

我感到特别高兴和幸福的是在远方听到你们国家的革命取得了成功。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

中国人民有着五千年的文明。高度的人道主义原则早就成为我国人民的特征，而且成为远东文明的中心。

不幸的是，中国外受列强的掠夺和侵略，内受君主专制的压迫，因而不能在世界上实现人道主义的原则。

现在，俄国人民及其领袖，为了全人类的解放，用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来消灭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建立在布尔

① 见叶菲莫夫：《孙中山——道路的探索，1914—1922年》，第117—119页。

② 见义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年》，1968年英文版，第305页。

③ 见卡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年》，1983年中译本，第16—17页。

什维主义基础上的新的俄国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的时代。

劳农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宣言已经到达中国。所有的中国人民都充满了极大的谢意。

近几天，波达波夫将军已到达这里同我会见。他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并给我讲述了关于新的俄国的情况和扩大自主原则的方法。这使我感到十分喜悦。

我深信新的俄国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相信它对 中国 即将到来的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在它的帮助下，中国人民，经过斗争和牺牲，将会更早地获得独立，摆脱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建立新中国。

新的中国和新的俄国将以兄弟般的友谊携手共进。

我更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想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这一制度。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

我作为福建省政府及我的军队的代表，仍象过去的广东政府一样，对您表示真诚地拥护。我还代表我们遍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同志及我的革命人民支持您。

我祝贺您的劳农政府及新的俄国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您的国家在将来繁荣昌盛。

向列宁及所有您的同志致以问候。

福建、广东、广西省军队大本营

陈炯明(签字)

李烈钧告苏俄人民书

(1920年5月)

代表先生们!

我们十分高兴地利用波达波夫将军路过香港的机会，通过他向你们致意，以加深我们同俄国人民及其代表的联系，并确立牢

固的关系。

俄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经过无数牺牲换来的，这是达到自由、团结和平等的道路，这条道路给我们以极大的吸引力。我们密切注视着你们坚定地支持人民政权和领导人民革命的每一步。你们的坚强不仅使所有的人震惊，而且迫使那些对你们的纲领持敌对态度的反对派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这种状况的确立是将来各族人民之间可能取得谅解的第一步。

中国人民对兄弟般的俄国的革命有特别的兴趣。中国报刊在展示着俄国人民的巨大势力，并愿以此为榜样。你们的纲领激励着中国，这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全民族的信念。

我们之间的友好往来将使两个民族联合起来。在上述信念的支持和影响下，在新的纲领的指导下，这种关系将更加密切。

我们高兴地看到，你们政府的观点已经公布。我们正在加紧研究这些观点，并将唤起我们的同胞，给予注意。

向你们，俄国人民，表示我们兄弟般的祝愿。

请接受我们对俄国人民及其代表所表示的深情厚意。

南方政府大本营总参

谋长李烈钧

译自《中苏关系文件集》，第49-51页

刘德喜译

简评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一次知识分子革命》

冯 崇 义

华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周策纵教授1960年所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一次知识分子革命》，20多年来被西方史学界奉为该课题的经典著作。他们称“这一本材料完备的卓越著作，是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所必不可缺的参考书”。至1980年，本书再版了5次。

一

该书是长达486页的大部头专著。应该说，周先生在这里是以严谨的态度、丰富的资料，在西方世界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五四运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变。全书分两部分共14章，第1部分从社会政治角度考察了“五四运动”的起因、过程及其后果。第2部分进一步探讨了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书后附有年表和4个附录。作为该书的补充，作者1963年还专门编辑出版了《五四运动研究资料》。

第1章导言，作者在这里陈述了“五四运动”的定义、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意义。作者将“五四运动”定义为“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知识分子的其他社会政治活动在内的一场复杂的事变”。他以为“五四运动”应以1917年新知识分子集结于《新青年》及北京大学从事新思潮的

传播和文学改革开始，以1921年转向“直接的政治活动”而告终。作者没有将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运动区别开来，而是试图将政治运动纳入思想文化运动中去。在他看来，政治活动只不过是这场由新知识分子主演的多幕历史剧中的插曲，包括“五四事件”在内的五四爱国运动，只是“3年来新思想运动的逻辑结果”。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作者简单地交代了经济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社会方面传统的“社会均势”为经济的变化所破坏，接受了新式教育而又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法由正途入仕的知识分子，开始“领导不安的人民从事‘拯救中华’运动”；政治方面国际列强的和会与国内军阀的和会均使国人失望，“新知识分子认定广泛的、根本的改革是复兴国家的必由之路”。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作者以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第一次意识到必须以西方文明来彻底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运动促醒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与人权观念，运动还伴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

作者在第2章里从两个方面考察了“促使运动爆发的动力”：一是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激发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是海外留美学生、留日学生及旅欧工读生的改革热潮。第3章叙述了“五四运动的最初阶段”。作者认为，以《新青年》成为同人刊物及北京大学改革为标志，新知识分子开始以“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造社会，从而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

第4章专门谈“五四事件”。作者认为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示威的特殊意义不在于示威本身，而在于示威的后果。因为“如果不是北京的学生在示威之后通过宣传、集会、游行等方式争取社会同情而获得新型工商资本家及城市工人的支持，从而引起过时的文明的崩溃及社会政治的新发展，五四示威仅仅是部分学生对军阀与列强的抗议”。第5章叙述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学生运动。第6章叙述工商资本家及城市工人对学生的支持，“五四事件”以罢免卖国贼与拒签和约而告结束。

第7章作者的笔锋转到“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他认为“‘五四事件’后的一年，是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在新知识分子头脑中混合生长的一年。传统的思想和制度受到来自一切方面的攻击，新的学说、主义、思想和知识备受推崇。”他还认为当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较杜威的实用主义远为逊色。

第8章以独立的一章讨论了“外国对运动的态度”。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对外反对的只是侵略政策而绝非笼统排外，它本质上恰恰是一场“西化运动”。日本因为是运动的锋芒所指，因而将运动视为英美支持的“学匪”排日运动，要求北京政府严厉压制。西方国家对运动兼有同情与怀疑两种矛盾的态度。作者特别指出，以美国驻华公使莱因士为代表的美国外交官、记者和著作家，基于威尔逊主义的政治信仰和良心，以及美日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对运动深表同情，而且这一态度“一度为美国政府所认可”；他扼腕兴叹：由于维护商业利益的狭隘心理和对所谓“过激主义”的“歇斯底里症”，上海公共租界对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苏俄对中国则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政策。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以来所有在华利益的“加拉罕宣言”，因为适逢西方对华采取殖民主义政策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潮，收到了“戏剧性的效果”。不过，作者力图说明，苏俄对“五四运动”本身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苏俄的呼吁得到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响应是1920年春“加拉罕宣言”传到中国以后的事。

第9章叙述新知识分子“思想上、政治上的分裂”。作者认为“新知识分子群”的目标与思想各异，只是因为面对共同的对立面而结成暂时的同盟。当运动进一步深入，实现何种社会制度、用什么手段变革社会等课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时，分裂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大致上分裂为4个派别：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左派，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和进步党。第10章小结运动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后果。作者特别强调，学生运动从初期的知识界爱国运动，在中期逐渐介入政治，到后期与政党便发生

密切联系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运动误入了迷途。

自第11章起是该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在这里对“知识分子的主流”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第11章系统地回顾了“文学革命”。第12、13章分析思想界的新、旧学之争。作者指出，“五四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教条的孔学受到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致命冲击，代之而起的是新思想的传播。他欢呼“新思潮的传播是新知识分子最有意义的活动。在‘五四运动’中改革者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新中国，其方法就是以新思想取代传统思想”。而在他的心目中，“新思潮”主要是指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1920年春才开始有组织的研究，其影响在1923年后才增强起来。

第14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以仲裁人的身份评判了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作者以为以上各个派别对运动的评价都是抱有偏见的。其实，作者的观点与“自由主义者”相去不远。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标示，作者将“五四运动”归结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其根本精神就是以民主与科学思想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来“拯救中国”。他写道：“五四运动实际是一场知识界与社会政治界的联合运动，其目标就是通过中国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独立、个性解放和社会正义。实质上，这是一场广泛的知识分子的革命。首先，它基于这样的设想：知识分子的变化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其次，它预示着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转变；最后，它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

二

本书既已在西方史学界享有盛誉，再作恭维似乎大可不必，而指出本书所存在的缺陷倒或会有助于促进学术研究。首先，作者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排斥在“五四运动”的主流之外。作者几乎将全部笔墨都花在知识分子身上，然而，他却力图回避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经过艰苦的探索、坚定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实。作者一味夸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而忽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态度。作者将发端于1918年底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以及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逐步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推迟到“五四运动”之后。而且他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必然兴起视为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迷误。他在“一些进一步的考虑”一节中指出，如果西方列强象杜威、罗素、莱因士等“杰出的知识分子”那样，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果中国自由主义者肩负起对其他社会力量的“领导责任”；如果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领袖对“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社会改革表示同情，中国知识分子便不会“倾向于共产主义”。乍一看来，这些因素的确都是偶然的，但偶然之中却包括了必然。作者幻想帝国主义自愿放弃侵略政策，幻想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赞助中国的民主改革，显然是痴人说梦。作者希望所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当年也何尝不想“领导”中国青年学生呢？只不过胡适等人宣扬的社会改良主义早为人们所唾弃吧了。历史的真谛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接二连三的失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已经触醒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使他们找到了新的出路；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又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便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必然归宿。

其次是作者轻视、甚至敌视政治运动的倾向。作者似乎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总结这场当年他曾经投身其中的运动，但他却是有意无意地执著于他当年的“自由主义”的偏见。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将“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改造，而且将新思潮的发现与传播归结为先知先觉们的智慧和良知，试图使人们相信，一旦先知先觉们“耐心的教诲”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在“真理之光”的照耀下对社会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理想的天堂便会降临神州大地。但

历史早已证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不以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任何改造中国的方案都是海外奇谈。“五四”群英们从思想文化领域转到政治领域，投身现实的革命实践，这是“五四运动”本身合乎规律的发展。当运动过去了40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作者仍然抱怨当年的改革者“缺乏耐性与恒心”，匆匆卷入政治洪流而使“五四运动”越出了常轨，这显然是多余的感伤。

最后是作者在“五四运动”领导权问题上的一些混乱。的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各个派别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主要是批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一观点，力图说明“五四运动”是一场“自发的运动”，或者说是由投身其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共同领导的运动，它仅仅是近代中国此起彼伏的一般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新浪头。诚然，“五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发性，还不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新质已经体现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中。历史家本应以锐利的眼光，捕抓这种指示历史发展新方向的质变。作者主要是在下列问题上步入了迷途。第一，他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仅仅抓住“加拉罕宣言”1920年春才正式传入中国这一事实大作文章，将苏俄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一笔勾销。他没有看到俄国十月革命使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同时也架起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通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桥梁。当西方“老师”以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政策作了充分的自我介绍之后，苏俄对失望彷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具有莫大的感召力。“五四运动”中李大钊那些热情洋溢的文章及当时报刊对苏俄的大批报道介绍，本应进入作者的视线。第二，作者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工人运动只是作为对学生运动的响应而附带地提到，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作为

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事实被轻轻地抹掉了。“五四运动”由知识分子主动这一结论是对的，但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左右了运动的方向。第三，既然作者将马克思主义排斥在五四新思潮的主流之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在“五四运动”中形成、并且成为新知识界的核心这一事实，也在本书中消失了。而“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正是这一运动所造就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肩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作者排斥了上述一系列史实，因而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批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既从社会经济内容方面将“五四运动”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表现形式，同时又从阶级力量配备方面将其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这一正确结论“自相矛盾”。这只不过表明了作者的阶级偏见和辩证思想的贫乏。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稿约

一、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目的在于介绍国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二、本刊欢迎有关中国近代（1840—1949年）历史的下列稿件：

1. 专论译文；
2. 专著摘译或节译；
3. 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或回忆录译稿；
4.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或述评；
5. 国外有关著作的书评或介绍；
6. 其他。

三、本刊并欢迎推荐值得译介的有关文字，建议一经采纳，当赠本刊为谢。

四、译稿要求译文准确，人名、地名、官职、机构名称等，务请查核清楚，引用中文资料应使用资料原文；数字，年、月、日等标写方法，以《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注释一律采用同页脚注。

五、译稿请附原文。如决定采用，即发函通知，一经发表，即按规定致酬；如不采用，妥为退稿。

六、无论译稿或撰写稿，均请使用有格稿纸，书写工整，译文中所附原文请用印刷体书写。

七、来稿请写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名听便。

八、来稿来信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勿寄个人。

11

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编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 海

责任校对：曾学白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面设计：王丹丹

E-146/11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 版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家建材局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356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册

ISBN 7-5004-0133-7/K·14 定价：2.85元

限国内发行